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苏联〕B.B.马夫罗金 著



SULIAN CONGSHU ·苏联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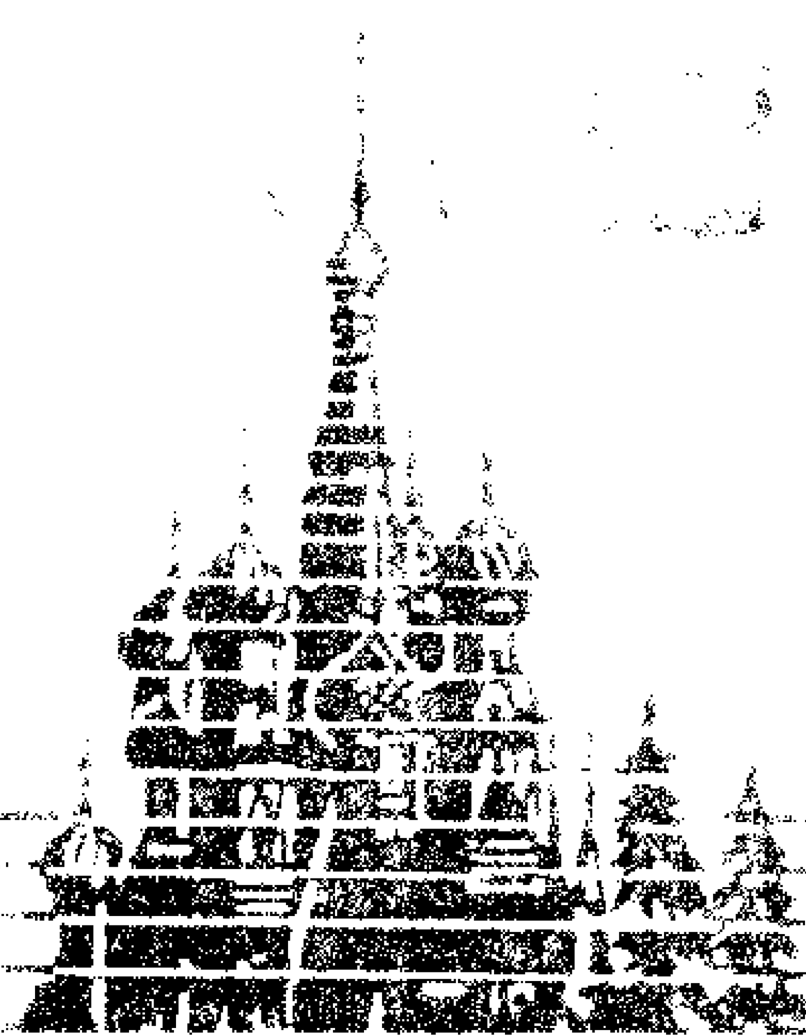
商 务 印 书 馆

·苏联丛书·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苏联〕B. B. 马夫罗金 著

余大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苏 联 丛 书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苏联〕B.B.马夫罗金 著

余大钧 译

责任编辑 何渝生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566-9/K·355

1991年11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4年10月北京第[illegible]次印刷 字数295千

印数 1 000册 印张12 1/4 插页5

定价：10.60元

《苏联丛书》出版说明

苏联的出现与解体，都曾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历史的进程。人们对它及其历史，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是可以理解的。《苏联丛书》正是为这种研究提供学术资料，汇编而成的。这套书的大部分，特别是俄国史部分，是本馆原版书，也有一部分借用兄弟出版社的版本，还有一部分是新组译的。这套书基本上反映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哲学、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的基本概况。这套书的选题，虽经反复研究并征求了有关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仍难免有不妥之处，尚希读者明鉴。

商务印书馆

1993年元月

译者前言

本书是苏联历史学家 B. B. 马夫罗金研究 14 世纪至 16 世纪初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过程的历史专著。原书于 1951 年由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首先分析了 13 世纪中叶至 15 世纪中叶封建割据时期以罗斯东北部为主的罗斯各公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政治史，进而分析了罗斯各公国、各地区逐渐合并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条件。封建割据和蒙古人侵虽曾延缓了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从 14 世纪起，罗斯社会经济已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罗斯人民反抗蒙古征服者、摆脱蒙古桎梏的强烈愿望和抵御立陶宛—波兰王国、德国骑士团等外敌侵犯的需要，则加速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在罗斯各地区的统一过程中，莫斯科公国逐渐发展为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统一事业的核心。这是因为莫斯科地区远离蒙古军队和其他外敌直接蹂躏的地区，周围又有丛林、沼泽作屏障，处境较安全，因此遭受战乱破坏的罗斯其他地区人民纷纷逃避至此，使该地人口迅速增长起来；莫斯科又为重要商道和水陆交通的枢纽，利于莫斯科公国与罗斯各公国、各地区联系，利于莫斯科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 14—15 世纪莫斯科地区农业、工商业的发展，莫斯科公国同罗斯其他公国争雄的物质力量增强了；自 14 世纪前期伊万·卡利塔在位时(1324—1341 年)起，莫斯科公国开始崛起，卡利塔通过用金钱贿赂金帐汗及其妻妾、近臣，取得金帐汗的信任，被敕封为大

公，并受权征收全罗斯的贡赋送交金帐汗国，他乘机捞取贡赋的大部分充实自己的国库，增强经济实力，并利用大公地位加强在罗斯各地的权力，扩展势力；自14世纪后期起，莫斯科公国积极领导了对金帐汗国及其他外敌的斗争，它的经常获胜，使它在罗斯各地人民中声望大振，成为全罗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领导者。1380年，莫斯科大公顿河王德米特里统率罗斯军队在库利科沃原野战胜20万蒙古大军，从而奠定了罗斯摆脱蒙古桎梏的基础。

伊万三世在位时（1462—1505年），莫斯科公国基本完成对罗斯各公国的兼并，初步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同时，伊万三世停止向金帐汗国进贡，彻底摆脱了蒙古桎梏。在基本实现国内统一之后，伊万三世还向北方、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扩展势力，扩大疆土。伊万三世死后，其子瓦西里三世即位(1505—1533年)。瓦西里三世继承父业，兼并了普斯科夫和梁赞，完成罗斯的统一大业，并更加向外扩张。从1462年到1533年，俄国领土从4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一跃而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统一也更形巩固。但拥有严密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的君主专制政体此时尚未最终确立，直到瓦西里三世的儿子伊万雷帝统治时期(1533—1584年)这一制度才渐臻完善（但本书叙述的内容至俄国统一国家形成时止，伊万雷帝时期不在论述范围）。本书除着重讲俄罗斯国家统一的历史背景和统一的历程外，还介绍了统一初期罗斯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本书作者B.B.马夫罗金，出生于1908年，194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著作颇丰的苏联历史学家。他长期研究9至18世纪俄国史，著有《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列宁格勒，1941年）、《古罗斯国的建立》（1945年）、《彼得一世》（列宁格勒，1948年）、《11

至13世纪古罗斯的人民起义»(莫斯科,1961年)、«古罗斯国的建立和古罗斯民族的形成»(莫斯科,1971年)、«彼得堡的建立»(列宁格勒,1983年)、«17至18世纪的俄国农民战争»(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与И. И. 斯米尔诺夫等人合著)和我们即将出版的这本«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本书资料丰富,作者旁征博引,基本以马列主义观点写成,是我们了解俄国统一历程的一本值得重视的参考书。

余大钧

1988年5月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目　录

绪　言

斯大林在庆贺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莫斯科八百周年纪念时写道：

“如果不摆脱封建割据和诸侯纷争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①

“把分散的罗斯联合为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斯大林语）② 在我们祖国历史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只有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才能荣耀地战胜自己的“敌人”——德国立沃尼亚骑士团匪帮和“鞑靼魔怪”（马克思语）——金帐汗，夺得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打退凶恶的克里木鞑靼人，从立陶宛王公处夺回自己的“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并把妄自尊大、贪得无厌的波兰封建主们从白石建造的莫斯科赶出去。

只有把自己的全部国土联合为统一的国家，创造出经济文化发展的条件，大罗斯人才能把密林和沼泽变成田地和城市，前往边远地区“开发土地”，创造出色的手工艺术，建造出像克里姆林宫和瓦西里·布拉任内教堂那样的俄罗斯建筑的杰作，到达遥远的格

---

① 《真理报》1947年9月7日。（斯大林：《贺词》，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535页。）

② 同上。

鲁曼特[1]，深入印度和中国，越过亚洲的东端，并通过自己的先进人士之口发表以独创性和大胆令人惊讶的思想。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拖得很长久。直到伊万雷帝时，拥有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的君主专制政权才得以最后确立，在实行沙皇直辖制度的年代里对封建反动势力采取了严厉措施才镇压了恢复旧制度即封建割据制度的最后企图。但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这座宏伟建筑物的基石是早就由伊万雷帝的父亲和祖父莫斯科大公、"全罗斯的君主"瓦西里三世和伊万三世奠定的，罗斯统一的根源还可追溯到更远的时期，可追溯到顿河王德米特里时期，甚至追溯到后来统一罗斯各地的莫斯科开始崛起时的伊万·丹尼洛维奇·卡利塔时期。这个以"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2]为特征的"近代俄国历史"准备了数十年、数百年。这个"近代俄国历史"就是(从)17世纪(开始的)。

在本书中，我们只涉及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开端，只涉及往昔分散的罗斯联合成统一国家的时期。这是"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3]的时期，是国家开始实行中央集权而这种集权制所特具的第一批国家机关(衙门、官厅)刚产生、常备军初出现、君主专制政权开始巩固起来的时期，是罗斯刚成为拥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国家的时期。

罗斯各地区联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俄罗斯(大俄罗斯)民族形成的过程。

这两个相互制约、相伴产生的我们祖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过程，构成了本书的内容。

---

① 格鲁曼特，即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1984年第2版，第124页。

③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1965年第1版，第458页。

第一章

封建割据时期(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罗斯东北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并非俄罗斯民族的第一个国家组织。在它之前有形成于封建关系初期、不同于15至16世纪俄罗斯国家的古罗斯国家。早在远古时代，东斯拉夫人就已住在我国欧洲部分。编年史曾提及各种部落(即：波利安人(поляне)、德雷夫利安人(древляне)、克里维奇人(кривичи)、德雷戈维奇人(дрегович)、杜列伯人(дулебы)、塞维里亚人(северяне)、斯洛温人(словены)、维亚季奇人(вятичи)等)都有了"罗斯的斯洛温语"的那些时期。

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在居住于第聂伯河到多瑙河之间、当时被称为安特人(анты)的东斯拉夫人西南支中间，出现了原始公社关系瓦解和奴隶制产生的过程。安特人进入了"军事民主制"(恩格斯语)时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部落联盟——未来国家的胚胎。4世纪70年代在与东日耳曼人(哥特人)的斗争中建立的安特人的联盟是极强大的，该联盟以博日为领袖，有安特人的70个首领("里克斯〔рикс〕")服从他。久而久之，安特人的部落联盟变得更为持久和巩固。6世纪时，安特人在与游牧民族阿瓦尔人(авары)的斗争中统一于安特人家族，即伊达尔及其子梅扎米尔、克拉加斯特家族的统治下。这一家族的领袖权成为世袭。

就在同时，即6世纪时，在与沃伦的阿瓦尔人作斗争中，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建立了杜列伯—沃伦人领导下的强大的安特人联盟。这不只是部落的联盟，而是政治的联盟。古老的部落名称杜列伯让位于地域名称沃伦。关于安特人与阿瓦尔人的斗争在罗斯编年史的各个时期都有所记述，并以记载在《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上的有关杜列伯人和奥布尔人（обры）的民间故事形式留传至今。

这个故事经过东方商人的传述，传给了10世纪阿拉伯著述家（马苏第和易卜拉欣—伊本—雅库布），他们提到："在古代……所有其他斯拉夫部落都服从沃伦人（"瓦林人"）"。在马苏第的"瓦林"一词中，我们看到了部落间的联盟，而且"瓦林"（沃伦人）这个名称本身并非部落名称、种族名称，而是源于东斯拉夫人西南地区地理、政治中心沃伦（或韦伦）这个城名的一个政治名称，而它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却给整个地区安上了沃伦这一名称。

9至10世纪喀尔巴阡山脉地区、沃伦、波多利亚不存在明显的部落边界，物质文化差异的消失，埋葬物品的千篇一律，这些情况都说明沃伦人的联盟不是部落的机械联合，而是结合、溶合了各部落。因此早在6至7世纪时，这里部落的个性就已开始消失，而共同特征得到加强，——这是政治结合的结果。据马苏第说，这是"古代"的事，即10世纪以前老早的事。

只是在7世纪20年代末（626年或626年前后），"沃伦人的强国"曾被阿瓦尔人摧毁，阿瓦尔人"进攻国王伊拉克利，使得他的部属所剩无几"。

马苏第也提到了"沃伦人的强国"的崩溃。他说："后来他们各部落之间发生了争吵，他们的制度被破坏，他们分为各个宗支，每个部落自己推选君主……"。

毫无疑问，6至7世纪的"沃伦人的强国"是东斯拉夫人的第

一个政治联盟，是“军事民主制”时代东斯拉夫人的第一个“强国”，——即基辅国家的直接前驱。因此这“沃伦人的强国”可认为是俄罗斯国家组织的开端。

我们所观察的东斯拉夫人的社会生活现象只发生在一定区域，发生在罗斯西南部。罗斯西南部在4至6世纪时原始社会关系开始瓦解，“军事民主制”所特有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在北方森林地带，社会发展以较慢的速度进行，这里，在捷捷列夫和杰斯纳以北，居住着占据辽阔地区的较落后的东斯拉夫森林各部落。

8至9世纪时，第聂伯河中游地区由于安特人迁往南方多瑙河和多瑙河以南地区以及由于游牧民的不断袭击而被弃置不顾，于是落后的森林斯拉夫部落迁到了这里。

但是这些森林斯拉夫部落在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并没有遇到无人生活的荒漠。古代安特居民继续居住在老地方，住在基辅和邻近地区，那些地区像安特人时期那样，成为9至10世纪东斯拉夫人的中心。

安特人对从5、6世纪前后起就接受自己巨大影响的北方的落后同胞传授了自己特有的风俗文化，自己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自己的人情关系。因此，曾存在于安特人处的“军事民主制”，就被传到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并在这里在与站在文明门槛上的南方同胞融合的北方罗斯部落中迅速传布开来。这就是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在一、二百年间经过“军事民主制”阶段、前封建主义时期进入封建主义时代的原因。

东斯拉夫人的西南支——安特人所走过的道路，由他们的邻人和后裔继续走下去。

如果说根据文物和原始文献资料判断，安特人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进入“军事民主制”时代，并于7世纪初退出政治历史舞台，从而从中世纪早期著述家的著作中消失，那末他们的后裔在第聂

伯河中游地区，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和沃尔霍夫河、西德维纳河、奥卡河沿岸，在短时期内就经历了“军事民主制”时代，建立起了封建社会。早在安特人时期东欧西南部就已发展起“军事民主制”这一情况，导致基辅时期罗斯封建制度在远比安特人地区辽阔的疆域上发展得更深更广。

8至10世纪时，在罗斯的东斯拉夫和非斯拉夫各部落的不同部分中以不同的速度出现了原始公社关系瓦解和“军事民主制”发展的过程。这个从拉多加湖沿岸到多瑙河的支流，从喀尔巴阡山脉到奥卡河遍及辽阔地域的过程，不外乎是封建制度的产生。封建制度的萌芽发生于原始社会，发生于公社社会，发生于正在瓦解的父权氏族生活时期。

这个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进行速度极不一致：当封建制的基辅已存在了几世纪时，同时的维亚季奇人(вятичи)地区、平斯克的波列西耶、德列戈维奇人(дреговичи)地区还长久保存着氏族制度的残余。

8世纪末和9世纪初时由于东斯拉夫人社会发展的结果，在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基辅一带产生了一个所谓“罗斯可汗国”的罗斯国家组织，在拉多加湖沿岸地区和伊尔门湖一带产生了被阿拉伯人称做“斯拉维伊”的另一个罗斯国家组织。

就这样，产生了“最初的两个国家：基辅和诺夫哥罗德”①。

9世纪后半期，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合并成统一的基辅国家，编年史的传统说法将这件事与奥列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基辅罗斯的兴盛时期为弗拉基米尔在位时期(973—1015年)。这是罗斯进行常胜的战争和远征，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特别好的成就的荣耀时期，同时这也是民族历史的这样一个时期：当时民族本身还在本国历史上起着巨大作用，而人民群众还刚开始变为不自由的、承受沉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5卷，第42页。

重赋役负担的被剥削者。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民族在其壮士歌、传说、故事中曾如此热爱地回忆自己的第一个首都——基辅，如此热爱地回忆自己光荣的基辅勇士和一去不复返的"光荣野蛮"时期(马克思语)的"老王公们"的化身红太阳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站在两个时代的交接处。他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罗斯民兵的最后一个王公兼战士，同时他也是以其全部活动筹备好包含了基辅国家未来瓦解因素的早期封建制度兴盛时期的第一位王公，早期封建制度兴盛时期是在其子孙们在位时到来的。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时期是基辅罗斯的兴盛时期。

过了一些时候，尤其是11世纪后半期时，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远征"外国"以夺取战利品和索取贡赋的时期结束了。剥削罗斯本土居民成为封建化的上层分子致富的源泉。

王公及其亲兵们夺取公社土地和能经营的地段的过程在加剧进行。贡赋转变为地租。成为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不再是从土地上取得的贡赋，而是土地本身连同土地上的农业人口。剥削和奴役把自由的公社成员转变为依附人口。封建制度广泛深入地发展着。

《雅罗斯拉维奇法典（Правда Ярославича)》鲜明地描绘的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关系的发展，以及以大城市(诺夫哥罗德、契尔尼戈夫、佩列雅斯拉夫尔、罗斯托夫等城)为首的各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的发展，这些情况都使基辅国家的统一逐渐削弱。

在罗斯各地区发展起来的领主(боярство)力图成为该地有充分权力的主人，他们团聚在"自己的"王公周围，这些王公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在"父辈和祖辈"的土地上，安排"生活"，弄到"财富"、土地、能经营的地段、农户和家仆，整个身心所关怀的不是全罗斯的利益而是当地的"地方"利益。领主企图脱离成为这些地区今后独

立发展障碍的基辅，因为这些地区正在很快变成公国，变成小小的、封建独立的半国家。

基辅强国的每个地区都成了领主世袭领地的巢穴。基辅的命运不仅不再使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契尔尼戈夫、加利奇的领主和其他领主感兴趣，而且连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契尔尼戈夫和加利奇的王公们对它也不再感兴趣。他们力图脱离基辅，建立独立的公国。

罗斯各地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缺乏共同的经济——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基辅国家所取得的国土的统一是不巩固和短暂的，并且是基辅国家后来瓦解的征兆。而基辅国家的瓦解开始了。

封建分散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但它在一定阶段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成为手工业、商业、城市发展的障碍，成为产生新形态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经济组织的障碍。

它还促使罗斯的实力衰弱，使罗斯国土缩减，缩小罗斯的国际意义，使它成为邻近敌国和游牧民族汗国的猎物。罗斯"被外族的干涉弄得支离破碎"①，在整整几个世纪中处于异族的压制下。

使基辅国家分裂成若干部分的割据势力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便是如此。

贤明者雅罗斯拉夫死后，基辅国家的瓦解和变为封建罗斯的过程开始了，封建罗斯作为封建主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与封建分散性相符合的。

封建割据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什么呢？

罗斯作为统一的国家不复存在。国土分裂成许多封建的"独立的半国家"。

它们的数量愈来愈增多，而规模则缩小。它们的政治存在很不稳固。有时它们在走运的王公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但这种联合并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7页。

不持久。王公们的“内讧”使罗斯国遭到破坏。甚至当外敌入侵时,内讧也不停止。

总之,我们看到,罗斯的封建割据发生在罗斯各领地联合为统一的国家之前。

斯大林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强调了确立苏联历史的科学分期的必要性。斯大林、C. M. 基洛夫、A. A. 日丹诺夫在《关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指出:“提纲中,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前的时期(当时农民还没有成为农奴),把专制的国家制度和封建制度(当时俄罗斯还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半国家),混淆在一起。”①

在转而分析俄国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和在东欧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的原因之前,有必要说明罗斯东北部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性,简述一下它的历史。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俄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和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于东欧,是“两个不同的题目,虽然不能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关的。”②

在罗斯东北部和整个罗斯的历史上,11世纪后半期的特征是封建割据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但是从13世纪中叶拔都入侵时期起,各地的封建割据迅速发展并延续到15世纪后半期,此时由于分裂与统一两种对立倾向斗争的结果,统一取得了胜利。

马克思强调指出,罗斯以往统一的最后残余“在成吉思汗可怕地登场时消逝得无影无踪”,当金帐汗的桎梏巩固下来时,“这个鞑靼人的一贯政策是使俄罗斯王公们互相遏制,助长他们的纠纷,使他们彼此势均力敌,而不让任何一个得以壮大”。③

金帐汗国竭力设法保存从罗斯国分裂成的各个“独立的半国

① 《关于研究历史》,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27页。

② 斯大林:《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61页。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979年中文版,第69页。

家"，而这些"独立的半国家"——各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① 他们互相敌对、交战，互相把对方的城市、乡村劫掠一空，在无穷无尽的毫无意义的王公内讧中使罗斯国土衰弱和贫困到极点。

斯大林用来表示封建割据时期的公国的"半国家"这个名词是非常具有特性的。这样的定义表明：如果国家的第一种和主要的内部职能"控制多数被剥削者"② 是封建公国"独立的半国家"所固有的，那末它们的规模狭小、边界不定、不稳固的存在、经常分裂和进一步分裂、一些公国消灭和另一些公国兴起、对外敌斗争的特别软弱，就不可能用国家这个词的完整意义来称呼封建割据时期的独立公国。

我们所研究时期的罗斯东北部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鞑靼—蒙古人所造成的完全破坏不能不反映在古罗斯的经济上。马克思指出："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同他们的大规模征服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因此需要用一道吓人的光环来虚张声势，并以大肆杀戮来减少可能在他们后方起来反抗的人民。此外，他们制造荒土……"马克思强调指出鞑靼汗的基本原则在于"把人变为羊，把肥沃土地和人烟稠密的居处变为牧场"。③

马克思在其另一著作中指出："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④ 马克思还进而指出：当"蒙古人深入罗斯内部

①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89页。

②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280页。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67—68页。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00页。

时，……罗斯人逃到了沼泽地带和森林里，城市和乡村被焚毁”。[①]

罗斯的整个东部和南部遭到完全破坏，成为废墟，毫无生气。城市和乡村遭到破坏和焚毁，不少边区一片荒凉，一部分居民遭到屠杀，一部分居民成为俘虏被押送走，一部分居民四散逃走。来不及逃走的人留在老地方，躲藏在窝棚和窑洞里，躲进了密林和沼泽地带。耕地上又长满了树林，在林中旷地和水淹的草地上不放牧牲畜，不垛干草堆，村庄里可见到大火的痕迹。在旧商道上很少有客商通过，而经常有鞑靼八思哈（баскак）率领队伍通过。在罗斯南部和东部被鞑靼毁坏的城市周围的各乡“长满了大树，成为众多野兽的栖息地”，人们从幸免于难的邻近城乡来此“照料”，并“使一些人为他们的野兽和蜂蜜前来贸易”。因为耕种土地是危险的和用不着干的事，所以在许多地方农耕就让位于捕鱼、狩猎和林中养蜂业。城市变成了废墟，商业衰落，罗斯往昔驰名的几十种手工业消失不见了。手工业技术变得粗糙、简单化了，手工制品平凡化了，古老的工艺失传和遗忘了，工匠们成为“俘虏”被押送走，四散到金帐汗国各地，城市一片荒凉。拔都入侵和随后所建立起来的鞑靼一蒙古压制制度对古罗斯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如此。

鞑靼一蒙古实行的压迫制度的全部沉重负担首先落在农民和城市黎民百姓身上。“汗国贡税”、特别贡税和苛捐杂税、王公们应送往汗国进献给汗的各色各样的礼物、关税、通过税等各种税收，军事服役、道路和驿站徭役等，以及汗及其官员八思哈、达鲁花（даруга）的残暴行为、一贯的恐怖手段、“一再屠杀”（马克思语）和专横霸道，——使罗斯人贫困到极点和压迫罗斯人的这一切，就构成为“鞑靼压迫制度”。

“汗国贡税”为数千卢布的巨额（按当时的卢布值计算）款项。例如，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一次缴纳了 7 000 卢布，下诺夫哥罗德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5 卷，俄文版，第 224 页。

国一次缴纳了1 500卢布。巨额钱款从居民中榨取出来，进入汗的金库。汗国不断野蛮地榨取罗斯人的脂膏。

金帐汗对罗斯居民首次进行人口登记后，就委派自己的官员八思哈去征收"毛皮实物税(ясак)"(贡税)。有时也将贡税征收交人包办，当时"那些该死的穆斯林包收贡税，使人大遭其害，他们还从中盘剥，由许多农人分担"。包税人由鞑靼人担任，而主要是中亚商人。八思哈("镇压者")和包税人的作威作福激起罗斯人民群众对金帐汗和八思哈的憎恨。八思哈知道他们受人憎恨，害怕起义。例如，他们于1259年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请求说："给我们卫队吧，以免我们遭受杀害"。

在罗斯的某些地方，八思哈和其他鞑靼显贵们感觉自己地位巩固，他们在荒芜的边区夺取土地，建立自己的"村镇"。例如，在忽耳万户中主宰一切的八思哈阿合马，在波谢米耶"横行不法，干了许多欺凌人的事"。

在南部的某些地方，大概还有东部的某些地方，鞑靼强迫农民为自己干活，让农民"为他们耕种小麦和黍类。"

罗斯正处在艰难时期。

马克思把罗斯屈服于金帐汗称做"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它"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1]

斯大林在其«乌克兰是个交叉点»一文中指出了鞑靼压迫制度的沉重性，他强调指出"奥德帝国主义者用刺刀带来……的压迫，……丝毫不比旧日鞑靼人的压迫轻些"。[2]

普希金写道：罗斯虽不能使拔都的军队停住，但英勇地与侵略者斗争的罗斯的一望无际的原野"耗尽了蒙古人的力量，使蒙古人的入侵就在欧洲的边缘上停住；蛮族不敢把被奴役的罗斯留在自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67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2页。

己的后方，他们回到自己的东方草原上去了。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的罗斯拯救了正在形成的文明……”。①

H.Г. 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不，罗斯人并没有像匈奴人和蒙古人那样在政治历史上充当征服者和掠夺者，罗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们免受蒙古压制的拯救者，他们竭尽全力阻挡蒙古人，不许蒙古人进入欧洲，他们确实是保护欧洲的一座墙，承受了所有射击的一座墙，被敌人摧毁了一半的一座墙……”②

只因为罗斯把剩余的全部欧洲从“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马克思语)中拯救出来，但丁和莱奥纳多·达·芬奇，马可波罗和瓦斯科·达·伽马，哥白尼和哥伦布，麦哲伦和乔叟，古滕贝格③和胡斯才有可能创作自己的出色作品，创造伟大的事业和作出惊人的丰功伟绩。如果不考虑到罗斯人在拔都入侵时期所作的贡献，那就无法理解文艺复兴时代和原始积累时代的伟大发现和发明。

遭到完全破坏、孱弱无力的受压迫、受凌辱的罗斯并没有屈服。拔都入侵许多年之后，据旅行家威廉·德·鲁布鲁克亲眼目睹证实，罗斯队伍曾向顿河以东的草原上的鞑靼进攻。

即便在遭到破坏的罗斯中心地区，鞑靼也不感觉安全。

“贡税”和徭役，压迫和专横，激起不满情绪的增长。罗斯人的这种不满情绪以反对八思哈和包税人的人民起义形式表现出来。1259年在诺夫哥罗德爆发了起义，1262年在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佩列雅斯拉夫尔爆发了起义，人民在这些地方起来反对“穆斯林的残暴折磨”，把包税人从自己的城市驱逐出去。

金帐汗看到罗斯人顽强不屈，不得不改变征收贡税的方式、方

---

① 《普希金文集》，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列宁格勒，1935年，第732页。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遗产》，1928年，第2卷，第44页。

③ 古滕贝格(1406—1468)，德国印刷术发明者，15世纪中叶曾在美因茨印刷了《圣经》——欧洲第一部全版出版物。——译者

法，从14世纪初起委托罗斯王公征收贡税。罗斯地区得以稍稍松一口气。

14至15世纪，罗斯东北部的历史以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为特点。

封建社会制度的特点是大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即赏赐、收买、强夺、占有空地等途径而形成。同一个主人的土地常分布于不同地方，每块独立的领地分出来成为封闭的经济单位。

"官地"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来源，在这种土地上由支配一切的农民村社占有空地和通过劳动开拓土地曾经盛行一时，农民村社"往那里挥动斧头、大镰刀和犁把森林清除一空。"

不久，这些土地归王公所有，使用这些土地要缴纳赋税，但是农民仍然是土地的实际主人，农民同意"土地是大公"和"君主"的，但附加条件是"黑麦田和熟地"或"经伐木烧过以备开垦的地方是我们的"，这就完全指出"土地是大公的，但却归我支配"。"官地"的土地占有权长期保留给农民。

封建主开发"官地"的下一阶段是他们的"领主贵族化"。领主贵族和寺院用暴力夺取土地，通过奴役的途径使居民屈服于自己，并从王公处以受封形式取得土地。农民的被奴役是由于孤苦无依的庄稼人经济上的不稳定，而变穷困的农民则陷入对"强者"——封建主的个人经济依附关系之中。在以往大家庭公社时期，在伐林耕作制盛行的情况下，农民——村社农民是以集体劳动清理森林、耕种土地的，而到了小家庭盛行时，农民就无力清理土地，他们只得寻找容易清理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多半已经是封建主的财产。这个情况是封建主奴役农民的原因之一。

封建世袭领地发展和巩固起来。王公们本身是最大的世袭大地主。他们在自己的公国和邻近的公国里占有土地，在邻近公国

取得土地多半通过收买，例如，伊万·卡利塔就是这么办的。1328年卡利塔的遗嘱上提到了属于他的54座村庄，而失明者瓦西里所占有的村庄已有125座。

大片世袭领地还归属于都主教、教会和寺院，这些世袭领地被认为不应收归国有，被认证永远属于他们。到15世纪时，都主教的地产扩得特别大，但是都主教拥有地产是在14世纪初都主教彼得时期开始的。

寺院是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到15世纪末时，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基里尔一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和索洛韦茨基修道院成为大片土地的所有者。王公们把出现隐僧修道院和荒郊寺院的土地赏赐给各寺院，这些寺院后来逐渐变成为大寺院。周围农民及其土地、和可用地逐渐都归属于寺院。寺院添购土地，并常由于"捐献"（这是对小封建主将自己的土地转交给寺院的称呼）而取得土地。

教会变成了大所有者。例如，15世纪初时，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在13个地方共占有几百座村庄。

领主贵族经济也发展着。例如，有势力的契尔尼戈夫领主贵族罗季翁·涅斯捷罗维奇在伊万·卡利塔时期动身来到莫斯科，取得半个沃洛科拉姆斯克县作为赏赐。

农民们住在大小村庄、村子和新拓小村里。荒废的村子被称为"荒地"。村庄和村子的规模很小。拥有50至100人居民的村庄很少。村庄里通常有木头建造的小教堂和领主贵族庄园，庄园里居住着领主贵族的管家和仆役。

这种有王公或领主贵族庭院的村庄通常是封建领地的中心。有各种能经营的土地、田地、草地、牧场、捕猎场地、村中养蜂用地、海狸栖息场、琴鸡栖息地、捕凫场地、捕鸟地点、浆果园、捕鱼场等隶属于村庄。

13至14世纪末以及15世纪前半期，村庄首先是行政和经济

中心。同时，村庄也开始起着教会低级教区的作用。"村庄(село)" 这个名词在当时既表示后来村庄型的居民点，又表示整个居民疆域或土地区段。例如，在一份房地产买契上我们见到"莫利特文斯科耶村庄"的注记，而从地界文书中我们得知，这是土地区段即"莫利特文斯卡亚地区"。又如，在另一份文书中述及"基涅利斯克驻地的各村庄"，并列举了"别克列米舍瓦、维亚希列瓦村，纳扎里耶夫斯卡亚村"等村子。在远古时代，"村庄"、"村子"、"小村落" 这些名词包含有 "有居民的地方"、"居民点"、"有人住的地方"、"血族联盟"等概念，这些名词的后来的含义二重化了，它们开始一方面表示地区，另一方面又表示村庄。

在村庄里照例居住有荷洛普 (холопы)①、各种仆役和农民。在较早的时期即 13 至 14 世纪时，村庄里荷洛普户数与纳赋税者(农民)户数相比，荷洛普较多; 后来村庄中纳赋税者数量增加，尽管荷洛普仍然不少。例如，在佩列雅斯拉夫尔县的斯捷普里诺村庄(15 世纪)有 3 户荷洛普、6 户农民，在雷科沃村庄有 2 户荷洛普、6 户农民。

有一些村子、新拓小村和外来户另成立的新村归作为经济和行政中心的村庄管辖。村子不大，由 1 至 3 个院落组成，每个院落常住有 1 个家庭。农民大部分都住在各个村子里。"村子(деревня)" 这个名词出现得较晚，它到 14 世纪时才出现。在某些文书中，村子型的居民点又称"家庭"，这是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在奥列格·伊万诺维奇·梁赞斯基给奥列格修道院的叙述 13 世纪情况的文书(约 1372 年)中，用"家庭"这个名词代替了"村子"这个名词。这是容易明白的，因为那时 1 个院落(甚至不只 1 个院落)的

① 荷洛普——俄国 10—18 世纪初依附于封建主的一类居民，法律地位接近农奴。荷洛普由于被俘、被出卖抵债而产生。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封建主的庄园从事各种劳动。从 17 世纪起始可使用土地，并承担赋税。1722 年实行人头税后，成为农奴。——译者

村子多半住有一个家庭。14至15世纪的村子通常有1至3户，包含有小庄园——小庭院、菜园和牧场。村子拥有自己的能经营的地，即耕地、休闲地、草地、刈草场、狩猎场、捕鱼和饲养野蜂地段，有时还拥有森林。各村所有土地的界线没有确切划定，常常按照“往哪里挥动斧头、大镰刀和犁”(即实际使用土地情况)而确定。随着土地的开发，各村子的地段开始相毗连，于是出现了田界、“做上记号的槲树”、“有记号的”松树和桦树、石头和坑。

13至14世纪到15世纪前半期，在罗斯东北部属于各村子的可耕地段和割草场散布于林中草地和河谷中，常常距离村子相当远。例如，15世纪时在沃里河畔，在莫斯科附近和韦拉河、雅赫罗马河、雅科季河沿岸，在季米特罗夫附近，隶属于各村子的草地距离各村有10至15俄里[①]或更远一些。

随着这种居民人口的增长，由于践踏和争吵，能经营的地变得不方便了，农民竭力设法把自己的能经营的地聚拢在一条田界以内，集中在村子附近的一个地方。这个现象在较晚的时期，即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特别突出的。罗斯农民牢固地同其耕种的土地，同故乡的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结合在一起。但是当时的村子终究经常变换主人。例如，14世纪末也迪该入侵前10年，在属于雷科夫的佩列雅斯拉夫尔县的泽伦希诺村庄(此处“村庄”一词意谓地区)的一个大村庄里居住着农民伊万·拉波季。1408年也迪该被击溃以后，在荒废的拉波捷沃村遗址，某个费坚和他的儿子彼尔胡尔、尤连住了下来。按照创始人的名字，该村得名为费杰尼诺村。1435年，雷科夫把土地交给了马赫里茨斯基修道院，费杰尼诺村成了属于寺院的村子。有个叶萨卡及其子女在费坚之后在这个村子里住过5年，而在他之后，马克西姆·沃罗比耶夫曾住过

① 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4年，等等。在不到50年间，这个独户的小村子换了7个主人，他们相互间都不是亲属。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

这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由于军人和由于抢劫”——王公们的士兵在永无休止的内讧中“使罗斯土地荒废了”，由于“凶恶的人”，由于抢劫和沉重负担，由于苛捐杂税和债务，由于压迫和暴虐，罗斯农民“流落”四方，找不到“容易经营”和可随意经营的土地，甚至找不到“善良的”王公贵族的土地，罗斯农民由于歉收、饥饿和流行病而死亡，他们被邻近的王公或“凶恶的鞑靼人”掳走。

占有分散在各地的数十个村庄的封建主们往往不从事生产，而安于征收代役租。领主贵族的播种地面积不大，其面积大小决定于领主贵族家庭及其奴仆、仆役的需求。这个现象是由世袭领地的自然经济、农村经济的贸易和市场供应的不发达造成的粮食较少作为商品出现在国内市场上。

列宁在谈到劳役租制经济即封建农奴制经济时，认为它的首要的决定性特征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并指出：“农奴制的领地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少联系。”①

对于13至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封建世袭领地而言，经济的自然性、故步自封与闭塞性是特别突出的。

在封建世袭领地里由依附于私人的直接生产者荷洛普、农民(смерд)、西罗特②、老佃农（старожильцы）所生产的产品的基本部分，其用途是供封建主家庭本身及其众多的仆人、仆役、奴仆们的消费，而非用于出售。由依附农所耕耘的封建主的大片可耕地、“农林用地”上所生产的一切；由农民、西罗特、银债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1984年第2版），第3卷，第161页。

② 西罗特（сироты）——古罗斯有封建依附关系的乡村居民。——译者

农① (серебреники)、半自由农 (изорники)② 和世袭领地的其他不自由居民作为实物代役租所缴纳的一切(谷物、牲畜、肉类、鱼、禽兽、浆果、亚麻、麻布、皮革、蜂蜜，等等)，只有一部分进入市场以交换封建主所需要的手工制品、奢侈品和"海外物品"，大部分产品则在世袭领地自身内部被吸收。大量拥有各种荷洛普、仆役、士兵一亲兵和其他家仆这一情况决定了必须大量征收实物，建立储藏室，等等。

但是不能认为：商业为封建主和农民所全然不知。如果说封建主需要用钱，以便购买昂贵的武器和织物，饰物和调味香料以及诸如此类之物，那末农民需要钱则首先是为了缴纳各种赋税。农民们出售农业、渔业、林中养蜂业产品、狩猎产品以及本村的手工制品。

例如，托尔若克的梅德纳村庄在15世纪初曾是由荷洛普和被奴役者耕种的领主贵族产业，它位于特维尔——托尔若克——诺夫哥罗德的商道上，到15世纪中叶时已成为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财产，变成了一个大商业村镇。王公安德烈·拉多涅日斯基赠送给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克列缅季耶沃村庄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变。该村庄位于去莫斯科的途中，距离修道院半俄里，15世纪中叶时就已住有圣像制作者、雕刻工、旋工等工匠，并成为贸易村镇。1504年时，克列缅季耶沃村庄共有134户。

属于寺院和领主的村庄居民凭特别颁赐的文书免除商税，而关厢居民却要继续缴纳商税，这就使从事工商业的农村居民获得一定特权。当然，必须指出：这个现象只发生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之末，即只发生在15世纪中叶或更晚的时候。

① 银债农——14—16世纪俄罗斯国家中向封建主借债(银子)的农民。他们必须服劳役，只有还清债务，才能离开封建主。——译者

② 半自由农——14—16世纪普斯科夫领地的一种农民。他们担负封建劳役，在归还庄园主借贷和缴纳一半收成后有权脱离原庄园主另找新东家。——译者

世袭领地的组织和管理不很复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王公或领主贵族庭院所在的村庄是世袭领地的中心。被木桩栅（木桩围墙)围起来的“领主贵族庭院”由住房和经济建筑物构成。如果该村庄不是王公或领主贵族的常驻的府邸，他们及其家庭不常占据住房。在这些住房里通常住着管理人员，即：管事、一般管理人员、管家、饲马员等等。

与住房相毗连的为经济建筑物，即放置大犁、简陋的犁、大镰刀、木犁手把等各种生产工具的贮藏室，畜栏或畜圈，粮仓，存放“伏特加酒”陶坛、“陈蜜”并储存“各种蔬菜”、腌菜、果子酱和其他食物的地窖。在不远之处建有厨房。在庄园的边缘通常有堆放着一垛垛谷物的谷仓，家禽室或家禽院，干草棚和马厩。在这些建筑物的再远一些地方，有澡堂(浴室)。

王公世袭领地由管事人或管家进行管理。

称做“王公宫廷仆役”或(“宫廷仆役”)的众多仆人为巨大的王公宫廷服务。其中有：书记、书吏、猎犬饲养员、饲马员、花匠、饲鹰的猎人、猎海狸者、饲养野蜂者，等等。能经营的地被划作各种特殊用途：鹰猎官所辖场地、捕猎场地、马厩长所辖场地，等等，由“御前仆役”中的专门人员进行看管。

一部分“王公宫廷仆役”为王公的荷洛普，而另一部分则由属于王公个人的自由民组成。由于为王公服务，“王公宫廷仆役”最初获得王公收入的一部分，后来则获得被利用并取得全部封建收入的土地。这种土地被称为“领地”。

王公的管事人管辖全体“黎民百姓”，即农民、荷洛普等。他们分配“赋役额”，监督劳役工作的按时执行，监督实物代役租和货币代役租的缴纳。14世纪时，货币代役租还不大，但是实物代役租很多，并且种类多样。农民或罗斯东北部被称之为“西罗特”的农民，必须用谷物、米粒、牲畜、肉类、家禽、乳制品、浆果、蘑菇、麻

布、亚麻等物缴纳代役租。

劳役也同样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因为14世纪时谷物还不常被当作商品,完全处于自然状态,封建主(王公、领主贵族、寺院)本身的耕地面积不大,在工役赋税中农民在耕地上的劳动远未占据首位。因此工役地租种类十分繁多。农民要在封建主的庭院里建造房物,给庭院围筑木樁墙,捕鱼,打野兽,割草晒干草,搬运木头,等等。领主贵族的庭院仿佛是王公宫廷的复制品,但一切较小、较简单一些。

农民所承担的徭役无论在王公经济或领主贵族、寺院经济中都是同样的。当然,由于农民对不同封建主或地方的依附地位以及经济本身的规模和特点,徭役可多次变化形式。

1391年颁发给康斯坦丁诺夫修道院的所谓基普里安证书最全面地描述了农民的徭役。富裕农民“成年人”要修理教堂,建造“木房”,给修道院的庄园围筑木樁墙,割草晒干草,并把干草运送到寺院里,耕耘寺院的地,捕鱼,在寺院的园子里劳动,打海狸。其他贫苦农民——“无马徒步者”,要磨黑麦、烤面包、打禾、磨麦曲、酿啤酒、纺麻线、修补大渔网。除此而外,农民们还用牲畜和燕麦缴纳代役租,尽管代役租定额还刚规定下来。寺院农民应尽义务的范围便是如此。顺便说说,在基普里安证书中首次与表示农民的旧名词“西罗特”一起,出现了“农民(крестьяне)”一词。农民在宫廷土地和领主贵族、服役贵族土地上所负担的赋役也大致相同。

后来可看到农民赋役的发展和规定出的细则。15世纪末在诺夫哥罗德地区,一个农户(舒托沃村)每年缴纳的实物代役租为:黑麦2筐、燕麦2筐、小麦和大麦各一俄石、公绵羊一整只、母绵羊一整只,一头牲畜的四分之一的肉、油一勺、干亚麻二把、半戈比铜币5枚和一些干酪。

谈到农民的赋役时，必须注意：他们还得以货币、实物和劳役负担王室的赋役。如上所述可知，农民的处境很艰难。

非自由民的数量经常不断地增长。对王公只须缴纳国税和负担若干徭役的"黎民百姓"或"耕种官家土地的"农民阶层愈来愈少，依然存在的村社——"乡"和"村落"的"官地"愈来愈少。荷洛普、银债农、对分制佃农、老佃农的数量扩大。农民经常被迫签订受盘剥的契约，答应一定作工偿还贷款("银子")或缴付利息("增长额")。这样的农民被称做"银债农(серебреники)"。

"贷款"分为"以劳役偿还的"和"付利息的"。某些"银债农"借了款，答应一定作工偿付利息，负担"劳役"。"服劳役者"完成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耕地。这种"劳役"被称为"在耕地里偿还的贷款"。

"付利息的贷款"规定了"利息"，即用钱付的利息，并且如果利息定期按年付给，这种"贷款"就称做"按年"付息的贷款。银债农出现于14世纪前半期。最早提到银债农的是1353年苏兹达尔王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寡妇给瓦西里耶夫斯基修道院的附加证书，但是银债农制度的专门发展是在15世纪时实现的，当时债契获得了使农民农奴化的基本工具之一的性质。

对分制佃农对其主人所应尽的义务具有同样的性质。对分制佃农从封建主处取得土地，并按对分制种地（有时分得1/3，由此得名为"仨一佃农"）。

从来就生活在主人的土地上并履行全部封建赋役义务的农民被称为"老佃农"。"老佃农"的名称是由于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关系是按"老"规矩确定下来的。在经过5至10年优待后，"新来的"农民也变成了老佃农。老佃农在经济和法律上愈来愈牢固地被束缚在自己主人的土地上，他们的处境愈来愈接近于农奴的处境，尽管表面上谁也没有权利把他们阻留在一个公国境内。

在14至15世纪的封建经济中，受剥削的还有荷洛普的劳动。荷洛普们在自己主人的世袭领地上担负极其繁多的赋役。有享有特权的荷洛普和仆役式的荷洛普：管事人、粮食管理人、管家、（主人子女的）养育者等。住在王公宫廷、领主贵族庭院和寺院内的手巧的男女工匠：铁匠、军械匠、制革匠、首饰匠、纺线女工、女织工等（的地位）与他们接近。

大多数荷洛普要完成各种工作，被称为"短工"或"受苦人"。他们种地，他们自己或住在领主贵族庭院内，或住在专门的村子里（"人们挤满各村庄"），并使用领主或王公的小块"熟地"以餬口。荷洛普与老佃农及与其相似的因被奴役而成为农奴的农民很少有区别。"纯粹的"（完全的）荷洛普不必向王公缴纳赋税。

农奴化的程度增长着，尽管大多数农民还有权从一个主人处转移到另一个主人处去。农民可以在完成应做的工作、履行了赋役后，离开（原主）投奔另一个主人。"负担赋役者"或"立过契约的"人只有当他们要离开一个公国到另一公国去时，才会有困难。为了给他们造成困难，王公们互相达成协议不接受"负担赋役者"入境。但是农民有转移权使封建主受到拘束，封建主便竭力设法限制这一权利。早在1450年就颁发过一些证书，只准农民在秋季尤里节（11月26日）前二周或节后一周离开，并且农民必须事前与封建主完全清账。这样一来，农民要离开自己的主人就不那末容易了。通常禁止农民转移似乎是王公对某一封建主的特别恩典。例如，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先禁止农民一老佃农从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土地上转移他处，后又准许该修道院召回出走的农民。还有根本禁止农民出走的文书。农民企图通过从一个公国转到另一公国的途径寻找改变境遇的出路，但是正如我们所已看到的，从14世纪开始，王公们在相互的契约中答应一定不接受"立过契约者"或"负担赋役者"入境。

封建统治和依附的形态日益巩固和扩展起来。

13至15世纪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分为两种，即：完全的所有制和有条件的所有制。世袭领地属于有完全占有权的土地。世袭领地可以出售、转赠、按遗嘱继承、按遗产转让。

有条件的土地所有权是所谓“赏赐”，即一个封建主从另一个更富有、强大的封建主处以服务、首先是军事服务作为条件所取得的土地。这份土地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按遗产转让或按遗嘱继承。只有在为自己的主人服务时，才能使用这份土地。停止服务或“前往”另一公国为另一王公服务时，即自动导致“赏赐”的丧失。

当小封建主——“军职人员”从王公—国君处取得土地供个人使用时，较晚的封建领地制也在相似的享受“赏赐”的权利上建立起来。

在伊万·卡利塔时期的罗斯东北部，就已有“赏赐”制度。例如，伊万·卡利塔曾以应对莫斯科王公服务为条件，赐给鲍里斯·沃尔科夫一个村庄。

大封建主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觉得自己是一个无限制的主人，不仅是一个主人，而且是君主、君主兼世袭领主。自古以来确立了如下制度：贵人和富有的领主贵族们把自己世袭领地的全体居民不仅视作荷洛普和仆役，而且视作自己的臣民，他们对自己的臣民享有与王公同样的权利。他们进行审判和惩治，从而控制了司法和警察职能，他们收取审判罚金和贡赋，从而成了真正的君主。

古罗斯和更早时代奠定的制度，在14世纪时得到发展，并在所谓“赏赐证书”中反映出来。寺院最先获得了这种赏赐证书（例如，1338—1340年伊万·卡利塔赐给尤里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叶西夫的赏赐证书，1361—1365年特维尔大公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和特维尔的封邑王公们赐给特维尔的奥特罗奇修道院的赏赐证

书，1410—1417年下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赐给圣母领报修道院的赏赐证书，等等。）稍晚一些时期最早赐给世俗大土地占有者的赏赐证书也流传到今天（例如，14世纪末大公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赐给伊万·卡夫特列夫的赏赐证书）。

王公的赏赐证书通常首先免除隶属于大封建主的居民应缴的一系列税。例如，颁发给寺院的赏赐证书中，谈及世袭领地农业居民义务的赏赐证书在列举了各种税之后，写道："他们不必缴纳任何贡税，不必缴纳驿站税、关税，不必提供大车、放哨者、书写用品、饲料和蜜制品"，"不必……缴果核或提交东西，不必缴纳其他税，不建筑城，不建筑我的宫廷，不饲养我的马，不为我割草晒干草，也不必为百人长、宫廷人员、十人长服务，不向纳赋役者征收任何费用……"

不应当认为：按照这个赏赐证书大封建主世袭领地的居民就免除了全部赋税，就象例如颁发给雅罗斯拉夫·斯帕斯基修道院的赏赐证书中所谈的那样，即修道院土地的居民缴纳两卢布代役租就免除了赋税。免除赋税多半是暂时的，偶而有长期免除赋税的情况，但也只免除某些税和徭役。在所有前述场合下，封建主本身把征收赋税揽了过来。例如，在下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颁发给圣母领报修道院的赏赐证书中说："如果来征收贡税，修道院长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替他们缴付。"因为世袭领主亲自为王公征收贡税和其他收入，所以"王公的属下"——驿站长、"传令员（езовник）"、地方长官、执事、乡长以及以王公名义为王公进行审判和惩治，征收赋税和监督居民履行种种徭役的王公的其他行政官员，不"进入"世袭领地，不干预世袭领主的活动，就理所当然的了。"而地方长官、乡长无论根据什么也不必进入……"，"驿站长"和"传令员"无论根据什么都不必去……"——赏赐证书这样地表达了封建主的权利。赏赐证书把司法和警

察权交给封建主是豁免的第二个特点:“……不派我的地方长官到那些人处去,不审判他们,除了杀人、抢劫,传令员不得根据任何理由进到他们处去”——这是前述颁发给圣母领报修道院的赏赐证书中谈到的。世袭领主亲自管理和审判自己的全体属民,“发号施令”,只有杀人、抢劫和有物证的盗窃案由王公法庭审理。

为审理涉及不同封建主利益的案件,成立了“联席法庭”,由有利害关系的封建主或其仆役参加审判。“联席法庭召开时,修道院长与地方长官一起进行审判,利益由他们对半平分”。

封建主掌握司法权是他们致富的补充手段,因为审判过程伴随着收取税金、罚款等等。

赏赐证书使得把对自己臣民征税和行使司法一警察权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封建主变成了自己世袭领地中的真正的、几乎独立自主的君主。这些世袭领地仿佛是小型的公国,而领主贵族或僧侣领主本身在一切方面都模仿王公。

王公行政官员(地方长官、乡长、传令官等)去征收赋税、审判城市“黎民百姓”和乡村农民时,常对臣民进行掠夺,因为即便只算这批王公仆役所到之处的吃、住靠当地居民供应这一项,居民也就得遭受掠夺了。因此“黎民百姓”(即缴纳国税者)当然竭力设法躲开他们,转移到获得赏赐证书的封建主的土地上去,那些封建主为把各种平民诱集到“准免赋税的”(即免缴王公赋税的)地方,答应给予他们优待。这种人便获得了典质者或抵押人的名称。农民被典质给取得赏赐证书的领主或邻近的王公,他们摆脱了一个压迫、一些赋役,却又获得了另一些压迫和赋役。典质后必须对自己的新主人负担一系列赋役或为新主人服务,并且在后一情况下典质者的地位接近于小仆从的地位。在罗斯存在过各种形式的分封制度。富有程度、实力和权力各不相同的各种封建主向大公“叩求效劳”或“请求吩咐”,即对他形成藩属关系。大公亲自领导封建职

位等级制度，是“统治阶级组织”[①]的首领。

在大公之后为“次要的王公”，即罢职的王公或被合并的封邑公国的王公或从立陶宛来归附的王公以及从金帐汗国来归附的王公（“有军职的鞑靼宗王”）。许多“次要的王公”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已是按照从大公处得到的世袭领地权取得土地，有时大公将另一些土地和城市赐给他们，让他们在那里“食禄”，即从居民处取得一部分收入。

在次要王公之后为领主、“自由侍从”和“领主子孙”。“领主子孙”是“贫困化的”领主家族的后裔，尽管不无可能，这个名词与古代所称做的“少年队员”、“儿童队员”即“年轻亲兵”的含义相同。领主和自由侍从需要最强大的君主的庇护，他们为他效劳，他们之中最强大者带有自己的亲兵。列宁指出:“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②] 这种封建“小同伙”中最小的通常拥有20至30俄亩[③]土地，2至3个荷洛普，甚至像这样小的“领主”也根本没有一个人亲自拉犁耕作的。他们之中许多人经营野蜂饲养业、渔业、干馏树脂业、小买卖等等。这种小封建主大多数为“领主子孙”。在诺夫哥罗德，他们被称为“土地小私有者”。

害怕王公、领主的暴虐，许多“领主子孙”或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寺院，当了寺院仆役，或不能独立自主地服军役，变成了“宫廷仆役”。

领主和“自由侍从”可以任意为某个王公效劳，也可以在任何时刻抛弃职务，“拒绝”为自己的王公效劳，转到另一个王公处去，等等，并且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土地占有者的地位，因为即便他去为敌对的王公效劳，任何人也不得侵犯他的土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29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1984年第2版），第1卷，第124页。

③ 一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

只有当领主或“自由侍从”的土地所在乡的城市遭到进攻，落到被围攻的境地时，他才必须参加该城的保卫。这项义务被称做“城市被围义务”。此外，领主和“自由侍从”应当免除“司法服役和缴纳土地税及水税”。在一切其他方面他们是自由的，王公们在自己的契约中通常指出：“领主和侍从不受宫廷管辖，意志自由”，“领主和侍从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为意志自由”。

看来，前述“宫廷仆役”没有自由转移的权利，王公们相互商定：“宫廷仆役”“不参加公职”。

王公不仅是封建主，他还是执政者、君主。他依靠领主和他周围的“自由侍从”进行统治。他们服军役，以王公的名义管辖他的“世袭领地”公国，管理庞大而复杂的王公宫廷经济的各个部门。

领主组成议会（杜马 дума）供王公咨询，由王公决定自己的事，王公作为君主和封建主举行审判，全面考虑外交事务和军事。

在和平时期，杜马几乎每天召开。领主早晨来到王公的宫廷，与王公一起“议事”。

领主上层分子拥有“大”领主或“显贵”的称号。在他们之后为“各部”领主、他们管辖“各部”，即管理公国经济的各部门或收入。当时。设有下列各“部”，即：猎捕（王公狩猎）部、鹰猎（使用鹰狩猎）部、饲马部、司饮部、司膳部等。主持各部的“各部领主”拥有猎捕长、司鹰、饲马长、司饮、司膳等称号。“各部”包括有土地、场地（能经营的地）、村庄、村子及其居民。管辖为宫廷和“各部”服务的仆役（“宫廷仆役”）的“总管”在宫廷中起首要作用。宫廷仆役在数十年中有的逐渐下降为荷洛普，有的逐渐上升为自由人。

领主管辖公国的各地区、各城和各“乡”。王公把领主派到各城、各乡，让他们以王公的名义在当地征收赋税、进行审判和管理土地。

到13世纪末时，对土地的管理集中于地方长官（наместник）

手中，这些地方长官居住在各城中，但定期巡视自己的土地，歇宿在“宿营地”中。后来地方长官停止巡视（在别热茨克县和某些地方只留下地方长官的“途中法庭”）。久而久之，在宿营地中到处出现了乡长，在他管辖下有协助他办公的“税吏”。乡长们大概不经常住在宿营地中，他们利用路上的客店住宿。例如，在莫斯科县科尔泽涅夫宿营地，乡长的住宿处为科济莫杰米扬斯基客店。各乡的领主乡长或各城的地方长官由于为王公效劳，获得向居民征收的税款的一部分，即所谓“食禄”。由此领主官长得名为“食邑贵族”。地方长官和乡长获得食禄收入、实物捐税、审判罚金和婚礼税（“新娘的绣花头巾”和“赎身的貂皮”）。王公把宠爱和有功劳的领主派到能提供较多收入的乡里去，领主们常为食邑互相争吵。地方长官和乡长配有助理（传令员）、仆役、法庭传呼员、司法员和其他税吏。

一部分领主留在王公身边，受命掌管各种事务，即掌管军事、官库（金库和国家档案）、使节事务（外交事务）、荷洛普等事。他们主持由通文理、有经验的属吏（秘书、书吏）操办的“事务”和供职的“衙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从这些委任的“衙门”发展出了一些官厅。领主的职位不是固定的。在忙碌的宫廷效劳之后，领主通常外出挣“食禄”，有食邑的贵族便占据他的位置。通常每隔一、二年变更一次，有时变更得更频繁些。

但是某些职位固定属于世袭名门的显贵家族，常常成为世袭的职位。例如，莫斯科千人长的职位固定属于领主韦利亚明家族。

管理各村庄的村执事，常常出自王公的不自由的侍役。王公还安排一整批侍役掌管公国较小的行政和经济事务。各种赋税由专人征收，即由贡税吏、税吏、征收灰鼠皮者（特殊税收——灰鼠皮的征收者）、驿站吏（驿站钱的收取者）等等征收。

书记和贡税吏编制村落及其居民的清册，并确定赋税数额。13世纪末和14世纪的征税单位为“索哈(coxa)”(2至3人)或村(2至3户)。在各“索哈”内税额的分摊则是农民自己的事。书记和贡税吏取得“作为书写报酬的灰鼠皮”、“牲畜的头”或“书写费”作为酬劳。从15世纪中叶起出现了新的课税单位“维季(выть)”——质和量极其多种多样的土地的赋役签。

至于军队组织，军队组织是典型封建制的。

由仆从、家仆、荷洛普组成的武装骑兵和步兵构成的小王公和领主的亲兵队是大公军队的基本部分。此外，还有召募来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城市民团。从“索哈”征集的农民和“黎民百姓”组成的步兵民团也起着颇为重要的作用。它常常决定最重要战斗的结局。由侍役和领主子孙组成的人数众多的大公亲兵队开始取得愈来愈大的意义，这支亲兵队由大公亲自统辖并只听命于大公个人，而当时在其他卫队中战士也首先服从自己的直接主人和统治者——领主或王公。

王公们之间的关系由遗嘱或协议书加以确定。通过父亲的权力，家族财产——公国兼世袭领地被分配给他的儿子们。按照遗嘱规定好了每个儿子获得各自的一份的“序列”(秩序)。寡妇及女儿们也获得一定的份额。长子的“居长地位”被固定下来，他还以其“居长地位”获得若干增补的土地和收入。主要的城市和纳赋税的人民不被进行瓜分，留下来(由家族)共同支配。大公被认为是王公之长，不管亲属关系中的辈份他被称为“长兄”，“占据父亲的位置”。位于他之下的王公被称为“诸兄弟”，然后是“诸弟”，而“弟”的称呼并不表示实际的亲属关系，所表示的是隶属的等级和相互关系的性质。如今全罗斯的王公相互关系和隶属系统既然已经被规定好，那末每个王公在自己的公国中就是独立自主的统治者，在自己的协议书中，王公们答应一定不收别的公国的典质者，不向别

的公国派出收贡税吏、收买村庄等等。在协议书中王公们互相首先答应一定“团结一致”，主要是在对金帐汗国和立陶宛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团结一致”。缔结了反对罗斯本国内可能有的敌人的相互协议。

在特维尔、下哥罗德、梁赞各大公国内部，各封邑的王公愈来愈服从于自己的大公。到15世纪初时，各封邑王公不再在大公国的对外政策方面起独立作用，在这方面他们只保留有为金帐汗国征收贡税的权力，并且所征收的贡税被（先）送交给大公。当然，封邑王公在其内部事务方面当时仍旧是独立自主的，但这一独立性通过协议书与大公巩固地联系起来。即便从对封邑王公季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扎奥泽尔斯基（14世纪至15世纪初在位）的领地的记述中，也可判明这些小封邑公国的情况。季米特里的领地包括王公庭院——府邸和仓房，位于库边湖畔的教堂，以及附近的住有王公全部臣民和教区教民的“整个奇尔科瓦”——这就是整个公国。

到15世纪中叶时，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作用大为提高，因为由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通常由莫斯科王公取得，所以大公与梁赞、特维尔的协议书就使梁赞、特维尔实际上处于服从莫斯科的地位。既然当时在特维尔和梁赞，大公们同封邑王公们进行着斗争（通常以大公获胜告终），那末在统一罗斯各地的过程中成为各种社会力量趋向中心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壮大起来的实力就会去消灭特维尔、梁赞两大公国及其全部封建政治体系，因为莫斯科王公是封建割据时期笼罩着罗斯的“混乱中的秩序”的代表，它“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53页。

第 二 章

封建割据时期(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罗斯东北部的各公国和各地区

罗斯东北部——苏兹达尔地区首次分出来成为贤明者雅罗斯拉夫的儿子弗谢沃洛德统治的公国。强大的王公政权是苏兹达尔地区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特点之一。

竭力设法依靠城市上层分子和依靠由王公的武装侍从组成的王公自己的亲兵队，是佩列雅斯拉夫尔与苏兹达尔王公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的特点，弗谢沃洛德在其在位末年11世纪90年代时抛弃了“旧有的”亲兵队——领主亲兵队。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尽管主要致力于罗斯南部事务，但是并没有忘掉自己的苏兹达尔“世袭领地”，他建立了主要居住着手工业者的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城。弗拉基米尔是住有只归王公管辖的手工业者居民和商人的王公城市，它不同于“古老的”城市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在这两座城市里领主们尽管隶属于王公，但却以其独立性和世袭名门有别于王公的“年轻”亲兵队的成员们。

王公占有的土地的增多大概属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儿子尤里·多尔戈鲁基在位时期。王公的各种侍役——管事人、粮食管理人、侍役长，如今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同时兼任王公的亲兵队员、行政长官和谋士。他们如今在王公左右，受到王公的倚重；这就引起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领主们的不满。尤里建造了一系列新的城市——尤里耶夫、德米特罗夫等城，让商人、手工业者

和自己的“年轻亲兵队员”住入这些城市。赏赐和贷款使他们直接依属于王公，而王公在反对企图反抗强化的王公政权的“古老”城市的领主和“地方自治领主”的斗争中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尤里让他们服从自己。尤里在位时王公管事人——亲兵队员对农村居民征收的苛捐杂税增加了，这就引起尤里死后于1157年基辅随后发生的“各村庄”反对“苏兹达尔人”的起义。

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地方各城市的商业意义增长起来；这些城市的商人同诺夫哥罗德进行贸易，并通过诺夫哥罗德同西欧发生联系，而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把诺夫哥罗德同“下方”即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沿岸地区的全部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对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戈夫、加利奇的贸易，甚至对高加索的贸易，发展和加强起来。高度的物质文明——手工制品、宏伟建筑物等等，证实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地方各城市中城市生活的发达和具有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

罗斯托夫“旧”领主——受“年轻亲兵队员”排挤而居于次要地位的“旧亲兵队员”的世袭名门和显贵的代表人物，仇视、鄙视年轻亲兵队员和城市居民。罗斯托夫贵族谈到弗拉基米尔人时说：“弗拉基米尔城不属于本公国，但是郊区是我们的，而我们的农人住在那里，那里还有荷洛普、石匠、木匠和耕田人。”

罗斯托夫领主对市民——各新城居民的这种态度下，市民当然向王公寻求支持。王公抛弃了旧城——先抛弃罗斯托夫，后又抛弃苏兹达尔，而尤里的继位人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在离弗拉基米尔不远的地方建造了自己的城堡博戈柳博夫。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继续同领主作斗争，并在同领主作斗争的过程中加强自己的统治。王公的地产增加了，与此同时对农民的剥削也加重了。安德烈举行的一些远征取得成功。他战胜了卡马河的不里阿耳人，并得以把需要苏兹达尔的粮食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的诺夫

哥罗德掌握在手中。尽管1169年对诺夫哥罗德的远征没有成功，安德烈对诺夫哥罗德的事务具有巨大影响，他在这座市民会议城市里扶立了一个"副"王公。

1169年，安德烈的亲兵队洗劫了基辅，但是安德烈并未进入基辅，他停留在北方本土上。他似乎以此来强调基辅作为政治中心的作用的衰落。

在受市民千方百计支援而成为不仅控制了自己的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领主，而且还控制了"副"王公们的"独裁者"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时代，王公政权的加强和他的建立"统一强国"的企图导致了宫廷领主筹划的阴谋。阴谋的发起人是被尤里·多尔戈鲁基杀掉的"地方领主"库奇卡的子孙库奇科维奇家族的人。1174年6月，阴谋实现，安德烈被杀。安德烈的被杀引起反对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王公主管人员——管事人、持剑武士、地方行政长官的起义，支持王公政权的教会出来保护他们。僧侣们制止了人民运动的扩大，并使它暂停下来。安德烈死后，罗斯托夫领主请来梁赞王公登上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王公之位，因为梁赞王公应当为领主们提供"按照自己意志"统治的可能性，而莫诺马霍维奇(莫诺马赫后裔)家族的人却迫使他们屈服于自己。安德烈的兄弟米哈尔卡(михалка)得以逃到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人——王公的亲兵队员和市民们害怕遭罗斯托夫领主的镇压、害怕领主专制制度确立和领主的掠夺，坚决支持自己的王公。梁赞王公们和罗斯托夫领主们的亲兵队费力地把米哈尔卡从那里赶了出去。由罗斯托夫领主们请来的梁赞王公姆斯季斯拉夫·罗斯季斯拉维奇和雅罗波尔克·罗斯季斯拉维奇开始公开抢劫市民。弗拉基米尔各教堂也遭到抢劫，这些教堂的僧侣都是支持莫诺马霍维奇家族的。罗斯季斯拉维奇族人将全部贵重物品运回梁赞自己那里。弗拉基米尔人再次请回米哈卡尔，这一次米哈尔卡在斗争中获胜。米哈尔卡修复

了城市和各教堂。看到他的成功，苏兹达尔市民与自己的领主划清界限，把他请到自己处。米哈尔卡与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签订了条约。他死去后，1177 年在市民的请求下他的兄弟“大窝”弗谢沃洛德登上弗拉基米尔王公之位。尽管罗斯托夫领主企图请梁赞王公再次出来反对自己的王公，但弗谢沃洛德依靠弗拉基米尔市民不仅以果敢的措施镇压了他们，没收了他们的地产，而且打败了梁赞王公们。弗谢沃洛德“面对自己强大的领主们毫不犹豫地”实施统治，他成功地继续加强了自己的王公政权。受他的亲兵队主宰的梁赞、契尔尼戈夫和基辅不得不承认了他。诺夫哥罗德也被拉入他的政治范围，但诺夫哥罗德领主对罗斯托夫和苏兹达尔领主的同情超过对王公的同情，弗谢沃洛德没能使他们服从自己的统治。

弗谢沃洛德是当时最强大的王公。编年史称他为“大公”和“君主”。弗谢沃洛德的众多的儿子们担任他的“副”王公，驻守在古罗斯各地。《伊戈尔远征记》这样地评论弗谢沃洛德的富有和强大：“弗谢沃洛德大公啊！难道你心里就不想从那遥远的地方飞来捍卫父亲的黄金宝座？要知道，你用你的那些木桨就能荡尽伏尔加河河水，而用你的那些头盔就能舀光顿河！……”①

弗谢沃洛德在位时期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极盛时期，该公国不仅在公国间的所有内讧中起主要作用，而且企图在古罗斯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权。

对不里阿耳人(болгары)和莫尔多瓦人的战争使公国的边界向东方扩展。

但是弗拉基米尔国的极盛隐含有分裂和瓦解的因素。引起罗斯各公国分裂为各封邑的同样一些原因，首先是封建土地所有制

① 《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 18 页。——译者

的发展，导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分裂。弗谢沃洛德死后，1212 年，国土在他的儿子们——康斯坦丁、尤里和雅罗斯拉夫之间进行瓜分。产生了各自独立的几个公国，开始了内讧，内讧的结果发生了 1216 年可怕的利彼茨克战役。于是在弗谢沃洛德在位的昌盛时期之后，罗斯东北部重新开始分裂为各个封邑。整个罗斯在 13 世纪正处在封建割据时期。

国土的分裂不断进行着。在弗拉基米尔公国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些新的封建国家组织。它们不断被分割、被再分割。瓜分时归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得到的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领地分裂为由雅罗斯拉夫子孙统治的佩列雅斯拉夫尔、莫斯科、特维尔三个公国。

13 世纪初由康斯坦丁·弗谢沃洛多维奇统治的罗斯托夫公国，在他死去(1218 年)后瓦解，在该国国土上形成了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乌格利奇、别洛奥泽尔四个公国。

14 世纪初，科斯特罗马与罗斯托夫脱离关系，在这个地区罗斯托夫王公们的领地曾与其邻邦雅罗斯拉夫和别洛奥泽罗王公们的领地交错在一起。罗斯托夫王公们的领地的极北点曾位于大尤格·乌斯秋格河河口。由于罗斯托夫国土进一步封建分裂的结果，14 世纪前半期时它已分裂为一大批小公国。

在雅罗斯拉夫公国，拔都入侵后在位的是弗谢沃洛德·康斯坦丁诺维奇的后裔瓦西里和康斯坦丁。后来 1249 年时，瓦西里·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女婿斯摩棱斯克王公费奥多尔·罗斯季斯拉维奇统治雅罗斯拉夫公国及其所辖各乡。到 14 世纪时，王公家族不同寻常地繁衍壮大，于是雅罗斯拉夫公国分裂为由王公库尔布斯基家族、普罗佐罗夫斯基家族、西茨基家族、莫洛日斯基家族等等统治的许多封邑。

康斯坦丁·弗谢沃洛多维奇将乌格利奇及所辖各乡分给自己

的幼子弗拉基米尔，但是乌格利奇公国没能长期独立存在，弗拉基米尔的儿子们死去（安德烈死于 1261 年，罗曼死于 1285 年）后，该公国就停止了独立存在。乌格利奇及其各领地转归罗斯托夫王公所有。

瓜分时归瓦西里科·康斯坦丁诺维奇得到的别洛奥泽罗公国远在北方，位于舍克斯纳河和莫洛加河沿岸、别洛耶湖畔和库边湖畔的处女密林地区，瓦西里科是众多的别洛奥泽罗王公，如乌赫托姆斯基家族、别洛谢利斯基家族、克姆斯基家族等等的始祖。

罗斯托夫公国就这样分裂为许多极小的封邑。

斯维亚托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后裔所统治的尤里耶夫·波利斯基也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公国。

1238 年分给伊万·弗谢沃洛多维奇及其后裔的斯塔罗杜布小公国位于克利亚济马河沿岸。

14 世纪时形成了包括有下哥罗德、苏兹达尔、戈罗杰茨的下哥罗德公国。

弗拉基米尔公国本身包括了位于伏尔加河中游、奥卡河、克利亚济马河三河之间的领地。其中包括有人口稠密、丰产和无森林的"苏兹达尔地方"和科斯特罗马地方。

鞑靼压迫制度建立之初，金帐汗们支持希望得到弗拉基米尔大公地位的大窝弗谢沃洛德后裔家族中的长者，后来，缴纳巨额"贡金"而取得受封为大公的敕令的人成了大公。马克思指出："肢解从南部扩展到了中央地带"。①

国土的封建割剧不限于这一点。各公国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其政治、经济上的隔绝性加强了。王公、愈来愈富有的、强大的领主们的世袭领地经济发展起来。在王公、领主的收入中，世袭领地经济起着主要作用，并使他们依附于公国、"领地"，使他们趋向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 年），第 67 页。

利己主义的狭隘私人利益。纷争和内讧不断进行。王公们到金帐汗国去为争封邑而争吵，他们互相交战。内战使土地遭到破坏，居民贫困化，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统治权逐渐衰弱。“大公”这个称号本身变成了实际内容十分贫乏的响亮衔头，变成了王公之间各种冲突的来源。

罗斯国土的分裂为小块是在鞑靼压迫制度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人民企图通过起义来摆脱鞑靼压迫制度，结果未能成功。1259年诺夫哥罗德的“大暴动”和1262年罗斯东北部各城市的起义都被鞑靼人所镇压。这些摆脱可恨的金帐汗的压迫制度的最初尝试未能成功。金帐汗国还很强大，而战败后一蹶不振、遭到洗劫的罗斯没来得及建立一个能够联合罗斯人民反击压迫者——鞑靼封建主的政治组织。

能成为这样的政治组织的只有强大的罗斯国家。然而13至14世纪时罗斯“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半国家”①，这些半国家经常互相敌对，与导向统一的倾向同时存在着的是阻碍罗斯统一的分裂力量。遭到鞑靼一蒙古人完全破坏和劫掠一空的罗斯正处在衰败、衰弱和分裂的时期。

在当时罗斯的许多公国中，较出众的有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梁赞、下哥罗德，当然也有莫斯科。

大诺夫哥罗德幸免于被鞑靼军队直接摧毁。13至14世纪时诺夫哥罗德领主共和国的领地还扩大了。大领主的地产增加了。领主的土地和能经营的地分散在整个诺夫哥罗德公国各地。“居民”和商人也占有了不少土地，尽管大部分土地属于小私有者——“土地小私有者”或“养蜂人”。自由农民愈来愈少。破产和受奴役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农民变成了对分制佃农和半自由农，他

① 《关于研究历史》，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出版社，莫斯科，1946年，第21页。〔《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27页。——译者〕

们在主人的土地上耕作以分得一部分收获物。农奴制依附关系逐渐扩大

在诺夫哥罗德各行政区和各地的辽阔土地上，移民垦殖在继续加紧进行。13和14世纪时开拓了贫困的奥博涅日耶、湖泊和峭壁地区，那里很少有适于农耕的土地和可获利的采掘场、渔猎场，其中占重要地位的只有当地的沼泽铁矿。奥博涅日耶不能吸引贪婪的领主，成了农民开拓的地区。精明能干和贪婪的诺夫哥罗德领主的注意力转向北方，因在北方的泰加森林里繁殖着许多可提供珍贵毛皮的野兽，而在海上可从事有利可图的猎兽业。诺夫哥罗德领地北部和东部边区的"贫瘠土地"迫使有进取心的诺夫哥罗德人奔向盛产鱼的河流，奔向盛产毛皮兽的森林，奔向盛产鱼和海兽的海洋。

诺夫哥罗德遥远"地区"富有这一切，在这些地区居住着人数不多的北方弱小部落群、诺夫哥罗德的"纳贡者"：洛普人(萨阿米人)、扎沃洛奇耶的楚迪人(科米吉梁人)、尤格拉人(汉蒂人和曼西人)、萨莫耶德人(涅涅茨人)。一些平民、"小百姓"为摆脱领主的压迫、剥削，也到了北方。领主们为开始剥削北方沿海地区、德维纳河地区、乌拉尔山脉地区的罗斯和非罗斯居民也奔向北方。

诺夫哥罗德人就这样进入北方泰加森林，进到冻土地带、冰海沿岸地区，去获取鱼和毛皮，海兽和盐。诺夫哥罗德的各业人员到达了盛产鱼和野兽的特列(捷尔河岸)和摩尔曼。在科拉河河口建立了科拉小城。后来，各业人员又到了佩琴加、芬马尔肯，并到了格鲁曼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等地。

东北部还有较富的扎沃洛奇耶或德维纳地区。这里早就出现了移民——从诺夫哥罗德和苏兹达尔领地来的农民和各行业的人们，商业早就发展起来，并出现了领主的地产。14世纪时，诺夫哥罗德领主企图在扎沃洛奇耶较巩固地住下来。1342年，领主鲁

卡·瓦尔福洛梅耶维奇率领武装队伍侵占了德维纳地区，并建立了奥尔列茨小城。诺夫哥罗德其他领主在他之后接踵而来，不久，大诺夫哥罗德的封建主们开发了扎沃洛奇耶全部地区。

14世纪时诺夫哥罗德国的辽阔疆土分为三种地区：(1)诺夫哥罗德旧有的基本地区，即所谓五行政区(沃德、舍隆、杰列夫、别热茨克、奥博涅加诸行政区)，那里发展起封建地产，农民们受奴役；(2)领主的垦殖发展起来的地区，即：扎沃洛奇耶、特列和北方沿海地区；(3)纳贡者、水上强盗和商人所深入的地区(伯朝拉、萨莫耶季、尤格拉至鄂毕河)。为了同尤格拉地区进行贸易，成立了专门的商业组织"尤格拉商社"。

诺夫哥罗德是罗斯"通向欧洲的窗口"，并且几乎是罗斯与西方之间贸易的垄断者。汉萨同盟① 的贸易起首要作用。诺夫哥罗德商人从汉萨同盟诸城市与吕贝克② 和维斯比③ 有最密切的联系。诺夫哥罗德有"德国会馆"，其中驻有按所谓"斯克拉"的专门规章办事的汉萨同盟商人的事务所。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之间在不同时期签订过一系列条约。汉萨同盟的商人是诺夫哥罗德同西方进行贸易的中介人，但是诺夫哥罗德商人也独立地行动，他们前往遥远的边区和"出海"，在里加④、纳尔瓦⑤、列维尔⑥、尤

---

① 14至17世纪法国北部城市(汉堡、不来梅、吕贝克等)以垄断北欧商业为目的的商业及政治联盟。——译者

② 西德东北部重要港口城市，建于11世纪，自13世纪末至15世纪，曾为"汉萨同盟"盟主和北欧主要商业中心之一。——译者

③ 瑞典东南哥得兰岛的首府。12世纪时海上贸易发达，为欧洲主要商业中心之一。14世纪以后经济逐渐衰落，19世纪末因商业发展再度兴起。——译者

④ 里加——前苏联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首府，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波罗的海里加湾南岸的大海港。早在1201年就被建为要塞，后逐渐成为商业城市和海港。——译者

⑤ 纳尔瓦——前苏联爱沙尼亚东北部城市，是波罗的海的门户，从13世纪初起就已成为商业市镇。——译者

⑥ 列维尔——即前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首府塔林，濒芬兰湾南岸，中世纪以来，常为丹麦、德国、瑞典、俄国的争夺目标。1219年丹麦在此建立据点，1466年为条顿骑士团占领，1504年后为瑞典占据，1721年被帝俄并吞。——译者

里耶夫(杰尔普特)、阿博、维堡[1]、斯德哥尔摩、吕贝克、哥得兰岛、维斯比城和丹麦进行贸易。

诺夫哥罗德的商品主要通过征收贡税获得，一部分则通过同北方各部族（萨莫耶德人、扎沃洛奇耶的楚迪人、尤格拉人等）进行贸易而获得，这些贸易物品为狩猎、猎兽业和其他行业产品(毛皮、鲸须、海象牙、所谓的"鱼齿"、鱼油、蜂蜜、蜂蜡及其他产品)。"海外"商品则由诺夫哥罗德商人在罗斯东北部各公国进行销售。

诺夫哥罗德的手工业，尤其是它的商业，为它建立了一定的经济优势，从而也建立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与罗斯其他各公国相比)。

按照政治体制，诺夫哥罗德是领主政体统治的封建共和国。

诺夫哥罗德是谓彻[2]共和国，而且全体自由民——诺夫哥罗德人和所辖各城即诺夫哥罗德国各城市的居民都参加谓彻。谓彻可以由随便什么人，即王公、地方行政长官或任何一个诺夫哥罗德人召集。通常按谓彻的钟声，在"雅罗斯拉夫尔宫"(商业区)召开。

全体诺夫哥罗德执政者，即地方行政长官、千人长等都坐在专设的木板台——"台阶"上。有按各街道召开的各街道谓彻和按各区召开的各区谓彻，经常在街道和区的谓彻上对各种问题预先进行讨论，各街道或各区的居民带着企图在谓彻上通过的某种意见前来参加。在谓彻上讨论一切重要事情：选举或罢免官员，议决战争和和平问题，聘请这位或那位王公，与他订立契约，等等。不投票表决——事情的决定取决于多数人的意见。谓彻常发生分裂，甚至引起流血冲突，当谓彻同时在索菲亚区和商业区召开时，双方的

① 维堡——前苏联西北部重要港口城市，在芬兰湾东北岸。1293年瑞典人建为城堡，1712年并入帝俄。——译者

② 谓彻(вече一词的音译)，为古罗斯某些城市的市民大会，最高权力机关。——译者

争吵常通过在横跨沃尔霍夫河的桥上进行搏斗获得解决。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谓彻视为"民权"，但是实际上"贫民"、"黎民百姓"在谓彻上不起主要作用。经常为自己目的利用诺夫哥罗德各平民集团的领主们代替他们决定和操纵一切事情。M.И.加里宁指出："哪怕回想一下古罗斯历史和诺夫哥罗德谓彻也好。表面上这是最纯粹的民主制：全体人民在广场上决定一些根本问题，并把决定加以实行"，他进而强调指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实质上一切最重要的问题由金钱决定。富人们拥有实际上的力量，他们支配着"青年好汉们"，这些青年好汉来到市民大会上高喊大叫压过一切，有时还动用拳头。历史学家们都知道：在这个"黄金时代"里问题经常是用拳头解决的。不用说，诺夫哥罗德市民大会不是真正的人民政权。"①

诺夫哥罗德地方行政长官和千人长们的局部撤换只不过反映出领主—商人寡头政治内部的斗争。当达到绝望境地的"小人物们"提出自己的权利和要求时，谓彻通常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于是就发生起义。

全部政权为领主寡头政体所掌握。王公在诺夫哥罗德起不了特别作用，从12世纪末起诺夫哥罗德就已与王公们达成协议，限制了他们的权力。通常担任诺夫哥罗德王公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王公在一切方面受到限制。他在诺夫哥罗德境内没有购买土地的权利，没有藩臣和隶属人口，不能不通过地方行政长官进行审判，甚至在狩猎、捕鱼等方面也受到限制。王公甚至不住在诺夫哥罗德，他的驻地是郊区的大城。但是，尽管有这些限制，王公们终究还是到诺夫哥罗德去，因为与诺夫哥罗德发生联系有利于其公国的商人们，此外，王公们终究还能从诺夫哥罗德富人处取得若

① M.И.加里宁：《论苏联知识分子的任务》，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39年，第24页。

干收入。诺夫哥罗德需要由王公抵御敌人、保障诺夫哥罗德人同其“下方”的贸易和供应粮食。

管理诺夫哥罗德政治生活一切部门的地方行政长官是真正的执政者。掌管民团和贸易法庭的千人长是他的副手。此外，有由谓彻秘书主持的“谓彻办公室”和下级主管人员传令官、宣读通告的官员、监管员等。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起着重大作用，有时起决定性作用。专设的区长们管理各区，街道长们管理各街道，同业公会会长主持商人们参加的同业公会。这样，所有的诺夫哥罗德主管人员都是须经选举产生的，但他们都是从富有的领主中选举出来的。几十个领主家族掌握了全部政权。地方行政长官、千人长等都出自他们当中。从诺夫哥罗德领主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的家族中出过12个地方行政长官。由大主教、王公全权代理人、地方行政长官、千人长（“现任者”，即目前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和各区区长、“原”地方行政长官、千人长以及德国原始资料中称之为“三百条金带”的其他富有、显贵的领主参加的“长老会议”是事实上的政府。因此，在诺夫哥罗德的政治制度中丝毫没有什么民主制的东西。领主们靠自己的农民、荷洛普、对分制佃农发财致富，靠为领主们服务的奔向北方的“水上强盗”队伍掠夺北方各族发财致富，靠贸易和高利盘剥发财致富。他们还靠所担任的职位的收入（“地方行政长官的税收”和千人长税收），非法勒索等等所得的收入发财致富。

聚集了大批家仆—仆役、“青年好汉”、“小伙子”的领主们把诺夫哥罗德“黎民百姓”和农民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诺夫哥罗德经常不断地发生尖锐的阶级斗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些阶级斗争以罕见的力量“在诺夫哥罗德汹涌澎湃”①。编年史编撰者写道：15世纪中叶时，“诺夫哥罗德没有真理和公正裁判……”。非常繁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英文版，第81页。〔参阅中文版，第74页。〕

重的苛捐杂税和领主们的高利盘剥使人民贫困到极点,"所有的人对我们的首长喊叫、痛哭、边诉边哭边诅咒"。结果发生了黎民百姓的历次大起义,例如1418年的大起义。如下事故成为大起义的导火线:诺夫哥罗德人斯捷潘科在街上抓住领主丹尼拉·伊万诺维奇并高声召唤诺夫哥罗德人。诺夫哥罗德人将该领主扔进了沃尔霍夫河。当被救出的丹尼拉·伊万诺维奇反过来抓住斯捷潘科并开始折磨他时,城里爆发了反对领主的起义。

诺夫哥罗德的阶级斗争以比较隐蔽的形式,即所谓异端派的形式进行着。第一个异端派是14世纪70年代在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产生的斯特里戈利尼克派异端派;斯特里戈利尼克派(стриг-ольники)以助祭尼基塔、卡尔普等人为首。斯特里戈利尼克派起来反对正统教会及其苛捐杂税、出卖教会职位、企图"贪财"等等。关于斯特里戈利尼克派,黎民百姓说:"这些人不掠夺,也不强夺财产"。

异端派在许多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间受到欢迎,它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增长。

普斯科夫是罗斯的第二个谓彻城市。1137年聘请从诺夫哥罗德驱逐出来的弗谢沃洛德·姆斯季斯拉维奇是普斯科夫走向独立自主道路上的第一座里程碑。

从13世纪末起,普斯科夫脱离了诺夫哥罗德,并且不考虑诺夫哥罗德的意见开始聘请王公们。例如,多夫蒙特在普斯科夫当王公时(1266—1299年)就是如此,多夫蒙特曾成功地捍卫该城,抵御了立沃尼亚骑士和立陶宛人。1346年普斯科夫彻底脱离诺夫哥罗德,按照博洛托夫斯克条约,诺夫哥罗德承认了其"小弟"的独立性。

就政治制度而言,普斯科夫的谓彻与诺夫哥罗德相近。政权掌握在统治普斯科夫的领主们手中,组成了被称做"长老集团"的

专门组织，只不过在普斯科夫设有两名有同等权力的地方行政长官，而不是地方行政长官和千人长各一人。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普斯科夫起着很大作用，领主不象诺夫哥罗德那样地强大和富有。

王公在普斯科夫所起的作用比诺夫哥罗德还要小。

1467年在谓彻上通过了《普斯科夫审判法规》，该《法规》包括若干部分，其中最古老的部分是14世纪初就已制订的。该《法规》反映了封建的普斯科夫各村及其借贷、按对分制从事劳动的情况以及只在菲利普节(俄历11月14日)有转移权的受剥削、压迫的半自由农、菜农、渔民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还存在有与主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老半自由农"。

普斯科夫地方从北向南延伸成一个狭长地带，似乎构成罗斯西部的边界。由于普斯科夫位于边境，这就使它在数百年间受到立陶宛和骑士团的打击。由于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位处边缘地区，它们必须经常同企图进攻罗斯的瑞典人、立沃尼亚骑士和立陶宛人作战。

"罗斯诸共和国之首"(马克思语)——大诺夫哥罗德老爷所统治的罗斯西北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

特维尔公国是罗斯最强大的公国之一。

特维尔在编年史上最初于1209年被提到，尽管它的创建还要早得多。当时特维尔是苏兹达尔国的组成部分，是该国西部靠近大诺夫哥罗德边界处的一个据点。大窝弗谢沃洛德死后，特维尔归他的儿子雅罗斯拉夫，成为佩列雅斯拉夫尔公国的组成部分。

到13世纪后半期之末，特维尔成为罗斯东北部最强大的公国。促使特维尔崛起于1247年成为独立的公国的条件，是农民和市民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国的东部边区大批迁移和逃入特维尔地区。拔都入侵后，由于随后发生的鞑靼人的多次侵袭，农村和城市的人们不得不离开东部各公国，向西部迁移到较安全的地方。

到13世纪末，尤其是1293年鞑靼人举行袭击，把除特维尔以外的弗拉基米尔国的所有公国和城市劫掠一空之后，特维尔差不多成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就使特维尔王公有可能通过向本国居民征税而集聚大笔钱款和募集大批士兵。从弗拉基米尔国东部和南部边区荒废的城市和村庄里来的领主和"自由侍从"都会集到了这里。

特维尔是一个商业大城。它位于伏尔加河岸上，正在特维尔察河流入伏尔加河的汇流处附近，它是联结诺夫哥罗德及其"下方"、在整个古罗斯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各条商道的集中点。诺夫哥罗德商人乘坐自己的小船沿姆斯塔河运送"海外"商品，他们从那里经连水陆路艰难地到达特维尔察河，再经特维尔进入伏尔加河上游，并远达"下方"。诺夫哥罗德同其"下方"的全部贸易可受到特维尔的控制。甚至在16世纪初特维尔已丧失独立性，屈服于迅速壮大起来的莫斯科时，它给住在其中的外国人所产生的印象仍是个大城市。例如，坎片泽记述道："伏尔加大河河畔的特维尔城或帕城非常大，它比莫斯科本身还要广阔、宏伟得多。"这就是当莫斯科还是个弱小的公国时，特维尔企图占据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原因。

特维尔的第一个王公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兄弟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1264年另一个兄弟安德烈死后，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从金帐汗处取得了被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揭开了弗拉基米尔大公政治史上的新的一页。大公没有到弗拉基米尔去。遭到破坏而荒废的弗拉基米尔已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雅罗斯拉夫留在人口众多而富庶的特维尔，从那里管理自己的大公国。

拥有被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使他有可能让其他王公们服从自己，并使他得以支配大片土地。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

维奇被诺夫哥罗德人聘任为王公。雅罗斯拉夫依靠“小人物”在诺夫哥罗德执政。这时，“小人物”和“大人物”之间的矛盾加剧，“大人物”在金帐汗的八思哈向市民征收贡税和登记居民户口时“为自己办好事，而对小人物们作恶”。当时“小人物”们在同王公谈判时要求他抛弃其前任王公的政策。王公所掌握的权力颇受限制，但是他终究使诺夫哥罗德人大伤脑筋，他夺取了他们的狩猎场地，征收“银子”，没收若干诺夫哥罗德人的财产，等等。王公的这些行动激起市民的不满，他们举行起义，赶走了王公的全权代理人。但是在与立沃尼亚骑士作斗争时他们不想与强大的王公绝交，便再次聘请王公，签订了新的条约。雅罗斯拉夫从诺夫哥罗德取得若干收入，此外，坐在诺夫哥罗德王公宝座上使他有可能影响诺夫哥罗德的命运，并巩固他的世袭领地——特维尔。因此，尽管雅罗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受到1265年和1270年条约的限制，他却不想舍弃它。雅罗斯拉夫在位时，使北面与诺夫哥罗德交界，西面与立陶宛大公国接壤，南面与斯摩棱斯克邻接的特维尔公国扩展了疆界。

当他从金帐汗国返回途中于1272年死去之后，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为科斯特罗马王公取得，接着为佩列雅斯拉夫尔王公取得，最后为戈罗杰茨王公取得。安德烈·戈罗杰茨基于1294年成为大公。他有两个强大的同盟者，即罗斯托夫王公康斯坦丁和雅罗斯拉夫王公费奥多尔，但是另一个由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佩列雅斯拉夫尔王公伊万和莫斯科王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结成的联盟反对前三个王公结成的联盟。双方经常不断地为敕令、权力和土地展开斗争。当受封为大公的敕令在安德烈手中时，莫斯科与特维尔的暂时联盟是能成立的，但仅能成立到特维尔企图靠侵占自己的邻邦土地扩展自己的领地和重新夺得大公地位之前。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与特维尔王公

米哈伊尔一起保卫佩列雅斯拉夫尔免受安德烈侵占。但是1304年安德烈死后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刚取得受封为大公的敕令，莫斯科与特维尔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莫斯科坚决坚持其统一罗斯国土的权利。此后特维尔公国的历史与莫斯科的历史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起初是争夺弗拉基米尔大公地位的长期紧张的斗争，后来又成为特维尔王公为保持特维尔独立的长期紧张斗争，因此我们将围绕着莫斯科来研究分析罗斯的统一。

富庶、丰产的梁赞地区位于罗斯东南部。肥沃的黑土为种庄稼创造了良好条件。森林里有许多野兽，河里有鱼。到处是"农林用地"、田野和牧场。

在罗斯的所有各地区中，"梁赞的乌克兰"从拔都入侵遭受到的灾难大概是最严重的。只有掩蔽在浓密森林里的公国北部或多或少得以幸免于难。各城市被焚毁和破坏，国土被劫掠一空和遭到完全破坏。居民们涌向北部与莫斯科公国接壤的森林地带，那里过去为荒凉和人烟稀少的地带，如今发展起一些新的城市，出现了一些村庄和新兴的小村庄。

梁赞地区的政治生活在因格瓦尔和奥列格·因格瓦列维奇家族时代(1237—1258年)停滞不前了。过了一个时候，公国中心迁到了梁赞的佩列雅斯拉夫尔。梁赞在同鞑靼人作斗争中建立的城堡普龙斯克在南部取得了特殊地位。

东南部开扩的梁赞地区在鞑靼人的侵袭下得不到片刻休息。鞑靼人的侵袭于1278年、1288年、1308年接踵而至，这还不包括各支鞑靼队伍和"宗王们"的频繁的袭击和掠夺。弱小的梁赞王公们不敢同金帐汗国斗争，而他们向西面推进则遇到了侵占北部地区的立陶宛的抵抗。

梁赞人进行了紧张的战争。他们经常自己担负可能的损失，不等待王公的帮助，在自己的千人长们和将军们的率领下与鞑靼

人斗争。不但如此，梁赞人还远远地深入南方，在顿河、霍皮奥尔河、季哈亚·索斯纳、沃罗纳河一带可遇到他们的居民点。那时被称做契尔夫列内·雅尔的沃罗涅日以东的整个草原，逐渐住入了梁赞人。充满危险的边境生活使梁赞人成为有经验的战士，莫斯科编年史家把他们称做“狂暴的”和“勇猛的”战士。

梁赞的西面与契尔尼戈夫北部国土接壤，那些地方逐渐转归梁赞王公们统治(例如，韦列亚、博罗夫斯克曾归梁赞王公统治，拉帕斯特纳也曾一度归梁赞王公统治)。

梁赞公国境内住有莫尔多瓦人和梅谢拉人，他们常参加梁赞民兵队，并与罗斯人打成一片，他们的小王公成为梁赞的领主。梁赞几乎不断地与另一些莫尔多瓦部落作战。梁赞或“梁赞的乌克兰”是罗斯南方和东方的战斗的军事前哨。当然，在最初时期梁赞是衰弱的，莫斯科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靠牺牲梁赞的利益。在康斯坦丁·雅罗斯拉维奇时就已加剧的梁赞地区的封建割据促进了这个情况。佩列雅斯拉夫尔、普龙斯克、穆罗姆分出来成了独立的公国，开始了内讧。同时，梁赞与莫斯科发生冲突，丢失了科洛姆纳，14 世纪 20 年代时梁赞王公就已依属于莫斯科王公。但是这个依属关系逐渐削弱，14 世纪中叶时梁赞又成为大公国，在其内部有几个封邑。在梁赞，(开始称为梁赞的佩列雅斯拉夫尔)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后裔坐上了王公之位，在普龙斯克，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后裔坐上了王公之位，穆罗姆的王公则为瓦西里·雅罗斯拉维奇和尤里·雅罗斯拉维奇，他们俩的系谱不清楚。

在与梅谢拉相邻、覆盖着浓密森林的梁赞公国东部地区，14 世纪初形成了一个新的封邑公国，该公国的奠基者为出身于金帐汗国的王公希林斯基家族、巴赫梅季耶夫家族、别克列米舍夫家族和当地梅谢拉族王公如亚历山大·乌科维奇等人。一些波洛夫齐

人的家族在这里为自己找到了避难所。波洛夫齐人的汗王们为罗斯的一些领主家族(例如,科布亚科夫家族)奠定了基础。

弱小的鞑靼人的、梅谢拉人的、波洛夫齐人的小王公受到罗斯文化的影响,他们皈依基督教,罗斯化,并听命于梁赞王公。

到14世纪中叶时,梁赞强大起来,形成以奥列格·伊万诺维奇为首的"梁赞大公国"和以其堂兄弟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维奇为王公的普龙斯克"小公国"。利用两个王公的年幼,梁赞领主们把全部权力攫为己有,并预先获得莫斯科一些领主的支持,他们利用(莫斯科王公)骄王谢苗之死,夺取了莫斯科的洛帕斯特纳乡。从这时起梁赞王公企图靠牺牲莫斯科的利益"修改"边界。

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在位时(1350—1402年)是梁赞公国开始逐渐从由鞑靼入侵和内讧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元气的时期。1365年进犯梁赞的佩列雅斯拉夫尔的(鞑靼)"王公"脱海被奥列格击溃于希舍夫森林一带。竭力设法无论如何要保持自己"世袭领地"为独立公国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根本不理解整个罗斯国面临的任务,他同时与鞑靼"小王公"和莫斯科王公敌对。战胜脱海使奥列格振作起来,他不顾同普龙斯克王公的内讧,企图开始同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作战。正如我们在后文所看到的,梁赞同莫斯科的斗争以梁赞的战败和屈服告终。被初次与莫斯科冲突的失败和鞑靼人的进攻所吓倒,奥列格面临臣服于莫斯科的威胁,决定倒向鞑靼方面。这就决定了他在(鞑靼王公)马买进犯时期的立场,当时他玩弄狡猾的外交手腕,终究站到马买"一边",当然,这使他暂时用这种手法"拯救了"自己的"梁赞的乌克兰"免遭破坏。在(鞑靼人)下一次远征莫斯科,即脱脱迷失远征时,奥列格再次充当了(金帐)汗的仆从。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只顾及自己的梁赞"世袭领地"疆界的浅见,使他和梁赞付出了很大代价,成为罗斯走向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奥列格的这些行为造成莫斯科和梁赞之间的不和睦关系和斗争。斗争以莫斯科获胜和1386年的和约告终，根据和约奥列格承认自己为顿河王德米特里之“弟”。

在西方展开的对立陶宛的斗争在奥列格在位时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但奥列格得以把“副王公们”更亲密地团结在自己的政权周围。他们是普龙斯克王公、穆罗姆王公，一度还有科泽利斯克王公和叶列茨王公。梁赞国的这种统一使他有可能具有被称为梁赞大公的充分根据。内讧暂时停止了。

奥列格在位时梁赞领主得到巩固和加强。原始资料告诉我们梁赞国有这样一些领主，如：同马买和雅盖洛进行谈判的叶皮凡·科列耶夫，同都主教皮缅一起前往顿河的斯坦尼斯拉夫，伊万·米罗斯拉维奇〔穆尔扎(贵族)萨拉赫米尔〕，萨福尼·阿尔特库拉契维奇，侍臣尤里，司膳亚历山大·格列博维奇和格列布·瓦西里耶维奇·隆格温，粮食管理人鲁基扬，等等。他们之中某些人占有大片土地，例如，伊万·米罗斯拉维奇占有韦涅瓦、韦尔赫杰列夫、拉斯托韦茨、韦尔科沙和其他许多地方的土地。但是尽管梁赞在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在位时得到加强，它终究没能成为联合罗斯的中心，它没有力量和手段来达到这一点，奥列格死后梁赞公国此后的全部历史不外乎是它逐渐衰弱和转归莫斯科统治的历史。

在东部被鞑靼人劫掠一空的苏兹达尔地区，第三个大公国——下哥罗德大公国逐渐兴起。在第一位“苏兹达尔、下哥罗德和戈罗杰茨大公”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在位时，这个大公国包括苏兹达尔、戈罗杰茨、下哥罗德和14世纪后半期的若干王公城堡。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到处“开辟”城镇，加强边区的移民垦殖，将农民和市民迁入在森林和莫尔多瓦人的“基地”。由于鞑靼侵袭而荒废的地区重新开始热闹起来。但是像梁赞那样地处边缘的下哥罗德公国不能不借助罗斯中部各地区而存在。因此下哥罗

德大公竭力设法成为整个罗斯国的大公。当1353年莫斯科王公伊万·伊万诺维奇到金帐汗国去谋取受封为大公的敕令时，发现预先取得诺夫哥罗德支持的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也是大公宝座的谋求者。但是这一次金帐汗把敕令授予了莫斯科王公。过了一些时候，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下哥罗德大公和解，康斯坦丁的儿子安德烈承认自己为伊万·伊万诺维奇之"弟"。

下哥罗德公国还包括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维亚特卡。

至于往昔基辅国版图内的罗斯其他地区，即：波洛茨克、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戈夫、基辅、平斯克—图罗夫、沃伦、契尔纳亚·罗斯、契尔沃纳亚·罗斯，以及多瑙河沿岸地区、卢科莫里耶、特穆塔拉坎、芬兰湾北岸地区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都被瑞典、立沃尼亚骑士团、立陶宛、波兰、匈牙利和摩尔达维亚利用罗斯的衰弱而侵占。

第 三 章

罗斯各地区合并的原因

斯大林在其卓越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生产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① 这些过程不能不在社会阶级结构上反映出来，不能不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关系上反映出来，不能不在国家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经济方面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的基础，因而述及罗斯各地区合并为统一的国家时，首先必须注意到国内经济发展的意义，必须说明其生产力发展的性质。

列宁强调指出经济因素在统一国家的形成和民族形成中的意义。他指出："9. 统一民族区域（恢复语言，民族觉醒等）和建立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必要性。10. 经济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②

斯大林在其《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中强调指出不容许在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把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对立起来，他指出：国防只不过是加速这个过程的因素。斯大林指出：他们歪曲地解释了他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报告提纲《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并向茨维特柯夫和

①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 年），第 220 页。

②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 · 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载《列宁文稿》，中文版（1978 年第 1 版），第 2 卷，第 190 页。

阿雷坡夫说明他们把斗争所需要的“经济发展”同外来威胁对立起来的错误。斯大林对茨维特柯夫、阿雷坡夫两同志写道：“无论我的报告或提纲中都没有说过俄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不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为了和蒙古人及其他东方人进行斗争’（见你们的来信）。应该对这种对立的说法负责的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是说，由于防御的必要，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因此，这些地方在封建主义消灭以前就建立了多民族的国家。可见，这和你们不正确地加在我身上的那种说法是不同的。”①

罗斯各地的经济发展、罗斯生产力的发展是基础和根本，而防御从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民族方面来的外来侵犯则是加速罗斯统一的因素，这些都成为俄国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原因。

让我们来分析 14 至 15 世纪时罗斯经济发展的情况吧。

到 13 世纪末至 14 世纪初时，罗斯从鞑靼征服带来的完全破坏中恢复了几分元气。在浓密的森林中出现了耕过的田地。村社（“米尔”）农民和各家、各户农民把密林变为耕田，从森林下面“开出”土地，准备耕种这些土地。荒废的土地上住入居民的过程进行着。由于鞑靼人而荒废的、长满森林的土地，重新被开垦、清理，变成了耕地。农民们回到了他们的祖先居住的待惯的老地方，开发新的空间。这样，农耕业广泛地发展起来，遍及于罗斯人从未开垦的土地上或住满各种各样“逃亡者”的土地上。

同时，新型轮种制正在普及，三区轮作制发展了起来。很难说三区轮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大概出现得很早。无论如何，它在 12 世纪时就已有了。如今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三区轮作的出现时间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三区轮作制盛行于罗斯东北部的问题。毫无疑问，14 至 15 世纪时伐林耕作业仅是北方盛行的耕作形态，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61 页。

而当时在南方奥卡河“沿岸”休闲田占据优势。三区轮作休闲制盛行于罗斯东北部中心地区。除经常按时更换春播与秋播作物地和还拥有二三块同样大小的休闲地的正确的三区轮作制外，看来还有所谓“驳杂地”，对它们实行“随遇”耕作即歇荒耕作，此外甚至还有伐林耕作制。但伐林耕作制很快就消失了，它只保留于北方和刚开始伐林、烧尽根除密林并使之变为耕地的地方。

卡拉姆津在《论利息》一文中摘引的《罗斯法典》描述了13至14世纪罗斯托夫省的一个村庄的生产情况，该村庄正确地实行了三区轮作制，每年在大致相等的农田上播种冬播和秋播作物，并有休闲田。在这个无疑为苏兹达尔地区典型的村庄里，用犁耕作，并“在村庄内”播种“2索哈①16卡季罗斯托夫精黑麦”，收获了40垛未脱粒的黑麦，15垛未脱粒的双粒小麦，21大勺脱粒的燕麦，6大勺大麦。一个村庄的这样的收获证实了冬播和秋播田的存在，当然也证实了休闲田的存在。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在古罗斯农业史上14世纪是三区轮作制发展的时期，三区轮作制成为首要的、后来又成为盛行的耕作形式，14世纪也是迅速开发新的空间，在新的地区传播农耕业，“伐”林、“清除”密林以开辟耕地的时期。

城市在俄罗斯国家组织的建立、发展和罗斯各地区的联合上起了巨大作用。

在俄罗斯历史上14至15世纪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和较快发展的时期。当与13世纪中叶和后半叶加以比较时，这一点就特别显著。由于拔都入侵而遭难的罗斯手工业复兴起来。手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手工业的分门别类和发展是由于劳

① 索哈为13—17世纪俄罗斯国家的田赋单位。索哈的大小依该土地所有人的社会阶级和土地性质而定。官吏所有的土地，每一索哈为800俄垧的“上等”土地。纳税的自由农民的索哈，等于500俄垧。——译者

动工具的改进，而这又要求专门的手工业训练；手工业的分门别类和发展还由于手工制品市场的扩大和粮食及其他农产品供应的增多，手工制品为农民、市民和统治上层分子所需要，统治上层分子愈来愈不满足于自己世袭领地内的手工业，便去购买手工制品。

老城市复兴起来，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黎民百姓"、手工业者和商人所居住的城郊工商区、街道和各区发展了起来。城市繁荣起来。在城堡即王公府邸、内城周围出现了热闹的商业手工业区。出现了许多生产各种日用品、武器、劳动工具、衣服等物的工商区居民，这些居民出卖这些东西并靠贸易与近郊地区紧密地发生联系。商人深入古罗斯各遥远地区的真正"穷乡僻壤"，到各城市贸易，前往"遥远的异国"。各公国之间经济上断绝联系的情况逐渐消失，它们的由于政治上的隔绝（同时还有语言、文化、日常生活的隔绝）所造成的典型的世袭领地的经济封闭状态逐渐消失。开辟了一些新的商道，旧商道也恢复了。商道通往新的地区，新的城市。诚然，许多古老的贸易联系失去了其往昔的意义，不能有机会重新恢复，但是在以似乎不可越逾的壁垒包围住的，受到鞑靼一蒙古人毁坏和压制的罗斯的墙上，打出了一些最初的缺口。对西欧的贸易发展和加强了。主要由富有的诺夫哥罗德商人担任对西欧的贸易。诺夫哥罗德商人同哥得兰岛、汉萨同盟、里加建立贸易关系，从德国商人处购买呢绒、细麻布、铁制品、金银器物、酒、水果、调味香料。所有这些商品不仅指定出售给诺夫哥罗德，而且主要指定用于"下方"即罗斯东北部各公国的贸易。此外，通过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波洛茨克同西方保持贸易联系。贸易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需要签订一系列契约。在诺夫哥罗德和另一些城市有德国会馆，而罗斯商人出现在里加，甚至到达吕贝克和丹麦。从罗斯运往西方的（商品）有：毛皮、皮革、蜂蜡、脂肪、鬃、大麻纤维，还有猎兽、捕鱼业产品：鲸须、海象牙、鱼子、胶。甚至还

输出若干手工制品：油性革、手套等。14世纪时特维尔和莫斯科也卷入了对西方的贸易。诺夫哥罗德商人非常清楚地理解对其“下方”进行贸易的全部意义，他们在1270年就已为自己从金帐汗处谋取到有权在罗斯东北部进行自由贸易的敕令：“根据汗王的敕令，我们的客商在苏兹达尔境内通商时通行无阻”。莫斯科照样也扩大了同诺夫哥罗德进行贸易的商人数。经伏尔加河同东方进行的贸易开始有了重大意义。商队从欧洲和亚洲各地汇集到伏尔加河下游金帐汗国的中心和首都萨莱城。该城以利用从被征服的中亚、东欧各城市迁来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为基础的富有和完美设施，使欧洲人感到惊讶。罗斯商人在萨莱城遇到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伊朗人）、花剌子模人、不花剌人，甚至还遇到了印度人和中国人，热那亚人控制着黑海—亚速海沿岸的商业城市兼殖民地，即：卡法（费奥多西亚）、索尔达亚（速答黑）、塔纳（亚速夫）等城。所有这各种各样的商人汇集到萨莱来进行交换，贸易，换出自己的商品，把奇异的“海外”物品运入自己的国家。罗斯商人把毛皮、蜂蜡、蜜、鱼子和其他商品运送到这里。这些商品在成交以后常常长途远运，或用骆驼经过玉龙杰赤和伊宁一直运到汗八里（北京，北平），或用热那亚船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运往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罗斯商人在萨莱收购丝绸、织物、染料、香料、调味香料和其他物品。当然，罗斯倾心于富有的东方，据13世纪后半叶和14世纪初的旅行家证实，在咸海旁的大商业城市玉龙杰赤，甚至在整个蒙古国家的大汗京都——汗八里，都能遇到罗斯人。

沿顿河通往位于顿河河口的塔纳、卡法和在罗斯称做苏罗日的索尔达亚（速答黑）的商道，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古罗斯的贸易联系上开始取得巨大意义。苏罗日是富有的热那亚殖民地之一，是一座大商业城市。罗斯商人来到苏罗日，在这里同热那亚人

和东方商人进行贸易。除水路外，还有经草原的陆路。

罗斯西北部和东北部的主要商道便是如此。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从村落中分出来以及国内贸易、首先是城乡之间的贸易，在消除罗斯各地区公国的经济隔绝，建立和发展各公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而这本身也是手工业和各行业发展的结果。各行业在拔都入侵的年代遭了大难。各城市被完全破坏，手工业者被屠杀，被俘掳或逃走。一系列生产部门消失了，另一些生产部门(石头建筑业、细丝工、上釉的陶器业等）过了100至250年才得以恢复。手工业和各行业在自己的发展中停滞不前。旧时的贸易联系中断了。只是从14世纪后半叶起，手工业才从被摧毁和完全破坏中恢复过来。乡村的主要手工业——打铁和制陶手工业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是与市场和城市铁匠紧密联系的炼铁炉业发展了起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手工业：磨盘业、磨坊业、裁缝业、制皮靴业、熬盐业，等等。同时，城市手工业者铸工、首饰匠的产品传入乡村，这就导致相应的乡村手工业的凋落。乡村手工业者愈来愈脱离农业。在各地区乡村出现了手工业区〔从14世纪中叶起在北方出现了熬盐业，在热列佐波利的乌斯秋日纳、诺夫哥罗德的沃德行政区和图拉附近出现了有高技术和生产机构(“仓库”)的制铁业〕，出现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市镇。除了劳动的社会分工外，发生了劳动的地区分工——分出了专业化的手工业区，经常作为雇佣工人的佃农为了找工作奔向那里。

甚至在有数千手工业者荷洛普工作的领主和寺院经济的世袭领地手工业中，也发生了向市场—货币关系深入的进展。许多手工业者荷洛普改行代役租制，补充了城市手工业者的队伍。

证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这些过程，在14世纪后半叶的乡村和世袭领地里进行得特别迅猛，这些过程在下一个世纪即15世纪的后半叶再次得到加强。

城市手工业发展得特别快。出现了水力机（使用这种动力机的最早企业得名为“磨坊”）和引起制铁手工业巨大发展的“火战”，铸造业有改进，开始生产纸张，与纸张的生产俱来的是抄写员手抄复制书籍和用绘画装饰的书籍的作坊，石头建筑业发展了，钱币铸造业和铸铜业以及一整套其他生产部门恢复起来。城市手工业在其发展中出现了两个极盛阶段，即 14 世纪后半叶和 15 世纪后半叶。手工业者为市场而工作，从 14 世纪开始，无数货郎将他们的制成品分送到罗斯最偏僻、遥远的地方。手工业产量增长，手工业复杂化，要求专业训练，多年中无数学徒经过了专业训练。

手工业者和商人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除类似呢绒商会和同克里木半岛的苏罗日、卡法进行贸易的苏罗日客商商会（正如在君士坦丁堡那样，罗斯人经常住在苏罗日、卡法，那里还有罗斯人的教堂）外，还有手工业者——木匠和其他“木工”，铁匠，建筑工，砌石工（“石匠”）和其他“工匠们”的手工业者公会组织。手工业者公会与指定的贸易地点联系，监视重量和长度单位，监视市场和贸易情况。手工业者在锅炉、铁器、靴、银制品等货摊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工长主持货摊市场。建筑工自古以来联合为以工长为首的劳动组合。城市里的手工业者组织为在某个教堂周围将同一专业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起的“同业公会”。例如，铁匠在库济马教堂和杰米扬教堂周围联合在一起。各（专业工匠）同业公会都加入手工业者公会之中。

供居住和进行贸易的“街道”和“货摊市场”，各种工匠所参加的手工业者公会—— 14 至 15 世纪罗斯工商区人们的组织便是如此。这些组织遵循自己的规矩，保护自己的成员，拥有自己的财库，选举自己的工长。

在分裂为许多公国和领地的罗斯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城市和市民所起的作用每隔 10 年越益显著。罗斯西北部和东北部手工

业的高度发展和复杂的组织是14世纪、尤其是14世纪后半叶罗斯城市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标志。国内贸易的发展,城乡交换,罗斯各城市与各领地之间交换的发展,它们之间经济联系的建立和发展,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

但是封建割据及各公国无穷尽、无意义的内讧,土地荒废、城市被毁,手工业者被俘,建立起的经济联系被破坏,关税、苛捐杂税,货币制、重量、容量、长度等单位的混乱,以及商人经常遭拦路抢劫的危险——所有这些情况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城乡的这些情况急切要求建立新兴市场式的共同经济。这是最起码的萌芽形态,但在这一形态中有促使罗斯各领地之间建立经济联系的趋势,这对于罗斯东北部的历史发展具有巨大意义。把过去独立的各个经济单位联系起来,并逐渐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的市场关系发展着。14世纪时所有这些现象只是刚开始萌芽,但在这萌芽状态中它们已对国内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

罗斯各部分经济分散性的逐渐消失,为国土联合为统一的政治整体作好了准备。

当罗斯分裂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互相隔绝的许多“独立的半国家”(斯大林语)时,显示出封建割据时期特性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组织体制阻碍了全罗斯各地区建立共同经济,从而阻碍着城乡生产力的发展。

耸立在各公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壁障,即“关税”和“疆界”,阻碍了由于手工业和各行业的发展而引起的贸易的发展。这些壁障应当倒塌。

消除罗斯各地区的经济隔绝状态和把它们溶合成统一的经济整体,必须消除封建割据状态。国家组织的现存体制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罗斯各地区经济分散性的逐渐被排除为罗斯的统一作好了准备。从而,生产力发展本身也为罗斯各地区联合为统

一的国家作好了准备。

因此，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在罗斯的国民经济中产生了不可避免地导致消除封建割据，导致建立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的过程。由国内生产力本身所造成的罗斯统一的原因便是如此。

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不过归根到底是历史进程的决定因素。

恩格斯写道："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他接着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①

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三同志在对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指出："提纲中，把封建制度和封建制度前的时期（当时农民还没有成为农奴）……混淆在一起。"②

因而，社会发展阶段可以根据直接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对他们的剥削方式来确定。

不说明劳动群众在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可能理解俄罗斯国家形成的历史。

斯大林指出："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他还补充说："正是人们创造历史"。③

---

①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1890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第460页。

②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27页。

③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4页。

斯大林写道："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①

14至15世纪罗斯的劳动群众是农民和手工业者。

但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什么是人的历史、社会的历史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③

斯大林在其经典著作《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说明封建制度的特征时指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是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④

因此，封建社会时代的社会生活现象不能脱离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与封建社会的产生和封建剥削形态的建立相伴随，当时"剥削几乎同奴隶制度下的剥削一样残酷，不过是稍许减轻一些罢了。"⑤阶级斗争成为一条红线贯穿着整个封建割据时期，它反映出农民对发展和加强起来、广泛传播的封建剥削形态和依附关系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5页。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中写道："即有文字可考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的时候，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即关于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

③ 同上，第466页。

④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224页。

⑤ 同上。

形态的自发不满，它促使封建主竭力设法建立强大的君主专制政权，这种政权在“全罗斯”境内保障了他们对农民劳动和农民本身的“所有权”。

因为阶级对抗社会中的一切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使被剥削的群众屈服，所以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阶级为使人民群众处于屈服地位而向国家提出的要求，同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取决于这些群众反对统治上层的斗争的紧张程度。

农民的阶级斗争采取各种形式。它可以表现为以星相家运动的形式反对正在形成中的封建秩序的自发农民起义。当农民直接避开日益迫近的封建制度的时候，它表现为大规模的逃亡，具有了“罢工”的性质；它可表现为小范围内的自发起义，最后，它还表现为像博洛特尼科夫运动、拉辛运动、普加乔夫运动那样的农民战争。城市“黎民百姓”也掀起反对领主和其他“大人物”的“起义”。

大规模逃亡、农民“避开”封建臣服形态和剥削形态，是14至15世纪农民阶级斗争形式的特征。不考虑罗斯西北部和东北部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不考虑农民和城市“黎民百姓”的生活和风俗习惯、期望和意愿，就不能得到有关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正确概念。在13世纪末、14世纪和15世纪初，罗斯农民究竟是怎样生活和进行斗争的呢？

那时的许多土地还没有被封建主夺占，只在名义上被认为是王公的、国家的，被称之为“官地”。农民居住在村庄和庭院里(庭院是被称做“德沃里谢”的新拓小村)。德沃里谢住着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由远近亲属和许可加入家庭的外人组成。村庄很小，只有二、三户。归属村庄的有森林、刈草场（пожни）、林中养蜂场(ухожаи)、河流、湖泊、狩猎场(捕海狸的地方)、耕地——总而言之，“斧头、大镰刀、犁能去”的一切地方，“自古属于该村庄的”一切地方。

13世纪、特别是14世纪时，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很大扩展。大片地产开始属于王公、领主和寺院。王公们把大片"官有"（国有）土地分赐给领主、侍从和寺院。例如，梁赞王公因格瓦尔于13世纪末就一次将住有1,010户人的5处乡村墓地赐给了奥利戈夫修道院。

生活在寺院和领主土地上的农民的地位逐渐发生改变，最初改变得较慢，后来改变得愈来愈快。赋役增加了。徭役增多了。随着农业产品贸易的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随着城市成为粮食、牲畜、蔬菜、家禽的消费者，实物代役租和劳役增长，并出现了货币代役租。这一切导致农民的破产。农民变得完全依附于封建主。受奴役的农民——"对分制佃农"、"买来的奴仆"、"银债农"、"抵债者"、"赤贫的孤身农民"、"寺院的小徒弟"等的数量增长。为了将这一大批流动的、经常改变主人和住处的人与经常住在同一地方有充分价值的纳赋税者区分开来，后者开始被称做"老佃农"。依附于封建主并受他们剥削的人们的数量增长起来。

斯大林指出："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就是这样。"①

由卡利塔奠定房屋基础、由伊万三世及其儿子建筑屋顶的俄罗斯国家是以"束缚多数被剥削者"为主要任务的国家。罗斯的大多数被剥削者就是农民。

13世纪末和14世纪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的时期。大片地产属于王公、寺院和领主。村社的"官有"土地被分赐掉。农

①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280页。

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便变为不自由的被剥削者。如果说农民过去认为:“土地是君主和大公的，可是由我占有”，土地是王公的，而“耕过的地和黑麦田是我们的”，那末如今不仅耕过的地和黑麦田不由他占有，而且他自身也不再属于自己，而变为身不自由者。

农民由于土地、财产和人身自由被剥夺和受奴役的结果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这种情况在罗斯东北部中心地区发展得特别快。农民当然要从造成的处境中寻找出路，他们通过转移、逃亡、谋求新土地和新主人来寻找出路。新土地愈来愈少，而新主人愈来愈多。新的封建主最初用优待办法招揽农民，后来加强压榨农民，努力获取暴利以补偿(最初优待农民的)损失。罗斯农民便重新出走去寻找土地，重新试图找到丢失的自由。封建主们于是加强对农民转移的斗争。

许多封建主力图建立一个高踞于一切官位等级之上的强大政权，这个政权将扫除使别的公国的封建主捉不住逃亡农民的各公国之间的壁障，这个政权是“全罗斯”范围的、“没有疆界”的，它能保障、巩固、保持他们对土地和农民的权利，封建主们的这个意图是决定各地区聚集在一个“大”公政权下的因素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或城市说来，都是一种需要。因此领导统治阶级组织即贵族组织的到处都是君主。”①

正因为土地分归领主、封建制度广泛传播以及各地封建割据在当时曾是半宗法式半封建罗斯转变为封建社会的道路上的必经阶段，正象缴纳贡税的“村社”被缴纳代役租、服徭役的“领主领地”所取代，是封建制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样，所以如今在农耕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在封建制度发展的新阶段，封建割据已不符合绝大多数封建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正在产生的、迅速成长的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1卷，第29页。

兴贵族的利益，因而应当被清除。

消灭“封邑时期”的政治制度是封建主的基本阶级利益决定的，正在诞生的中央集权国家应当执行自己的帮助统治阶级束缚农民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个情况，中央集权国家在罗斯建立的过程不能不引起人民群众的社会抗议，而“各城市、村庄和所有各地”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又促使封建主统治阶级更坚决地建立统一的国家剥削、压迫制度。

从封建割据过渡到统一的国家促成了罗斯经济的真正发展[1]，这一过渡是重大的成功和历史的进步。

但是“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2]

因此在罗斯统一时期自然发生了各地农民的多次自发起义。尽管这一时期述及农民阶级斗争的原始资料很少，但是我们知道在斯特凡·马赫里茨斯基、尼科利斯基、帕维尔·奥布诺尔斯基、基里尔—契尔莫戈尔斯基、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阿夫拉米·楚赫洛姆斯基(14世纪)、德米特里·普里鲁茨基(1371年)、穆罗姆斯基(1352年)、斯帕斯基·努罗姆斯基、索洛韦茨基、乌斯季—维米斯基、博戈斯洛夫斯基·瓦尔拉姆·斯沃耶泽梅茨、特罗伊茨基·卡利亚津斯基、科尔尼利·科梅利斯基（15世纪)、特罗伊茨基·博尔金(1528年)、丹尼尔·佩列雅斯拉夫斯基(1530年)、安东尼·西斯基(1520年)、基里尔·诺沃泽尔斯基(1517年)、阿尔谢尼·科梅利斯基（1527年）等修道院世袭领地上发生过农民的暴动和起义。

阶级斗争的这些公开表现使封建主更加坚决追求“全罗斯”范

① 参阅斯大林:《贺词》,载《真理报》1947年9月7日；《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535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01页。

围的强大政权以保障他们的地产，使他们有可能剥削农民。

各城市"黎民百姓"的阶级斗争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意义。已被奴役和正要被奴役的，遭受掠夺和剥削的，受压迫、侮辱和无权的罗斯各城市工商区的"黎民百姓"同各城市的进行高利盘剥的封建上层分子和支持他们的政权进行了残酷的斗争。"黎民百姓"的起义在罗斯相继爆发。1304年，科斯特罗马爆发了起义（"科斯特罗马举行谓彻反对领主"）；1305年，下诺夫哥罗德"黎民百姓""打了领主"，王公费很大力气"屠杀谓彻参加者"；1340年勃良斯克造反者"召集谓彻"，杀死王公；1357年，莫斯科爆发了反对"大领主"的起义；1382年，"暴动者、造反者召集人民大会"。此外，还有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爆发的阶级斗争（1342、1359、1418年诺夫哥罗德的暴动；1385年、1484年普斯科夫的暴动）。

当然，大公在统一罗斯的事业中利用市民同封邑王公和领主寡头政治作斗争，而当"贫穷的老粗"——"谓彻参加者"、"黎民"、"小百姓"利用用惯的、被王公们废除的谓彻声明自己的权利并同自己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时，大公就无保留地站到了封建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方面。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过程的阶级、社会内容便是如此。

首先是由手工业、各行业和农耕业的发展以及劳动的社会分工、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各城市同罗斯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所造成的各封建公国、各"独立的半国家"（斯大林语）、各"民族区域"（列宁语）经济隔绝性的削弱，其次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能使人民群众屈服的强大政权。这就是为罗斯各地区的合并创造条件的内部形势。

同时必须指出，在14世纪的罗斯，为实现联合的全部经济基础远没有充分成熟，但是大公们对各地区的合并仍进行得十分有效和顺利。到底是什么加快了罗斯统一的过程呢？

罗斯被有侵略野心的敌国四面八方包围。它们利用分裂为许多自相敌对的封建的半国家的罗斯的衰弱，竭力设法侵占罗斯国土，征服罗斯人民。

正如已曾指出的，这些敌对国家是波兰、德国骑士组成的立沃尼亚骑士团、瑞典、立陶宛和金帐汗国。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欧洲东部各国——匈牙利、奥地利、俄国时指出，“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开始，也许刚刚开始，然而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必须立即建立能够抵御外侮的中央集权国家。”①

斯大林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指出，在欧洲东部，尤其在俄国，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过程“早于封建主义的消灭”，在“资本主义还不大发达……的条件下”，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没有开始，也许刚刚开始”，这就完全清楚地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建立时期在罗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在封建发展阶段范围内产生的新东西。②

斯大林给予国防问题、加快形成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以抵御外来侵略的问题以很大的意义。斯大林在其《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中指出，“由于防御的必要，东欧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过程比民族形成的过程要快些”，并强调指出对敌人进行斗争是加快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的要素。③

不应当忘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就是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性的觉醒。统一感没有在人民中间逐渐消失，“封邑时期”的任何风暴、内讧和无穷尽的“毁坏”没能在人民的意识中消除全体

①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7—28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1979年)，上卷，第69页；《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14,27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61—162页。

罗斯人民的统一感:“罗斯国”和“罗斯”——这整个概念是在人民观念中完全实在的概念。民族自觉性的火花只不过被各公国内讧和封邑制度的灰烬所掩盖,——而如今它又燃起火焰来。各领地罗斯人民、城乡罗斯人民的互相来往,他们在贸易时、在共同出征与罗斯国的“敌人”作战时相遇,这些情况摧毁了往昔语言和文化习俗的不统一性,加强了共同的东西,扫除了局部的、地方的东西和受“封邑时期”“不幸时代”制约的东西,使统一感和爱国主义觉醒起来。普斯科夫人和诺夫哥罗德人,莫斯科人和梁赞人,特维尔人和下诺夫哥罗德人,在语言和日常生活上,在习惯和风俗上,在一切方面互相日益接近,融合成统一的大俄罗斯民族。

列宁指出这个历史现象为:“统一民族区域(恢复语言,民族觉醒等)和建立民族国家”。[1]各“民族区域”(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特维尔、莫斯科、梁赞、下诺夫哥罗德等领地)的居民融合在一起,创造了统一的语言,民族意识觉醒起来,各民族区城融合成了统一的国家。

大俄罗斯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件事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非常重大。罗斯的统一就这样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作好了准备。

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参加者到底是哪些人呢?

罗斯各地联合的过程是以大公为首进行的。所有的王公都力图夺取更多的土地,积累更多的珍宝,以此使自己更加强大并使其他王公屈服于自己,但是在这个斗争中成功的全部可能性在最强大的大公方面。

属于王公的疆土越大,城市就越多,向王公缴纳各种税和负担各种赋役的城乡居民数就越多,王公的侍从和战士就越多,这样的

---

① 《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载《列宁文稿》中文版(1978年),第2卷,第190页。

王公就越富有和强大。

王公们为占有土地、农民和收入相互斗争，这就促使他们去兼并罗斯各领地。

大公们想把罗斯各领地合并于自己的政权下的意图与国内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相一致，与罗斯所面临的总任务相一致。

谈到民族国家在西欧的建立，恩格斯写道："但是，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增加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连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止那种总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踞国土时还在内战——的封建主之间的争吵，结束那种不间断地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的、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①

因此，封建社会中的所有进步因素都趋向于王权，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它也代表着形成中的民族。

大公政权与西欧各国的王权相当，大公政权作为"混乱"与分裂成无数小公国的王公封邑时期"君主"的对立物，代表着秩序并作为形成中的大俄罗斯民族的代表吸引了罗斯的所有进步因素。

大公——罗斯的统一者——在其为占有罗斯领地而与封邑王公作斗争时受到居民各社会集团的支持。当然，他们同时也根据各种打算行事，追求着不同的目的。各统治集团力图控制土地、财富和权力；劳动人民则竭力设法保证经济发展和本国的独立自主。

领主们支持大公的统一趋向。领主们反对国土分裂，因为位于不同地方的领主世袭领地常常在两个甚至三个互相敌对的公国的疆土上。当时领主与他们的世袭领地所在地区的封邑王公有一定的赋役关系。领主应当"按照土地和水源的情况，服从裁判和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51页。

纳贡税"。领主作为王公的侍从可随自己的意志为王公或不为王公服务，可以为并非他的世袭领地所在的封邑的那个王公服务，但是作为土地所有者他必须按照其世袭领地所在地服从王公裁判和缴纳贡税。在王公们内讧时，领主可以出来"效力(于本主)"反对其地产所在封邑的王公，但是作为土地所有者他又要服从该王公。此外，领主们还以所谓"城围"的服役与王公发生联系。如果城市遭到敌人进攻，不管应当"效力"与否，(该城市所辖)县的所有土地所有者必须保卫城市，"落到被围攻中"。但是如果领主的地产所在地的城市遭到(他所隶属的)王公的进攻，那末怎么办呢？他为谁效力呢？

领主地产的交错分布造成他必须"按照土地"承担一系列义务，他同时要为经常互相敌对的几个王公效劳，这是促使他站到统一国土的大公方面的第一个原因。土地和政权集中于一人手中使领主们有可能只为一个王公效劳，他们的所有世袭领地将全都在该王公的领地境内。

促使领主们联合在大公周围的第二个原因，是为较富有、强大的大公效劳的自然企求，领主们可以从较富有、强大的大公处取得"封赐的世袭领地"、官职等等。领主家族接二连三地离开封邑王公去投奔大公。

封建阶级的下层——服役贵族(Дворянство)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倾向于大公。他们是服"军役"的"自由侍从"，由服军役得到土地和"俸禄"，即与他们作为王公的官吏、管理人员等服役相联系的行政服务收入。为王公经济服务、直接归王公的管家管辖的自由的"宫廷侍役"(照料猎犬者、饲马员、花匠、饲鹰的猎人等)与王公的自由侍从相接近。他们靠自己的效劳取得土地。这批封建主们——未来的新兴贵族、地主的胎儿——在14世纪时壮大起来，并且自然也就开始起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他们有权从一个王公处

转到另一个王公处去，他们利用这个权利去投奔较强大、富有的王公，而大公就是这样的王公。

封建主们——领主和服役贵族——倾向于大公还出于如下情况，即他们都在使农民成为农奴上获得利益。

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加强和扩展促使封建主必须把农民变为农奴，并把他们的"法权"扩展到农民身上和农民劳动上。只有强大的大公政权才能在"全罗斯"范围内保证把农民变成农奴。

教会也站在大公方面。教会不仅是集中掌握了全罗斯四分之一土地的罗斯最大的封建主，而且是唯一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教会有自己的中心和自己的都主教。教会也力图建立"统一性"，即建立可以(由教会)施加一定影响的领导世俗国家的唯一统治者的秩序，因为教会要让几十个王公服从自己的影响是无力办到的。此外，教会可以从富有和强大的王公处取得赏赐和特权，这是各个封邑王公所做不到的。

教会害怕异教徒会铲除"东正教"，使东正教教会退居次要地位，因此教会在王公同外敌作斗争时经常支持王公，这个情况也具有重大意义。教会必须关心自己的能够保卫罗斯和停止王公内讧、争吵的"东正教王公"。

(罗斯)统一的观念在宗教界中出现得很早，早在14世纪初都主教马克西姆被称为"全罗斯"的都主教时，这个观念就已出现。教会开始关心全罗斯的事业，当然也就支持罗斯统一的观念，从而支持大公。值得注意的是，写至1305年为止的头一部全罗斯编年史的编纂工作是在这个时期进行的。① 东正教教会在罗斯以弗拉基米尔为中心，后来以莫斯科为中心，它成为全国的机构，促进罗

① 在此以前，12至13世纪时，编写编年史盛行于各个公国，并主要反映该公国的历史。有《基辅编年史》、《加利奇-沃伦编年史》、《苏兹达尔编年史》等。都主教彼得根据地方编年史决定编撰一部全罗斯的编年史，这件事证明了教会的统一意图。

斯合并为统一的国家。

古罗斯的市镇居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关心公国间内讧的停止，因为内讧使城市毁坏，阻碍正常的交易和手工业者的工作。他们渴望扫除公国间的政治边界，因为公国间的政治边界阻碍贸易的发展，使贸易以公国间的纠纷和战争为转移，使商品涨价并导致每个商人所担的风险的增加。由于封建割据，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重量单位等等，这也是阻碍贸易发展的一个因素。商人们在路上不仅会遭到土匪的抢劫，而且也会遭到商队行经的公国的王公亲兵队的抢劫；商人每走一步就得缴纳关税，到处遇上特殊的地方法令和规矩。手工业者和商人需要“秩序”，而大公政权“在混乱中”唯一代表着“秩序”。

最后，罗斯农民也站在大公方面。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封邑王公把手执火和剑沿罗斯村庄和田地通过的鞑靼人、立陶宛人、德国人引进罗斯来时，“保卫了罗斯国土免于敌人侵犯”(这是十分容易明白的)，而且农民义勇军在决定性的战斗中也起着特殊的作用，在库利科沃原野会战时便是如此。

农民出于与他们的城市中的社会同行、普通“黎民百姓”同样的原因，站到了大公方面。对他们而言，大公代表着秩序、“安宁”、封建割据时期罗斯历史上无穷无尽的“大”、“小”“破坏”的停止、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罗斯的“统一”与强大。

因为正在形成的统一国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压迫工具，农民和城市“黎民百姓”就起来反对它；但因为它还执行着自己的第二项职能——保卫国土免于敌人侵犯，保障罗斯人民的独立和经济文化发展，罗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就支持使罗斯各领地合并、使俄罗斯国家建立起来的大公。

罗斯觉醒起来，它的力量壮大起来，民族自觉性逐渐成熟。这就是古罗斯社会的所有进步成分——领主、服役贵族、市镇人民

(手工业者和商人)以及农民——倾向于代表罗斯统一的大公，逐渐地具体倾向于莫斯科大公的原因。

许多富有和势力强大的封邑王公和“同他们在一起的人”是对抗大公、企图阻止罗斯统一进程的唯一力量。他们手中有土地、城市、政权和势力、数以千计的臣民、财富和实力。他们拥有威望和各种关系、众多的亲兵队和设防的城市。要摧毁他们的反抗是不容易的。诚然，拥护封邑王公的人日益减少，他们的市镇人民在脱离他们，领主和“自由侍从”离开他们去投奔大公，但最终还是靠伊万三世、瓦西里三世的统治和伊万雷帝的直辖制才摧毁了他们的统治。

中央集权国家和君主专制政权的形成违反封邑王公的意愿进行着。非名门出身的、地位较低的封建集团，即昨天的“宫廷侍役”（照料猎犬者、饲马员、饲鹰的猎人和“传令员们”）、王公的仆役，走向政权并取得政权的未来服役贵族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好处。

服役贵族需要统一国家的统一的强大政权，即君主专制政权，需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国家监察机构、侦查审判制和法院，而君主专制政权也依靠服役贵族。就这样，一个封建集团为另一个封建集团所取代，封建国家制度的一种形态为另一种更完善的形态所取代。

罗斯各领地统一的原因就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由莫斯科所建立，而不是由特维尔或下诺夫哥罗德所建立呢？为什么15至16世纪的俄罗斯国家不是特维尔国家或下诺夫哥罗德国家，而是莫斯科国家，不是“特维尔的”，而是“莫斯科的”。

须知13世纪末特维尔王公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在位时，特维尔的地位曾一度迅速提高，特维尔王公曾担任弗拉基米尔

大公，王公家族的“特维尔一支流露出一点民族独立的愿望”[1]，并在15世纪时还继续与莫斯科竞争，在君主专制思想方面走在了莫斯科前面。

有时，下诺夫哥罗德和梁赞在争取统一的斗争中也成为莫斯科的有威胁性的竞争者。

然而在这场斗争中，胜利却终究归莫斯科王公们所取得。

莫斯科王公们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莫斯科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罗斯各领地统一起来的呢？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9页。

第 四 章

莫斯科兴起的先决条件

莫斯科是怎样开始兴起的？是什么造成它的蓬勃发展，它的极盛？它的繁荣的根源是什么？造成它的强大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使莫斯科成为罗斯东北部的首府，俄罗斯国家的首都？为什么罗斯国成为“莫斯科的”——成为莫斯科王国？这是不仅引起和将要引起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注意，而且普遍引起和将要引起所有关心祖国历史的人们注意的一些问题。

当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国的边区出现这座小城时，谁也料想不到它的意义将是什么样的，B.O. 克柳切夫斯基说得对，他写道：“…… 在13世纪后半叶时……未必有人……预感到很快显示出来的莫斯科边区迅速的经济发展；如果他们(即弗谢沃洛德的后裔们——马夫罗金注)预感到这一点，那末在当时的王公之中莫斯科就要落到辈份长于王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某个王公手中了。”

毫无疑问，早在很古老的时代斯拉夫族居民就已居住在莫斯科地区。在斯拉夫人之前，这里居住着人数很少的远古居民，他们大概与梅里人有亲属关系。关于他们居留的记忆保留在一些河流的古老名称中，早在他们的远祖猎人和渔人们创造独特的多坑洼的梳状陶器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他们就已住在这些河流的沿岸了。

猎人和渔人，或者最好说成渔人和猎人，他们住在河流沿岸，他们分别迁住的地点具有不能以现代语言解释的名称。某些小河在俄语中保留了罗斯以前古代语源的痕迹，如：普列斯尼亚、萨拉、

契契拉、伊奇卡。

斯拉夫人在远古时代开发了莫斯科地区，并居住在小河和湖泊沿岸。

人数不多和落后的古代居民的残余很快与斯拉夫人同化，消失、溶合在他们中间，诚然，他们曾把自己的某些种族文化、语言特点留传给9至10世纪这一边区的主要居民——斯拉夫人。

莫斯科是斯拉夫族维亚季奇人部落的城市。斯拉夫人在莫斯科地区的居民点属于维亚季奇密林的居民。莫斯科河成为北部和东北部森林地带之间的边界以及两个斯拉夫部落——维亚季奇人和克里维奇人之间的边界。

那个开始"统一"罗斯各地的莫斯科，作为王公城市的莫斯科的奠基者，正确地说应是尤里·多尔戈鲁基，因为在1156年，他"在阿乌札河上方涅格林纳河口为城市奠定了基础"，他从九年前即1147年为庆祝其同盟者举行"盛宴"的地方把"城市"搬迁(到此)。但是莫斯科地区的考古发掘和偶然的发现物使人们有可能说，这里早在9世纪时已有斯拉夫人的某些居民点。

关于莫斯科的头一个主人领主斯特凡·伊万诺维奇·库奇卡的传说留传至今。关于莫斯科城起源的古老传说叙述了领主库奇卡的"美丽"小村和大村庄在莫斯科所在地的时代，后来尤里·多尔戈鲁基就在它们所在的地方为莫斯科（城）奠定了基础。斯特凡·伊万诺维奇·库奇卡的儿子们库奇科维奇们不是传说中的英雄，而是参加或者甚至组织杀害王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历史人物。莫斯科在12世纪时又名库奇科沃，15世纪时在莫斯科有一个地区名为"库奇科沃原野"，当时离莫斯科不远在苏兹达尔地区有个"库奇卡"乡，——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的古代名称"库奇科沃"的语尾"O"，这是俄语中村庄名称所特有的，而莫斯科最初以"莫斯科夫"(Московъ 或Московъ) 的名

称见于编年史。这证明尤里·多尔戈鲁基时代的莫斯科已经不是一个村庄或一群村庄，不是庄园，不是世袭领地，而正是一座小城。可以十分自然地设想，当时莫斯科的名称为“莫斯科夫小城”。

在蒙古人入侵之前的整个时期，莫斯科没有在罗斯东北部的生活中起过较重要的作用。拔都入侵时莫斯科仍然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城，拔都入侵把它从地面上抹掉了，稍后在13世纪末当从鞑靼人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时，它建筑起房屋，开始积累力量，并在半个世纪中利用从鞑靼人的侵袭中“乱中求静”发展和壮大起来。甚至1293年鞑靼宗王都典的侵袭也没能使莫斯科逐渐积累力量的这一过程长久停顿。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位时(根根《苏普拉斯尔编年史》判断，他于1292年即位于莫斯科，1303年死去)莫斯科还是个弱小的公国。

从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时起开始了莫斯科作为独立公国的历史，但是莫斯科兴起的历史是在他的儿子和孙子们在位时期。

13世纪末，尤其是14世纪时，莫斯科终于走上政治舞台，当时莫斯科兴起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

莫斯科公国是人口最多的公国之一。鞑靼人侵袭所造成的“恶果”是居民的大批逃亡，例如，当1252年鞑靼人进攻佩列雅斯拉夫尔，1281至1282年鞑靼人进攻弗拉基米尔、尤里耶夫、穆罗姆、罗斯托夫及其他各城时，就曾引起居民大批逃亡，引起城乡居民迁往安全、平静无事的莫斯科。只有一次，1293年时，莫斯科曾遭到鞑靼人的进攻，但是此事并没有影响整个公国人口的增长。由于居民的涌入和增加以及进一步移民垦殖边区(焚烧森林，开垦从森林中取得的土地)，出现一批新的乡和大村庄，这些乡和大村庄主要位于莫斯科公国的边缘地区。

《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传》谈到了居民涌入莫斯科公国。谢尔吉的父亲、富有的罗斯托夫领主基里尔为摆脱鞑靼人的侵袭和

苛捐杂税，“逃到了”莫斯科公国偏僻的小城拉多涅日。同时有许多市镇居民和农民从罗斯托夫的城乡迁往莫斯科公国。谢尔吉本人成了隐士，他同几个僧人躲进了森林、进了“荒郊寺院”。他在莫斯科（公国）的这种密林深处生活了15年，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逐渐来了许多农民，他们开始砍伐森林，开垦土地，到处建立村庄、小村和庭院。“荒野”密林变成了人口稠密的边区。

城乡居民和他们所开发的往昔为森林覆盖、难以耕作的土地的迅速增长，使莫斯科边区变成了富有和人口稠密的公国。众多的农民和市民向莫斯科王公缴纳税款，提供强大的军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繁荣起来。

跟随在人民群众之后，为莫斯科王公“效力”的领主汇集到了莫斯科这里来，到了古罗斯的这个平静无事和安全的角落，到了奥卡河伏尔加河之间的中心地区。莫斯科的名门老领主家族说，他们的始祖在鞑靼时代从罗斯托夫、穆罗姆、契尔尼戈夫、基辅、沃伦“动身来到莫斯科”。领主的家庭、家仆、仆从、仆役、亲兵们等等随同他一起迁来。例如，早在14世纪初时，著名的契尔尼戈夫领主罗季翁·涅斯捷罗维奇，即领主克瓦什宁家族的始祖，就已带着整个庭院共1700人来到莫斯科王公处效劳。莫斯科公国的人口就这样增长起来，——这是莫斯科公国兴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城市发展起来，对莫斯科的兴起起着重大作用的莫斯科领主也壮大起来。

谈到莫斯科的兴起时，不可忘记下列情况，即莫斯科在12至13世纪时虽曾作为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国的一个边境城堡发展起来，但它在14世纪时已失去其战略上的军事边堡地位，转变为罗斯东北部的地理中心和政治中心，转变为大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中心。在14世纪整个后半叶，莫斯科一次也没有遭到敌人的侵犯，而其他公国则承受了外敌对罗斯国的攻击。鞑靼人毁坏了梁赞、穆罗姆、雅罗斯拉夫尔、弗拉基米尔、下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和普

斯科夫同立沃尼亚骑士和瑞典人作战;斯摩棱斯克同立陶宛作战。莫斯科既没有遇到对外敌的战争，也没有内讧。因此周围各公国的居民竭力设法迁到莫斯科来。

莫斯科位于罗斯东北部的中心不必考虑罗斯的南部和西部，从四面八方受到周围罗斯各公国的保护，距离鞑靼、立陶宛、德国和瑞典的边界较远，莫斯科的这种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全罗斯对居民最有吸引力的边区。莫斯科公国的“平静无事”、和平,以及有可能过较安全的生活,造成其居民的迅猛增长;靠外来农民和市镇居民以及由于自然增长的结果,莫斯科公国的居民人数急剧增加。莫斯科王公们在强大起来后开始扩展自己的领地，这就遇到邻近封邑公国的抵抗。征服了这些公国后，莫斯科王公已起到抵御“敌人”的全罗斯国土边界保卫者的作用,这就保证了它得到来自人民群众方面的支持,从而也保证了它在政治上的成功。

莫斯科兴起的第二个先决条件便是如此。

在论述莫斯科兴起的这第二个先决条件时，似乎应该稍作逗留。

在莫斯科的历史发展上，有一个很少引起我们的研究者们注意的特点。

事情是这样的:当莫斯科还弱小时,当它还是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统治的很小的公国时,斯摩棱斯克、特维尔、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梁赞曾保护它免受立陶宛人、瑞典人、德国人和鞑靼人的侵犯;而当莫斯科积蓄了力量,它本身就成了保卫罗斯免受“敌人”侵犯的人，这就保证了它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从而保证了它在政治上的成功。同瑞典人签订的奥列霍韦茨条约,确立了许多世纪中坚韧不拔的罗斯与瑞典之间的边界线;击溃瑞典国王马格努斯,把冲到波罗特瓦河、冲到莫斯科城墙下的立陶宛人的进攻制止住;最后还有,在库利科沃原野击溃“鞑靼魔怪”(马克思语)——所

有这些在各地区罗斯人民的认识中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莫斯科王公们的名字和活动联系在一起，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莫斯科履行其保卫整个罗斯国土义务的结果，随着莫斯科的壮大，它竭力承担了这一义务。

罗斯人的真实感情在《顿河左岸故事》中得到了反映，这些感情满可以称为列宁所说的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早就有的民族觉醒。这种民族感情甚至笼罩了与莫斯科王公及其中央集权意图相敌对的统治上层管辖的地区。因此，库利科沃会战在述及这次会战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和在梁赞所编写的《顿河左岸故事》中得到如此鲜明的反映，是并非偶然的，尽管诺夫哥罗德领主上层和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都敌视库利科沃会战的英雄、战胜马买的顿河王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这就证明诺夫哥罗德广大群众把注意力集中于莫斯科，梁赞王公的臣民也珍视和爱戴它。罗斯各地区居民把莫斯科看作罗斯命运的最高主宰者，于是莫斯科的声望、有关库利科沃会战的传说与摆脱鞑靼枷锁的希望一起增长起来，传播到民间口头创作中，传播到古罗斯书本中，促进了民族自觉感的发展和加强，促进了罗斯人的民族觉醒。民族自觉感从来也没有消失，它只是像火花般被鞑靼入侵和王公内讧的火灾灰烬所掩盖。库利科沃战役将这火花煽成了火焰。

因此反映库利科沃会战的民间创作与《伊戈尔远征记》在形式和风格上的令人惊异的联系，以及《伊戈尔远征记》和《顿河左岸故事》的基本思想的一致，都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强调指出，《伊戈尔远征记》的基本思想是号召统一。① 《顿河左岸故事》也是对统一的这种号召。莫斯科领导罗斯的统一事业，莫斯科王公统一罗斯国土。凡是追求实现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罗斯、没有异族压制的罗斯、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罗斯的人们，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2卷第122页。

都把注意力集中于莫斯科，全都认为它是使人们摆脱鞑靼痛苦奴役的拯救者，全都把莫斯科看作罗斯的领导力量。

因此，民族自觉的增长是一个有重大作用的因素。

还应该强调指出也很少引起我们的研究者们注意的另一个因素，尽管这个因素的意义也很大——我们指的是大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的开始形成。关于这个过程的实质，我们将（在后文中）较详细地谈到，如今我们只述及莫斯科在俄罗斯民族形成中的作用。

大俄罗斯民族形成于从楚德湖到乌斯秋格和下诺夫哥罗德以及从冰海到谢伊姆河这片土地上。但是罗斯人的东北支重新形成为大俄罗斯民族或俄罗斯民族的这个过程的中心是伏尔加河奥卡河之间的人口最稠密地区，罗斯东北部的罗斯人的主要部分其实就住在这里。像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佩列雅斯拉夫尔一梁赞斯基、下诺夫哥罗德这样的城市都在大俄罗斯民族基本疆域的边缘地区，既然莫斯科领导了正在形成的俄罗斯国家，既然莫斯科的兴起与罗斯的统一从14世纪起，特别是从顿河王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位时起，逐渐成为同一个过程的同义语，因此莫斯科就十分自然地成了形成中的大俄罗斯民族的中心。

同时，还有一个情况也不应当忽略，那就是莫斯科真正是大俄罗斯民族的地理中心，大俄罗斯民族围绕着作为民族中心的莫斯科而形成起来。

正如苏联语文学家的著作所指出的，到14世纪时，确切些说，到14世纪后半叶时，大俄罗斯语言开始形成，尽管当时的大俄罗斯语言还包含有各种成分，还分为互相颇为不同的多种方言，但已是统一的大俄罗斯语。

这样，可确定形成民族的两个要素，即统一的语言和民族自觉——民族觉醒已经具备。后来又形成了统一的地域和心理素

质，这也就是说可确定作为资本主义民族之前的共同体的民族的一切要素都已形成。

因为罗斯的统一和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是同一过程，即莫斯科所领导的罗斯各地区合并过程的两个方面，所以，十分自然，莫斯科的兴起与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不可能互相脱离。未来大俄罗斯民族的基本地域形成于伏尔加河奥卡河之间的地区，而莫斯科又是这两条河流河间地区的地理中心，这个情况决定了莫斯科在俄罗斯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个情况也作为莫斯科兴起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莫斯科是民族自觉的启蒙者，莫斯科以其"统一"罗斯的意图，以其为罗斯国土的独立自由所作的斗争促进了民族觉醒。

围绕着莫斯科进行的把罗斯各地居民联合成大俄罗斯民族的过程，反过来也是莫斯科兴起的最大促进因素。莫斯科不仅成为"罗斯各地区的统一者"，而且也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生活中心"。①

莫斯科位于极其方便和重要的商道上，这个情况在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中也有很大意义。莫斯科首先是伏尔加河奥卡河河间地区的中心，是最遥远的公国和地区相互联系的枢纽。莫斯科河的支流伊斯特拉河紧靠流入伏尔加河的绍沙河的支流拉马河，构成伏尔加河上游通过拉马河连水陆路与奥卡河中游相联结的道路。经过莫斯科从西向东的道路沿着雅乌扎河和克利亚济马河伸展。以莫斯科为起点的"沃洛季米尔大道"经过库奇科沃原野。有一条把契尔尼戈夫、基辅地区与佩列雅斯拉夫尔、罗斯托夫、弗拉基米尔联系起来的道路从洛帕斯纳通到莫斯科。这些古老的道路都是商队行走的商道，商队行经这些商道时有时坐大船，有时经过连水

①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庆贺首都莫斯科八百周年纪念的《贺词》，载《真理报》，1947年9月7日。

陆路，有时利用车辆和滑木。罗斯南部的契尔尼戈夫商人、基辅商人沿着杰斯纳河坐船到布良斯克，从那里经连水陆路进入奥卡河，坐大船从奥卡河到达莫斯科河。商人中的某些人在这里继续坐船远达涅格林纳亚，从那里通过陆路进入罗斯托夫，其他商人坐船到雅乌扎河，然后经过连水陆路到达克利亚济马河上游，再沿该河到达弗拉基米尔。

诺夫哥罗德商人同“下方”进行贸易也通过莫斯科。

诺夫哥罗德人沿伏尔加河、绍沙河运送德国商品，然后经过拉马河附近的连水陆路进入伊斯特拉河，沿该河到达莫斯科，最后过渡到奥卡河和伏尔加河。谷物和其他若干商品也从莫斯科和“下方”各城市运往诺夫哥罗德。把立陶宛、波兰和罗斯西部斯摩棱斯克、波洛茨克两公国与东方联系起来的各条商道也都经过莫斯科。商品从立陶宛、波兰、里加、波洛茨克通过陆路和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运到斯摩棱斯克，并远达斯摩棱斯克公国东端的封邑莫扎伊斯克，又从那里沿莫斯科河经莫斯科运往克利亚济马河，并远达奥卡河和梁赞。再沿奥卡河运到下诺夫哥罗德，又从那里经伏尔加河到达萨莱。14 世纪时，“苏罗日贸易”即同热那亚人在克里木的殖民地苏罗日（速答黑）进行的贸易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商人们汇集到莫斯科，坐船经莫斯科河、奥卡河、奥谢特尔河到顿河上游，并沿顿河下驶到亚速海。此外，也有经草原通往南方和东方的陆上道路。

穿过莫斯科并在 14 世纪使莫斯科变为有热闹的商业和众多的手工业者、商人的大城市的商道便是如此。

但是并非所有这些商道都是同时形成的。这些商道的形成过程历时很长，包括整个 14 世纪。直到 14 世纪第二个 25 年之初，经过莫斯科的商道才发展起来，这些商道促进了莫斯科工商区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莫斯科王公征收的商税收入的增长。在莫斯

科公国成立的初期，莫斯科在这方面的经济优势未必受到重视，这些经济优势当时还表现得很弱，因为甚至诺夫哥罗德同“下方”进行贸易时所利用的不仅是经过莫斯科的商道，而且还有沿涅尔利河经佩列雅斯拉夫尔的商道。

但在14世纪时莫斯科的商业地位增长起来，莫斯科成为拥有众多商业人口的最大商业城市之一。莫斯科商人到处经商，同一系列其他公国有商业往来。后来，在规定莫斯科商人有权“作客商时通行无阻”、“保持旧日的关税”的有关条约中把商业关系固定下来。1327年和1380年，莫斯科同诺夫哥罗德签订了使早已安排好的商业关系固定下来的这种条约；1381年，莫斯科同梁赞签订了这种条约；1399年，莫斯科又同特维尔签订了这种条约。贸易额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各种商税的增加，使王公的金库充实起来，这个情况从14世纪后半叶起变得特别显著。各城市的发展使作为政治单位的公国巩固起来。莫斯科商人在罗斯商业中取得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变得愈来愈富有，愈来愈有势力。但是经过莫斯科的商道都是过境商道，其终点控制在其他王公、经常是与莫斯科王公敌对的王公们的手中。因此，以各路的特殊枢纽站莫斯科为其中心的过境贸易能否有大的意义取决于政治局势，取决于王公们的相互关系、王公们的内讧。当然，不断发财致富、壮大起来的莫斯科商人力图把罗斯的所有商道都条条整个儿夺取到自己手中。因此，力图把全罗斯各地区统一在自己政权下的莫斯科王公就受到商人们的坚决支持。

莫斯科商业的发展和扩大，整个说来它在全罗斯商业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工商区居民数——充实王公金库、竭力设法加强统一罗斯各地区的王公政权的商人、手工业者人数的增长，——这一切便是莫斯科公国兴起的第三个先决条件。

我们考虑到莫斯科公国兴起的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在罗斯的

统一事业中、在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中，不是决定性的，但起有重要作用。斯大林说："地理环境无疑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①

在莫斯科公国中王公们的王朝没有发展到我们在其他公国中所见到的那种程度，这个情况也具有一定意义。多半由儿子继承父位，并且当时叔父即父亲的弟弟已经死了，因此，不管封建割据倾向仍存在，王公政权继承情况本身却促使莫斯科的王公政权——"君主专制"加强起来，这无疑在莫斯科兴起中起了某些作用，使莫斯科公国居于不同于竞争者各公国的有利地位。莫斯科几乎没有"混乱"现象和封建战争。莫斯科公国内的封邑小而微不足道，这些封邑多半是短时期的，不致造成它们的政治发展，因此内讧很少。这就使莫斯科公国居于不同于它的竞争者们——其他各大公国的有利地位。

最后，有必要强调指出教会对莫斯科的支持，"全罗斯"都主教驻留莫斯科这个事实，使莫斯科成为罗斯的教会中心；还应强调指出莫斯科王公们的成功而巧妙的外交政策，他们在与其敌人斗争时团结罗斯各地的力量，并善于随机应变，等待有利时机；当需要时就退却，而当有必要和可能时，就转入决定性的进攻。

莫斯科王公们在对待金帐汗国方面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有成效。

这些先决条件决定了莫斯科变为"全罗斯的京都"，并且只有这些先决条件总合起来才达到了这一点。

促使莫斯科兴起的各因素，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并非一下子同时起作用，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逐渐加强的，并且当一个因素停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216页。

止了它过去所起的作用时，另一因素便出现了。只有当造成莫斯科兴起、使它成为“全罗斯的京都”的全部先决条件都真正起作用时，莫斯科才成为正在形成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心。

斯大林在其庆贺莫斯科（八百周年）的《贺词》中写道：“莫斯科的功绩首先在于，它成了把分散的罗斯联合为一个有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的基础。”“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①

① 《贺词》，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985年），第535页（原载《真理报》，1947年9月7日）。

第五章

罗斯合并的开始　莫斯科的兴起
伊万·卡利塔统治公国

大河源自冰冷的小泉，
莫斯科母亲始自不大的小城堡。

1147年初，“在赞颂圣博戈罗季察的星期五”，即4月4日，尤里·多尔戈鲁基在莫斯科为自己的同盟者契尔尼戈夫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利戈维奇即«伊戈尔远征记»中的英雄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父亲举行“盛大宴会”。

这是编年史上头一次提到莫斯科，但是正如前文所已指出的，莫斯科所在地的斯拉夫居民点被确定为是9世纪的。在尤里·多尔戈鲁基时代，莫斯科已经是一座城。12世纪时，莫斯科是一座小城堡，它位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边境。四个公国的边界线在这里相接。不远处，在莫斯科河上游有属于斯摩棱斯克王公的莫扎伊斯克；南面与契尔尼戈夫王公的洛帕斯纳乡接壤；相距不远，有梁赞的前哨城堡——科洛姆纳。莫斯科地处边境，使它早就成为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地点之一。莫斯科位于梁赞王公对弗拉基米尔进行军事远征的途中，它早在1156年就已围上新的木墙设防。这样就建立了位于涅格林纳亚河河口下方的莫斯科内城(克里姆林宫)。博洛维茨基的城门使人回忆起过去覆盖部分克里姆林山的那些浓密的森林，到12世

纪中叶时，莫斯科城还很小，所占据的地方不大于现今克里姆林宫的一半。

莫斯科人早就不得不参加各公国之间的内讧。1176年，莫斯科人在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的兄弟米哈尔科和弗谢沃洛德反对雅罗波尔克的掠夺而进行的斗争中，支持了他们俩。在得知雅罗波尔克向莫斯科进军之后，他们退回来“看守自己的老家”。由于莫斯科支持了莫诺马霍维奇家族的人，它于第二年被梁赞王公格列布所焚毁。《拉夫连季编年史》记载说:“格列布于那个秋天进到莫斯科，焚烧了全城和各村”。

当时莫斯科受弗拉基米尔王公的地方行政长官或小王公们管辖。最初统治莫斯科的是大窝弗谢沃洛德的幼子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在他之后统治莫斯科的是弗拉基米尔·尤里耶维奇，那时鞑靼一蒙古人侵入了弗拉基米尔地区。

“鞑靼人占领了莫斯科，菲莉帕妈妈由于虔信基督教被统将杀死，王公弗拉基米尔(尤里之子)被擒获，人们从老人到婴儿全遭屠杀；城市和神圣的教堂被付之一炬，所有的修道院和各村庄都被焚毁，许多财产被夺走。”

事件的同时代人、东方作家志费尼记载说，拔都大军占领了M. C. K. (莫斯科)[1]城，该城人口众多，多“如蚂蚁和蝗虫，而城的四周，沼泽和森林密布，以致连一头蛇也穿不过去。”攻占莫斯科后，鞑靼人“在那里找到了许多战利品”，并把该城完全破坏掉，以致使该城“除了它的名字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尽管如此，莫斯科在弗拉基米尔一苏兹达尔公国所有各地中间仍享有最安全的边区这一应得的声誉，那时就已开始有逃亡者

---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此处所记载的是鞑靼-蒙古人攻占高加索地区阿速人的篾怯思城的情况。马夫罗金此处似有误。见《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中译本，上册，内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页。——译者

从被鞑靼一蒙古人搞得最荒芜和完全破坏的弗拉基米尔公国的东部边区逐渐聚集到这里来。后一情况以及各地分裂状况的发展，导致莫斯科产生了一位新的强大的王公。他就是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绰号"勇敢者"，他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兄弟。勇敢者米哈伊尔利用苏兹达尔王公和佩列雅斯拉夫王公不在的机会，于1248年将自己的叔父斯维亚托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驱逐出弗拉基米尔，成了弗拉基米尔大公。这件事不仅使他取得大权，而且还使他得到人口众多的富庶地区，尤其是整个苏兹达尔地区的谷仓奥波利耶(尤里耶夫·波利斯基地区)。但是他统治的时间不长，同年他在反击进犯波罗特瓦河的立陶宛人时，在战斗中阵亡。他的兄弟佩列雅斯拉夫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成了莫斯科王公。1252年，他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之位，后来立下遗嘱把莫斯科交给了出生于1261年的自己的儿子丹尼尔。

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于1282年(据《尼康编年史》)或1293年(据《苏普拉斯尔编年史》)成为莫斯科王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扩大了自己的领地。1301年，他从梁赞王公康斯坦丁处夺得商业和战略要地科洛姆纳，1302年又从无子的王公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处继承了佩列雅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取得佩列雅斯拉夫尔一扎列斯基一事提高了莫斯科的地位，因为佩列雅斯拉夫尔被认为"高于"、"长于"莫斯科，并且似乎是通往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宝座的特殊跳板。莫斯科王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的儿子尤里不得不同戈罗杰茨王公和特维尔王公进行争夺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的残酷斗争，最后他们获胜。1303年，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去世。长子尤里成为他的继位人。丹尼尔还有几个儿子，其中包括日后著名的伊万·卡利塔。他们在父亲死后全都得到一小块封邑。父亲取得成功的最初步伐使尤里·丹尼洛维奇于1304年以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

奇的竞争者的资格出现在金帐汗国。莫斯科王公首次决定争取得到受封为大公的敕令。诚然，一年后尤里·丹尼洛维奇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莫斯科，因为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给了金帐汗大批“贡物”，尤里不得不退让。但是第一次失败没有使精力充沛的莫斯科王公失去信心。他打退了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向莫斯科王公报复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的失败和在金帐汗国中的受辱而派来的军队，并从斯摩棱斯克王公处夺取了商业和战略要地莫扎伊斯克，最后，还把罗斯教会领袖都主教彼得拉拢到了自己方面。彼得出身于乌戈尔罗斯①，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不顾去世不久的都主教马克西姆的同盟者特维尔王公的意愿委派到罗斯来的。自然，当彼得于1308年来到罗斯的教会首府弗拉基米尔时，那时担任罗斯诸王公之长、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敌视他，甚至对他提起诉讼。在召开于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的会议上，彼得证实自己无罪，而莫斯科王公尤里和伊万坚决为他辩护。彼得自然就找到了莫斯科王公作为同盟者。在莫斯科的兴起中起了如此大的作用的莫斯科与教会的联盟就这样奠定了始基。这一联盟的结果很快地表现出来。1311年，米哈伊尔派遣年幼的儿子德米特里率领特维尔军队“进军下诺夫哥罗德，进军王公尤里处”时，都主教彼得“不为他祝福”，而以诅咒威胁他，于是米哈伊尔的全部事业立即遭到失败。当时都主教的“祝福”起着很大作用，因为不听从都主教的执拗的王公有遭教会开除的危险，而这对于王公绝非无关紧要的事，同时这还意味着与教会这样强大的经济、政治力量相敌对。从那时起，教会始终站在莫斯科方面，彼得死去后被伊万·丹尼洛维奇安葬在莫斯科专为安葬他而建造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中，都主教则从弗拉基米尔迁到了莫斯科。

特维尔王公在诺夫哥罗德的事业也复杂化起来。他竭力设法

① 外喀尔巴阡地区的罗斯地区。

在诺夫哥罗德加强控制，这不能不引起诺夫哥罗德人方面的抗议。1312年，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从诺夫哥罗德撤出自己的地方官，侵占了诺夫哥罗德境内的托尔若克和别热茨克两城，并停止从“下方”送来食品。这一次诺夫哥罗德人屈服了。但是1313年诺夫哥罗德人利用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那时在金帐汗国月即别汗处、不在(罗斯)，同尤里·丹尼洛维奇结成联盟，起来反对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的特维尔军队。从那时起，诺夫哥罗德与莫斯科结盟反对特维尔成为长期的通常现象。1315年，尤里·丹尼洛维奇动身前往金帐汗国。在那时处于极盛时期的金帐汗国里，尤里受到月即别的恩宠，娶了月即别的姊妹康察黑(受洗礼后得名为阿加菲娅)为妻，并取得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作为康察黑的嫁妆。以万人长合兀合迪为首的鞑靼使臣应当把尤里带往大公国领地，为帮助合兀合迪，月即别汗派出了大队鞑靼骑兵。米哈伊尔没有得到“小”王公们的支持，而他的后方又有不屈服的诺夫哥罗德人在活动，于是他不得不退回到特维尔去。苏兹达尔王公们归附了尤里，尤里便同合兀合迪向特维尔进军。

在距离特维尔40公里的巴尔捷涅夫附近，尤里和合兀合迪被击溃。在巴尔捷涅夫附近作战时，康察黑(阿加菲娅)、合兀合迪、尤里的兄弟鲍里斯·丹尼洛维奇以及许多莫斯科领主被米哈伊尔俘获。尤里逃到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人和普斯科夫人都乐意支持他，当王公们商定在金帐汗国月即别处解决自己的争端时，这两个谓彻城市的军队已出动去迎战米哈伊尔。但是在米哈伊尔处当俘虏的康察黑突然出乎意外地死了。米哈伊尔释放了合兀合迪和被俘的领主们，但是为时已晚。尤里断言：康察黑是米哈伊尔授命毒死的，他便急忙到金帐汗国控告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被召到金帐汗国，被指控有如下罪状：他对抗汗的使臣合兀合迪，同鞑靼人作战，夺取汗的贡税，想带着财产逃到“德国人处”去，并且一

部分财产已经送到了罗马教皇处，还有杀害尤里的妻子。指控的罪状并没有全部得到证实，但有意思的是：就在那时，在与立陶宛接壤的这个极西端的公国里执政的特维尔王公在反对莫斯科的斗争中已经企图依靠罗斯敌国的统治者，而且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甚至没有在面临背叛罗斯时停步不前。特维尔王公们力图同立陶宛、同“拉丁人”（天主教徒们）结成联盟，罗斯东部的巩固甚至使他们害了怕。而罗斯西部和东部的利益同样都是莫斯科王公所关注的。当然，月即别归罪于米哈伊尔的主要是他反对他的使臣们。米哈伊尔被处死。1320年“尤里在乌兹别克汗[1]的脚下拾起了以告密和暗杀手段从特维尔那一支夺过来的大公国的王冠。”[2]尤里回去后成了罗斯的全权主宰者。特维尔掌握在他的手中。

成为大公后，尤里担负起保卫罗斯国土边界的首倡者的责任。1322年，尤里统率诺夫哥罗德军队打退了瑞典人对卡累利阿的进攻，深入芬兰，围攻维堡。1323年，为预防瑞典的复仇，尤里在涅瓦河支流畔奥列霍夫岛上建立了奥列舍克小城（彼得罗要塞）。

瑞典人求和，尤里同意了。签订了确定瑞典、罗斯边界的奥列霍韦茨和平条约（Ореховец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得到了很好的教训后，瑞典人安静了，长期不敢对罗斯采取军事行动。

1324年，尤里进军乌斯秋格和北德维纳地区，征服了扎沃洛奇耶地区的楚迪人（чудь）（科米吉梁人，коми-зыряне），与当地王公签订了条约。

但如果说尤里在诺夫哥罗德的活动取得了成功，那末被打败但尚未被摧毁的特维尔却引起（尤里）很大的担心。为争夺受封为大公的敕令的讼争使王公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罗斯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昂贵。王公们答允缴给（金帐）汗巨额“贡税”，于

---

① 乌兹别克汗即月即别汗。——译者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8页。

是他们自然要（向人民）竭力多搜刮一些钱。由此造成“罗斯国土上负担繁重”，而这就是莫斯科和特维尔争夺受封为大公的敕令的斗争所造成的。

马克思指出，随同尤里一起从金帐汗国来了“掠夺（人民）的汗的收贡税者。结果引起难以忍受的物价飞涨”。[1] 尤里竭力设法亲自从所有各公国征收“贡税”，这样他就成为金帐汗与其他王公之间的唯一中间人，但是特维尔王公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也企图同金帐汗国建立直接联系。当特维尔公国的一个封邑卡申出现了金帐汗国的代表、征收贡税者时，尤里立即带着军队赶到那里。诚然，这次没有达到发生武装冲突的程度，王公们自相签订了条约，按照条约，德米特里答应一定把“贡税”缴给尤里，此外，还答应一定不觊觎大公之位。但是，从特维尔取得了指定缴给金帐汗的2 000卢布银币“贡税”后，尤里没有马上到汗的使臣处去，而是到了他应当“按照军事需要”去的诺夫哥罗德。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利用这个情况，急忙到了月即别处，向他控告尤里的行动，指出尤里把特维尔指定缴给金帐汗的贡税据为己有。汗的使臣支持德米特里，月即别便把受封为大公的敕令给了德米特里。终于（向各公国）收集起贡银的尤里了解到他所面临的危险，便急忙前往金帐汗国，同时向诺夫哥罗德人求援。德米特里的兄弟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在途中袭击了他，并且夺走了钱款。遭到抢劫的尤里逃到普斯科夫，又逃到诺夫哥罗德，去到涅瓦河地区和乌斯秋格，从那里，从北方沿卡马河奉月即别的召唤前往金帐汗国。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也急忙赶到金帐汗国。两个竞争者在途中相遇，德米特里指望得到月即别的青睐，于1324年11月21日杀死了尤里。但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他自己被月即别下令处死。可是，月即别在尤里隐瞒“贡税”之后也不再信任莫斯科的王公们了，特维尔

[1]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48页。

王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遂取得了受封为大公的敕令。

尤里死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孙子、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五个儿子中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伊万·丹尼洛维奇·卡利塔成了莫斯科王公。

大俄罗斯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莫斯科之开始合并罗斯国土，是与伊万·丹尼洛维奇·卡利塔的名字和活动分不开的。卡利塔早在经常去诺夫哥罗德和金帐汗国的兄弟(尤里）在世时，就已代替他在莫斯科统治公国。在伊万·卡利塔即位的第一年，都主教彼得死了，彼得不久就被宣布为圣者，成为莫斯科的庇护圣徒。彼得在世时，卡利塔同暮年的都主教保持良好关系，得以把都主教的讲坛迁到了莫斯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莫斯科王公"使教权同他的王权合而为一"。[1] 从这时起，教会与莫斯科王公们的联盟日益加强。在将罗斯各地合并为统一国家的事业中起重大作用的教会，现在除极少例外，只在与莫斯科王公联盟中执行自己这个职能。

尽管取得了这个成功，卡利塔还是不得不从头开始，因为他只不过是莫斯科王公，而受封为大公的敕令在他的死敌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手中。当然，月即别汗并不特别信赖特维尔，为了用恐怖手段恐吓"罗斯兀鲁思"(罗斯国)和使自己那不再被认为有威严的政权恢复威严，月即别汗于1327年把自己的堂兄弟绰勒罕·图丹诺维奇派往特维尔，绰勒罕在罗斯被称做"谢勒坎·杜坚季耶维奇"或只称做"谢勒坎"、"舍夫卡勒"。月即别出动大军帮助绰勒罕。绰勒罕占领特维尔，并把王公亚历山大从他的宫廷中驱逐出去。

《特维尔编年史》记载说，绰勒罕的鞑靼人掠夺特维尔人，粗暴地侮辱他们。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9页。

马克思谈到月即别扶立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为罗斯大公时写道:“不久,那里(特维尔——马夫罗金注)(照常)出现了作为月即别使臣随员的鞑靼(匪)帮”。①特维尔人再也不能忍耐了。他们诉诸自己的王公,请求他开始同可恨的谢勒坎斗争。但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劝告他们忍耐。鞑靼人不断横行,不断进行粗暴的侮辱和抢劫,下列事件终于使特维尔忍无可忍:8月15日黎明,助祭久德科把自己的马牵到饮水处去。鞑靼人喜欢这匹马,他们便开始夺取它。久德科叫喊起来。特维尔人便聚拢来歼灭了鞑靼人。绰勒罕也被杀死。

马克思指出这件事说:“特维尔人把全体鞑靼人驱赶到城里的一个地方,把他们全部杀光,直到杀死最后一人为止”。②民间传说保留了有关《谢勒坎故事》的回忆。在谢勒坎·杜坚季耶维奇之歌中唱道:

“年轻的谢勒坎他收贡税,
没有财物,缴不了皇帝的贡税;
每个王公征收一百卢布;
每个领主征收五十;
每个农民征收五卢布,
他没有钱,
就夺走他的孩子,
他没有孩子,
就夺走他的妻子,
他没有妻子,
就取走他的脑袋。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48页。
② 同上。

年轻的谢勒坎
运走了贡税，
那没缴付给皇帝的贡税；
年轻的谢勒坎
带走了值一百卢布的马，
值一千卢布的马鞍，
还有无价的马笼头……”
“那时年轻的谢勒坎
到那古老的特维尔，
到那富庶的特维尔，
他担任法官。
他担任法官没多久，
就粗暴地侮辱所有的人，
侮辱各家各户。
几个老人，
几个富人，
几个城市工商业者，
他们把控诉状
交给两个亲兄弟，
两个大胆的博里索维奇。
他们从民间来，卑躬屈节，
带着呈献的礼物，——
他们送去了诚心诚意奉献的礼物：
黄金、白银和大而圆润的
珍珠。
在谢勒坎·杜坚季耶维奇本人家中，
那些财物被耗尽；

他从他们处收下了礼物，
却没有表示敬意。
那时年轻的谢勒坎
他狂妄傲慢，
他们便同他争吵起来——
一个人抓住他头发，
另一个抓住腿，
就此把他撕裂了……”

民间传说忠实地反映了由于谢勒坎·杜坚季耶维奇的横行不法所造成的“城市工商业者的沉重负担”和反对鞑靼人的起义。编年史的记载证实了民间传说。

得知特维尔人惩治绰勒罕后，月即别勃然大怒，他开始准备远征罗斯国土。全罗斯恐怖地等待着拔都大破坏的重新出现。但是那时伊万·卡利塔急忙去到金帐汗国。他利用特维尔的起义来打击自己的敌对者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把月即别的愤怒引向暴乱的特维尔。在“谢勒坎”被杀后金帐汗国忐忑不安的时日里，卡利塔充当金帐汗的忠实奴仆，竭力设法取得金帐汗的信任，以获取受封为大公的敕令。

充当这样的角色时，卡利塔根本没有想“驯服地”博取月即别的信任。正如我们在后面所看到的，“约安·卡利塔是狡猾的，并不驯服”。①

月即别委派卡利塔和苏兹达尔王公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带着5万鞑靼军队（费多尔楚科夫和图拉雷科夫的军队）一起前往发生暴动的特维尔。

特维尔遭到蹂躏和破坏。卡利塔使特维尔国土变得一片“荒

① В.Г.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国家文艺作品出版社，1949年，第873页。

凉”。大批俘虏被送往莫斯科，住入城郊各村庄。西北部只有诺夫哥罗德没有遭难，它用金钱和礼物从鞑靼人处得到赎免，并让卡利塔的全权代理人驻进来。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不得不逃往普斯科夫。他的兄弟康斯坦丁从月即别处取得了特维尔王公之位。

我们从《罗戈日编年史》编撰者的记载中读到:“伟大的救世主、热爱人类的仁慈天主以其仁慈保护了虔信的大公伊万·丹尼洛维奇和他的莫斯科城以及他的全部世袭领地，使之免于极可恶的异族鞑靼之难”。卡利塔以摧毁特维尔作为代价拯救了莫斯科，拯救了罗斯。

必需指出:尽管伊万·卡利塔于1328年取得了受封为大公的敕令，但是月即别出于对罗斯王公们的防备和不信任，把当时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领地进行了分割: 他把诺夫哥罗德和科斯特罗马分给卡利塔，把弗拉基米尔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分给了苏兹达尔王公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大公国的分割是不长久和不巩固的，并且几乎没有影响到伊万·卡利塔作为大公的地位，1332年亚历山大死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领地又恢复了统一。

1328年，卡利塔决定彻底击溃拒绝到金帐汗国去的自己的竞争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但没有见效，因为普斯科夫保护着自己的新王公。当时卡利塔想出了新的有效手段，他求助于自己的同盟者都主教。都主教费奥格诺斯特诅咒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和整个普斯科夫，并把他和普斯科夫开除出教会。在教会和宗教界对人们的心智和思想具有巨大影响的那个遥远年代，这种手段是决定性的和生效的。

亚历山大被迫离开普斯科夫，逃到了立陶宛，特维尔王公们后来曾多次向立陶宛求援。普斯科夫承认了卡利塔的统治，于是教会撤销了对普斯科夫的诅咒。教会就这样站到了莫斯科王公方面，教会的支持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立陶宛大公国在西方发展和壮大起来，到那时已侵占了罗斯的一系列地区。立陶宛王公格季明想侵占罗斯国土，他干预罗斯各公国的事，竭力设法把普斯拉夫和特维尔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罗斯就处于锤和铁砧之间：金帐汗国从东面威胁着它，精力充沛、好战的强大对手立陶宛又从西面进攻它。

实际上，过了一年半后，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回到了普斯科夫，他"在立陶宛操纵下"驻留在那里。亚历山大在普斯科夫当了10年王公，他同立陶宛的联系比罗斯更为密切。立陶宛企图扶持自己提出的候选人为普斯科夫主教，但没有成功。立陶宛的势力不仅扩大到普斯科夫和特维尔，甚至还扩大到诺夫哥罗德，格季明的儿子立陶宛小王公纳里蒙特曾一度就驻在诺夫哥罗德所辖各附城拉多加、奥列什卡、科列拉和科波里耶中。就在这个时期，诺夫哥罗德领主中出现了倾向于立陶宛的所谓"亲立陶宛派"，他们借立陶宛的帮助企图同莫斯科趋向中央集权化的意图作斗争。在"亲立陶宛派"中间，我们发现有诺夫哥罗德最富有和高贵的领主们的代表人物，他们企图保持自己的掌握政权的封建寡头政体的地位和诺夫哥罗德的独立性，这也就是企图让中央集权过程和王公政权的发展暂停。

1336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得以重新取得受封统治特维尔的敕令。他力图摆脱莫斯科的"暴虐"（当指得到加强的卡利塔大公政权），便把某些封邑小王公"拉"到特维尔方面。立陶宛通过自己的走卒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把手伸向罗斯东北部。卡利塔决定利用鞑靼人对付他们。1339年，（鞑靼）以欺骗手段把亚历山大召到金帐汗国，在那里把他处死。几年后接着发生的罗斯王公们与鞑靼人联合远征立陶宛一事，确证了亚历山大与立陶宛的关系。在与一个外敌——立陶宛作斗争时，卡利塔善于利用另一个外敌——金帐汗国。

1339年，伊万·卡利塔也去了金帐汗国。在那里，他同自己的敌人——特维尔王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作了清算。同时，在金帐汗国，卡利塔使自己的遗嘱获得批准，这份遗书开列了他所获得的土地，这些土地作为世袭领地或作为他的势力范围成了他的所有物。

卡利塔于1329年成为诺夫哥罗德王公后，企图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诺夫哥罗德，并限制诺夫哥罗德的"自主"。此外，卡利塔从金帐汗处取得了以汗的名义征收贡税的大权，这被他利用来向诺夫哥罗德征收规定以外的赋税。1332年，当卡利塔应缴给帮助他高升和占有大公宝座的金帐汗的钱款增加时，他便向诺夫哥罗德征收扎卡米耶银和伯朝拉贡税①。诺夫哥罗德人拒绝缴纳，这就引起卡利塔联合梁赞王公和"下方"王公们向诺夫哥罗德各乡进攻。卡利塔夺取了托尔若克、别热茨基·韦尔赫，拒绝诺夫哥罗德人求和。诺夫哥罗德人则把立陶宛王公纳里蒙特请来统治所属各城，并同在普斯科夫担任王公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结成联盟。诚然，卡利塔同诺夫哥罗德"失和"并不长久，因为塔夫哥罗德人为取得纳里蒙特的帮助付出了昂贵代价，纳里蒙特对居民进行了掠夺。此外，站在莫斯科背后的金帐汗国是令人可怕的。于是1335年2月，卡利塔又重新回到诺夫哥罗德。卡利塔尽管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不得不对诺夫哥罗德宣誓，并按照保护诺夫哥罗德人权利的旧文书同它签订了条约。卡利塔不安于自己的限于王公权利的处境，他经常不断竭力设法扩大自己的大公权力。例如，卡利塔不顾吻十字架进行的宣誓，于1337年向扎沃洛奇耶、北德维纳河地区、富有珍贵毛皮兽类的"扎沃洛奇耶的楚迪人"地区派遣了军队。

卡利塔在北方扩展了自己的势力。他的"武士"和"饲鹰猎人"潜入遥远的伯朝拉河，从那里运来猎禽供王公狩猎和出售给海外

① 扎卡米耶银和伯朝拉贡税指由扎卡米耶和伯朝拉河地区的居民缴纳的贡税。

商人，卡利塔企图在德维纳河地区、在扎沃洛奇耶筑城堡，结果没有成功。但这些企图证明：第一，卡利塔绝非只想局限于自己在诺夫哥罗德的政权，他倾向于把诺夫哥罗德视为自己的"世袭领地"，第二，莫斯科王公企图占有以毛皮驰名的北方。

1339年，卡利塔再次企图侵犯诺夫哥罗德的"自主"和侵占"旧关税"，并征索"皇贡"。当诺夫哥罗德人提到誓约和条约后拒绝了他时，卡利塔便把自己的全权代理人从诺夫哥罗德撤走了。

卡利塔对诺夫哥罗德政策的特别突出之点，是大公统治的加强，这就吓坏了倾向于与大公权力较弱的立陶宛结盟的封建寡头政体。领主们没有在面临背叛罗斯时停步不前，他们只不过是为了不服从大公，只不过是为了不失去自己的用诺夫哥罗德的谓彻政治制度掩蔽着的特殊政权。此外，利用金帐汗给予卡利塔的征收贡税权，对于卡利塔的政策说来也是很突出的。

贡税的征收最后转入莫斯科王公手中，这对罗斯是有政治意义的。因为征收贡税的包税人和八思哈曾掠夺人民，激起人民举行自发的无组织的起义，而这些起义遭到鞑靼人极其残酷的镇压。贡税归莫斯科王公征收这个办法，促使大公政权壮大起来。

马克思在谈到《谢勒坎故事》时指出："从那时起，月即别和他的继任者们再也没有派遣统帅到各公国去（被特维尔的屠杀吓倒了），但他们只征索应由罗斯王公们送去给他们的贡税"。[1]

金帐汗委托给伊万·卡利塔向整个罗斯征收贡税的权力（和职责），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发财致富，因为"他用鞑靼人的名子所引起的恐惧去聚敛钱财，然后用这些钱财去腐蚀鞑靼人自己"。[2]

在这方面有伊万·卡利塔与金帐汗月即别的相互关系问题。

---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48—149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9页。

月即别时期是金帐汗国的极盛时期，强大的月即别辖有辽阔的疆域，以有权势的铁腕实行统治。月即别的同盟者一旦处在金帐汗国境内，就可以使自己的遭遇平安。伊万·卡利塔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不可忘记，卡利塔多亏月即别才取得受封为大公的敕令。这就使他揹上了对金帐汗应尽的巨大义务。诚然，卡利塔以其对特维尔的告密及时防止了整个罗斯、尤其是自己的公国的被摧毁，但是正是这种告密使他成为大公，成为月即别在罗斯的右手。但在评述卡利塔在金帐汗国的政策之前，应当谈到金帐汗的统治方式。关于这点，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说了下面这段话："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同他们的大规模征服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少，因此需要用一道吓人的光环来虚张声势，并以大肆杀戮来减少可能在他们后方起来反抗的人民。"①

在这种情况下，卡利塔必须合并罗斯各地区。必须欺骗疑心重重地监视着罗斯各王公、竭力设法保持罗斯的分裂、千方百计支持各公国之间的内讧、削弱罗斯以使征服者的政权巩固下来的金帐汗。当然，卡利塔必须"充当汗的卑鄙工具"(马克思语)，利用他的政权使封邑王公们屈服于自己。莫斯科当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同鞑靼侵略者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分散的、自发的、准备不充分的反抗汗政权的个别起义只证明罗斯人民憎恨"凌辱和摧残了……人民的心灵"(马克思语)的鞑靼—蒙古压制制度，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起来反抗汗政权的力量。

这些起义不可能胜利，因为罗斯还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把罗斯合并为统一的、团结一致的中央集权国家是主要的任务。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罗斯人民反对征服者和压迫者的斗争才能以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7—68页。

成功结局。

卡利塔屈服于金帐汗，秘密地诽谤自己的竞争者，进行贿买和欺骗，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加强莫斯科公国和合并罗斯各地。卡利塔扮演着金帐汗的同盟者和奴仆的角色，但他同时逐渐“把汗变成了”自己手中的驯服“工具”，并且“暗地里使鞑靼征服者的权利完全为他的利益服务”。[①] 卡利塔了解得非常清楚：罗斯要同金帐汗僭位者作斗争还缺乏力量，个别的自发起义暂时只能导致罗斯国土的完全破坏和拔都时代的恢复，他便把及时防止鞑靼人的侵袭和摧毁罗斯各地、各城市、各村庄，保障安宁和“太平”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作到了。几乎在他在位的全部期间，罗斯国土上一次也没有遭到鞑靼人的侵袭。

古代原始资料赞扬卡利塔实现了“太平”：“攻打罗斯国土和屠杀基督教徒的令人厌恶的战争停止了，基督教徒摆脱极其疲倦和鞑靼人的繁重负担和暴虐后，得到休养生息，因而全国太平了”。卡利塔为同鞑靼进行未来的战斗聚集了力量，这战斗落在了他的孙子身上。

当莫斯科公国居民人数增多时，城市发展和富裕起来，新的“处女地”被开垦出来，莫斯科各乡扩大起来，手工业和各行业发展起来。罗斯在鞑靼侵袭之后恢复起来，壮大起来。

金帐汗把莫斯科王公当作自己的同盟者，没有注意到他的壮大。金帐汗当时不能想到，他的“奴仆”莫斯科王公伊万·丹尼洛维奇的孙子、王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竟会使征服者和压迫者鞑靼匪帮——鞑靼封建主们遭到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而当将来战胜马买的人的祖父伊万·卡利塔到金帐汗国去，把礼物送给金帐汗及其后妃和达官贵人，竭力设法同金帐汗建立和平关系时，他也似乎并没有想到与侵略者作斗争。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9页。

卡利塔在位时大公国境内没有公国之间的内讧也是造成"太平"的原因。卡利塔把苏兹达尔、梁赞、特维尔、罗斯托夫各王公控制在自己的铁腕中。在这些公国里进行着进一步的分裂。特维尔相继出现了一些小公国:多罗戈布日公国、卡申公国、霍尔姆公国、斯塔里察公国、捷利亚捷夫公国、米库林公国,等等。罗斯托夫公国分裂为若干封邑,从其领地上分出了罗斯托夫公国、雅罗斯拉夫公国、乌格利奇公国、别洛奥泽罗公国等等,这些公国由卡利塔的全权代理人、莫斯科的领主们主宰一切。加利奇王公、斯塔罗杜布王公、尤里耶夫王公、别洛奥泽罗王公、德米特罗夫王公及其日益分裂的各小封邑都处于卡利塔的统治之下,变成了莫斯科大公的副手。莫斯科王公在他们的领地上收买世袭的乡、村庄,征收赋税,征集军队。

马克思指出:"莫斯科王公伊万得以夺取了许多公国,并取得凌驾于其他王公之上的最高权力。"①同时必需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并非直接夺取各公国,而是说它们加入了莫斯科公国的政治体系。

马克思在另一著作中更明确地说明了他有关莫斯科王公伊万·丹尼洛维奇与其他王公的相互关系和伊万势力发展的想法。关于卡利塔,他写道:"他并不征服封土,而是暗地里使鞑靼征服者的权利完全为他的利益服务"。②

卡利塔通过答应给予土地和收益的手法来收买领主,领主们受莫斯科王公的势力和富有的吸引从各地: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戈夫、基辅、沃伦、特维尔、罗斯托夫、苏兹达尔等地会集到莫斯科来。他们的众多的侍役和亲兵队同他们一起来到。听到莫斯科的富有,"国外"的封建主也从立陶宛、金帐汗国、"外洋"(意大利)前来为莫斯科王公效劳。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49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1979年),第69页。

卡利塔从王公们处收买土地，靠这些土地向金帐汗缴纳贡税，并以此使他们变为依附于莫斯科王公的“副”王公。

通过这种手段他把自己的势力扩到了被他称做“被收买地区”(即“归并的地区”)的乌格利奇、加利奇和别洛奥泽罗，这些地区的王公留在当地，但处于莫斯科的统辖之下。卡利塔不仅“归并”，而且收买了弗拉基米尔、尤里耶夫、科斯特罗马、罗斯托夫这些公国的村庄和“乡”。卡利塔不仅在自己的莫斯科公国内，而且到处收买土地，他深信大公国将归于他的儿子们所有。莫斯科王公的土地交错地分布在各地，在这些土地中间有暂时还是“国外”的土地。莫斯科所取得的土地以细长的链状延伸向北方，这似乎意味着它企图夺取盛产珍贵毛皮的北方。移民垦殖活动从莫斯科公国向北方扩展。

受到“太平”生活的吸引，农民和市民从其他地方迁移到莫斯科公国来。卡利塔以优惠和免缴赋税招揽新住户们。

卡利塔在金帐汗国赎买罗斯俘虏，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这些农民被称为“来自汗国者”。王公的宫廷经济、王公的世袭领地发展起来，王公的世袭领地包括许多乡和大村庄，住有被奴役的人们和在王公宫廷经济中工作的荷洛普(奴仆)。农民们缴纳各种贡物，负担一系列徭役——提供大车、饲料，修筑桥梁、道路，等等。寺院地产和持有专门赏赐证书被卡利塔免除纳税的寺院经济发展起来。例如，1338年，按照卡利塔颁赐的证书，尤里修道院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并免于缴纳土地税和各种行业的税。领主的地产也发展起来。当著名的契尔尼戈夫领主罗季翁·涅斯捷罗维奇带着自己的1700名仆从前来莫斯科效劳时，曾把半个沃洛科拉姆县给了他。落在农民身上的负担加重了，对寺院经济和领主经济中的受奴役者、荷洛普、“农人” 的剥削加强了。这一切都促使封建上层和王公们发财致富。卡利塔同“抢劫”——农民反抗封建所有制的暴动进行

斗争。

栖留在国有土地、"王公"土地上的自由农民还很多，尚未被封建主夺取、占有的但被看作王公土地的地也还有许多。这些土地供王公分赐之用，被用来赏赐效劳的领主、"自由侍从"和"宫廷侍役"——新兴贵族们。卡利塔赐给某个鲍里斯·沃尔科夫占有罗斯托夫的一个村庄，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

莫斯科的工商区扩大起来，商人、手工业者的数量增多起来，莫斯科的贸易联系加强起来。卡利塔维护各条大商道上商人的安全，从而促进了商业关系的发展。莫斯科的面貌在改变着。1326年建立了莫斯科第一座石头教堂——埋葬都主教彼得的圣母安息大教堂。1339年，莫斯科筑起了柞木筑成的新围墙，这城墙直到顿河王德米特里建造石头内城之前一直存在。新城——内城比1337年焚毁的旧城要大得多。用石头修筑的新教堂接二连三地建造起来。工商区扩大起来。工商区居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增多起来。

征收居民捐税，征收商税，以及把鞑靼贡税据为己有，使莫斯科王公成为所有罗斯王公中最富有者。马克思谈到卡利塔时说："他用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是钱袋，而不是刀剑"。[1] 卡利塔不打仗。这位莫斯科王公只认真地打过一次仗——那是在"谢勒坎故事"的时代。后来，他宁可行动得较谨慎些，采取贿赂和"收买"手法。他控制其他王公们的权力很大，他对待他们的"专横"迫使他们放弃"内讧和纷争"。卡利塔在他作为大公时统辖的各地区如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等地征收巨额贡税："贡税"、"皇贡"、"卡马河彼岸贡税"和其他各种捐税。于是"出现了许多强制手段"。但他把这种强制手段变成莫斯科王公——罗斯的统一者加强财政基础的工具。

卡利塔所拟定的政策成为与他最接近的后裔的政策。马克思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70页。——译者

指出："他们辛劳地、逐步地、坚定不移地追随这个政策"。①

马克思强调指出："在他的时代奠定了莫斯科强盛的基础。"②

卡利塔被公正地认为是奠定莫斯科强盛的基础、逐渐把所有罗斯国土合并为统一国家的罗斯国土的"第一位合并者"。

卡利塔的权力和威望是如此之大，以致当他死(1341 年3月 31 日)时，没有人敢觊觎他的长子谢苗的大公宝座。王公们会集到金帐汗国，在这里的王公代表大会上，金帐汗承认了谢苗·伊万诺维奇继任大公的权利，并把敕令颁赐给了他。1341 年 10 月 1 日，号称"骄王"的谢苗·伊万诺维奇开始统治大公国。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 70 页。

②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8 卷(俄文版)，第 149 页。

第 六 章

14 世纪中叶的莫斯科公国

卡利塔在自己的遗嘱(共两份)中嘱告儿子安德烈和伊万听从长子谢苗。卡利塔把一些特别的"县"(封邑)和"乡"分封给每个儿子。他赐给谢苗的是莫扎伊斯克和科洛姆纳这两个边境和商业要地以及一系列乡,赐给伊万的是兹韦尼戈罗德和若干个乡,赐给安德烈的是佩列梅什尔和谢尔普霍夫及若干个乡。但是莫斯科(公国)的"纳税"(缴纳赋税的)人口没有分配给他们。王公们可以自相分配从各城和各乡取得的收入、从莫斯科取得的收入,但是纳税人口由他们共同管辖,各占有从纳税人口取得收入的一定份额。王公政权交给了谢苗,他应当继续卡利塔的事业。此外,卡利塔死后,兄弟"在父亲灵柩旁"宣誓"不持不和睦态度",不互相争吵、打仗,要"团结一致",听从"长兄"谢苗,谢苗也答应一定同兄弟们商议。尽管在兄弟们的誓约中强调指出了领主有脱离一个王公投奔另一王公的权利,但是谢苗手中保留有对军队、财政的领导权和对"纳税人口"的管辖权,王公们没有权利引诱纳税人口为自己效劳。此外,谢苗手中还集中了宫廷经济、宫廷收入和管理机构的一半,即所谓各种"部门"如饲鹰猎夫、渔猎官、饲马官、果园等等"部门"的一半。谢苗答应自己的兄弟,他不触动被他们视为私产的各封邑,不干预他们对其封邑的管理。

卡利塔的遗嘱由金帐汗批准,并盖上了汗的玺印。

日益加强的长兄政权与属于其他诸弟的封邑的这种结合,证

明莫斯科公国保留了封建割据时期所固有的制度。尽管莫斯科使罗斯各地归并，但它本身还是一个带有它所固有的割据趋向的典型的封建公国。这个矛盾应当这样解释：尽管在谢苗和伊万在位时，封建割据的原则还占支配地位，封邑还继续存在，但是在封邑制度内部，强大的大公政权已经萌芽、成长和壮大起来。强大的大公政权的形成、壮大过程不是匀速、直线发展的，而是一个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缓慢时期，甚至还有向后倒退时期的复杂过程。尽管卡利塔的遗嘱使他的儿子们成了莫斯科的共有主，“三分之一个王公”，但是他的遗嘱的总的倾向在于强调他们的团结和政权的“统一”。这就难怪这三个儿子全都前往金帐汗国。

谢苗拥有高于其他王公的独有的权力。编年史记载说：“全体罗斯王公都归他掌管”。他被称为“全罗斯的大公”，而以往只有宗教领袖被称为“全罗斯的”都主教。对待自己的下属王公——藩臣们他傲慢自大，把他们控制在手中，甚至要求自主的“大诺夫哥罗德主人”也对他表示特殊的尊敬。

马克思强调指出：“谢苗对待其余王公们是严厉的”。[1] 由于他的这些性格，他得到了“骄王”的称号。

谢苗在位时成长壮大起来的莫斯科工商区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的政治意义。莫斯科千人长，即王公的管辖城市事务和市民的领主，企图依靠市民来起政治作用。骄王谢苗在位时，莫斯科千人长、领主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赫沃斯特掀起了一次反对王公的某种“叛乱”。这次“叛乱”的情况不明，但是根据后来的一些事件判断，可以推想这位千人长在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很有声望，他企图指望工商区的支持，干预王公的某种事。谢苗、伊万、安德烈三兄弟全都发誓说：“不让赫沃斯特留在莫斯科”，据此判

---

[1]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8 卷（俄文版），第 149 页。

断，这次“叛乱”对王公们是有危害的。赫沃斯特被驱逐出莫斯科，其财产被剥夺。可是，谢苗的继位者伊万即位的那年，赫沃斯特重新以千人长身份出现在莫斯科。

伊万的这种令人奇怪的不记仇大概是因为他即位时正是邻敌梁赞王公向莫斯科公国进攻的时候，同时莫斯科王公属下的某些小王公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这些小王公不满于莫斯科王公的独裁，指望梁赞方面的援助。这时同工商区不和是不利的，于是赫沃斯特便在莫斯科出现了。

从赫沃斯特死的情况可以断定：他是敌视因王公政权的加强和管辖的中央集权化而感到苦恼的那些王公子孙和领主的，这一点部分地反映出市民的利益。1357年2月3日，他被杀死了。在莫斯科市民中，流传着一个以切合实际的推测为根据的传闻：反对赫沃斯特是领主们的阴谋，这位莫斯科千人长成为这个阴谋的牺牲品并被害死。编年史把领主赫沃斯特被杀同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被库奇科维奇族人杀害加以对比是有缘故的，编年史似乎要用这种对比强调指出阴谋的反动性。

1357年2月莫斯科的大规模人民起义是对千人长被杀害的答复，参与阴谋的“大领主们”被迫逃往梁赞。当然，不久后一部分领主应伊万的召请重又回到了莫斯科。王公们一方面指望工商区的帮助，而另一方面又害怕它所起的政治作用，为了往后不再出现上述类似事件，莫斯科千人长的职位不久被取消。

1357年事件证明，在反对封邑王公的斗争中，在争取政权“统一”、争取有统一制度的统一罗斯的斗争中，大公可以指望市民的支持。

恩格斯指出：“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他进而强调指出了“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对于西欧和罗斯的中世纪都是有代表性的

现象。①

反对大公政权加强的领主寡头政治在诺夫哥罗德起着封邑王公的作用。诺夫哥罗德领主中的显贵们在同强大的特维尔王公作斗争时寻求莫斯科支持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如今莫斯科王公成了对诺夫哥罗德领主如此格格不入的中央集权倾向的体现者。

谢苗曾担任诺夫哥罗德的王公，但他不得不长期同不驯服而专横的诺夫哥罗德领主进行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谢苗受到诺夫哥罗德普通市民、"恶汉"、"谓彻参加者"的支持。早在谢苗即位那一年，当他还在金帐汗国时，通常由领主从"中意的年轻人"中募集来的诺夫哥罗德水上强盗就侵占了莫斯科的别洛泽里耶乡，出现在托尔若克。但是诺夫哥罗德领主只追求私利的目的、以及引起强大的莫斯科王公对诺夫哥罗德愤怒的这些行动，激起了诺夫哥罗德"黎民百姓"的起义。诺夫哥罗德"黎民百姓"拒绝出征。托尔若克也爆发了起义，那里的"黎民百姓"穿上铠甲武装起来，释放了莫斯科的亲兵队员和收税官，摧毁领主们的庭院，捣毁他们的家，将领主财产自行分配。在此之后，谢苗向诺夫哥罗德领主开战，迫使他们接受了自己的全权代理人，他要求领主赤脚来见他，使领主受了凌辱，他还强迫诺夫哥罗德缴纳贡税——"黑博尔(черный бор)"。因此，到处"兼并"罗斯国土的莫斯科王公在其争取行政统一的斗争中，在其对封建割据势力——封邑王公和领主寡头政治的斗争中依靠了城市人民。

骄王谢苗同札尼别汗保持着良好关系，他曾五次带着礼物前往金帐汗国，据编年史记载，每次他都满载"荣耀和赏赐"而归。

谢苗在位时，莫斯科同当时成功地夺取了罗斯西部许多公国的强大的立陶宛发生了冲突。立陶宛大公使特维尔屈服于自己的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53页。

势力，并企图占领整个罗斯东北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早在卡利塔在位时，莫斯科就已“目击了立陶宛国家的崛起”①。1341年，立陶宛王公奥尔格尔德率军出现在莫扎伊斯克城下，蹂躏了郊区，焚毁了城外工商区，但没能攻占该城。奥尔格尔德企图说服金帐汗，他的依靠金帐汗国的企图没有成功，谢苗把札尼别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奥尔格尔德只是把谢苗的注意力从诺夫哥罗德同瑞典的边界上引开。1348年，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向诺夫哥罗德举行十字军远征，但是诺夫哥罗德人自己“举国”奋起，打退了瑞典人，追赶他们到“海外”，并征服了直到维堡为止的地区。

在西北边境的战争中，罗斯军队帮助当地居民反抗压迫者，例如，他们帮助芬兰人民反对压迫他们的瑞典人，因为瑞典人力图铲除当地为时已久而有益的罗斯影响。在1343年爱沙尼亚人反对德国立沃尼亚骑士的大起义时期，当装备很差的爱沙尼亚农民起义队伍退到罗斯边境时，进入尤里耶夫地区支援起义者的普斯科夫军队正迎着他们前进。但是罗斯队伍没能帮助爱沙尼亚人。当普斯科夫人走近尤里耶夫时，起义者已被击溃。被击溃的爱沙尼亚队伍残余在奥斯特罗夫附近越过罗斯边境，在普斯科夫地区溃散了。

这时罗斯经受着巨大的灾难。突然发生了遍及西欧和罗斯的“黑死病”——鼠疫流行病。1352年开始的鼠疫猖獗了好些年。一些城市和乡由于“瘟疫”整个地荒芜了，往昔人口稠密的边区变得空无人烟。不少王公家族死绝了。1353年，骄王谢苗·伊万诺维奇本人也死了。还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兄弟安德烈。

谢苗·伊万诺维奇的遗嘱强调忠于卡利塔的政策。谢苗要求兄弟们(当时安德烈还活着)“团结一致”，不要听从企图挑拨他们绝交的“恶人们”，而要听从“领主们”和都主教阿列克谢。谢苗的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70页。

遗嘱不仅强调了不要意见分歧、要和睦相处的旧的思想，而且还指出了王公所应当依靠的力量是领主和教会。

谢苗死后，号称“红”伊万的他的兄弟伊万·伊万诺维奇成了王公。他不仅把大公政权集中在他的手中，而且还成了诸兄弟封邑的主人。只有他的侄儿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以小亲属王公的权利取得了谢尔普霍夫封邑。

伊万·伊万诺维奇即位时的外部情况对他来说绝不是有利的。当时形成了特维尔、梁赞、下哥罗德三个大公国——三个特殊的封建联盟。

这三个大公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大公宝座和下属的封邑，它们都在争取起罗斯统一者的作用。

14世纪后半叶初，特维尔从由伊万·卡利塔所造成的大破坏中恢复过来。尽管特维尔国处于分裂状态，形成了愈来愈新的封邑，但特维尔终究建立起相当强大的特维尔大公政权。特维尔王公在其公国境内保持着大公的特权，并同其亲属——霍尔姆、米库林、勒热夫等地“副”王公建立起藩属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伴随着互相敌视和纷争，其结果是“使特维尔人困苦不堪”，“许多特维尔人由于那种混乱状况而散往各处”。

（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位时（1366—1399年），卡申、霍尔姆两封邑被兼并，特维尔大公完成了对特维尔国土的统一。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固了“特维尔诸城”，保障了商道的安全，“于是任何地方也没有抢劫现象了”。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成为莫斯科的敌对者的原因是很清楚的。特维尔王公本人希望在“统一罗斯”中占据领先地位。但是特维尔没有力量独自同莫斯科作斗争。甚至连当时的任何一个封建联盟也只有依靠敌视罗斯的国家，首先是立陶宛或金帐汗国，

才能起来反对莫斯科。而当时已变得很清楚，反对莫斯科也就意味着反对罗斯，一切刺向罗斯的剑都冲着莫斯科而来。

正因为如此，霍尔姆王公和米库林王公同奥尔格尔德结成亲家，同立陶宛亲近起来，成为立陶宛势力的传导者，而同莫斯科的关系则愈来愈敌对。

14世纪中叶，梁赞公国也强大起来。在拔都入侵时代和此后的1278、1288、1308年它遭受了可怕破坏，并在不同鞑靼"宗王"和鞑靼贵族队伍的无数次袭击时又遭受了不断破坏，但靠着"狂暴"、"勇猛"的梁赞战士的勇敢和战斗经验，靠着梁赞农民的倔强（他们顽强地从草原鞑靼游牧人处收复了"耕地"，并且先作为哥萨克、后作为农人住入顿河地区、霍皮奥尔河地区、季哈亚·索斯纳和沃罗涅日），到14世纪中叶时，梁赞公国便复兴起来。梁赞是罗斯东南部的战斗前哨，它在西面遏制着顽固地冲向奥卡河，夺取罗斯各地的立陶宛。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在位时（1350—1402年），普龙斯克、科泽利斯克、叶列茨、穆罗姆等封邑的王公曾屈服于梁赞大公。当时大建城市，首先兴建了梁赞国京城佩列雅斯拉夫尔。莫斯科和梁赞之间在奥卡河、乌帕河沿岸、洛帕斯纳附近的边境冲突，不能不促进这两个邻国之间敌对关系的加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莫斯科王公伊万·伊万诺维奇在位时期，除特维尔和梁赞大公国外，第三个大公国下哥罗德大公国也强大起来。下哥罗德王公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成为莫斯科王公伊万的竞争者和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敕令的觊觎者。但是同莫斯科王公"竞争"是困难的，因为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在伊万·伊万诺维奇手中，于是下哥罗德王公安德烈·康斯坦丁诺维奇只好承认自己为莫斯科王公伊万之"弟"。

希望在统一罗斯各地中占领先地位的新的大公们的分立主义意图就这样发展着。在反对已经存在的莫斯科王公大公政权的斗

争中，他们没有在面临投靠罗斯人民的敌人立陶宛和金帐汗国时停步不前。金帐汗煽动他们互相敌视，因为罗斯的一切“混乱”全都对他有利。

新的大公国形成的这一事实本身乃是中央集权倾向发展过程的标志，其结果是各个小公国形成为大公国，但是大公国又分为各个封邑，证明了封建割据的旧制度的生命力。此外，应当注意到，罗斯已经存在有能够依靠工商区、领主和教会把罗斯各地统一起来、建立统一的强大国家的力量。这个力量便是莫斯科王公。正因为如此，力图独立、敌视罗斯的中心——莫斯科、同它作斗争并求援于立陶宛和金帐汗国的梁赞大公国和下哥罗德大公国封建联盟的形成，应当看作是阻碍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的一个因素。特维尔、梁赞、下哥罗德三王公以消除本公国内的封邑、保持自身的独立为自己的目的，而莫斯科王公不仅力图达到莫斯科公国内部的统一，并且力图统一全罗斯各地区。在莫斯科王公们走向建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道路上，站着另外一些大公。

伊万·伊万诺维奇在位时的局面便是如此。伊万是个优柔寡断、懦弱、萎靡不振的统治者，没有丝毫出色之处。出身于古老的莫斯科领主家族的都主教阿列克谢起了大得多的作用，阿列克谢坚持罗斯东正教教会统一和国家统一的思想，他同立陶宛利用罗斯西部宗教界来加强其对罗斯影响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红伊万于1359年死后，莫斯科公国在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德米特里、伊万(不久后死去)和侄儿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之间进行分配，弗拉基米尔分得了谢尔普霍夫封邑。

第七章

顿河王德米特里和库利科沃会战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出生于1349年。他即位时刚够10岁。年幼的大公决定利用强大起来的特维尔大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下哥罗德大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下哥罗德大公在1359年成功地取得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但是这个时候莫斯科的领主们起来帮助10岁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莫斯科的领主们为罗斯最强大的莫斯科王公效劳已成习惯，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优先地位。尤其清楚的是：一些强大、富有的领主带着众多的仆从、仆役、士兵聚集到了莫斯科。莫斯科领主为数最多、最富有，他们习惯于不仅作为侍从，而且作为自己王公的顾问参加管理。莫斯科领主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其他领主。

而如今他们竟面临着充当次要角色的命运。强大的莫斯科领主不能忍受这一点。领主们便全体一致地起来保卫自己的年幼王公，开始为他"谋求"受封为大公的敕令。德米特里同领主们便驱车前往金帐汗国。

这时的金帐汗国已经不是月即别汗时代的金帐汗国了。汗权衰弱。在宫廷政变的过程中，一个汗更替另一个汗。

在从1360到1380年的20年内，金帐汗国先后更替了14个汗。一整批地区脱离了金帐汗国。万人长诺盖曾建立过一个特殊的鞑靼国家。罗斯统一起来，莫斯科王公坚决而精力充沛地"兼并"罗斯各地区；金帐汗国则被分割而化整为零，分裂成几部分，在内

讧中日趋衰弱。罗斯在消除封建割据的道路上行进；金帐汗国则刚进入封建割据时期。

到(14世纪)60年代初时，金帐汗国被两个汗所分据，一为奥都剌，在他背后有万人长马买执政，另一为木里。莫斯科的领主送礼买通了木里，于1362年从他那里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取得受封为大公的敕令。但这还不够，必须赶走盘踞在弗拉基米尔的下哥罗德王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精力充沛的莫斯科领主召集军队，把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从弗拉基米尔赶走了。过了一年，即1363年，奥都剌的急使到弗拉基米尔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送来(封他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急使受到隆重接见、赠送礼物，并被遣返。那时，受了委屈的木里通过别洛奥泽罗王公伊万把任命大公的敕令送交给莫斯科王公的敌对者(下哥罗德王公)，下哥罗德王公德米特里便把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驱逐出弗拉基米尔。胜利是短暂的。他只在城里支持了12天，便被莫斯科军队击溃。他被迫承认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意志”。

本来利用内讧已抬起头来的罗斯托夫、斯塔罗杜布和加利奇王公此时屈服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并被“召集”到莫斯科。遭到失败后，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承认自己为臣属，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请求援助以反对其兄弟鲍里斯，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德米特里(·伊万诺斯奇)。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于是立即干预了发生激烈兄弟内争的下哥罗德公国的事。这时教会出来帮助了莫斯科王公。“全罗斯”都主教阿列克谢派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到下诺夫哥罗德去见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召请他到莫斯科来。当他拒绝前来时，谢尔吉用都主教名义采取行动，封闭了下诺夫哥罗德的所有教堂。此外，惊慌失措的鲍里斯过了一些时候与迅速逼近下诺夫哥罗德的莫斯科军队发生冲突。他

不得不屈服，去拜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使王公们屈服于自己，“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从而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还企图利用特维尔王公之间的斗争，让最强大的特维尔王公（出自米库林王公家族）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屈服于自己。后者急忙向自己的女婿立陶宛王公奥尔格尔德求援。

奥尔格尔德在位时，立陶宛把自己的边界急速向东扩展。奥尔格尔德时代“立陶宛人征服了”基辅、契尔尼戈夫、布良斯克、诺夫哥罗德—塞维尔斯基、斯摩棱斯克各地区，立陶宛军队逼近莫斯科边界。“立陶宛之祸”开始了。

担心（立陶宛人）入侵的威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下令“马不停蹄地”建造“莫斯科石头城”。莫斯科内城（即克里姆林宫）四周很快就筑起了又厚又高的石墙，并建有塔楼、碉堡、炮门和铁门。14世纪60年代的莫斯科已经是一座有众多的工商业人口和众多领主、僧侣及各种仆役的大城市。城内耸立起第一批石头建筑物。“买卖”兴隆。做买卖、办理外交事务、军务和为王公“效劳”的各种人汇集到这里来。莫斯科的人口不止一万。

莫斯科人在进行防卫。1367年造起石头内城，他们便开始以此进行防卫。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所作的准备是很及时的。1368年，奥尔格尔德突然进犯莫斯科。由奥尔格尔德、他的兄弟凯斯图特、年轻的维托夫特·凯斯图托维奇和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率领的立陶宛大军进入了莫斯科领地。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来不及召集军队，他只派出了由将军德米特里·米宁和阿金夫·舒巴指挥的警卫团。1368年11月21日，人数众多的立陶宛王公的队伍在特罗斯纳河上击溃了小小的莫斯科警卫团。德米特里同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及领主们躲进了新

建的石头内城里。石墙是可依赖的。奥尔格尔德焚烧和蹂躏了郊区,俘走了大批居民,但是不能攻占城市。

可是德米特里不得不向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让步。但同特维尔的斗争并未就此告终。成为立陶宛影响传播者的、经常向奥尔格尔德求援的特维尔王公,自然在莫斯科王公的心目中成了整个罗斯的敌人。

在领主上层中也已形成了"亲立陶宛派"的诺夫哥罗德,这时却并无危害性。由于莫斯科领主们和都主教阿列克谢的努力,诺夫哥罗德承认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统治,并同他缔结了反对德国人、立陶宛和特维尔的联盟。因此,只有作为立陶宛同盟者的特维尔在这个阶段上是危险的。

从同奥尔格尔德的战斗中恢复了元气后,德米特里向斯摩棱斯克和布良斯克进发,向斯摩棱斯克和布良斯克王公进行报复,因为这两个王公曾援助奥尔格尔德。

1370 年 8 月,德米特里对特维尔宣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逃到立陶宛,莫斯科蹂躏了特维尔国,完全破坏了米哈伊尔的世袭领地米库林公国。奥尔格尔德正忙于同德国骑士斗争,不能援助米哈伊尔。这时米哈伊尔产生了利用金帐汗国同莫斯科作斗争的思想。他准备到金帐汗国去一次,但德米特里及时成功地防止了他的这一行动。米哈伊尔得知:在从特维尔通往金帐汗国的路上到处布置了德米特里的人,准备擒获他。到处碰壁的特维尔王公只好重新向奥尔格尔德求援。

这一次奥尔格尔德同凯斯图特、米哈伊尔和斯维亚托斯拉夫·斯摩棱斯基一起出征。立陶宛—罗斯联军围攻了沃洛科拉姆斯克,但没能攻克,1370 年 12 月 6 日,立陶宛人临近莫斯科,德米特里再次躲进了城墙里。但是这一次莫斯科王公们的行动较坚决。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率领大军驻扎在佩列

梅什尔，准备攻打立陶宛人。普龙斯克王公和梁赞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的联军来到他那里汇合。奥尔格尔德见形势对他不利，便开始请求讲和，但是这一次德米特里却不肯议和，他只同意暂时停战到彼得节（俄历6月29日）。奥尔格尔德回去了，他谨慎地在敌视他的罗斯居民中间行进，并预防着追兵。米哈伊尔又同德米特里讲了和，但为时不久。1371年时，他实现了自己的计划——他去到金帐汗国，并终于从汗马买处取得了受封为大公的敕令。汗的使臣昔罗火者同他一起回来。但是弗拉基米尔人不让米哈伊尔进入自己的地区。这时米哈伊尔开始"攻打"莫斯科各地。德米特里利用这个情况，把汗的使臣昔罗火者邀到自己处，赠送给他礼物，把他拉拢到自己方面。受到昔罗火者鼓励的德米特里驶往金帐汗国，用丰厚的礼物向马买和他的妻妾以及鞑靼万人长们献殷勤，取得了受封为大公的敕令。当时欠金帐汗1万卢布债无力偿还的年轻特维尔王公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在金帐汗国。德米特里替伊万向汗偿还了这些钱，把伊万作为人质抓住放在自己身边。光是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米哈伊尔与德米特里所进行的斗争是力量悬殊的。德米特里轻而易举地偿付了特维尔王公无论如何也缴纳不出的这笔款子。德米特里比特维尔王公富有，如果没有奥尔格尔德，特维尔王公早就不得不屈服了。德米特里可以同自己的敌人算帐的时刻似乎来到了，但这时突然发生了对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的战争。

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引起前不久的同盟者梁赞王公奥列格与德米特里俩的互相敌视，但是1371年12月，沃伦人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指挥下的莫斯科军队已经进军梁赞。从孩童时起就习惯于同鞑靼人作战的有经验的梁赞士兵们夸口说：他们不用武器就能打败莫斯科人，并用绳子把莫斯科人捆个结实。梁赞军队与莫斯科军队在斯科尔尼谢夫附近相遇。梁赞人被击溃。王公奥列

格·伊万诺维奇带着少数亲兵逃脱。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同盟者、另一个梁赞王公弗拉基米尔·普龙斯基利用这个机会在一段时期内占据了梁赞。

对梁赞的战争没有使德米特里长期丢下他的主要任务——同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作斗争。米哈伊尔再次把立陶宛人"领到"罗斯国土上来。凯斯图特、维托夫特和安德烈·奥尔格尔多维奇的军队再次在罗斯国土上作战，蹂躏了各乡，焚烧了基斯特马城、德米特罗夫城、佩列雅斯拉夫尔城和卡申城。卡申王公瓦西里曾试图投靠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诺夫哥罗德人不承认失去了任命为大公的敕令的米哈伊尔为自己的王公，把他的全权代理人赶出了托尔若克，但米哈伊尔由于这个情况而攻占了托尔若克，并击溃了诺夫哥罗德军队。1372年春，奥尔格尔德再次"率领大军"来援助自己的亲戚米哈伊尔。这一次德米特里作了准备，并于1372年7月在柳布茨克附近打败了立陶宛人的警卫团。奥尔格尔德被迫求和。德米特里只答应短期停战到10月26日为止，而立陶宛答应今后不干预特维尔的事，不保护特维尔王公。

被自己的同盟者抛弃的米哈伊尔如今孤立无援了。当然，他并未投降。莫斯科有两个出于个人目的试图帮助米哈伊尔的人。这就是打算继承父亲的莫斯科千人长职位(德米特里取消了这一职位)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韦利亚米诺夫，以及同热那亚在克里木的殖民地速答黑(苏罗日)进行贸易的大商人涅科马特·苏罗扎宁。

他们同米哈伊尔勾结起来。涅科马特前去金帐汗国，带来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敕令给了米哈伊尔。特维尔王公依旧指望奥尔格尔德和金帐汗国的支持，因此下决心再次与德米特里作战。但是这一次援助德米特里的不仅有属下的王公们，而且还有不满

于米哈伊尔"把立陶宛引导"到他们领地上的其他王公(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诺沃西利和奥博连斯克王公)。特维尔军队被打败，1375 年米哈伊尔被迫屈服，并承认自己为莫斯科大公之"弟"，对莫斯科大公处于与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 谢尔普霍夫斯基同样的关系。他答应一定不向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或弗拉基米尔大公国"找岔儿"，答应一定随同莫斯科王公一起攻打鞑靼人和罗斯的其他"敌人"，并放弃对卡申王公的主宰权，放弃与立陶宛结盟等等。

莫斯科与特维尔的长期斗争就这样结束了。特维尔公国没有被废除，但承认自己为莫斯科的藩属。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也驯服了，他早在 1371 年就承认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领导地位。西部的局势变得更有利于莫斯科王公。此外，立陶宛本国的内讧很快造成下列情况：有两个立陶宛王公，即安德烈·奥尔格尔多维奇和德米特里·奥尔格尔多维奇(一个是波洛茨克王公，另一个是布良斯克王公)来到莫斯科，开始为德米特里效劳。莫斯科不仅有足够的力量打退立陶宛的进攻，而且有足够力量使它在罗斯的主要追随者特维尔王公不能为害，有足够力量使特维尔王公屈服于自己，并且甚至把两个奥尔格尔多维奇变成了附庸王公。然而，东方却乌云密布。

与卡利塔正相反，德米特里自幼习惯于战争。附属王公们的众多军队，领主、工商区和教会方面的支持，使他有可能不仅利用他终究要使用的钱袋坚决地行动，而且还要使用剑坚决地行动。成长壮大的莫斯科下决心公开不服从金帐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米特里一再出动反对金帐汗任命为大公的走卒。与金帐汗国的关系愈来愈复杂化。而当时金帐汗国不断进行着内讧。一个汗把另一个汗推翻，登上宝座后便索取礼物和贡税。各个鞑靼汗、"宗王"、万人长和贵族强大起来，他们不承认金帐汗国诸汗的政

权，单独对罗斯发动袭击。

1376年，对立陶宛和特维尔的斗争结束后，德米特里派遣沃伦人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将军同两个年轻的下哥罗德王公瓦西里和伊万一起去攻打卡马河地区的不里阿耳人。罗斯军队围攻了喀山[①]。喀山人进行回击，除使用弓和弩弓外，还使用了当时首次出现在东欧的火器。火器不久也出现于罗斯人处。当时还没有手持的火器，并且主要是被围攻时才采用"火器战"。喀山被攻占，并且喀山王公阿散和马合木一莎勒坛被迫缴纳贡税和接纳（莫斯科）王公的征收贡税吏和关税吏入城。

1377年，来自押亦河（即乌拉尔河）的新金帐汗阿剌卜沙来到苏拉河上。以莫斯科军队为首的罗斯大军出去迎战。但是得知阿剌卜沙在顿涅茨河上的消息是假的之后，王公们和将军们就不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正是7月酷热气候。王公、将军和普通士兵从身上脱下甲胄，把甲胄和武器一起放到大车上，穿着衬衣行军，并经常在途中酗酒。这时，阿剌卜沙利用莫尔多瓦（Мордвины）向导于1377年8月2日走近皮亚纳河，击溃了疏忽大意的罗斯军队。残余的罗斯军逃脱。鞑靼人和莫尔多瓦人蹂躏了下哥罗德和梁赞地区。为进行报复，莫斯科军队在斯维巴尔将军的统率下与下哥罗德人联合在严寒的冬天冲入莫尔多瓦地区，"把它破坏得一片荒凉"。

第二年夏天，马买所派遣的鞑靼贵族别吉赤向不驯服的罗斯人进军。1378年8月11日，罗斯军队与鞑靼骑兵在沃扎河河岸上相遇。鞑靼人渡过河，大喊大叫地向罗斯人疾驰而来。罗斯人也向鞑靼人进击：普龙斯克王公丹尼尔的军队从一侧进攻，莫斯科侍臣季莫费的军队从另一侧进攻，大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① 喀山城建立于13世纪末。最初它位于离它今天的所在地50公里处，但在14世纪末时，该城迁到了喀山卡河河口附近。

"在正前方"进攻。鞑靼人挡不住罗斯人的进攻,支持不住逃跑了。浓雾使罗斯人不能追击鞑靼人，但是到清晨时罗斯人终于夺得了敌人的辎重。盛怒的马买为报复沃扎河上的失败，出其不意地迅猛攻击了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的领地。

沃扎河之战是金帐汗国与罗斯相互关系史上的转折点。罗斯人振作精神，证实了自己的力量，深信罗斯能一次又一次地同"凶恶的鞑靼人"作战。马克思谈到沃扎河之战时指出:"顿河王德米特里在(梁赞地区的)沃扎河上完全打败了蒙古人。这是罗斯人战胜蒙古人的第一次正规的战斗"。[1]

沃扎河之战后，再也别想同鞑靼和平相处了。必须准备新的战争。皮亚纳河之战表明:不能过于自信和低估鞑靼人的力量;而沃扎河之战则使罗斯人深信:鞑靼人绝非不可战胜的。早就用汗的名义执政的马买在金帐汗马合木死后成了金帐汗国的独立自主的统治者，他决定恢复以往"罗斯国"对金帐汗国的从属关系。为此必须重新采用拔都的入侵方式。

所有人都觉得好像将会如此。马买暴怒了。他对鞑靼宗王和鞑靼贵族们说:"你们要把固执而任性的奴隶们处死!要使他们的城市、他们所有的一切和基督教教堂化为灰烬!我们要夺取罗斯的黄金发财致富!"有关击溃马买的大激战的传说这样地传述了狂怒的马买所说的威胁话:"我们要像拔都时代那样地向罗斯王公进军,全力进攻罗斯人;我们将再也看不到基督教,我们将焚毁上帝的教堂;他们将流血,他们的法律将毁灭。"

但是罗斯已不是拔都时代的罗斯了——正在形成的俄罗斯国家的核心——强大的莫斯科大公国壮大了。金帐汗国则衰弱和瓦解了。难怪当马买准备远征罗斯时，他的谋士们指出了金帐汗国的穷困和衰弱，建议他雇用热那亚人("弗里亚兹人")、希腊人和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51页。

阿速人。马买不得不采纳这一建议。他的军队中有“伊斯兰教徒，亚美尼亚人、弗里亚兹人、撤耳柯思人、阿速人和布尔塔斯人”。1380年夏天，他率领20万大军渡过伏尔加河，开始驻牧于沃罗涅日河河口附近。得知马买出动后，立陶宛王公雅盖洛·奥尔格尔多维奇立即同他结成联盟，答应到9月1日时与鞑靼人会合，一起进军莫斯科。

雅盖洛和马买结成同盟其计划是要摧毁和瓜分罗斯，取消罗斯的独立和奴役罗斯人民。罗斯的两个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促使德米特里下决心组编军队。德米特里将属下王公和同盟王公的军队以及起来保卫自己家乡的城乡民兵召集起来。战士们从遥远的乌斯秋格，从特维尔地区的卡申和霍尔姆，从普斯科夫和斯摩棱斯克，从布良斯克和托鲁斯萨来到此地。当然，并非所有各地区都响应了德米特里的号召。各公国的独立性使害怕鞑靼人和不满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大公政策的下哥罗德和梁赞王公不愿参加保卫罗斯国土抵御鞑靼人。

担心与鞑靼草原接壤的自己的梁赞地区会首先遭到鞑靼人的攻击，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与马买和雅盖洛结成了联盟，并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取得莫斯科公国的一部分。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决定如此行动，是想使冲突的任何结局都对他有利。他与马买结成联盟后，同时又派遣急使到德米特里处去，在其致德米特里的呼吁书中写道：

“马买倾国出动，进军梁赞地区反对你我。雅盖洛也是这样。但是我们的手还高举着，不要睡，鼓起勇气来！”

在马买胜利时，梁赞王公指望得到莫斯科领地的一部分，而在德米特里成功时，奥列格则又希望得到赏赐，因为他是第一个警告和鼓励德米特里的人。

奥列格也写信给马买。梁赞王公向这位汗写道：“我听说君主

你想去威胁你的臣属莫斯科王公德米特里;如今,最英明的君王,你取得黄金和大量财富的时间来到了。王公德米特里一听到你的盛怒的名字,就躲到远处去了,他躲到大诺夫哥罗德或德维纳去了,莫斯科的财富将落入你的手中;而你的奴隶梁赞的奥列格我,将有幸获得你的恩典。”

但是奥列格·伊万诺维奇错了。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没有逃到任何地方去。相反地,“附庸”王公们汇集到莫斯科,亲兵们汇集到莫斯科,普通人的军队在行进,进向科洛姆纳。

在极端危险的年代要战胜罗斯的“混乱”对莫斯科王公来说不是轻易的事。但是德米特里成功地从自己的公国和下属封邑王公的公国召集起了一支当时很庞大的10万人的军队。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命令全军于8月15日会集于科洛姆纳。到了规定的期限,除莫斯科军队外,穆罗姆、弗拉基米尔、佩列雅斯拉夫尔、科斯特罗马、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奥泽罗等地的民兵(“团队”)都来到了这里。

罗斯奋起了。对压迫者和掠夺者,对鞑靼汗和鞑靼贵族,对“鞑靼魔怪”的无尽无休的炽烈仇恨迸发出来了。罗斯人进行殊死的可怕战斗,他们为家乡的土地而战,为自己的辽阔牧场、浓密森林,为家庭和田地,为自己的自由和荣誉而进行流血战斗。人们从卡尔戈波尔和别洛奥泽罗,从乌斯秋日纳和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和叶列茨,从辽阔的罗斯东北部所有各地前来参加战斗。

王公们率领自己的亲兵、有战斗经验的士兵们行进。罗斯的长剑、宽大矛头、弯刀、包银的弓和装满致命的箭的箭筒受到乌云下的夏日阳光的照射,闪烁着可怕的青光。沉重的圆锤和六叶锤悬挂在皮带上。在一些人的肩后悬挂着弩弓。大部分罗斯亲兵骑马行进。

但是应德米特里的召唤进军科洛姆纳的不仅有王公的亲兵

队。罗斯军队的主要部分为"按索哈应征者",即从农民和城市"黎民百姓"中征集的人民武装。这个民兵部队应当决定未来战役的结局。按"索哈"征集的民兵用斧子、猎熊矛、长木棒(粗棍子)和短锤武装起来。他们穿上缝有铁块、铜块的衬衣、皮袄和用绳子及"木板"铠甲制成的环甲(不穿锁子甲、头盔、盾和甲胄)来保护自己抵御敌人。

罗斯战士的坚强和勇敢弥补了武器的不足,他们不只一次地迫使敌人的精锐部队逃跑。

罗斯军队士气高涨、精神振奋。

有关库利科沃会战的古老叙事故事《顿河左岸故事》中说:"马在莫斯科嘶叫,荣誉响彻了整个罗斯国土。喇叭在科洛姆纳吹响,板鼓在谢尔普霍夫敲起,旗帜竖立在大顿河的河岸上。大诺夫哥罗德的永恒的钟敲响了。"

宣诏官跑遍了各个城市和村庄,并在教堂旁的广场上高声宣读王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关于同金帐汗国作战的诏书。

在遥远的"乡村"和"城市",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兵力正在集结。普通百姓们在行进,一如他们的祖辈曾英勇地"保卫"罗斯国土抵御敌人一样,现在他们也英勇地去保卫罗斯国土抵御"敌人"。原始资料在库利科沃之战参加者中间提到了尤尔卡皮靴匠、瓦休科·苏霍博列茨、格里佳·赫鲁列茨和先科·贝科夫,他们全都是普通的手工业者。

罗斯准备战斗。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首先收集有关敌人的情报。为此目的,他派出"哨兵"即以"忠实可靠的亲兵"罗季翁·勒热夫斯基、安德列·沃洛萨特和瓦西里·图皮克为首的侦察兵深入草原向南到季哈亚·索斯纳去。当长期没有从他们那里收到消息时,他派出了"第二批哨兵":克利门特·波利亚宁、格里戈里·苏达克和伊

万·斯维亚托斯拉夫。“第二批哨兵”遇到了带来被俘的“舌头”的瓦西里·图皮克。

从被俘的鞑靼人的口供中获悉：马买没有赶来，他在等待秋天雅盖洛的立陶宛人与他会合，因为没有立陶宛人他下不了进攻莫斯科的决心。

侦察兵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马买不知道德米特里的计划，而德米特里却清楚地知道其敌人的意图。必须采取措施和准备军事行动计划。

在莫斯科，王公和将军会议作出决定：及时防止立陶宛王公雅盖洛的军队与马买的鞑靼军队会合，出其不意，各个击破，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使罗斯国土免遭由于军事行动造成的大破坏。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必须立即出兵迎击鞑靼人。

准备出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科洛姆纳检阅了自己的军队。罗斯国的兵力是庞大和有威胁性的。10万大军准备向敌人挺进。

马买听到罗斯人的有威胁性的准备工作后，派遣急使到科洛姆纳要求缴纳像月即别汗和札尼别汗在位时所缴纳的巨额贡税，提议在德米特里同意这个条件时达成和议。但是德米特里拒绝了这一提议。

在科洛姆纳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责成季莫费·瓦西里耶维奇·韦利亚米诺夫、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韦利亚米诺夫、季莫费·瓦卢耶维奇、伊万·罗季奥诺维奇和安德烈·谢尔尼佐夫迅速采取坚决行动，于是1380年8月26日罗斯各部队从科洛姆纳出动，向奥卡河进发。

布置了战斗序列。警卫“团”在前面，其后为其余“各团”和辎重队。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自己军队的前方派出了侦察骑队、

“忠实可靠的哨兵”。取10名清楚地知道通过鞑靼地区和游牧站的道路的苏罗日商人担任向导。

在洛帕斯纳河流入奥卡河的汇流点附近，军队停下来休息一天。韦利亚米诺夫将军率领的莫斯科步兵部队开近这里与先出动的军队会合。过了一天，亲兵骑兵队渡过奥卡河前进，派出谢苗·梅利克指挥的侦察队先行。韦利亚米诺夫的步兵部队停留了一些时候，保护渡河和等待落后者。归附莫斯科王公的安德烈·奥尔格尔多维奇和德米特里·奥尔格尔多维奇两位立陶宛王公的部队不久也与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会合。

9月5日在涅普里亚德瓦河河口附近，第一批罗斯骑兵部队向顿河逼进。

根据侦察员“哨兵”彼得·戈尔斯基和卡尔普·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报告，德米特里得知，马买长期驻扎在库济明泽间小径附近，不急于出动，正在等待奥列格和雅盖洛的军队。必须决定何时何地与马买作战的问题，马买听到罗斯人行进后，已急忙向顿河奔来。

9月7日，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召开了会议。

这里，在顿河附近，德米特里和他的将军开始议决如下问题——是渡到彼岸去攻打鞑靼人呢，还是停在河的这边？如果过河去，把顿河和涅普里亚德瓦河留在自己后面，一旦战败，这两条河就将切断自己的退路，而停在河的这边看来较安全，因为退路没有被切断。一部分将军认为，应当选定第二方案，因为敌人为数众多——有鞑靼人，有立陶宛人，还有梁赞人。他们劝告说：“如果把河留在我们后面，我们将难于行动，应当给自己留住后路。”

但是较有经验和坚毅的将军激烈反对怯懦者和缺乏信心者。他们对德米特里说：“如果想打硬仗，今天就渡河吧，以使任何人都没有向后转的想法；让所有的人作战都不要耍滑头，谁也休想幸

免，死神随时都在等待我们；至于说他们力量强大，那倒要瞧个究竟……”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没有动摇。他没有因此在罗斯国土上大声乱叫，没有因此把自己的军队带到还没有进入战斗就准备退路的地方。他清楚地知道，罗斯人民在送别他和自己的父兄、子弟远征时，不哭泣也不抱怨，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他们自身生死存亡的问题，是罗斯的存亡问题。

德米特里王公战士的家人没有为战士们哭泣，因为他们“同大公一起去为全罗斯国土拼搏”。他“怎么”能“忍受和见到”这些信赖他、知道为什么和以什么名义出征的战士以及他们的将军、王公们“战败”而归呢？

这就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顿河附近的会议上起来发言的原因。他说：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观看奥列格和雅盖洛或保卫顿河，而是为了解救罗斯国土免于被奴役和被完全破坏或者为罗斯献出自己的生命。光荣地死去胜于耻辱地活着。出来后什么也没有做就返回去，不如根本不出来反对鞑靼人。

他下令立即渡过顿河作战，到了顿河左岸若不能战胜、保全全体罗斯人民免于毁灭，就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

光荣的罗斯统帅和爱国者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号召人们必须坚决、主动，勇敢地正视现实。实际上，战斗所面临的不是生，而是死。但应当想到的不是退却，而是付出代价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祖国。

坚持采取坚决的行动时，德米特里所遵循的不仅是内心的吩咐。

位于不宽的顿河彼岸的是岗峦起伏、被沟壑和有陡岸的河流即流入顿河的涅普里亚德瓦河、斯莫尔卡河、库尔察河、下杜比亚克河所割裂的辽阔的库利科沃原野。在原野中间延伸着一片沼

泽。德米特里所选择的阵地的有利处在于：较小的库利科沃原野使鞑靼人不能采用他们所惯用的以大批骑兵从两侧迂回包抄的战术：河流和小树林阻碍了这一战术的运用。鞑靼人必须使用他们所不习惯的正面进攻，这就使罗斯人处于有利条件下。德米特里的计划是深思熟虑、正确和合情合理的——它不让敌人的力量联合起来采取突然袭击。

王公、领主、将军们用心地听了德米特里的话，大多数人同意了他。

发出了架桥和寻找渡口的命令。9月7日至8日之交的夜晚，罗斯人趁黑暗和雾渡过顿河。渡河刚开始，谢苗·梅利克奔驰而来报告说："哨兵"已与鞑靼的先锋队发生不大的武装冲突，马买想阻止罗斯军队渡河，迅速地逼近顿河。

情报是准确的：罗斯人渡过顿河时，马买驻扎在总共只离库利科沃原野7—8俄里的地方。9月8日有雾的黎明，当连绵的阴霾在库利科沃原野的沟壑、森林、低地上升起时，罗斯军队开始排列成战斗序列。"右手团"在将军米库拉·瓦西里耶维奇和王公安德烈·奥尔格尔多维奇、谢苗·伊万诺维奇的指挥下占据右翼，接近下杜比亚克河多沟壑、多树林的河岸。别洛奥泽罗王公们的"左手团"占据斯莫尔卡河旁的战斗阵地。位于前方的则是德米特里·弗谢沃洛多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先锋团"，其中包括韦利亚米诺夫的莫斯科步兵部队和谢苗·梅利克的"哨兵"。"先锋团"几乎全部由步兵组成。

在"先锋团"之后为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本人和莫斯科将军季莫费·瓦西里耶维奇·韦利亚米诺夫指挥下的"大团"。在正面更远的深处驻扎着德米特里·奥尔格尔多维奇统率的后备军。在后方，从左边是匿藏在泽列纳亚·杜布拉瓦的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科夫斯基和领主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博

布罗克—沃伦涅茨的“西团”。罗斯军队的整个阵线延绵不过5俄里。

罗斯军队的这种布署给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军事天才造成了荣誉。事实上，当战斗爆发时，鞑靼人不仅不能从两侧迂回包围罗斯军队（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两侧迂回包抄对鞑靼人是有利的），而且不能前进也不能曲折绕行，“因为没有给他们让道的地方”。此外，担任总后备军的“西团”还挡住了顿河的渡口。

德米特里清楚地懂得：鞑靼人的主攻方向是左翼，目的是切断罗斯人与渡口的联系，然后渡过涅普里亚德瓦河把他们紧逼到顿河没有渡口的地方和有沼泽的岸边。按战斗序列布署了自己的军队后，德米特里遍历各部队，鼓励士兵们，使他们的心中有了勇气和信心。

接着王公换上自己宠爱的掌旗领主米哈伊尔·布连克的盔甲，德米特里本人穿上普通的外套，骑上别人的马前往“先锋团”。王公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他的榜样鼓舞了士兵。

白天12时，出现了鞑靼人的先头部队，不久就开始与罗斯人相遇。鞑靼军的中央为从奥塞梯人、热那亚人、撒耳柯思人中募集来的雇佣步兵。他们穿着深色长衣、黑色头盔，手持长矛。他们把长矛搭在肩上，矛头朝前，肩后的后半截矛长于前半截。在源源不绝的鞑靼大军两侧，灵活机动的带着弯刀、弓箭的鞑靼骑兵队从红岗驶下。

鞑靼人穿着深色衣服和带有铁鳞片的革制头盔、甲胄。他们是剽悍的骑士和在疾驰中能用弓射中一切的熟练射手，他们是危险的敌人。作战时他们排成几种队列——前锋、主力和侧翼，但鞑靼的拉瓦战法(лава)① 经常用半个月包围敌人。

① 拉瓦战法为鞑靼人用骑兵散兵线包围敌军的一种战术，这种战术后来为俄国哥萨克骑兵队所经常使用。——译者

连成一片的长矛之林向罗斯人逼进，士兵的沉重步伐和马蹄声汇集成一片不祥的强大响声。可怕的强大力量在行进，但是对抗它的是不可战胜的伟大罗斯军队。

走近到一箭之远的距离时，鞑靼人停住了。

德米特里返回到"大团"，以统率主要兵力。不大的武装冲突开始了。按照习惯，罗斯勇士佩列斯韦特向鞑靼勇士帖木儿一木儿咱挑战，进行单人决斗。勇士们纵马疾驰，互相迎战。在骇人的打击下，两匹马都蹲下来了，两位勇士都被杀死了。

两位勇士的交锋预告战斗的开始。响起了喇叭声、喊叫声、马蹄声，隆隆作响声，还有刀枪的清脆碰撞声、箭的呼啸声，杀喊声。

马买的鞑靼军队进攻"先锋团"。罗斯步兵部队英勇地同鞑靼人厮杀，但是鞑靼人数量上占优势，不久"先锋团"几乎全部被杀死。光荣的罗斯战士英勇地牺牲了。接着，鞑靼人猛攻"大团"，冲入"大团"中间，打败了莫斯科亲兵队。骇人的肉搏战开始了。互相拥挤到如此程度，以致许多人喘不过气来，被杀死的人倒不下来。不少战士被马蹄踏死。面对面地肉搏厮杀。武器相击的叮噹声、铿锵声，喊叫声，伤员和垂死者的呻吟声，马的鼾声——这一切声音混合成骇人的强大声响。

«马买大激战故事»对战斗作了这样的描述："镀金的头盔玎玲作响，深红色的盾咚咚响。宝剑呼啸，锐利的军刀在好汉们的头旁闪烁，勇士的鲜血沿着包铁皮的马鞍流下，镀金的头盔在马蹄旁滚动。"

突破了中心部分后，鞑靼人冲向大公旗帜处，把旗帜斫碎。领主布连克被杀死。但是不久，季莫费·韦利亚米诺夫和格列布·布良斯基指挥下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布良斯克亲兵队投入了战斗，迫使鞑靼人后退，把局势恢复了过来。"大团"顶住了敌人的进攻。

这时鞑靼人如巨浪般地急速冲向左翼。"左手团"被打败，开始退向涅普里亚德瓦河。下午3时，鞑靼人突破罗斯军队的防线后，冲到"大团"的后方。右翼没能出援；尽管罗斯人坚守在这里，但是指挥"右手团"的安德烈·奥尔格尔多维奇没有下决心出动，他担心中军"大团"将被击溃，那时他就会落入陷阱。这时鞑靼人继续迫使罗斯人后退。胜利的欢呼声和哨声已经在原野上响起。

"西团"早已企图从泽列纳亚·杜布拉瓦冲出来，但是有经验的德米特里·博布罗克—沃伦涅茨将军制止了急躁的人们。他说："还不到时候。"

但是那时刮起了逆风；陶醉于看来就要胜利的鞑靼人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等待到。德米特里·博布罗克—沃伦涅茨指挥说："是时候了！"于是"西团"生力军冲向作战的原野。出乎意外的打击使鞑靼人支持不住，逃跑起来。"大团"的罗斯战士乘机转入进攻。鞑靼人受不了新的打击，溃逃起来。从红岗上观战的马买也逃走了，把自己的大帐和贵重物品丢给了罗斯人。罗斯战士追击了鞑靼人30俄里，一直追到克拉西瓦亚·梅恰河。追击得全身躁热的罗斯战士直到晚上才开始返回库利科沃原野。鞑靼人被完全击溃。

马克思指出："辽阔的库利科沃原野会战"，乃是"德米特里的彻底胜利"。①

库利科沃之战结束了。日落时，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站在大公的旗帜下，下令吹集合号。在战斗中幸存的罗斯国的光荣勇士们，满身血污疲惫不堪地，穿着揉皱的甲胄集合在大旗下。胜利的欢呼声在库利科沃原野响起。胜利者在战场上在欢呼声中宣布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为"勇敢者"。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51页。

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下令寻找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人们开始询问——谁见到王公德米特里没有？一些战士回答说：曾见到他同4个鞑靼人厮杀。另一些战士报告说：曾见到遍体创伤的他“刚走了”。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冲锋在前，同鞑靼人多次厮杀”。人们找了很久，但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能找到王公。最后，德米特里被找到了。王公穿着满是皱纹和被砍碎的甲胄躺在一颗被砍倒的树下昏迷不醒。王公德米特里勇敢地厮杀，但是“鞑靼人的力量”战胜了他，只有出色的甲胄使他幸免于必不可免的死亡。英勇的王公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作战。恢复知觉后，德米特里遍历战场，下令统计伤亡。

躺在战场上的罗斯战士达6万名之多。

鞑靼人战死的更多。库利科沃会战使罗斯国付出了巨大伤亡。正如编年史所说的：“不论是将军和战士”都死了(不少)。但是它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是可恨的金帐汗国遭受的第一个打击、惊人力量的打击，是全民反对鞑靼桎梏斗争的开端。它振作起罗斯人民的精神，加强了爱国主义感情，使人民产生了迅速摆脱金帐汗桎梏的希望。显然，罗斯战士的顽强、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各地一切力量的联合和集中，必将导致鞑靼桎梏的消灭。顿河王德米特里所实现的罗斯各地力量的联合甚至已造成了胜利。

库利科沃会战的意义还在于：此后莫斯科被认作把罗斯从马买入侵中拯救出来的救星；莫斯科在人民中的威望和声誉大为加强和增长。

人民群众对莫斯科的这些好感迫使诺夫哥罗德的敌视莫斯科的领主显贵开始对由于莫斯科战士“保卫”“罗斯全国”免受“敌人”侵犯而颂扬莫斯科及其王公的诺夫哥罗德“小人物们”、“恶汉、谓彻参加者们”作了让步。甚至在梁赞，在其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在库利科沃会战时期扮演了如此不光彩角色的那个梁赞地区，

萨福尼写成了著名的古罗斯爱国主义文学作品《顿河左岸故事》，这部作品是以颂扬挺胸保卫全罗斯国土的莫斯科精神编写成的。

库利科沃会战推动了罗斯人民民族自觉心的提高，它是在形成大俄罗斯民族和统一的俄罗斯国家时的最重大的精神因素。

库利科沃会战的意义难以充分估计。由谁来领导罗斯统一的问题已解决，已不可改变地由莫斯科王公率先解决。莫斯科开始变成罗斯的经济、政治中心，变成罗斯人的民族生活中心。

顿河王德米特里在位时期是俄罗斯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

库利科沃会战是罗斯人民争取自己独立自主斗争中的历史关键。尽管还要经过一百年，鞑靼桎梏才被彻底打碎，而且在库利科沃会战后总共才过了两年，莫斯科就遭到脱脱迷失的完全破坏，但是，在马买被击溃后，金帐汗国对罗斯已经根本起不了过去它曾起过的那种作用了。

别林斯基写道："顿河王德米特里用剑而不是用驯服态度向鞑靼人预告了他们对罗斯统治的结束。"①

顿河王德米特里把金帐汗敕封给他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作为自己的"世袭领地"来支配，他在自己的遗嘱中深信不疑地写到很快就会彻底摆脱鞑靼桎梏："上帝将使金帐汗国发生变化，我的子孙将不向金帐汗国缴纳贡税"，他预告在不久的将来将停止向金帐汗国缴纳贡税。

库利科沃会战是当时罗斯军事艺术的最高峰。

顿河王的美名传遍了全罗斯。这是一位有才能而勇敢的统帅，他"以自己的英勇保卫了罗斯国土"。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库利科沃原野表现出他个人的英勇和完全不徒骛虚名，而西欧

---

① В.Г.别林斯基：《选集》，苏联国家出版总局，1949年版，第873页。

各国的国王和统帅，如法国国王善人约翰[1]，波兰国王、过去的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2]，都曾被评为徒骛虚名。他宁愿换上自己米哈伊尔·布连克的盔甲作为普通一兵参加战斗；他用这种作动及时防止了当王公旗帜被敌剑砍落时笼罩军队的惯常的惊慌失措情绪。

顿河王德米特里的统帅指挥艺术的特点首先是主动精神。考虑到进攻是防御的最好形式，顿河王德米特里的行动积极、迅速、果敢。恰当地选择攻击时机后，他打败了主要敌人；解决了局部问题后，他也就解决了整个战略任务，因为雅盖洛的立陶宛人得知马买战败后退走了。

出色地组织了侦察队使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熟悉敌情，有可能始终把握主动权。

恰当的选择战场，大胆、适时地把决定战役结局的后备军投入战斗，坚决、有效地追击溃退之敌。

顿河王德米特里特别成功地使用了“西团”(伏兵)，即后备军。

罗斯人民对库利科沃会战和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本人给予高度评价。民间传说把新的胜利同古罗斯战士最伟大的胜利相比拟，而对于以其意志和英勇导致胜利的德米特里本人，则把他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这样有声望的王公、“为罗斯国奋斗的斗士”相提并论。编写成了回忆库利科沃会战的歌曲和民间故事«顿河左岸故事»、«马买大激战故事»。由于库利科沃原野的胜利，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获得“顿河王”称号。

---

① 即善人约翰二世(Jean II le Bon,1319—1364)，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350—1364年在位。1356年在对英作战中被英军俘获。后来根据1360年签订的«布勒丁尼和约»，以缴纳巨额赎金为条件获释返回法国。1364年因未能如期缴纳赎金又去英国，不久因死于伦敦。——译者

② 查理十二世(1682—1718年)，瑞典国王，1697—1718年在位。在位期间，王权加强，不断进行对外战争。1709年在波尔塔瓦战役被俄军战败。

被可怕的拔都入侵和鞑靼人经常不断的恐怖手段造成的鞑靼人不可战胜的观念消失了，“不可战胜”的鞑靼人的魔力在罗斯宝剑的打击下在库利科沃原野上消失了。

库利科沃会战为罗斯摆脱金帐汗的桎梏奠定了基础，但是金帐汗国还很强大，严厉可怕的征服者帖木儿（塔密儿兰）的走卒新的金帐汗脱脱迷失于1382年率领大军，极其秘密地向莫斯科进发。下哥罗德的王公们和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出来迎接脱脱迷失，恳求他不侵犯他们的领地，奥列格·伊万诺维奇甚至向鞑靼人指出了渡过奥卡河的渡口。

脱脱迷失迅速向莫斯科挺进。由于经过库利科沃会战而力量衰弱的莫斯科地区派不出大军，德米特里甚至得不到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夫的支援，于是他离开莫斯科，从右面转移到佩列雅斯拉夫尔，然后到了科斯特罗马，在那里开始召集团队。那时，鞑靼人占领了谢尔普霍夫。被自己王公抛弃的、同领主一起从城里出来的莫斯科人波动不安起来；掀起了一场“大骚动”，人们在群众大会上决定不把本城交给敌人。怯懦者和叛徒遭到痛打，想逃出城去的人不准许出去。政权掌握在“黎民百姓”自己手中。许多人汇集莫斯科：“留下来的市民很多，从各乡跑来的人也很多，从其他地方也跑来很多人”。

根据罗戈日编年史编撰者的叙述可知，从莫斯科城里和四周森林逃来的许多人，许多农民和“黎民百姓”，在莫斯科找到了避难所。

市民们积极准备保卫战。苏罗日等地呢绒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市民”、逃难农民，万众一心开始准备反击可怕的敌人。莫斯科人高呼：“我们不怕被鞑靼人找到，我们有坚固的、有铁门的石头城。”还在城被围攻之前，为莫斯科王公效劳的奥尔格尔德之孙、王公奥斯捷伊赶到了城里。市民们委托他担任指挥。根据起来抵

抗的市民的倡议，人们开始为保卫城市和“被围困”作准备。

市民们烧毁了城外工商区、栅栏、板墙，砍光城郊的全部树木，以使敌人无处隐藏，无处取得可供接近城的“跳板”。被自己王公抛弃的莫斯科人对付围攻所作的准备，表明莫斯科工商区居民对自己城市多么热爱，为了它他们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证明莫斯科人中间有不少经验丰富的勇敢战士：在艰难时刻市民不仅没有惊惶失措，而是武装起来，深思熟虑地迅速为保卫城市作好准备。

1382年8月23日，当脱脱迷失的鞑靼先头部队兵临城下时，武装起来的市民们成群出现在莫斯科内城高不可攀的石头墙上，准备不顾生命决一死战。鞑靼人问道：王公德米特里在城里吗？他们得到了否定的回答。鞑靼人绕城走了一圈后，没有找到突破口，便回到金帐汗处去了。第二天，脱脱迷失率领主力前来。开始了围攻。鞑靼人的箭雨点般向城墙上射来，勇敢的莫斯科保卫者被射死不少。鞑靼人沿着云梯爬向城墙。被围攻的莫斯科人向鞑靼人倾倒沸水、烧热的焦油，抛掷石块，并以箭还箭。

莫斯科人动用了火器——秋菲亚基（тюфяки）。这是编年史上第一次提到的罗斯人所使用的火器。火器最初出现于城市，这不是手持的火器，而是发射火药瓢和石核的炮。最先学会运用它的不是领主和新兴贵族，而是市民，在有经验的莫斯科工商业者手中，“射击火器”是新的可怕武器。

鞑靼人的第一次猛攻被打退了。他们后退，停在远离带来火焰和死亡的莫斯科内城城墙的地方。但是熟练的（莫斯科）射手用弓、弩、秋菲亚基和炮竟把箭和石核射到了鞑靼人驻扎的地方。例如，呢绒商人亚当站在弗罗洛夫城门附近城墙的雉堞上，久久选择自己的射击目标，最后射中脱脱迷失宠爱的一个著名鞑靼宗王的胸部。编年史指出，宗王之死使脱脱迷失和全体鞑靼人都“为他

悲伤”。

鞑靼人厮杀了三天，勇敢的莫斯科普通市民每天都打退了鞑靼人。脱脱迷失用猛攻夺取城市没有指望，便决定采用狡计。下哥罗德王公以金帐汗的名义出面，答允莫斯科人说：脱脱迷失“想奖赏他们”，说他丝毫不反对莫斯科人，他只同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作战。

市民相信了敌人和叛徒的话。8月26日，莫斯科人打开城门，在王公奥斯捷伊率领下出来迎接鞑靼人。鞑靼所需要的就是这个，他们把奥斯捷伊接到汗帐，这位勇敢的王公就在那里被杀死了，接着鞑靼人冲进城里，开始屠杀城市的保卫者，掠夺，焚烧。不少书籍被焚毁，这些书是市民们珍惜当时书本上的丰富知识，藏在莫斯科的。被杀者超过24 000人。

但是当库利科沃会战记忆犹新的时候，脱脱迷失毁坏几座城市之后回去了。这个用欺诈手段占领城市的、莫斯科人昔日的“胜利者”被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击溃鞑靼部队的报告吓坏了（鞑靼部队报告说：顿河王德米特里亲自来了）。鞑靼人于是匆促离开了罗斯。

莫斯科保卫战表明：当事情涉及保卫故土时，罗斯人民是有能力保卫它的。莫斯科人民在没有王公、领主，没有王公战士的情况下挺胸保卫了城市，只是由于王公们的背叛脱脱迷失才得以占领莫斯科。但是罗斯人民所珍视的库利科沃会战使罗斯国力量衰弱了，这就使鞑靼人乘机蹂躏了国土。

秋天，顿河王德米特里回到遭受完全破坏的莫斯科。必须重新承认对金帐汗的依附关系，德米特里被迫派遣自己的儿子瓦西里带着大量礼物到金帐汗国脱脱迷失处去，向他请求受封为大公的敕令。瓦西里在金帐汗国被扣留，后来他才得以逃回来。1383年，脱脱迷失终于颁发了（任命莫斯科王公为大公的）敕令，但迫使

(莫斯科)缴纳巨额贡税,“每个村子半卢布银币”。

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清楚地知道，在自己一再背叛之后,不能指望从顿河王德米特里处得到丝毫好处,便逃到立陶宛去了。从那里回来后,他被迫于1381年同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像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那样承认自己为德米特里之“弟”，对他的关系就像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对他一样。奥列格答应一定同罗斯的敌人立陶宛和金帐汗国脱离关系，不“谋求敕令”，等等。此外,奥列格还把梅谢拉和梁赞的许多城市以及“鞑靼地方”割让给顿河王德米特里，那些地方的鞑靼小王公和梅谢拉小王公不再依附于金帐汗国,而依附于罗斯王公。

在与奥列格的和谈中，教会再次起了重大作用。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到梁赞去了一次,迫使奥列格屈服。

这样,特维尔和梁赞两大公国尽管未丧失其独立性,但却已处于屈服于莫斯科的地位。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和梁赞王公奥列格必须像顿河王德米特里的堂兄弟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那样“不违命地效劳”于莫斯科王公（对其“效劳”莫斯科王公答应“酬谢”),不“谋求”受封为大公的敕令，而在对待金帐汗国、立陶宛和其他王公的态度上，奉行莫斯科王公所行的政策。此外,莫斯科王公有权干预这些王公与其领主们的关系。

至于说封邑小王公们，顿河王德米特里让他们全服从于自己的统治，变为“附庸”。顿河王对待封邑王公领主和莫斯科领主十分严厉。他取消了千人长一职，并在莫斯科库奇科沃原野处死投靠特维尔方面的最后一个莫斯科千人长伊万·韦利亚米诺夫。

顿河王德米特里还担任了诺夫哥罗德王公，他同诺夫哥罗德人订立了条约,按照条约,诺夫哥罗德答应在德米特里同立陶宛和特维尔作战时支援他，而莫斯科王公也答应一定支援诺夫哥罗德

同德国人、立陶宛和特维尔作斗争。莫斯科王公曾两次履行条约条款，援助诺夫哥罗德同德国人作战（1364年）和同特维尔作战（1373年）。但是诺夫哥罗德的水上强盗——"大胆的青年好汉"和强盗曾多次袭击莫斯科各个地区，而莫斯科的将军们并不总是能打退他们的袭击。水上强盗破坏和焚烧城市，如焚毁科斯特罗马、下哥罗德等城，俘走居民，把他们卖到不里阿耳和金帐汗国再转卖给"木速蛮伊斯兰教徒"，还抢劫商人。掠夺罗斯各城乡的诺夫哥罗德水上强盗的破坏性袭击，促使顿河王德米特里于1385年前往诺夫哥罗德采取制裁措施，并使傲慢的诺夫哥罗德领主屈服。诺夫哥罗德屈服了，并缴纳了贡税。水上强盗抢劫性的袭击暂时停止。

顿河王德米特里是罗斯最强大的王公，除了罗斯西部，事实上所有罗斯各地全都服从他。顿河王德米特里把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看作自己的"世袭领地"。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不仅封邑王公们服从他，甚至连下哥罗德大公、特维尔大公和梁赞大公也都服从他。顿河王德米特里在位时，别洛奥泽罗公国归并于莫斯科。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外来威胁的压力以及与金帐汗国和立陶宛的斗争，使将各种力量统一起来的意识发展了起来，建立有统一政府和统一领导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愿望发展了起来。

"……共同危险和共同苦难的感情把分散的罗斯各公国联系起来，并通过莫斯科公国对其他所有各公国的统治地位使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发展了起来。尽管外部的统一多于内部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毕竟拯救了罗斯。"[①]

莫斯科成了日趋统一的罗斯的公认的中心。在同立陶宛作斗争时，莫斯科联合了下哥罗德、卡申、雅罗斯拉夫尔、戈罗杰茨、罗斯托夫、别洛奥泽罗、布良斯克、斯摩棱斯克、斯塔罗杜布、奥博连

① B.Г.别林斯基:《选集》，苏联国家出版总局，1948年版，第488页。

斯克、塔鲁萨、诺沃西利等地王公的军事力量，这个战斗联盟并用条约固定下来，按照条约莫斯科今后将“同它们一起进行保卫战”并任领导。

我们之所以把莫斯科说成是罗斯公认的中心(当然，这并不排除个别王公和诺夫哥罗德领主寡头政体对它的斗争)，是因为莫斯科王公与特维尔王公签订的 1375 年“最后”文书已把莫斯科最危险的敌人公开承认莫斯科为罗斯的民族中心和全罗斯政治领导者这一点用文件固定下来。甚至连互相约定共同行动反对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国外“敌人”金帐汗国和立陶宛也都是这样看待莫斯科所起的作用的。

莫斯科征讨敌视它的特维尔被金帐汗国看作“反对金帐汗的罪行”。

莫斯科事实上变成了全罗斯政治的领导者，这就使顿河王德米特里有可能提出担任这一角色的正式权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莫斯科王公开始把弗拉基米尔大公国连同诺夫哥罗德一起看作自己的世袭领地。

莫斯科王公的实力是如此地强大，库利科沃之战的意义是如此地伟大(其意义之伟大不因脱脱迷失的“进袭”而有所降低)，以致金帐汗国不得不承认顿河王德米特里对卡利塔“所收买到的”权利，对卡利塔在其遗嘱书中所“赐予”长子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对整个弗拉基米尔大公国的权利。

在联合罗斯民族的力量时，王公依靠的是新兴的、人数增多的工商区居民和领主。

莫斯科的贸易关系发展着。莫斯科同诺夫哥罗德的通商条约(证书)(1380 年)、同梁赞的通商条约(1381 年)、同特维尔的通商条约(1369 和 1399 年)规定了莫斯科商人享有到处“通行无阻”和“关税照旧”的权利。西欧的商品呢绒、葡萄酒、调味香料、贵重制

品等物经过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进入莫斯科。莫斯科通过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和金帐汗国同东方进行贸易。被提到的商品有“切尔卡斯头盔”、“伊斯兰教徒拜丹”、“也思忒盘子”(产自伊朗的也思忒城)。莫斯科还同南方热那亚殖民地苏罗日(速答黑)进行贸易。同苏罗日进行贸易的大商人被称为苏罗日客商。莫斯科商人“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中间商人，金帐汗国和弗里亚济的所有人们都知道他们”。

不可忘记还有通往拜占廷的道路，但是如今要通过热那亚人同拜占廷发生联系。莫斯科的苏罗日商、呢绒商和其他商人是富有和有势力的商人集团。

发展起来的商业需要，促使顿河王着手铸造自己的钱币。手工业发展着。工商区成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力量。

领主壮大起来。在顿河王周围形成了有势力的富有领主、大土地所有者集团。他们是王公的将军、全权代理人和谋士。在他们之中我们已遇到的有在顿河王时代从沃伦来的、娶德米特里的姊妹安娜为妻的著名的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博布罗克，还有御前侍臣季莫费·瓦西里耶维奇，伊万·罗季奥诺维奇·克瓦什尼亚，安德烈·科贝拉和他的儿子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科什卡、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维巴尔，米哈伊尔·切利亚季亚，亚历山大·普列谢伊，以及其他许多显赫领主家族的始祖。人数众多、富有而精力充沛的莫斯科领主在顿河王的公国中起着重大作用。无怪乎根据顿河王的«传记»来看，他在临死前对其儿子们嘱咐说:“要爱自己的领主，赐给他们应得的荣誉，任何事情没有他们的议会(杜马)什么也作不到。”德米特里对领主们则说:“我敬重和爱你们全体，非常尊敬你们，我与你们同悲欢;你们对我说来不是领主，而是我的国土上的王公。”顿河王这样地强调指出了领主的作用和自己对他们的态度。

顿河王德米特里在位时期的特征可说是封建割据制度的危机和莫斯科开始变为罗斯的中心。

谁领导罗斯统一事业的问题由莫斯科大公顿河王德米特里占先而得到解决。“弗拉基米尔大公国”和莫斯科公国併入卡利塔子孙的“世袭领地”。莫斯科变成了罗斯的经济、政治中心，正在形成的大俄罗斯民族的中心。

从编年史中我们知道了顿河王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性格和外貌。在实现目的上他是倔强的，而他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罗斯各地，加强和提高莫斯科的地位，同“敌人”斗争和加强王公政权。

几世纪来，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描述了顿河王德米特里的形象。他是一个魁梧、高大、宽肩、肥胖的人；长着黑发、黑胡子，目光锐利，刚毅，英勇而聪明；尽管“没有从书本中获益”，但他正直、谦逊，不爱宴饮娱乐；他屡建军功和经常“考虑”国事。

1941 年 11 月 7 日，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红场上检阅红军时所作的历史性讲话中，对苏联国土上的勇敢战士们曾说：“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①、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②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如此高度地评价了顿河王德米特里的作用。

---

① 即顿河王德米特里。——译者

② 斯大林：《检阅红军时的演说》，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第 八 章

15 世纪第 2 个 25 年间的 封建战争及其政治结局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位多年(1389—1425 年)，其统治时期的特点是外部局势的复杂化。罗斯同其邻敌立陶宛和金帐汗国的矛盾增长了，立陶宛当时已与波兰合并，处于波兰的控制下。此外，大雷雨的乌云——新的征服者帖木儿的无数大军正从东方逼近罗斯。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即位之初合并了下哥罗德公国。1391 年，他前往金帐汗国，买到了受封为下哥罗德大公和受赐戈罗杰、穆罗姆、梅谢拉小城（卡西莫夫）、塔鲁萨的敕令。以倾向于强大的莫斯科王公并与其秘密接洽的瓦西里·鲁缅涅茨为首的下哥罗德领主投靠了（莫斯科王公）瓦西里。下哥罗德王公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被他抓起来交给了瓦西里，莫斯科王公的地方官们被领入下哥罗德。尽管鲍里斯的侄儿苏兹达尔王公瓦西里和谢苗企图同鞑靼宗王爱替牙黑联合起来夺回尼日尼，“夺得”下哥罗德地区，但是 1401 年瓦西里派将军伊万·乌达和费多尔·格列博维奇去反对他们，两位将军反而“夺得”了不里阿耳和莫尔多瓦地区，迫使谢苗放弃了自己的妄想。瓦西里·鲁缅涅茨也屈服了。受鞑靼—不里阿耳茹科京[1] 小王公支援的鲍里斯的儿子伊万和丹尼尔也降顺了。

苏兹达尔公国也投靠了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苏兹达尔

① 茹科京——古代卡马河不里阿耳国的城市之一，后来被鞑靼—蒙古人占领。

王公成了他的“侍从”。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其即位之初曾为了封邑同其叔父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失和，但不久他们言归于好，当弗拉基米尔死去时（1410年），他曾留下遗言嘱咐自己的儿子们全都要服从瓦西里。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位时，诺夫哥罗德领主打算脱离莫斯科。诺夫哥罗德领主们不想到莫斯科去听从王公裁判，接着诺夫哥罗德宗教界也不愿由都主教来裁判。都主教基普里安要求诺夫哥罗德人承认他的权力，承认献给他巨额进项的“大主教法庭”①。

瓦西里懂得：如果诺夫哥罗德脱离都主教，那末接着它就会企图摆脱他的统治。因此他放下下哥罗德方面的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诺夫哥罗德来。他要求诺夫哥罗德缴纳“黑鲍尔贡税”②，缴纳应缴给王公的一切税，以及承认都主教的裁判。当诺夫哥罗德人拒绝时，瓦西里开始采取军事行动。诺夫哥罗德人不得不“照老规矩”签订和约。尽管有条约，但诺夫哥罗德领主不想履行和约条款，当1395年都主教基普里安来到他们处时，他们拒绝他“进行裁判”。此外，诺夫哥罗德领主竭力设法“脱离”莫斯科，他们同立陶宛王公维托夫特签订了条约，并同德国骑士们签订了条约。瓦西里要求他们解释理由。诺夫哥罗德人回答得十分含糊。当时莫斯科王公便将自己的团队派往北方，进入诺夫哥罗德最富庶的地区——位于北德维纳河流域的扎沃洛奇耶或德维纳。这是以毛皮、沿海鱼猎业驰名的边区。这里还有熬盐场、树脂干馏作坊和生产钾碱的“常驻营地”。

① “大主教法庭”为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掌管的审判教会案件或某些民事案件的法庭。

② 黑鲍尔贡税（“чёрный бор”），14世纪后半期至15世纪莫斯科大公为向金帐汗国纳贡对诺夫哥罗德土地和手工业征收的一种特别税。——译者

莫斯科早就力图夺取富庶的德维纳，即便取得其北部和东北部就可继续深入。它们全都以细小链条状延伸在吸引莫斯科领主和商人们的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北面。1397 年，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派遣自己的领主到德维纳去建议德维纳领主和全体德维纳人脱离诺夫哥罗德，接受大公统治。德维纳人同意了，他们宣誓忠于瓦西里。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把专门的法定证书颁发给德维纳人。

诺夫哥罗德领主显贵和以大主教约安为首的宗教界不能容忍丢失自己最富庶的“殖民地”德维纳地区。领主和教会在这里拥有土地、征收捐税、进行贸易，诺夫哥罗德商人——“客商”们在这里开展自己的贸易，水上强盗们在这里掠夺，并从这里出发举行其抢劫性袭击。诺夫哥罗德领主企图向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证明他的不公道，但是瓦西里对他们的说教置之不理。于是只好动用武器。1398 年夏天，在诺夫哥罗德最富有的封建主大主教约安的祝福下，诺夫哥罗德军队出动了。他们不仅夺回德维纳，而且还“夺得”了一些大公领地。瓦西里不得不让步，重新“照老规矩”签订了和约。尽管莫斯科将军们后来曾不只一次地“夺取”德维纳地区，但这不过是袭击，直到 1478 年失陷之前，德维纳始终归诺夫哥罗德所有。

尽管瓦西里没能占有诺夫哥罗德的“殖民地”扩大自己的领地，但他在普斯科夫的势力加强了。诺夫哥罗德的“小兄弟”(普斯科夫)不仅没有得到其“兄”的支援，诺夫哥罗德人还一再进攻普斯科夫。面临对立陶宛和德国骑士们的艰苦斗争的普斯科夫不得不求援于莫斯科，它从 1399 年起，开始“从”莫斯科大公“手中”接受王公。

瓦西里·德米特里的势力不仅在谓彻城市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得到发展(诺夫哥罗德由于害怕莫斯科王公的强大，如今“敬

而畏之地”固守自己的条约），而且还在承认其居长地位的其他公国——梁赞公国和特维尔公国中得到发展。虽然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还没有力量彻底消灭各地区的割据状况，但是他不仅保持了顿河王时期加强起来的大公政权的意义和力量，而且还更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势力范围。

从14世纪末起，住有兹梁人(科米人)并被称为“小彼尔姆”的维切格达河流域实际上并入了莫斯科公国的领地。兹梁人生活在不大的氏族公社里，主要从事狩猎。外号为斯特凡·彼尔姆斯基的传教士斯特凡·赫拉普在这里展开活动。在维切格达河支流维马河河口，他在多神教祈祷献供处建造了一座城堡，这座城堡成为莫斯科政府在彼尔姆边区的依靠和彼尔姆主教的驻地。斯特凡·彼尔姆斯基在“小彼尔姆”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他创制了彼尔姆字母，并将几种宗教内容的书籍翻译成兹梁语。莫斯科的影响开始在这里逐年增强，主教驻地在维切格达河地区密林中起着殖民基地和文化中心的作用。

14世纪末，东方再次出现了大雷雨前的乌云——博得战无不胜战士荣誉的帖木儿(跛者帖木儿、塔密儿兰)率领新的征服者大军向西挺进。受恩于帖木儿而得以即位的(金帐汗)脱脱迷失不想顺从帖木儿的要求，率军迎战帖木儿。1395年，脱脱迷失在捷列克河沿岸被帖木儿完全击溃后逃走了。

帖木儿大军向莫斯科推进。极大的危险威胁着莫斯科。比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残酷得多的凶残征服者的强大军队进入罗斯各地。数十万俘虏被屠杀，砍下的头颅堆积成山，数千人被活砌在塔楼里，城市被毁坏，土地变为荒漠——这就是帖木儿给自己树立的纪念碑。“帖木儿的政策是残酷地折磨、杀光、消灭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男子和青年，就这样到处造成惨祸。”[1] 瓦西里·德米特

[1]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6卷，第185页。

里耶维奇召集军队，出兵迎战帖木儿，进抵奥卡河河岸。勇敢的莫斯科军队在这里等候强大的征服者。

这时帖木儿到达叶列茨，攻占了它并进行了破坏。

沿着多林、多沼泽地区行军的困难，担心远征莫斯科要付出昂贵代价并未必能获胜，而占领、掠夺富庶的克里木则可望成功——所有这一切促使帖木儿转向了南方。

罗斯居民松了一口气。由于库利科沃之战而遭到损害的金帐汗国的往昔的强大已成为传说。帖木儿的远征是对金帐汗国的又一次打击。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不再前往金帐汗国去送礼物和贡税。对于缴纳贡税的要求，他答复说：边远的罗斯地区穷困而荒无人烟，不管对谁也缴不出什么东西。但是本应缴给鞑靼的贡税终究还是从居民处认真地收集起来(每二“索哈”缴一卢布)，只不过进了王公的金库。到罗斯来的金帐汗国使者和商人遭到嘲笑、欺凌和侮辱。罗斯人力图以此来报复多年来所受的压制和迫害。

1408 年，代替金帐汗统治金帐汗国的帖木儿的走卒鞑靼贵族也迪该突然袭击了罗斯。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带着家属逃往科斯特罗马，留下自己的叔父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保卫莫斯科。也迪该比脱脱迷失谨慎，他回想起莫斯科人当年给鞑靼人的教训，没有猛攻莫斯科城，而是把它包围起来，决定用围困法夺取它。同时，鞑靼各部蹂躏了(罗斯)各城。过了一个月，原决定在莫斯科城墙附近过冬的也迪该，从金帐汗处得知有个鞑靼宗王来进攻金帐汗，金帐汗要求他回去，狡猾的鞑靼贵族(也迪该)在向莫斯科人索取高额贡税后，答应了撤围。莫斯科人高兴地缴付了三千卢布。也迪该便回去了。

也迪该的远征使罗斯付出了昂贵代价。下诺夫哥罗德、谢尔普霍夫、德米特罗夫、罗斯托夫、梁赞成为一片废墟。1412 年，瓦

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不得不重新前往金帐汗国札兰丁—莎勒坛汗处，并且送去了礼物。

乌云密集于西方。立陶宛对罗斯说来变得愈来愈强大和危险了。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是立陶宛王公维托夫特的女婿，但是这丝毫不妨碍立陶宛与罗斯互相敌对。1368年①，当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从金帐汗国逃离脱脱迷失时，他不得不经过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立陶宛绕道而行。在立陶宛，他对维托夫特说过要娶他的女儿为妻。当瓦西里成为大公后，他不得不履行这一外交婚约，于1390年娶了索菲娅·维托夫托芙娜。

尽管有亲戚关系，维托夫特仍然是正在形成的俄罗斯国家的敌人。维托夫特使斯摩棱斯克屈服于自己，"占领"了梁赞地区，他还觊觎诺夫哥罗德，为此他同德国立沃尼亚骑士团结成联盟，答应帮助该骑士团同普斯科夫作斗争。维托夫特同立沃尼亚骑士团团长订立的条约使罗斯敌人的力量团结在一起。

敌对力量的联盟并不巩固。普斯科夫人保卫边界抵御骑士掠夺者的坚决行动和德国—立陶宛联盟本身内部的矛盾使得维托夫特不能实现其侵略计划。

维托夫特企图干预金帐汗国的事，他收留了被帖木儿赶出的脱脱迷失，然后统率大军着手远征金帐汗国。1399年，在沃尔斯克拉河河岸上，维托夫特被鞑靼人击溃，逃回了立陶宛。失败的征服者气焰锐减。首先他不得不同诺夫哥罗德签订和约。斯摩棱斯克一度脱离了立陶宛，只是由于某些领主的背叛才使它又重新

---

① 疑为1386年之误，因1368年时脱脱迷失只是白帐汗国的一个未掌大权的普通宗王，尚未进入金帐汗国。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则出生于1371年，此年尚未降生。——译者

成为立陶宛的城市。

由于收回斯摩棱斯克而振作起来的维托夫特，加紧展开对普斯科夫的军事行动。因为普斯科夫不久就无力单独对抗立陶宛，莫斯科便出来保护它。曾对其岳父维托夫特宣誓和好的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撤销誓约，出征立陶宛。莫斯科军队围攻维亚济马、谢尔佩斯克、科泽利斯克，但是为数众多的立陶宛驻防军守卫着防御工事强固的各个城市，瓦西里不能占领城池，不得不只限于围攻。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坚决行动引起许多不满于维托夫特统治加强的立陶宛王公和依附立陶宛的罗斯王公投奔莫斯科。例如，1406 年亚历山大·涅柳布率领众多侍役（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来为莫斯科王公效劳。瓦西里"以敬重和赏赐"迎接这些"投奔来的"王公。

1406 年，维托夫特的立陶宛军队在普拉瓦河上与用鞑靼骑兵加强的瓦西里的罗斯军队相遇。双方没有交战，因为王公缔结了和约。第二年（1407 年）也发生了同样不大的武装冲突，还是以缔结和约告终。

1408 年，国王雅盖洛的兄弟塞维尔王公斯维德里盖洛同契尔尼戈夫大主教、僧侣，以及六位王公和许多契尔尼戈夫和谢维尔的领主及其侍役一起"投奔"了莫斯科。怎样解释这样大规模的"投奔"呢？事情是这样的：从 1385 年波兰与立陶宛合并为一国的克列沃联合时起，波兰的影响和天主教势力在立陶宛加强起来。如果说过去明多夫格、格季明和奥尔格尔德在位时侵占罗斯国土的文化落后的立陶宛曾处于罗斯文化的影响之下，那末如今波兰—天主教的影响正在加强。

罗斯文化、罗斯语言、罗斯制度和风俗习惯、罗斯东正教，过去曾在立陶宛占支配地位。许多立陶宛王公和封建主罗斯化，信奉东正教。而如今精力充沛而贪婪的波兰领主和天主教僧侣们正力

图把立陶宛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向立陶宛灌输波兰文化、语言和天主教。

首先波兰化和天主教化的是立陶宛王公和封建上层。信奉东正教的维托夫特成了天主教徒。所有的罗斯人都开始遭到迫害。罗斯王公、领主受排挤，屈居次要地位。罗斯化的立陶宛王公、领主也同他们一起遭受迫害。开始最深切地感觉到与阶级压迫相交织的新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的是普通人民——农民和市民。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感到了由于波兰势力的加强在立陶宛公国中所发生的变化的全部沉重性。农民受奴役的程度加深，落在农民（“荷洛普”）和城市平民（“黎民百姓”）身上的税赋变得力不胜任了。

在立陶宛的罗斯领地上有不少罗斯王公和领主以及罗斯化的立陶宛人，他们清楚地懂得：他们的地位随波兰势力的加强而下降，波兰人和波兰化的立陶宛人——天主教徒们占据了信奉东正教的王公、领主和“小贵族”[1]的位置。所以立陶宛境内罗斯地区的封建主和人民群众都不满于克列沃联合，因为它打开了波兰领主和天主教教会在立陶宛大公国占统治地位的道路。维托夫特受其女婿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支持，也反对克列沃联合，并得以把联合几乎化为乌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城市格罗德诺、布列斯特、波洛茨克、基辅等城在他同波兰作斗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维托夫特绝不想对自己的罗斯臣民让步。依靠当地某些阶层和罗斯领主，维托夫特取消了罗斯化的格季明后裔立陶宛王公的大部分领地。尽管他在国家行政中央集权化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远不如莫斯科王公的成就大，但是封邑王公和一部分领主明显

---

[1] 原文作 шляхт—— 这是立陶宛和波兰对相当于罗斯新兴贵族的小公职人员的称呼。

仇视日益加强的立陶宛的维托夫特大公政权，他们实质上始终是分立主义和封建割据的拥护者。尽管莫斯科王公敌视分立主义，其统治公国的全部思想基于消灭分立主义、清除封建割据、使封邑王公屈服、合并各地和使政权中央集权化，但从立陶宛来"投奔"他的王公和领主同他的冲突还只是潜在的，所以当时他仍是斯维德里盖洛和所有立陶宛的罗斯王公、领主的誓不两立的敌人、天主教徒"波兰人"维托夫特的敌对者。这就是促使斯维德里盖洛及其拥护者投奔莫斯科的客观情况。

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在立陶宛统治下的罗斯地区很有声望的强大同盟者的到来十分高兴，他把弗拉基米尔、佩列雅斯拉夫尔、尤里耶夫、勒热夫等城赐给他作为"食邑"。1408 年 9 月，瓦西里和斯维德里盖洛率领自己的团队出征，攻打维托夫特。维托夫特的波兰—立陶宛—德国军队与他们相遇于乌格拉河上，但是没有再次交战，因为敌对的双方讲和了。斯维德里盖洛不满于这样的结果，因为他指望借助瓦西里恢复过去在立陶宛的统治，1409 年他又"回到"立陶宛去了。

在乌格拉河上的接触之后，维托夫特变得更谨慎些了，他停止向莫斯科进攻。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其在位末期同其岳父恢复了友好关系。

维托夫特与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之间缔结的暂时联盟引起条顿骑士团骑士的多次侵略行动。

罗斯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的联合力量使 15 世纪初条顿骑士的侵略遭到毁灭性打击。日穆季①起义成了斗争的信号。起义的日穆季人把号召人们起来同德国侵略者作斗争的文书分别寄送到各处。他们指出，骑士们"不是为上帝寻找灵魂，而是为自己寻求我们的土地"。

① 日穆季——立陶宛的一个省，过去曾住有立陶宛的日穆季部落。

条顿骑士不仅威胁到立陶宛，而且也威胁到波兰。当时已成为波兰国王的雅盖洛与维托夫特出兵攻打德国骑士。

1410年7月，在离坦嫩贝格不远的一个小地方格伦瓦尔德，雅盖洛和维托夫特的军队与骑士团军队相遇。在这次决定波兰、立陶宛和纳入两国版图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各地命运的战役中，克拉科夫、波兹南、格涅兹诺(Гнезно)的波兰人，特罗基和日穆季森林的立陶宛人，斯摩棱斯克的罗斯人，喀尔巴阡山脉和第聂伯河沿岸的乌克兰人，波列西耶和波洛塔河沿岸的白俄罗斯人，以及布拉格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全都并肩作战。在51面波兰军旗中有7面乌克兰军旗，即：1面利沃夫军旗、1面彼列梅什尔军旗，1面加利奇军旗、1面霍尔姆军旗、3面波多利耶军旗。在40面立陶宛军旗中乌克兰、白俄罗斯、罗斯各地招募的军队的军旗占36面。在这些军队中有从德罗吉钦、格罗德诺、罗夫诺、克列梅涅茨、斯塔罗杜布、维捷布斯克、波洛茨克、斯摩棱斯克和罗斯西部其他各地来的战士。

扬·日日卡(未来的胡斯军队统帅)率领的捷克和摩拉维亚士兵在雅盖洛的第4和第49团作战。参加作战者还有鞑靼人。这样，我们就看到波兰—立陶宛军队大部分由罗斯战士组成。除了雅盖洛和维托夫特的罗斯臣民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罗斯人外，普斯科夫人和诺夫哥罗德人也参加了维托夫特对（德国）骑士团的出征。有间接资料述及维托夫特军中有从特维尔地区和莫斯科地区来的个别战士。骑士团的人数超过35 000人，其中重骑兵不少于16 000人。波兰人、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联军，包括捷克人和鞑靼骑兵，总数不超过5万人。

德国军队以其重骑兵队，大炮和投射器驰名，而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罗斯人多半为步兵——武装起来的民兵。立陶宛、日穆季、罗斯战士以刀、斧、棒槌、粗棍子、镰刀为武器。他们相当艰难地同

穿铁盔甲、武装精良的德国骑士作战。只有立陶宛、罗斯王公的亲兵队和波兰骑士，武装得较好，并与德国骑士相比毫不逊色。条顿骑士在装备方面优于联军，但是联军是为保卫自己的土地，保卫家乡的森林和草地、田野和庄稼地，为自己的家庭而战，为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化、风俗习惯、制度和法律而战，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的荣誉和生命而战。与民兵、与人民争取胜利、自由、独立的意志对抗的是受过严格训练、武装到牙齿、组织严密的骑士团。

统率联军的是尽管特别有心计但谨慎得近乎胆怯的波兰国王雅盖洛，坚毅、勇敢的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具有军事天才和智慧的克拉科夫总督津德拉姆·马什科夫斯基，和父亲为立陶宛人的罗斯将军尤里·卢格维尼耶维奇，王公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指挥骑士的是骑士团首领乌尔里赫·冯·云金根本人，以及骑士团最高级团员库诺·冯·利赫腾什坦和骑士团元帅弗里德里赫·冯·瓦尔罗德。

7 月 5 日，波兰—罗斯—立陶宛联军离开契尔温斯克附近 自己的营地，向骑士团领地前进。雅盖洛沿途派人与骑士团首领谈判，向他提议讲和，但是骑士团首领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决要作战。

7 月 13 日，联军攻克被德国人侵占的杜布罗夫纳堡，向东方柳边湖(即劳边湖)推进。7 月 14 日晚，条顿军队接近格伦瓦尔德村和坦嫩贝格村。雅盖洛和维托夫特的军队驻扎在离柳边湖几公里处。

双方准备交战。在战斗前夕，即 7 月 14 日深夜，可怖的雷电大作。清晨日出时，骑士们不等土地变干就转入进攻。雅盖洛把指挥权交给维托夫特和津德拉姆·马什科夫斯基，自己靠边。波兰人、罗斯人和立陶宛人占据了森林边缘。在他们前面是一大片原野，西面是处女林。波兰—罗斯—立陶宛军队拉开很大的距离

分布开来，其边缘触及岸边覆盖着密林的湖泊和沼泽。这就使骑士难以从两侧包抄敌人。

立陶宛各团占据右翼，其最边缘的队伍驻扎在柳边湖附近。罗斯各团，其中包括斯摩棱斯克各团，驻扎在靠近中央处，其边缘驻有立陶宛人和鞑靼骑兵。津德拉姆·马什科夫斯基指挥的波兰军队驻扎在左翼。在靠近中央的波兰军队中包括有罗斯各团，即：加利奇、波多利耶等团。联军组成三条平行线，以便在被突破时进行防卫。

骑士们占据着较有利的阵地，他们驻扎在丘岗上。在骑兵队前面为炮队，再后为步兵。库诺·冯·利赫腾什坦指挥右翼，弗里德里赫·冯·瓦尔罗德指挥左翼。在后面远方的格伦瓦尔德村附近，驻扎着排成圆圈的辎重车队和后备军。

中午时分，两军结束了战阵布置。雅盖洛无论如何也不下令作战。乌尔里赫·冯·云金根想诱敌出战，把雅盖洛和维托夫特的军队从其驻扎的多沼泽、长满树林的草地上诱出来，他派急使到波兰国王处，侮辱他的尊严，蛮横无礼地向他挑战。维托夫特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开始应战。维托夫特的立陶宛和鞑靼骑兵进攻冯·瓦尔罗德的骑士军队。德国炮队的圆形炮弹没能伤害他们，石炮的轰隆声没能使他们的马受惊。

就在那时，冯·利赫腾什坦进攻津德拉姆·马什科夫斯基所指挥的左翼。

右翼的情况愈来愈糟。联军武装得很差、最弱的各团没能击溃冯·瓦尔罗德的骑士。不管维托夫特怎样鼓励自己的立陶宛人和鞑靼人，他们还是在骑士队的攻击下坚持不住，开始后退了。冯·瓦尔罗德深信能歼灭敌军，便让自己的骑士集中追击逃跑的立陶宛人和鞑靼人。

但是维托夫特军队的左翼没有动摇，没有逃跑。这里有罗斯

斯摩棱斯克的三个团。如果他们也逃跑，那就将意味着联军的完全失败，因为波兰人将从没有防御的后方和从右翼受到攻击。波兰编年史家德卢戈什写道："在这次战斗中，从斯摩棱斯克地区来的罗斯战士，在各自的三面军旗下顽强作战，只有他们没有参与逃跑，他们是值得赞扬的。因为尽管对一面军旗的进攻最为激烈，后来军旗简直被压到地上，但是其余两个团像男子汉和战士般顽强作战，成为战胜者……最后，与波兰部队汇合起来。"

勇敢、机智的尤里·鲁格维尼耶维奇指挥的三个斯摩棱斯克团的英勇抵抗挡住了德国人的攻击。不少斯摩棱斯克人被砍死，不少斯摩棱斯克战士在同骑士团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骑士团没有成为战场上的主宰者。斯摩棱斯克人不仅阻挡了德国人，而且得以集中自己的一部分战士去援助维托夫特，从一侧攻击骑士团，使立陶宛人的逃跑暂时停止。这就使各团有可能重新建立队列。

取得指挥的主动权后，维托夫特利用斯摩棱斯克人的英勇抵抗，把第三线的若干部队集中到右翼去援助斯摩棱斯克人。这支增援部队使骑士团完全失去了击溃斯摩棱斯克人的可能性。

不久，维托夫特集中波兰部队迂回到格里温瓦尔德村。波兰人突然走出森林，攻击骑士团侧翼。回到战场上的立陶宛人和鞑靼人迅猛进攻德国人，立陶宛大公的乌克兰各团跟随他们冲向坦嫩贝格村。

下午5时，德国人的进攻显著减弱，许多德国骑士已经阵亡。甚至连来到冯·利赫腾什坦处的后备军也不能挽救局势。日暮时，德国人开始退往坦嫩贝格村和格伦瓦尔德村。只有冯·利赫腾什坦一军后退，因为冯·瓦尔罗德的军队已不复存在了。后退很快就变为逃跑。

傍晚时，冯·云金根决定集中全力攻击敌人中军，以拯救骑士

团。骑士团重骑兵纵队成楔形猛攻联军中军。激烈的肉搏战决定着战斗的命运。

在这次可怖的械斗中，那位伟大的骑士团团长本人也阵亡了。立陶宛军的猎熊矛刺穿了他的脖子。骑士团残兵聚成一团，拼死战斗，进行防御。从这里，从这一堆人的肉体上传来大镰刀的咯咯响声、剑的呼啸声、猎熊矛的敲击声；斧头叮当作响，立陶宛人的长剑、鞑靼人的弯刀、罗斯战士的锤矛闪烁着光辉。一些时候过去了，骑士军被彻底歼灭。成群或单身的骑士带着自己的雇佣兵向马连堡逃命。一部分骑士企图跑到辎重队躲避，但辎重队也被摧毁，骑士们全被歼灭了。

天色开始昏暗。早晨曾为骑士团首领大本营所在地的丘岗上，站着雅盖洛和维托夫特。骑士军的精锐部队被歼灭了。

罗斯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以极大的努力和极大的牺牲作为代价，歼灭了条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的军事力量被消灭了。在这次战斗中，波兰人、罗斯人和立陶宛人以自己的充满必胜信念、立志保持本族人民独立的民兵，以自己的军事艺术，以自己的坚忍不拔和英雄主义与骑士团骑士的本领、装备、组织和纪律相对抗。格伦瓦尔德决定了同条顿骑士战斗的各族人民的命运，而罗斯斯摩棱斯克各团的战斗品质和英勇，坚忍不拔和守纪律精神则预先决定了格伦瓦尔德战役的结局。德国人“对东方的冲击”第二次被同波兰人、立陶宛人、捷克人并肩作战反对共同敌人的英勇的罗斯战士所阻止。莫斯科王公也参加了立陶宛对条顿骑士团的斗争。

莫斯科王公自古以来依靠教会，始终有都主教这个强大、精力充沛的助手。但是当时的罗斯东正教教会被立陶宛和罗斯所分割。罗斯的都主教为出身于不里阿耳人的基普里安，按照政治上的爱憎，他是个为满足教会统一的要求不惜出卖罗斯国家利益的“立陶宛人”。他想使教会政策摆脱大公政策，成为包括立陶宛

罗斯在内的“全罗斯”的都主教，而不仅是莫斯科的都主教。他尽力设法依靠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来实现如下思想，即都主教机构不是罗斯的宗教机构，尤其不是大公政策的工具，而是“全世界的”东方教会的机构。当他的利益与大公的利益一致(例如，在诺夫哥罗德的“大主教法庭”等问题上)时，他就帮助瓦西里，但是他经常依靠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威望出来反对瓦西里。因此在立陶宛的事情上，曾经也是基辅都主教的基普里安都主教不仅没有帮助瓦西里，甚至还阻碍他。基普里安不反对缔结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联盟。值得注意的是，基普里安之死(1406年)与瓦西里和维托夫特的断交是同时发生的。基普里安的继任者福季在其就任之初也不顾及罗斯的民族利益，力图达到罗斯东西部教会的统一。

因此，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位期间莫斯科王公与教会的旧联盟开始破裂。

国土分裂为属于卡利塔后裔，属于大公的兄弟们和其他亲属们的封邑一世袭领地，是与正在形成的统一国家和政权的中央集权化根本对立的。只有坚决取消按照王公遗嘱划分封邑一世袭领地的原则本身才能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由于封邑制度，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同自己的叔父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他的封邑几乎在莫斯科公国内部成为独立的公国），同自己的兄弟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和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均有矛盾。

15世纪初，合并和废除封邑公国的过程在梁赞大公国和特维尔大公国中已经结束；而在莫斯科公国实质上的封建割据才刚开始。直到14世纪末为止，莫斯科公国的统一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公国内经济联系的高度发展；缺乏可成为小公国首府、奠定封邑基础的大城市；在争取扩大和加强莫斯科公国以及在“统一罗斯”过程中争领先地位的艰苦斗争中保持政权“统一”的意图。

如果按照遗嘱，兄弟们各得一份收入和土地，那末“缴纳赋税的人民”就不进入分配，长兄被认为“继承父位”，死去者留下的“无人继承的”领地就变为公共世袭领地。

14世纪末，莫斯科吞并了许多在经济上相当独立，同莫斯科的联系薄弱，由一些可以充当新兴封邑“首府”的相当大的城市领导的封邑领地。

除旧有的谢尔普霍夫封邑外，15世纪初增加了由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普霍夫斯基的子孙统治的韦列伊斯克封邑公国和莫扎伊斯克封邑公国。当然，这些公国都不大，他们的领主没有旁人的帮助不能给莫斯科王公造成损害。

按照顿河王德米特里的遗嘱分归其第二子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加利奇公国（加利奇·梅尔斯基或加利奇·科斯特罗姆斯基）则不同。它人口稠密，位于肥沃多产的土地，以开采盐驰名，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封建的“独立的半国家”（斯大林语），其王公自然力图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莫斯科公国内政治生活中的领先地位。

这一切表明：危机迫近了，源于过去的旧的封邑制度及其固有的按照家族长幼（由长兄传给次弟）的继承制度与有统一的“国土”、领地和政权，王公之位由父亲传给长子的新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

不仅在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亲属——王公们中间，而且在领主圈子中也有不少过时的旧制度的拥护者。在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谘询机构领主议会（杜马）中，新领主有特殊力量，这些新领主拥护对立陶宛和金帐汗国采取坚决行动和加强大公政权，他们用文献资料与“旧领主”相对抗。

当以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兄弟尤里（当瓦西里在世时他就表现出自己是新制度的敌对者）为首的旧的封邑封建分子再

次企图转入进攻时，这些新领主便为瓦西里的继任者效力。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知道尤里敌视新制度，知道按顿河王德米特里遗嘱按老规矩不由其子，而应由其弟尤里继任大公位，于是便于1423年派福季说服维托夫特同意自己立的遗嘱，在其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与其叔尤里的未来冲突中，让他前来援助自己的外孙。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不顾及金帐汗，甚至不要他的批准，独立解决了大公之位的继承问题，并以此表明了自己对金帐汗国的态度。但是他知道：他的儿子瓦西里将面临连续不断的艰苦斗争。这就是他在遗嘱中写上“上帝赐予我儿大公之位”的原因。

1425年，在“瘟疫”——流行病盛行时，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死于某种不明的疾病。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儿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成为其继位者。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位期间(1425—1462年)，莫斯科公国成了1425至1453年的内讧场所。以封邑王公为首的旧的过时的封邑—世袭领地制度、封建割据制度，对新的政治开端——有强大王公政权、后来又有沙皇政权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国家进行了最后一战。

只在1425—1453年内讧之后，新的政治制度才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此之前，莫斯科公国中还没有铲除封邑制度，尽管事件进程本身(逐渐)使废除旧封邑原则的王公之位继承原则建立起来。在封邑王公中，王公之位不是从父亲传给儿子，而是按照统治家族中居长的原则进行传位。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后裔人数较少，这就使莫斯科公国被分割为封邑的程度较小，尽管这些封邑14世纪时还存在，15世纪初甚至得到加强。

在莫斯科公国中，按照遗嘱传位的制度被固定下来。按照遗嘱，王公通常把大公宝座或“首位”传给长子，而把封邑和公国公共

收入中的一定份额赐给其余诸子，诸弟要服从于除大公外还拥有公国全部领地中最大最好一份的长兄。迄今为止由于王公家族人数较少尚未发生遗产纠纷。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留下遗嘱把王公宝座交给长子尤里，尤里死时无子，他的长弟伊万·卡利塔自然成为王公。卡利塔留下遗嘱把王公宝座交给长子谢苗。谢苗死时也无子，伊万便成为王公，他死时把王公宝座遗交给长子德米特里。因此很难说什么样的原则在继承王公之位时占支配地位。形成了这样的情况：王公之位按照遗嘱由父亲传给儿子，而当王公无子时，则由长兄传给长弟。

到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死去时，正如我们已指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10岁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都主教福季和莫斯科领主们的监护下在父亲死后登上王公宝座时，他的叔父加利奇·梅尔斯基王公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自己没能继任莫斯科王公感到受屈(至少对于向往封邑制度，向往与此相应的按照家族中居长地位继承王公之位权利的这位王公来说，似乎受了委屈)，他便于当天夜里跑回加利奇，开始准备同其侄儿作战。过时的封邑旧原则与导致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新原则之间的斗争从此开始。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主张旧原则，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福季和在他们周围构成一座坚实的墙的莫斯科领主们主张新原则。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其他几个叔父彼得、安德烈和康斯坦丁也站在他一边。福季提议讲和，但作为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死后家族中的长者觊觎莫斯科王公宝座的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只同意暂时停战，而连这一点也是在维托夫特的压力下才达成的，因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曾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维托夫特。这时，立陶宛的势力总的说来得到加强，它迫使诸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同它“照旧规矩”签订了“和约”。

互相敌对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各自为政，它们都没有

强大到足以反击不速之客维托夫特，此外，加以莫斯科统治上层内部的分裂——所有这些情况就造成立陶宛干预罗斯事务和立陶宛势力的发展。

由于维托夫特的干涉，1428年尤里被迫承认瓦西里的居长地位，从此承认他为“兄”，答应一定不觊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莫斯科的”“世袭领地”，不觊觎其“大公之位”。

此外，为了预防迫近的内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采用契约制度使封邑王公们互相约束。

但是和平是短暂的。1430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支持者都主教福季死亡，同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外祖父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也去世了，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姻亲斯维德里盖洛登上立陶宛大公宝座。

尤里乘机与侄儿绝交。叔侄俩的纠纷必须由金帐汗来解决。瓦西里的领主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弗谢沃洛日斯基见机行事，收买了鞑靼贵族。1432年当尤里在金帐汗国法庭援引关于长系继承权的旧文书和旧习惯时，弗谢沃洛日斯基拿出新制度和新法令来与之对抗。这位领主公开嘲笑旧制度，用“汗的恩典”和鞑靼贵族的偏袒来加强自己的理由。弗谢沃洛日斯基成为这场争执的胜利者，因为他有足够多的支持者和金钱来影响金帐汗的决定。尤里一无所获地回到了加利奇。弗谢沃洛日斯基指望由于自己的“效力”取得瓦西里的“恩宠”，因瓦西里派他到金帐汗国去时，曾答应娶他的女儿为妻。但当弗谢沃洛日斯基带来在金帐汗法庭取得成功的消息时，瓦西里没有遵守诺言，他把联姻这样的重要外交手段留着以待良机。于是因受拒绝而备感受辱的斯摩棱斯克王公后裔弗谢沃洛日斯基“投奔了”尤里。新的内讧即将发生。导致内讧的导火线为如下情况。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结婚宴会。瓦西里举办了自己同玛丽亚·雅罗斯拉芙娜·谢尔普霍夫斯卡娅的婚礼。尤

里的儿子瓦西里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参加了宴会。瓦西里·尤里耶维奇戴着饰以宝石的华美金带。领主彼得·康斯坦丁诺维奇对索菲娅·维托夫托芙娜说，这条金带怎么能归瓦西里·尤里耶维奇戴呢，根据权利它应当归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戴。愤怒的索菲娅从瓦西里（·尤里耶维奇）身上揪下金带，受侮辱的（瓦西里·）尤里耶维奇马上离开了莫斯科。这个插曲便是战争的导火线。

1433年4月，尤里打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尽管瓦西里曾从商人、苏罗日客商和其他市民中招募了人民武装。（占领莫斯科的）胜利者尤里听其领主谢苗·莫罗佐夫的劝告把科洛姆纳给予战败的瓦西里。瓦西里·尤里耶维奇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清楚地懂得：如今已不是能无阻碍、不受制裁地让在莫斯科扎根很深的大公"退位"的时候了，因此他们竭力反对父亲，劝他杀掉瓦西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摆脱瓦西里。但是尤里没有听从他们。瓦西里迁往科洛姆纳的后果很快就表现出来。

正如编年史编撰者所指出的，王公们、领主们、将军们、"自由侍从们""络绎不绝从莫斯科前往科洛姆纳"。他们不仅从莫斯科，而且还从其他各城市不断走向科洛姆纳大公处。他们的封邑公国和世袭领地也随着他们"被吸引"到科洛姆纳。编年史说领主们和各种"自由侍从"迁往科洛姆纳的原因是：他们说，他们不习惯于为加利奇王公们效劳。但是问题不在于此。莫斯科领主、"附庸"王公、"自由侍从"和其他官宦集团习惯于在莫斯科起领导作用，习惯于为最强大、富有的莫斯科大公服务。在莫斯科他们有自己的府邸、庭院，有众多的家仆、侍役、奴仆。他们的世袭领地分布在莫斯科周围。他们习惯于为自己的王公"效劳"，在领主议会（杜马）上同他决定一切问题。每个新王公，即前任王公的继位者和儿子，当然不得不依靠"自己父亲的侍从"，即"附庸"王公、领主和新兴贵族。为瓦西里的父亲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效劳的领主有：费奥多尔·

安德烈耶维奇·科什卡及其儿子们伊万、费奥多尔、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谢苗诺维奇·热列布措夫，伊利亚·伊万诺维奇·克瓦什宁，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韦利亚米诺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切利亚德尼亚，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舍亚，丹尼尔·费奥法诺维奇·普列谢耶夫和斯捷潘·费奥法诺维奇·普列谢耶夫——以上这些领主全是莫斯科有势力的显赫领主家族罗曼诺夫、热列布措夫、克瓦什宁、切利亚德宁、舍因、普列谢耶夫等家族的始祖。如今他们及其儿子们为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效劳。正如我们在后文所看到的，莫斯科领主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普列谢耶夫、伊万·尤里耶维奇·帕特里克耶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斯特里加—奥博连斯基、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萨布罗夫、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扎博洛茨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奥谢拉、米哈伊尔·雅科夫列维奇·鲁萨尔卡、谢苗·莫罗佐夫等人在莫斯科公国的封建战争时期起了重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习惯于掌权和执政，在罗斯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安于自己的新处境。情况是这样的：当王公宝座按家族中居长原则由长兄传给长弟时，以往的封邑王公带着自己的宫廷人员、包括其领主和宫廷侍从来到莫斯科，这些新来的领主、宫廷侍从就把原来的莫斯科领主排挤到了次要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莫斯科领主和宫廷侍从支持由儿子继承父亲的新的继位制度的意向就十分清楚了，在新的继位制度下他们在大公宫廷中和领主议会(杜马)上的地位和势力能得到发展和巩固。莫斯科封建主大批迁往科洛姆纳作为对尤里占领莫斯科的答复。莫斯科领主、将军、宫廷侍从、“自由侍从”以此来强调自己对新的政治制度的拥护。

瓦西里·尤里耶维奇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看到他们的担心是正确的，便杀死劝尤里把科洛姆纳给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的谢苗·莫罗佐夫，而他们自己害怕父亲的愤怒，从莫斯科逃走了。被莫斯科的领主、将军、宫廷侍从所离弃、受到宗教界敌视的尤里，不得不同他的侄儿和解，“因为他的大公之位不稳固”。他同侄儿缔结和约，承认其侄的“长房地位”，而自己只在五名侍从伴随下回到加利奇去了。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和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之间协议的条款之一是：尤里方面有义务“不接受其儿子们到自己处，并且不给予他们帮助”。尤里的长子瓦西里·尤里耶维奇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孤立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开始攻打他们，但是在其堂兄弟的军队中有不遵守诺言的其叔父的团队。1434年，瓦西里在罗斯托夫地区第二次被打败，但仍与第一次相同，尽管他与尤里交锋时似乎战败了，但他却终于成为胜利者。尽管战败的瓦西里不得不先逃到大诺夫哥罗德，后来又逃到下诺夫哥罗德，并已准备去金帐汗国求援，尽管还在1433年就已被他通过契约与谢尔普霍夫一博罗夫斯克王公瓦西里·雅罗斯拉维奇一起约束住的他的亲族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莫扎伊斯基和米哈伊尔·安德烈耶夫·韦列伊斯基投靠到尤里方面(他们与尤里签订了“最后文书”，承认尤里为大公)；但是瓦西里还是再次成为斗争的胜利者。1434年6月5日，尤里突然死去，其长子瓦西里·尤里耶维奇夺得莫斯科大公宝座。他的两个兄弟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和德米特里·克拉斯内不承认他的夺位，请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同他们签订了条约，按照条约他们取得了封邑。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得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敌对者驱逐出莫斯科，1435年流亡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再次登上莫斯科“宝座”。

战败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突然成为胜利者并重新占据莫斯科宝座，似乎令人感到很奇怪。但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他本人是新的政治制度的代表，是正在形成中的君主专制政权领导

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代表，“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恩格斯语）。领主、服役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支持他，反对他的只是封邑王公及其最亲近的侍从。不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取得了胜利，而是领主、服役贵族、教会、城市、工商区人民取得了胜利，新的政治关系取得了胜利。敌人知道旧封邑制度末日到来，采取最激烈和最坚决的斗争方式尽力设法维持自己的地位，但自己内部的纷争使瓦西里轻易地取得了胜利。

瓦西里·尤里耶维奇逃到诺夫哥罗德，从那里反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但未能成功，于1435年被迫同大公签订了和约。他承认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领导地位，他没有取得自己的旧封邑，而取得了新的封邑——德米特罗夫。大公把新的封邑赐给自己的战败者，其目的在于不让他们有可能在封邑中根深蒂固，不让他们强大起来和在居民中树立威望。在此场合下，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瓦西里·尤里耶维奇不同意这种办法，到第二年他已开始为自己的加利奇“世袭领地”作战。占领科斯特罗马后，他向加利奇推进，兼并了“加利奇宫廷”即加利奇领主和宫廷侍从。维亚特卡人也与他联合。进行抵抗的乌斯秋格在他攻占后被毁坏。瓦西里·尤里耶维奇的出兵使德米特里·舍米亚卡蒙受嫌疑，他被监禁于科洛姆纳。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同德米特里·克拉斯内、伊万·莫扎伊斯基和从立陶宛“出来”为莫斯科效劳的友好王公伊万·巴巴一起出征自己的敌人。瓦西里·尤里耶维奇战败后被俘，他的同盟者维亚特卡人尽管收了赎取被他们俘获的大公的将军亚历山大·布留哈特的赎金，却仍将将军带走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为进行报复下令刺瞎了瓦西里·尤里耶维奇。眼睛被刺瞎后外号“斜眼”的瓦西里·尤里耶维奇的暴风雨般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他退出政治斗争后，一直活到1448年。

莫斯科王公之间内讧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莫斯科公国由于内讧而削弱，大公政权遭到了损害。莫斯科不受到重视，大公的威望衰落。梁赞和特维尔的独立性加强，特维尔明显转向立陶宛大公。立陶宛的势力加强：1430 年在特罗基的维托夫特宫中举行的著名加冕典礼上，参加的来宾中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都主教福季，还有特维尔王公和梁赞王公。

这个时期也是企图按照教会组织系统把莫斯科纳入罗马教皇势力范围的时期。问题在于罗斯的都主教经常由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从希腊人中委派。希腊人来到莫斯科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大公有共同语言。但是在福季死后，出身于希腊人的伊西多尔来到莫斯科，他决定使罗斯东正教教会服从希腊教会利益，并且总的说来服从拜占庭帝国的利益。

当时衰弱的拜占庭处于灭亡的边缘，很难抵御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几乎已夺取了拜占庭帝国位于小亚细亚的全部土地。土耳其人已追近君士坦丁堡城下，而拜占庭没有力量打退他们。拜占庭的危急局势迫使它在对抗土耳其的斗争中向西欧天主教各国国王求援，为了得到援助，拜占庭东正教教会事先得到了罗马教皇的支持。1439 年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会议，通过决议要求东正教教会合并于西方天主教教会，并听从教皇控制。教会合并对拜占庭是必要的，因为它想通过这个途径来依靠西欧天主教国家同土耳其人作斗争。但是当伊西多尔去佛罗伦萨参加会议，并从那里以合并的教会的教徒和教皇代表(全权代表)的身分回来时，罗斯领主、宗教界和王公自然认为他的行为是背叛。的确，合并使罗斯对西欧各国处于依附地位，合并后的教会是西欧天主教势力在正形成中的俄罗斯国家境内的最好传播者。当时莫斯科正面临创建既不依附于“拉丁人”(天主教徒)，又不依附于“伊斯兰教徒”(穆斯林)的俄罗斯国家的任务。与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相适应，必须有独立的教

会。因为伊西多尔的政策与这个原则相抵触，阻碍独立自主的教会的加强，违反他的前任们的传统政策，所以他被宣布为“拉丁人”、“异端分子”，被从都主教的宝座上赶下来，监禁在楚德修道院。以教皇代表身分号称红衣主教的伊西多尔，带着教皇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信从佛罗伦萨会议回到了罗斯，他的使命以完全失败告终。罗马教廷想用教会合并的罗网套住罗斯的企图失败了。按照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命令召开的罗斯宗教界的会议推举梁赞大主教约纳为都主教，后来，约纳死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不经会议就委任费奥多西为都主教。从这时起，罗斯教会脱离了君士坦丁堡的合并的教会，重新成为国内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

一系列新战争爆发、莫斯科开始内讧新阶段时的复杂、不利局势就是如此。但这一次鞑靼人、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都干预了莫斯科。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同诺夫哥罗德曾建立和好关系。这个谓彻城市同他签订了“条约”，但大公征收贡税和“黑博尔贡税”，事情便常导致战争冲突。被瓦西里从科洛姆纳释放回到其封邑的舍米亚卡利用了这一情况。他加入诺夫哥罗德人一方，但于1440年战败，被迫同大公签订了和约。

当时，从衰落的金帐汗国中分裂出来的各地区统治者，在寻求新土地时愈来愈迫近莫斯科。1438年，兀鲁—马合木汗占领别列夫，向莫斯科王公挑衅。瓦西里向别列夫出动军队作为答复。除别列夫外，又夺得了喀山和下诺夫哥罗德的兀鲁—马合木成为胜利者，他在下诺夫哥罗德一直坚持到1445年。兀鲁—马合木利用罗斯的削弱，1439年进抵莫斯科，但没能占领它。1444年，木思塔法汗进攻梁赞。被严寒从干枯的草原赶出来的木思塔法想在梁赞地区过冬，于是鞑靼人蹂躏了这块地方，俘走了罗斯人，被俘者必须缴纳高额赎金才准赎回。瓦西里派出军队在王公奥博连斯基

和安德烈·戈尔佳耶夫的指挥下去攻不速之客，受到梁赞步兵、梁赞哥萨克（顺便提及，这是第一次提到罗斯哥萨克）和莫尔多瓦滑雪队士兵的援助。鞑靼人被击溃，木思塔法本人战死。兀鲁一马合木发动新的侵袭作为对木思塔法战败的答复。

为数众多的强大的各支鞑靼军队迁往罗斯边区寻求土地，他们不仅想侵袭，也想为大公“效劳”，结果便出现了大公能依靠的新的力量。这些人就是“有军职的鞑靼宗王”和“汗国王公”及其贵族、仆从和士兵。例如，宗王别儿迪答忒那时就已为瓦西里效劳。

攻打兀鲁一马合木的新的远征没有成功。1445年7月6日，在同鞑靼人作战时，瓦西里战败被俘。莫斯科得知军队战败、王公被俘后，惊慌起来。人们等待鞑靼人的袭击。就在那时，7月14日突然发生一场大火。由于火焰冲天和可怕的灼热，内城城墙裂开和倒塌了。王公家族和领主们离开毁坏和冒烟的莫斯科，让市民自己去同灾难和日益迫近的鞑靼人的袭击威胁搏斗。

正如脱脱迷失时那样，普通“黎民百姓”、市民再次成为自己城市的爱国者。为了在此紧急时刻不让惊慌情绪在莫斯科居民中间传播开来，他们阻止胆怯的逃跑者，把他们押送回来痛打，戴上镣铐。“黎民百姓”、城市贫民，不能像贵族那样逃离，他们无处可去，必须操心城市的保卫工作，并且通过一些坚决措施使惊慌失措情绪平息下来。“黎民百姓”同押送回来的逃跑者一起开始兴建城市的防御工事，他们砍伐树林，为遭火灾的人建筑新屋。莫斯科的“黎民百姓”、市民再次表现出自己是本土、本城的真正坚定爱国者，他们甚至在莫斯科变为冒烟的废墟，被王公、领主离弃的时候，也没有陷入惊慌，而是准备反击敌人。

得知市民们的准备后，兀鲁一马合木下不了决心前往莫斯科，他回到下诺夫哥罗德，又从那里返回库尔梅什去了。当时舍米亚卡

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在同鞑靼人进行带来厄运的战斗前夕，舍米亚卡拒绝支援瓦西里，而如今他却指望成为大公。但事情却向另一方向发展。缴付了巨额赎金（编年史上记载的数字为20万卢布）后，瓦西里被释放，并同兀鲁一马合木签订了友好条约。由于在封建内讧中失败，并为寻找强大的宗主国君主，许多有军职的鞑靼宗王同瓦西里一起来到罗斯。将被大公用于同鞑靼人斗争的“鞑靼军职人员”的来到莫斯科，加强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力量，但是却又激起反对他的不满情绪。要善遇（投奔来的）鞑靼人，然而鞑靼人的骚扰、袭击、残暴和征收贡税在人们的头脑里记忆犹新。此外，为赎回瓦西里所付“赎金”的全部重担首先落在市民和商人身上。在领主、莫斯科商人和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僧侣们中，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种不满情绪为舍米亚卡所利用。

一些流言在莫斯科传播开来，人们说：瓦西里把鞑靼人带来并不是没有用意的，他好像已答应把整个公国出卖给兀鲁一马合木，等等。领主伊万·斯塔尔科夫和尼基塔·康斯坦丁诺维奇成为舍米亚卡所操纵的阴谋的主持者。1446年2月，瓦西里启程到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2月12日，舍米亚卡乘机同投靠到他这边的伊万·莫扎伊斯基一起占领了莫斯科，第二天又采用狡计冲进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瓦西里被擒获后押送到莫斯科，并被弄瞎了眼睛。从那时起，“失明者”的绰号便为他专有。

瓦西里和他的妻子被放逐到乌格利奇，他的母亲索菲娅·维托夫托夫娜被遣送到楚赫洛马。瓦西里的儿子伊万和尤里原来躲藏在逃往穆罗姆的王公里亚波洛夫斯基家族处，但这时舍米亚卡又用狡计，把他们从穆罗姆诱出，遣送到乌格利奇其父亲处。许多拥护瓦西里的王公、领主们，见他已失败，便逃往立陶宛。“投奔”立陶宛的有王公瓦西里·雅罗斯拉维奇、谢苗·奥博连斯基，“自由侍从”费奥多尔·巴谢诺克。他们从立陶宛大公处得到一系列

城市，即布良斯克、戈梅利、斯塔罗杜布等城。

当时里亚波洛夫斯基家族见他们受了舍米亚卡的欺骗，便在穆罗姆召开了领主议会。参加这次领主议会的有拥护瓦西里的王公斯特里加—奥博连斯基，领主伊万·奥谢拉、博布尔、尤什卡·德拉尼察、鲁萨尔卡、鲁诺等人。领主议会通过决定向乌格利奇进军，解放被俘的瓦西里。莫斯科的所有领主和整个大公宫廷都开始倾向于正采取坚决行动解救瓦西里的穆罗姆。里亚波洛夫斯基家族甚至出兵征讨舍米亚卡，但是他们在打败他的队伍后，害怕进一步的斗争，"投奔"到立陶宛去了。舍米亚卡惊慌了。他由于都主教的坚决要求，在他得到瓦西里允诺不"谋求"大公之位后，释放了瓦西里，并把沃洛格达给瓦西里作为世袭领地。

这一次，战败的瓦西里又成了胜利者。他刚在沃洛格达住下，成群的领主和"自由侍从"立即开始迁往沃洛格达，而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院长特里丰取消了瓦西里对舍米亚卡所立下的誓言。对瓦西里的束缚再次被解除。预先取得特维尔的支持后，瓦西里向莫斯科推进。瓦西里·雅罗斯拉维奇、王公奥博连斯基和费奥多尔·巴谢诺克立即从立陶宛前来支援瓦西里。途中，在叶利尼亚附近，他们与也来为大公效劳的兀鲁—马合木的儿子卡西莫、牙忽卜的人数众多的鞑靼部队会合，一起继续向前进发。

当时，舍米亚卡出来迎战瓦西里，只把自己的几个领主留在莫斯科。瓦西里的将军普列谢耶夫利用了这一情况。估计会得到莫斯科人的支持，他率领一支小部队走近莫斯科城。城门开着，普列谢耶夫通行无阻地进入莫斯科。舍米亚卡的一个领主什加被王公夫人的烧炉工人拉斯托普恰擒获，其他人被普列谢耶夫的战士捕获。于是，莫斯科城不战而得，1447年2月17日，瓦西里进入京城。他立即让王公们认清，舍米亚卡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舍米亚卡向往封邑制度。他依靠自己的同盟者王公们，在领主

中没有得到支持，只是由于各种情况的凑合，在一段时间里他才同莫斯科各界发生了联系。在同封邑王公们订立的一系列条约中，舍米亚卡扩大了他们的权利，实质上重新恢复了封邑公国。失明者瓦西里同德米特里·舍米亚卡的斗争发展得很不寻常，甚至超出了王公宝座“大竞争”的范围。问题关系到封邑公国的存亡，关系到这些封建“独立的半国家”今后能否保持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成为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统一”制度的化身，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则是旧的封邑制度的化身。整个封邑公国制度是在舍米亚卡一方。当舍米亚卡坐上莫斯科大公宝座时，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同苏兹达尔王公瓦西里·尤里耶维奇、费奥多尔·尤里耶维奇所签订的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意图。条约规定按下哥罗德王公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时代即下哥罗德公国全盛时代的边界恢复独立的苏兹达尔大公国、下哥罗德大公国和戈罗杰茨大公国，容许其王公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享有包括与金帐汗国进行独立谈判的权利。

这样，旧的封邑制度在舍米亚卡时代复辟了。舍米亚卡的同盟者王公们感到自己重新是局势的主宰者，他们尽力设法挽救已失去的东西。他们对待莫斯科领主、商人、市民行为傲慢，甚至掠夺、压制他们；他们的敲诈勒索，引起不能在舍米亚卡法庭上约束他们的工商区人民的反对，瓦西里取消了舍米亚卡授予莫扎伊斯克王公、苏兹达尔王公等人的权利，重新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侍从和附庸王公，虽然他同其中某些王公还不得不签订一些条约。

被放逐的舍米亚卡没有停止活动。他进行了一系列无意义无希望，但却很坚决的尝试，想把一切不满分子和罗斯的国外敌人联合起来反对瓦西里。但他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他的一切行动都失败了，他的这些努力和行动就像是旧的封邑制度的垂死挣扎。舍米亚卡自尊为诺夫哥罗德王公，号召诺夫哥罗德同大公作斗争，

他教唆维亚特卡人，他同喀山汗联络，向自己的季温(тиун)[①]瓦塔津寄去文书，要求他唆使市民不服从瓦西里，等等。他劝说领主和宫廷侍从为自己效劳，议论瓦西里邀请鞑靼有军职的宗王和鞑靼贵族到莫斯科一事来蛊惑人心。

看到舍米亚卡桀骜不驯，坚韧不拔，瓦西里决定通过舆论来打倒他，他预计教会的决定有利于自己，便把同他的争执交给宗教界去裁决。失明者瓦西里能获胜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罗斯中心的教会和修道院的支持。1450—1462年他赐给在内讧时期支持过他和他妻子的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叶夫菲米救世主修道院和楚赫洛姆斯基·波克罗夫斯基修道院奖状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次宗教界果然不出所料，出来拥护瓦西里，拥护中央集权和王公政权的加强，拥护王公之位继承的新制度，谴责尤里、斜眼瓦西里和舍米亚卡的活动，让舍米亚卡屈服。舍米亚卡这一次并未屈服。

斗争延续到1453年，最后，书记斯捷潘·博罗达特从莫斯科来到舍米亚卡当时的躲藏地诺夫哥罗德，组织了一次阴谋。舍米亚卡被毒死，他的儿子伊万逃到立陶宛。

莫斯科公国的内讧就此结束。封邑王公们匍伏于失明者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脚下。封邑制度被摧毁了。新的政治制度得到巩固，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权诞生了。领主、教会和市民决定了斗争的结局。他们使瓦西里取得了胜利。

内讧停止后，失明者瓦西里着手坚决取消封邑。王公伊万·安德烈耶维奇从其莫扎伊斯克封邑被逐出，逃到了立陶宛。甚至连忠于瓦西里的谢尔普霍夫王公瓦西里·雅罗斯拉维奇也被剥夺了封邑，他(后来)死于监禁中。谢尔普霍夫领主和宫廷侍从企图解救他，这只引起对他们的残酷镇压，这种镇压再次显示了大公

① 10至17世纪俄国某些官员的职称。——译者

政权的力量。苏兹达尔的各封邑被废除。以往恣肆任性的维亚特卡地区毫不抗争地屈服于瓦西里。依靠罗斯东北部的统一，瓦西里还在诺夫哥罗德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按照1456年雅热尔比茨克条约，诺夫哥罗德承认瓦西里的统治，承认他的裁判、他的全权代理人和征收贡税、征收"黑博尔贡税"的权利，答应决不接纳大公的敌人、废除谓彻文书，等等。雅热尔比茨克条约是为取消诺夫哥罗德的独立性而进行的斗争的开端。

在诺夫哥罗德之后，轮到了普斯科夫。普斯科夫被迫于1461年"不按普斯科夫的请求，不照旧规矩"接受了瓦西里的全权代理人。在诺夫哥罗德同德国人的交往和条约中，如今大公说的话具有决定意义。

剩下的还有两个公国——特维尔和梁赞。但梁赞王公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于1465年临死时留下遗嘱让自己的儿子归瓦西里保护，瓦西里便把该王公之子带到莫斯科，并把自己的全权代理人派遣到梁赞。

特维尔的情况则有些不同。特维尔公国在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同时代的王公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在位时期（1425—1461年）正值上升时期。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不需像失明者瓦西里在莫斯科内讧时期所做的那样同其特维尔大公国内的封邑王公进行斗争，——早在特维尔大公伊万·米哈伊洛维奇时期（1399—1425年），特维尔公国内的最后一个封邑卡申就已被废除。

因此，特维尔王公进行积极的外交。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同维托夫特签订条约，帮助他，参加著名的加冕典礼。1433年，特维尔军队帮助走亲罗斯路线的斯维德里盖洛与拥护波兰和拥护克列沃联合及天主教的西吉斯孟德作战。不同意教会合并、与伊西多尔绝交的特维尔领主福马·马特韦耶维奇是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罗斯的唯一世俗界代表。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认为佛罗

伦萨宗教会议有很大意义。他要求“神圣的全世界宗教会议按神圣规则的最初传统”召开，他甚至在得到拜占庭皇帝“写的信”后，仍然是天主教的敌对者。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接见了从遥远的阿富汗前来的帖木儿的继位者沙哈鲁的使团，他从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卡西米尔处夺回了勒热瓦。所有这些情况都证明特维尔实力的加强，特维尔王公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被称为“罗斯皇帝”。

特维尔实力的增长，是由于依靠非名门世袭领主同封建贵族斗争的特维尔大公手中的特维尔诸地区合并过程的完成所造成的。正如写于1453年左右的《恭顺的僧人福马对贤明大公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赞语》中所说的，鲍里斯大公“傲慢地剥夺一些人的权力，而谦恭地坐在宝座上对待左右侍从”。在忠诚地为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效劳的特维尔领主中间，有同莫斯科军队一起出征诺夫哥罗德的参加者亚历山大·罗曼诺维奇和卡尔普·费奥多罗维奇，有亲莫斯科的博克耶夫家族的人，有领主比比科夫家族的人、纳戈伊家族的人、列瓦绍夫家族的人、纳晓金家族的人、博罗兹金家族的人、科罗博夫家族的人——他们都是古老的罗斯著名领主家族的始祖。所有这些情况使僧人福马有理由颂扬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为“戴着皇冠”的“专制君主”。在莫斯科内讧时，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保持中立，特维尔既让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敌人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弗谢沃洛日斯基、伊万、莫扎伊斯基和斜眼瓦西里避难，也让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本人两次避难。最后，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站到失明者瓦西里一边，同他结成联盟，给予他帮助。瓦西里年幼的儿子伊万同鲍里斯女儿玛丽亚的订婚，勒热瓦转让给特维尔王公，这两件事巩固了联盟。坚决要求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帮助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都主教约纳在特维尔与莫斯科缔结联盟中起了重大

作用。1454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与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签订条约，按照条约鲍里斯虽然没有承认瓦西里的领导地位，但承认了他把诺夫哥罗德作为“世袭领地”，有大公统治权，并且答应一定同莫斯科一起出征“鞑靼人、波兰人、立陶宛和德国人”。

如下情况似乎使人纳闷，即：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并未利用莫斯科公国内的封建战争来破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统治，来削弱莫斯科和提高特维尔的地位，但是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谨慎及其对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友好态度显然是这位特维尔王公对待其在位时罗斯展开的暴风雨般事件的深思熟虑态度的结果。他估计到了莫斯科与特维尔实力的对比关系，估计到了舆论的力量和人民群众、封建上层的力量，尤其是站在莫斯科王公方面的教会势力，估计到了莫斯科王公失败的暂时性及其所拥有的巨大力量和财富，以及当时除封邑王公外封建社会一切阶层对他的支持。

失明者瓦西里在位时，立陶宛的势力显著减弱。立陶宛王公们的全部注意力贯注于其国内事务。只在1445年时，莫斯科军队曾一度出动，与立陶宛对抗，但1449年时就已缔结了和约；在失明者瓦西里在位的所有其余期间，没有同立陶宛发生过冲突。

停止对普斯科夫地区举行掠夺性袭击的立沃尼亚骑士不再嚣张了。普斯科夫人曾依靠莫斯科大公回击了他们，1460年时，德国人开始请求和好。

对鞑靼人的斗争也是成功的。不久前形成的喀山汗国还很弱，为大公效力的卡西莫鞑靼人成功地击退了喀山鞑靼人的袭击。只是到1451年时，鞑靼宗王马佐甫沙才进抵莫斯科，但市民们再次给予反击，以致鞑靼人把他们在罗斯各城中抢来的全部珍宝都弃于莫斯科城墙附近，逃走了。诚然，赛义德—阿黑麻后裔诸汗国（青帐汗国和诺盖帐汗国）的鞑靼人和金帐汗阿黑麻的军队曾进攻

奥卡河沿岸各城，但在失明者瓦西里时代这一带也建立了坚强的“骑兵防哨”(防御线)，鞑靼人的所有进攻都被罗斯人打退了。

失明者瓦西里死于1462年，他指定其子伊万为继位者，伊万在瓦西里在世时就已是瓦西里的“共同执政者”。

第 九 章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罗斯统一的完成 伊万三世

罗斯各地合并为统一的国家和罗斯中央集权的形成发生在伊万三世在位时期，当时造成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全部因素已成为现实和实际可行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时，莫斯科公国"已经成为一个庞然大物"。①

伊万三世面临的任务是在罗斯建立强大的统一国家，这个国家以中央集权的官署和君主专制政权为首，有能力执行其最重要的职能，即"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和"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② 伊万三世面临如下任务：使农民在"全罗斯"范围内农奴化，建立有助于封建主实现其对土地、对农民的劳动、对农民本身的"权利"的国家机构和法制，合并所有的罗斯地方，巩固自己的政权，摆脱鞑靼桎梏（鞑靼桎梏曾"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③），收复王公"内讧"和罗斯衰弱时期被立沃尼亚骑士团、立陶宛、波兰等敌人侵占的"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古老的罗斯国土。

马克思指出，当时"……波兰一立陶宛正力图征服莫斯科公

① 参阅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71页。

②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年），载《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280页。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67页。

国；最后，立沃尼亚骑士团尚未解除武装”。[①]

到伊万三世在位时，旧的封邑制度已经开始崩溃。由于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的金帐汗国也衰弱了。马克思把金帐汗国比作一个垂死的人，在这个人的卧床旁有个医师（伊万三世）确认他的死亡，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伊万三世终究还是向鞑靼人缴纳贡税者。[②]

伊万三世较迅速而成功地解决了他所面临的任务。因此毫不奇怪，为什么后来关于俄罗斯国家的大改革和巨大成就的概念与伊万的名字联在一起。由此他也就被尊称为伊万“大帝”。

伊万三世身上兼有从自己先辈继承下来的、成为卡利塔家族世代相传的一切品质：机智而有远见，头脑冷静而慎重，稳重而细心，不屈不挠而刚毅。伊万三世坚持把一切事情做到底，他有时在危险面前退却只是为了对情势作深思熟虑，等待时机，然后重新转入进攻。

伊万三世继续和完成了莫斯科王公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后裔们准备建立大俄罗斯强大中央集权国家而细心进行的持久事业。

伊万三世从征服和合并诺夫哥罗德——“罗斯诸共和国的首领”（马克思语）开始。诺夫哥罗德趋于衰落。领主政体在该城中主宰一切，一小群领主（“三百条金带”、“老爷们”）掌管城内诸事。由于领主横行霸道，由于赋税、苛捐杂税、高利贷而受苦的下层人民所遭受的压迫更深了。

编年史编撰者写道，15世纪中叶的“诺夫哥罗德没有什么真理和公正裁判……”“卑贱”人民和“大人物”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谓彻不再召开。在诺夫哥罗德，阶级斗争汹涌澎湃。人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70页。

② 同上。

数众多的诺夫哥罗德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认为大公、“全罗斯的君主”能拯救他们免受领主和大商人的压迫，在他们看来，大公与他们自己一样都是诺夫哥罗德领主的“敌对者”。

伊万三世坚持把诺夫哥罗德视为自己的“世袭领地”。诺夫哥罗德领主看到他们对付不了人民群众的造反，又害怕莫斯科王公统治的加强(这将意味着他们的寡头政治统治的末日)，便决定同波兰—立陶宛国结成联盟。大封建主享有独立性的波兰—立陶宛国的政治制度比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国的国家制度较接近于诺夫哥罗德领主的政治意图。况且，诺夫哥罗德的军事力量削弱了，如今它宁肯赎免，而不愿打仗；在领主本身内部，争吵增长了。

占有北德维纳和沿海地区大片土地的地方行政长官伊萨克·博列茨基的儿子们和其寡妇马尔法是“亲立陶宛派”领主的首领。小博列茨基们担心人民群众暴动的发展，他们担心暴动的结果会使他们失去地位和掠夺来的财富，便决定背叛自己的人民，把诺夫哥罗德交给立陶宛。1470年，他们以此为目的同波兰—立陶宛国王卡西米尔四世结成联盟，卡西米尔四世立即把自己的全权代理人基辅王公米哈伊尔·奥列利科维奇派到诺夫哥罗德，米哈伊尔是出身于立陶宛王公格季明的罗斯化的东正教徒的后裔。米哈伊尔·奥列利科维奇之被选派不无原因，因卡西米尔懂得，马上派天主教徒波兰人担任全权代理人是危险的。“亲立陶宛派”领主已制订出让米哈伊尔娶伊萨克·博列茨基的寡妇马尔法为妻的计划。

从此以后，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卡西米尔，这个“莫斯科人的死敌”①，就答应一定“为大诺夫哥罗德骑上马，率领全部立陶宛援军反对(莫斯科)大公，保卫大诺夫哥罗德”。此外，我们从立沃尼亚骑士团首领给条顿骑士团首领的信中获悉：诺夫哥罗德显赫领主还同立沃尼亚骑士结成联盟以便同莫斯科和普斯科夫作斗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58页。

争。诺夫哥罗德领主上层对罗斯国家事业的背叛引起“卑贱者”和不愿“追随拉丁人”的僧侣们的愤怒。季波格拉夫编年史记载说："地方上的人民不愿那样，但是他们听从他们，同国王和好”。一部分领主也坚决反对诺夫哥罗德变为波兰一立陶宛国的藩属。

激烈的谓彻接二连三地召开。

伊万三世早就为了被侵占的地区同诺夫哥罗德领主敌对。诺夫哥罗德统治者一贯对大公“桀骜不驯”，如今则是诺夫哥罗德“金带”领主们背叛罗斯国家事业的问题了。伊万三世试图通过都主教菲利普对诺夫哥罗德领主施加影响，谴责他们的背叛行为，劝导他们拒绝“拉丁人的好处”和“拉丁国家”。但是劝导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于是伊万三世召集了会议。他的兄弟们、封邑王公们、领主们、将军们、小军职人员们被召集在一起。在这次会议(未来的全俄缙绅会议的先声)上，通过了征讨脱离关系的诺夫哥罗德的决定。1471年6月，莫斯科军队出发。同他们一起行进的有普斯科夫人、维亚特卡人、特维尔人。在罗斯，人们愤恨诺夫哥罗德领主的背叛行为。罗斯向“脱离关系的”诺夫哥罗德进军。向诺夫哥罗德领主进军如同“向语言不通的异族人和向背叛原有信念者”进军一样。当时的人们把伊万三世的军队比作顿河王德米特里的军队，这是不无原因的。诺夫哥罗德的“卑贱者”不愿同罗斯作战。当局用强迫手段迫使他们离开家园，加入领主们仓促召集起来的民团。他们勉强去作战或根本不去作战，例如，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的团队就拒绝拔剑刺杀莫斯科人。

6月初，王公丹尼尔·霍尔姆斯基和领主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的先头部队冲进诺夫哥罗德地区。一部分军队被派去征服富庶的德维纳地区。伊万三世统率全军，集中掌握最高指挥权。当时无人去援助诺夫哥罗德。甚至连卡西米尔的全权代理人米哈伊尔·奥列利科维奇也早已逃出诺夫哥罗德。他沿途洗劫了旧鲁萨

和通往立陶宛边界的他所遇到的所有城市。

诺夫哥罗德的“亲立陶宛派”领主开始乞求立沃尼亚德意志骑士援助。立沃尼亚骑士团团长写信给总团长说，必须援救诺夫哥罗德，因为莫斯科一旦征服了它，立沃尼亚骑士团的末日也就到来了。进行掠夺的骑士们的代表人物说得对，因为莫斯科实际上不久就迫使骑士团屈服了。

莫斯科军队已经在个别武装冲突中打败诺夫哥罗德军队，但是到7月14日时才在舍隆河河岸发生了大规模的决战。攻打4万诺夫哥罗德人的是4 000莫斯科人的军队，但这是一支专门的军队。诺夫哥罗德人照老规矩作战：由各个封建主召集和武装起来的各团各自行动。人数少的莫斯科军队则服从统一的指挥，其巨大优势就在于此。诺夫哥罗德人被击溃。据编年史证实，他们在12 000人被杀死后，从战场上逃跑了。有1 700人沦为莫斯科人的俘虏，其中包括地方行政长官博列茨基。

舍隆河战役是新的中央集权的、服从统一指挥的军队对按照旧的封邑战争原则行动的军队的胜利。

舍隆河战役的结局并非偶然。莫斯科军队的另一支由奥布拉泽茨将军指挥下的作战于北方的4 000人的部队，在北德维纳河沿岸击溃了王公舒伊斯基的将军的12 000名诺夫哥罗德人军队。

诺夫哥罗德战败了。伊万三世取得胜利不仅有赖于“全罗斯”向诺夫哥罗德的进军、伊万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还由于诺夫哥罗德“亲立陶宛派”领主是受到人民群众憎恨的放高利贷、征收赋税、横行霸道和为所欲为的叛徒和背信弃义者。无人应受保卫，他们至多只能指望诺夫哥罗德下层人民对他们采取不友好的中立态度。

诺夫哥罗德被迫同(莫斯科)王公签订和约和新的条约，并且已由推翻“亲立陶宛派”的拥护莫斯科派来签订条约。伊万三世谨

慎地采取行动。他只作到恢复雅热尔比茨条约，但扩大了自身权力，并用诺夫哥罗德裁判文书加强了王公裁判权和自己的全权代理人的权力。伊万三世没有触动诺夫哥罗德的政治制度。谓彻、地方行政长官，即诺夫哥罗德群众所珍视的、使他们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同领主寡头政治作斗争的作为诺夫哥罗德"自由"的特征的一切东西，都被保留了下来。伊万三世的打击主要指向"亲立陶宛派"领主政治。"亲立陶宛派"被他搞得一蹶不振、衰弱下来。

伊万三世的这种政策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普通"粗人一谓彻参加者"的同情和对整个谓彻制度的同情，谓彻制度的全部传统是与君主专制政权完全对立的。对伊万来说，着手取消诺夫哥罗德人的谓彻制度，为时尚早，并且是危险的。必须利用伊万巧妙地挑起的诺夫哥罗德人本身之间的内部斗争和矛盾。

马克思谈到伊万三世时指出："在诺夫哥罗德……他支持不和睦和党派纷争。"①

马克思强调说，伊万三世"认为适宜的作法是突然表现得节制"②，他索取15 000卢布贡税后，回莫斯科去了。"亲立陶宛派"领主于是利用了这一情况，重新集聚在地方行政长官瓦西里·阿纳宁周围。他们的掠夺和专横恣肆再次在"黎民百姓"、"下层"市民中，甚至在富有市民中间引起不满情绪的波涛。他们请求伊万为他们鸣不平，因为"地方行政长官和大领主们行施暴虐"，"谁也不能制裁他们"。伊万"俯就"他们的请求，于1475年10月前往诺夫哥罗德"举行审判"。在沿途的村落和村庄中，一些要求制服肆无忌惮的领主的控诉人前来见他。来到诺夫哥罗德后，伊万按诺夫哥罗德惯例，在地方行政长官、大主教和领主们的列席下开始审判。被他认为犯有"谋逆"、"叛变"罪的地方行政长官阿纳宁以及费奥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56页。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文版，第73页。

多尔·博列茨基等人被逮捕，并被带上镣铐押送莫斯科。伊万想把“下层人民”、“黎民百姓”和“富有者”、商人们笼络到自己一边，他分赠给他们丰厚的礼物，仔细听取每个控诉人的申诉，总而言之，企图利用自己滞留诺夫哥罗德期间，为自己建立起一个仁慈、慷慨、公正的君主的威望。他做到了这一点。所有认为受冤屈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都开始请求他。伊万乘机把全部审判权夺取到自己手中。诺夫哥罗德的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埋怨他破坏了“老规矩”，但伊万不听从他。然而不应当认为伊万三世在诺夫哥罗德“卑贱者”和“贵人”的斗争中确实真诚地站在“卑贱者”一方。如果说舍隆河战役之后大公的威望在“卑贱者”中大为增长，伊万三世似乎成了“公正”君主的化身，如果说“下层人民”曾纷纷向他提出呈文，找他管束“对他们行施暴虐”的“贵人”，真诚地信赖他会很好地对待“下层人民”，那末，伊万三世本人一方面虽完全不想让自己在他们心目中丧失尊严，同时却又由于其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尽管不拒绝蛊惑性地利用“下层人民”对自己的同情，他终究在诺夫哥罗德主要依靠的还是领主中的一定集团。“卑贱者”经常不断地反对诺夫哥罗德领主的寡头政治，反对其背叛政策，反对波兰、立陶宛、骑士团、瑞典，反对封建混乱现象，他们始终卫护罗斯，卫护莫斯科，卫护大公，卫护国土和政权的“统一”，但是他们却始终不是封建制度的拥护者，不管封建制度来自诺夫哥罗德或来自莫斯科对他们都一样，因此他们卫护自己的谓彻，尽管谓彻仍是领主寡头政治操纵的工具，但毕竟能使他们有可能同领主寡头政治作斗争。

伊万持续不断地迅速推行自己的使诺夫哥罗德屈服的政策，他断定：是结束诺夫哥罗德残余的独立自主性的时候了。推行这一政策的借口是如下情况：1477 年 3 月，莫斯科来了诺夫哥罗德的两个使者——谓彻书记扎哈尔和传令官纳扎尔。他们在自己的呈

文中没有像过去那样称伊万为"君主"，而是称他为"国君"。伊万在同年4月派遣使臣到诺夫哥罗德去询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他们是否希望到处是"唯一的国君的法庭和他的行政机关？"诺夫哥罗德统治上层的代表人物们答复说：他们根本不希望这样，他们没有派遣扎哈尔和纳扎尔，不准备废除"老规矩"。伊万三世派来使团与提出询问的消息引起诺夫哥罗德全城惊慌不安。使臣们被"尊敬地"遣返，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伊万以此为借口声称：诺夫哥罗德已称他为自己的国君，而如今却打算违背自己的诺言。他遂开始准备征讨"背信弃义者"。

1477年10月9日，莫斯科军队出发，向诺夫哥罗德前进。诺夫哥罗德已经没有抵抗力量。诺夫哥罗德的一些领主去迎接伊万，请求他接受他们为他效劳，使者们前去向他建议讲和，但是伊万向诺夫哥罗德推进，对领主们的建议置之不理。11月时他用军队把诺夫哥罗德城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于是开始进行谈判。谈判的最后结果是诺夫哥罗德完全屈服于伊万。从此以后诺夫哥罗德应当由大公的全权代理人管辖，诺夫哥罗德各地区——各"殖民地"转归伊万，谓彻制度被废除。甚至连数百年来以钟声召集诺夫哥罗德人参加谓彻的那个钟也"遭了难"——它被搬下来，运送到莫斯科去了。

伊万把一部分领主遣送到莫斯科去。他们的世袭领地被没收归伊万支配。伊万答允不侵犯其余领主对世袭领地的权利，并保留旧有的审判法。领主们试图让伊万哪怕对他答允的话宣誓也好。伊万拒绝宣誓。领主们又请求哪怕由他的全权代理人"对诺夫哥罗德吻十字架"即宣誓也好。这一点也遭到拒绝。1478年1月15日，领主们使伊万为各区各街的全体诺夫哥罗德人宣誓。全体诺夫哥罗德领主、"领主子弟"和"富有者"也宣誓为大公"效劳"。于是立即着手在诺夫哥罗德地区组织大公经济和普遍"按'索哈'

征收赋税”。伊万的全权代理人奥博连斯基家族王公伊万和雅罗斯拉夫住在诺夫哥罗德的雅罗斯拉夫宫。

“罗斯诸共和国的首领”诺夫哥罗德就这样结束了。古老的谓彻制度废除了。谓彻在过去有个时候曾使人民群众有可能同领主作斗争，但到15世纪时谓彻已成为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活动场所。他们的统治使人们不能忍受，因此尽管伊万废除了他们的谓彻制度，诺夫哥罗德下层人民仍支持他，此外，领主们的分立主义，他们企图把诺夫哥罗德交给波兰一立陶宛国王和德国骑士团团长以保持他们本身的统治，他们明显的反民族、反人民政策也促使诺夫哥罗德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加强起来，渴望与莫斯科合并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

后来继续爆发了领主反对伊万的一些斗争。例如，1479年，伊万得知某些诺夫哥罗德领主重新同国王卡西米尔和骑士团进行谈判，同年秋天他便再次围攻诺夫哥罗德。领主们已经在城里重新活动起来，他们推选了地方行政长官、千人长，并“按照老规矩”建立了一切。罗马教皇亲自插手，卡西米尔答允把诺夫哥罗德教会交给罗马教皇。罗马教皇下令募集钱以组织夺取诺夫哥罗德的斗争。但是这一次“波兰人”和天主教教会首领又打错了主意。伊万突然进攻诺夫哥罗德，向它开炮轰击。城里开始惊慌失措。领主的行为引起拥护莫斯科的“卑贱者”们的不满，他们投向围攻者一方。领主们遂被迫投降。伊万进入城内。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和100家领主后裔和商人被放逐，他们的财产被没收。

制裁和“迁移”领主、领主后裔、“富有者”和商人的工作进行了多年。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他们本身被放逐到莫斯科各城市。大主教和各修道院的大批土地被没收。到1488年为止迁移的人超过8 000家。在没收的土地上，伊万“安置”(即将土地分赐为地产)了莫斯科服役贵族和与当地居民没有联系、远远脱离诺夫哥罗

德谓彻传统的领主后裔，这些领主后裔倾向莫斯科和大公，是他在归并的边区上的最好依靠。领主"效忠者"变成为地主。莫斯科商人也出现于诺夫哥罗德。

随着当地封建上层的消灭，以及莫斯科的制度、法律、习俗移入诺夫哥罗德地区，诺夫哥罗德地区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和特殊性，同莫斯科溶合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

在北方没收的领主和寺院的大批土地被伊万留给了自己，而没有分赐给莫斯科新兴贵族和领主后裔。国有土地在这里占支配地位。农民只依附于大公，向他缴纳税。这种农民被称为"国有农民"。

寡头政治的领主谓彻共和国——大诺夫哥罗德老爷就此完结。伊万三世在同富有、强大的诺夫哥罗德的斗争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在舍隆战役的时日里，在伊万三世驻留于曾属于"戈罗季先斯基"、"特罗伊茨基"和"斯拉文斯基"的诺夫哥罗德时期，人民群众尽管倾向于故土的谓彻老规矩，但他们的同情却在作为统一罗斯的化身的大公方面，莫斯科方面。不管满心希望保存领主共和国旧制度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编撰者对拥护莫斯科的人表现得多么凶狠，诺夫哥罗德人乌帕德什却把五门炮的炮口堵住，使这些炮不能向莫斯科军队开火，"大主教军"(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的团队)拒绝与大公军队交战，诺夫哥罗德平民不愿去作战，他们借口说他们的"马累垮了，盔甲磨破了"。

结束诺夫哥罗德的事务后，伊万便着手取消其他公国的独立。1463年时，雅罗斯拉夫尔公国就已被废除，雅罗斯拉夫尔王公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和西茨基家族、库尔布斯基家族、普罗佐罗夫斯基家族的王公们都已不再是"附庸王公"，而成了大公的侍从.1474年，轮到了罗斯托夫王公，11年后又轮到了特维尔王公。

特维尔的人们感觉到，特维尔独立的末日就要来到，还在

1476年时，就有许多特维尔领主和领主后裔“投奔”了莫斯科。特维尔王公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于1483年同卡西米尔四世结成联盟。第二年，莫斯科军队进攻特维尔公国领土作为对此的答复。米哈伊尔被迫作为“弟弟”向伊万宣誓，并答应不同立陶宛进行谈判。此外，他还答应决不同从莫斯科逃出的伊万三世的敌人、躲避在立陶宛的舍米亚卡诸子、莫扎伊斯克家族王公、博罗夫斯克家族王公等人谈判。

特维尔王公衰弱了，他的威望下落。特维尔领主们认识到莫斯科的力量和自己王公的衰弱，并预感到特维尔末日即将来到，便投靠到莫斯科王公方面。1485年时，特维尔封邑王公安德烈·米库林斯基和约瑟夫·多罗戈布日斯基以及许多领主就已“投奔”了莫斯科。表面上屈服的米哈伊尔不投降。1485年，从截获的米哈伊尔的一个到立陶宛去的急使查明：特维尔王公又企图“脱离”莫斯科。伊万再次进军特维尔，特维尔于1485年11月10日投降，许多封邑小王公、领主和市民公开投靠了莫斯科。米哈伊尔逃到立陶宛，长期飘泊于立陶宛和波兰，后来住在克拉科夫，没有留下继位人就死去了。特维尔公国就这样被归并了。

许多领主和领主后裔从特维尔“迁”出，与诺夫哥罗德一样，莫斯科的一些新兴贵族和领主后裔迁入了特维尔地区。16世纪初时，他们在那里已经人数很多。伊万用这个办法在此为自己建立了巩固的支点，同时把特维尔封建主放逐到莫斯科公国各地区。

就在这一年，莫斯科公国的最后一个封邑——韦列亚封邑被废除了。

接着轮到了恣肆任性的维亚特卡地区。在封建战争年代里，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在位时，维亚特卡站在他的敌对者方面，它的“大胆的青年好汉”曾袭击过大公的土地。当然，1459年在失明者瓦西里收拾了舍米亚卡并同诺夫哥罗德签订了雅热尔比茨条

约之后，便派遣自己的军队向维亚特卡进军——他的敌对者和旧制度的拥护者、舍米亚卡的同盟者的最后一个支点。王公帕特里克耶夫和里亚波洛夫斯基的军队攻占了科捷利尼奇和奥尔洛夫，围攻了赫雷诺夫，迫使维亚特卡人求和，“完全听从大公的支配”。

伊万三世时，维亚特卡的“卑贱者”日益倾向莫斯科。1471 年英勇地远征萨莱的组织者、维亚特卡人康斯坦丁·尤里耶夫成为倾向于莫斯科的维亚特卡领主集团和“卑贱者”的首领。这些社会力量的影响，决定了维亚特卡人参加伊万三世对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和尤格拉的远征。但是在维亚特卡领主中间也有莫斯科的敌对者——旧制度的拥护者。这就是阿尼基耶夫、博戈代希科夫、拉扎列夫等人。他们对大公的大乌斯秋格地区、瓦日地区进行袭击(1466、1486，1488 年)，支持同伊万三世作战的曼西亚小王公阿瑟卡，迫使康斯坦丁·尤里耶夫逃往莫斯科。1485 年伊万三世同喀山作战时，他们不仅没有支持伊万(他们用拒绝伊万提出的派遣军队“赴援”的要求来回答伊万)，而且乘机投靠莫斯科的敌人阿里汗，“脱离了大公”。

作为对此答复的是 1489 年丹尼尔·谢尼亚和格里戈里·莫罗佐夫向维亚特卡的进军。被围攻的赫雷诺夫城投降了。维亚特卡便归并于莫斯科，大公的敌人阿尼基耶夫、拉扎列夫和博戈代希科夫全被处死。伊万三世把维亚特卡领主和商人分别送往其他城市和地区，而把乌斯秋格人迁居于维亚特卡。在维亚特卡各地到处建立了莫斯科的管理机构。维亚特卡及其赫雷诺夫、奥尔洛夫、斯洛博德斯科伊、科捷利尼奇诸城市成了莫斯科的“世袭领地”。

罗斯各地的归并就这样完成了。

还剩下名义上“独立的半国家”普斯科夫和梁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还在失明者瓦西里在位时普斯科夫事实上已屈服于莫斯科大公，莫斯科不考虑“老规矩”，开始向这个谓彻城市指派自己的全权代理人。诚然，第一个全权代理人王公弗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未按普斯科夫老规矩、未经普斯科夫人邀请”于1461年来到普斯科夫，他从谓彻台阶上被推下，被驱逐走，但在这件事之后不久伊万三世即位，他“感到有点惊讶”，但只限于三天内不让普斯科夫使者见他，接着便承认了普斯科夫的“老规矩”。然而事情还是朝着一定方向在发展，即向普斯科夫谓彻共和国的消灭发展。马克思指出：“机智的普斯科夫通过让步在一定期间拯救了其旧有的制度。”①

正如在诺夫哥罗德所做的一样，大概甚至在更大程度上，伊万三世把普斯科夫的阶级斗争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483—1485年，普斯科夫发生农民骚动。这些骚动从如下事件开始：1483年普斯科夫人“冲击了”地方行政长官的庭院，并“冲击了其他许多庭院”。但第二年“贵人们”和“卑贱者”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沉重的负担”落在农民身上是骚动的原因，而导火线则是如下情况：在普斯科夫的圣三一大教堂的档案中有规定农民赋役数额的“农民文书”，有根据认为：1484年，普斯科夫领主得到大公全权代理人的同意，通过贵族会议作出了关于减少农民为城市服役以便为领主多服徭役，并在档案内放入另外的文书取代旧的“农民文书”的决定，这样一来，应为城市服的徭役当然转嫁到普斯科夫“黎民百姓”身上，于是“黎民百姓”来到谓彻反对领主企图加重他们的生活负担，并主要反对领主和全权代理人企图不通过谓彻决定如此重要的问题。地方行政长官加夫里拉在“全普斯科夫”谓彻上被杀死，其余地方行政长官也被写入“处死名单”。被“黎民百姓”判处死刑的地方行政长官逃往莫斯科。“黎民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8卷（俄文版），第156页。

百姓"强迫领主派遣一个又一个的使团去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了。斯捷赫诺、瑟连和列任领导了起义农民。伊万三世在普斯科夫的全权代理人王公雅罗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奥博连斯基在骚动之初就坚决站在农民方面，坚持减轻他们对城市所服的徭役，同时尽力设法不触犯"黎民百姓"，因为"黎民百姓"不反对大公，而是捍卫其旧有的谓彻权利。在谈判时，"下层人民"、"黎民百姓"写信给伊万说："国君，正如你对我们所命令的，我们完全按照您的意志对待了农民和地方行政长官们。"

奥博连斯基这种"爱护农民"的办法和迫使全罗斯的国君和"整个封建制度"[1]的首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接受其在普斯科夫的政策是根本达不到实际上去帮助受"暴虐"之苦的农民的意图的。支解、分化社会敌对力量，传播不睦和矛盾，是伊万的始终不变的政策。这一政策清楚地表现在伊万企图利用农民和"黎民百姓"由于"农民文书"所发生的斗争中。"黎民百姓"——"谓彻参加者"反对地方行政长官们是因为"老规矩"遭到破坏以及像编制新的"农民文书"这样重要的问题竟由贵族会议作出决定，而没有召开在此情况下一般应召开的谓彻。谓彻也反对农民，但在"黎民百姓"心目中农民只不过违犯了旧有制度，从而使他们有境遇恶化的危险，因此把骚动的农民孤立起来就够了。而对于违犯"老规矩"并严重破坏普斯科夫人的谓彻传统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个谓彻城市的"黎民百姓"则是另一种态度——把他们看作敌人，打算处死他们。

伊万三世坚决站在农民方面，并把地方行政长官遣返回普斯科夫。他"如此地袒护农民"。但这只是暂时的。"有个教士"找到了一份更古老的"农民文书"，其原文没有许给农民丝毫好处。一个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51页。

普斯科夫农民从教士手中夺下了这份文书，使它“消失”了，即把它藏起来或毁掉了。农民重新骚动起来。普斯科夫使者再次带着呈文来找伊万三世，控告奥博连斯基的所作所为，但是大公“以明亮的眼睛看了看”后，把他们赶走，并下令停止虐待农民。普斯科夫平静了下来。

伊万三世在梁赞也感到自己是全权主宰者。梁赞王公在莫斯科受过教育，他幼年时执政于梁赞的母亲阿格拉费娜接受了伊万的命令。梁赞的王公、领主、“自由侍从”和宫廷侍从都为“全罗斯国君”效劳。1503年，梁赞公国的一半并入莫斯科。梁赞的独立性已成为昔日的传说。伊万三世同莫斯科公国本身的封邑制度作了坚决斗争。在80年代签署的协议书和遗嘱中，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要减少莫斯科“世袭领地”数目和建立起大公亲属中的封邑王公对大公的巨大依附关系的意图，表露得愈来愈明显。

到伊万三世统治末年，莫斯科王公家族的封邑只剩下了一处，即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沃洛茨基的很小的封邑。此外在梅谢拉，在奥卡河上的新戈罗杰茨还驻着卡西莫的一些鞑靼宗王。

罗斯的统一就这样完成了。

恩格斯指出：“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①

---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58页。

第 十 章

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创建时期罗斯东北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15 世纪后半叶至 16 世纪初的特点是封建罗斯生产力的发展。在其自然经济的内部，劳动社会分工的过程继续着并加速进行着。手工业在发展。农村手工业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过去农民从事某种“行业”、手工业时，自己找原料，他的劳动产品在自己经济中预定供农民经济内部消费或封建主消费，如果说过去 13 至 14 世纪时“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同家庭手工业(即为自己消费而对原料进行加工)、同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相结合”①，那末 15 世纪后半叶就已是“宗法式的农业同手艺形式的手工业相结合”了。② 农民开始购买他所需要的手工业原料，并出售自己的产品。

农村手工业日益脱离农业。不从事农耕的手工业者的数量增多。出现了一系列农村手工业的新部门（木匠业、裁缝业、制靴业），经受不住手巧的城市手工业者竞争的那些手工业部门(铸造业、珠宝加工业)消失了。一些农民手工业场所(制铁场、熬盐场)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手工业地区。在一些农村地区形成了“集镇”——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市镇，它们与城市一样成为小地区的经济中心和新兴的国内贸易关系链条中的一环。

在封建主经济中，除徭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缴纳产品)外，出现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 年)，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2 版，第 3 卷，第 341 页。

② 同上。

了货币地租。手工业者转为缴纳货币代役租；他们之中许多人跑到城市里去，充实了城市工商区手工业者的队伍，或在手工工场受雇作工。在从事采掘业的农民中间出现了像斯特罗加诺夫家族那样的人，该家族的始祖斯皮里东·斯特罗加诺夫为俄罗斯北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无冕皇帝，最富有的“客商”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产业奠定了基础。但是这样的人为数极少。许多农民兼家庭手工业者破了产，靠“作工”“糊口”，奔走于“人世间”，开创了到城市打零工的先例。

在靠近商道的村庄中，集市正在形成。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定期到这里聚会，进行买卖。

在这样的村庄中住着铁匠、陶器匠、皮靴匠、鞍匠、制木桶匠、制熟羊皮匠、裁缝和木匠。他们在自己家里制作，在长凳上做买卖，他们是一大群人，有的有助手。

城市手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莫斯科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时有手工业者2 000人以上，图拉、科洛姆纳、莫扎伊斯克各有手工业者数百人。手工业分布于各处。

除“铁匠业”、“铁匠”的一般概念外，出现了制针匠、制钉匠、制刀匠、制锁匠等。

手工业专业数不断增长，16世纪时达200种。制铠甲匠、制斧匠、制弓匠、制箭匠生产武器，制炒锅匠、镀锡匠、陶器匠、制木桶匠生产家庭日常生活用品，制革匠、鞋匠、制女无袖长衣匠、皮袄匠、制帽匠、织袜工、制男长衣匠、制女无袖短衣匠生产服装和鞋，而众多城市人口的饮食则由制造“饮食品”的面包匠、烤馅饼者、制克瓦斯工、渔夫生产。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时从事食品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数量急剧增长，这证明与农业生产无关系、不得不购买食品的市民数量的增长。

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一系列技术上的新发明得

到采用：生产砖和用砖(代替白石板)进行建筑，用铜铸造炮，轧制金属，锻造铁板，等等。

手工业与商业之间的联系很牢固。手工业者经常亲自出售自己的制品，甚至亲自把制品运到遥远的边区。例如，1489 年罗斯商人的商队在第聂伯河下游的塔万斯克渡口遭到抢劫。在来自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的 120 个商人中有许多手工业者，他们的名字中留有手工业绰号(染色工之子叫奥巴库姆·叶列梅耶夫，制弓囊箭袋匠叫济诺夫卡，铠甲匠叫翁德留什卡，制针匠之子叫萨福尼克·列翁季耶夫，砌砖匠叫鲍里斯，等等)。久而久之，这样的手工业者中有许多人变成了商人。例如，普斯科夫手工业者基里尔为追荐亡灵建造了一座教堂，这件事证明了他的富有。但另一方面，大多数手工业者生活得还是贫困、艰难，甚至沦为乞丐。他们在极坏的条件下栖息在城市边缘的没有烟囱的可怜的小木房里，又拥挤又饥饿。工资很低。有时产品的价格几乎与原料等同。“寒冷”、“饥饿”，经常发生的火灾、水灾和歉收使手工业者“彻底”破产，迫使他们落到受奴役的地位和借债。那些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手工业者，无法摆脱债务和极端贫困状况。

莫斯科的手工业生产特别发达。莫斯科以其首饰匠、金银加工业工匠和军械匠闻名于世。莫斯科手工业者铸造罗斯其他地区所不能做的盖屋顶用的铅板，铸造钟和大炮，生产火药，用手誊写装帧得很精致的书籍，建造置有大钟的钟楼，等等。在莫斯科、普斯科夫和罗斯其他各大城市，有数十(60—70)种手工职业。罗斯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联合成“一条街”、“同业公会”、“市场”、“行会”、“团伙”。手工业者在罗斯地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增长起来。

国内贸易在发展——这是劳动社会分工和小生产者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形成了一些集市(例如“霍洛皮镇”)。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所聚集的“市场”、“集镇”成为产生中的民族市场的细胞。

农民去“做买卖”，出售自己的产品，也购买手工业产品。例如，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其颁发给萨瓦—斯托罗热夫斯基修道院的证书(1404年)中指出：“有的寺院农民在寺院中也作买卖或交换东西，玷污了寺院；而有的寺院农民则在市场或村里出售东西，他们在寺院中向修道院长萨瓦缴纳商税”。这样，在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初就产生了地方上的集市，这些集市久而久之在“近代俄国历史上”即17世纪时就形成了统一的全俄罗斯市场。[1] 王公们很早就已顺从正在兴起的交换，他们互相商定准许“客商经商不受边界限制”，容许商人“通行，不设边卡”，并商定不增加关税(“关税照旧”)。交换的发展促使人们着手建立自己的货币体制。从顿河王德米特里时起，莫斯科开始铸造本地的货币，“卢布”制取代了旧有的“格里夫纳”[2] 制。

莫斯科钱币上反映库利科沃大战的战胜蛇的形象和胜利者格奥尔吉的形象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后来下诺夫哥罗德、谢尔普霍夫和其他公国也开始铸造本公国的货币。罗斯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作了准备。

15世纪后半叶，商品生产的需要迫使国内贸易不断发展。

同苏罗日(速答黑)和君士坦丁堡，卡法和东方、“伊斯兰教”各国的贸易，同北方、立陶宛、立沃尼亚、波兰、日耳曼尼亚的贸易，以及同罗斯各城市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的贸易，集中在莫斯科的富商手中，即苏罗日客商和到其他各地经商的客商手中，他们是：韦西亚科夫家族、萨拉列夫家族、翁托诺夫家族、希霍夫家族、叶尔莫林家族和霍夫林家族。莫斯科的苏罗日客商和呢绒商们有把自己的成员在教堂周围联合起来的自己的商人

---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24页。

② 格里夫纳——古代罗斯的货币，为约重1磅的银锭或金锭。——译者

组织。约安·兹拉托乌斯特教堂(1479 年)、尼古拉·戈斯通斯基大教堂(1506 年)就是这样的教堂。

国内贸易的发达,出售自己生产的产品的贸易者的众多,商人之多和莫斯科贸易之热闹,这些情况使 15 至 16 世纪游历莫斯科的外国人阿姆夫罗西·康塔里尼、西吉斯孟德·赫伯施坦、约萨法特·巴尔巴罗感到惊讶。约萨法特·巴尔巴罗虽然并未到过莫斯科,但他对莫斯科了解得很清楚。

尽管领先地位转移到了莫斯科,但是像特维尔、普斯科夫、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下诺夫哥罗德、维亚特卡、梁赞这样一些城市的商业地位并未下落,而是继续在提高。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到这时已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以致彻底废除封建割据和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成了国内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列宁在《民族问题》一文中强调指出,由作为贸易关系中心的市场的发展所决定的经济需要也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①

城市居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罗斯的政治生活中也提高起来。

富商们对大公的物质帮助(例如,商人霍夫林家族用钱帮助过失明者瓦西里),苏罗日客商和其他商人们的城市民兵和军队对大公的支援,商人们完成的外交任务,装备有民兵武器的手工业者人数的增长,"黎民百姓"不屈不挠地向往罗斯的统一(只有它能保障正常的经济生活,使人们有可能不害怕鞑靼或立陶宛人的"入侵"或王公内讧,安定地劳动)——以上这一切证明了"全罗斯国君"与罗斯城市人民之间关系的发展。

封建割据带来战争和内讧,使商人和手工业者有在途中或城

---

① 参阅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载《列宁文稿》,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1版,第 190 页。

市随时遭到敌对王公及其军队抢劫的危险，加之过境税、关税和层层税关，缺乏统一的计量单位和货币制度等等所有这些情况，都与城市和各地区正在形成的商业关系是矛盾的。

在过去当各大公国的力量大致相当时市民经常支持本公国的王公，而如今从失明者瓦西里时起这些王公的威信已动摇，他们的权力已几乎化为乌有，市民们已开始懂得，莫斯科王公是唯一的破坏和阻碍国内经济力自然增长的"混乱中的秩序的代表"。可以看清楚，失明者瓦西里为什么如此轻而易举地使封邑王公"失去王公之位"。城市如今不仅不支持企图维持独立免受莫斯科王公并吞的"自己"王公，而且公开转到莫斯科大公方面。对城市居民在罗斯统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概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吧。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不能不在封建经济中反映出来。15世纪后半叶和其后16世纪时，除盛行伐林经济的遥远北方和休闲地占大半的与"荒野"接壤的南方外，在休闲地、秋播作物地、春播作物地这三块田地上更替耕种的三区轮作制到处巩固起来。同时，通常只计量一块田地，因为认为三块田地全都相等("另两块也相同")。三区轮作制的推广促进了肥料的使用(当时罗斯称为上粪)。关于"有时驱车前往"耕地的大量记载证明了对新土地的集约开垦，因为"有时驱车前往"耕地只是在新土地上建立三区轮作制的第一阶段。罗斯南部的收获量相当大，尽管通常不超过种籽的3—5倍。

在罗斯北部森林环境中产生的犁继续有所改进。在犁上加有刀具和拨土板(取决于土壤情况和需要，有各种形态)的双齿犁得到推广。犁复杂化起来，分为多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犁。在靠近半森林半草原地带的各地区，犁得到推广并有所改进。农业技术发展起来并有所改变，尽管比手工业技术发展得慢。农民的经营集约化所造成的农业发展，其结果是谷物的增产，谷物的增产不单由、甚至主要不是由农民本身需求的增长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国

家的税收和代役租的增加所决定的。为了缴纳赋税需要钱，而钱只能出售自己劳动的成果在市场上得到。这就是15世纪末罗斯农民把谷物送到市场上去的原因。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劳动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导致各村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集镇”）——地方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姆列沃“集镇”在15世纪末时共有225家小铺，而四、五十年后已有332家小铺。商业和手工业村镇梅德纳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也发展得同样快。各城市和“集镇”、贸易村镇、采掘场手工业者、普通工人、商人数量的不断增加，需要农产品。农民和寺院、世袭领主和新兴贵族地主，把自己的产品运往城市。从莫斯科、特维尔、诺夫哥罗德、沃洛格达运来的粮食在别洛奥泽罗出售。别洛奥泽罗的基里洛夫修道院派遣该院农民夏天坐船、冬天乘雪橇到各城市出售谷物，圣三一修道院的农民做买卖，最后，“全罗斯国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本人也出售谷物。北方则把盐运到罗斯所有各地，西北部把亚麻送往各地，伏尔加河地区把鱼送往各地。各大城市吸收了大批农业产品。

约萨法特·巴尔巴罗描述15世纪末的莫斯科时写道：“这里的谷物和肉类如此丰富，以致可不按重量、而根据目测来出卖牛肉。您花1马克可买到4磅肉，70只母鸡只值1个金币，而1头鹅不超过3马克……冬天有这么多的已经完全剥去皮、冰冻好的猪、牛和其他动物运到莫斯科，一次就可购买200头”。别洛奥泽罗市场堆满了鱼、肉、禽类、野味、乳制品、蘑菇、浆果、亚麻等货物。

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价格的相对低廉，不能不使在自己村庄过着半饥饿生活的那些农民进入城市，其中许多人进城干粗活糊口，或者如果能够和会干的话，就从事手工业。

谷物或其他农产品出售量的增大不能不影响到封建主的经济。谷物成了商品。出售谷物成为有利可图的事，而且封建主需要钱用于购买“火药”以进行“炮火战”以及购买手巧的城市手工业

者的产品（自己世袭领地的手工业已不再使封建主满足）和"海外"产品：各种各样"进口碟、盘"、"外洋酒"、"维涅迪克呢绒"、"古尔梅兹粮食"，等等。货币日益进入封建主经济的日常生活。过去在王公、领主庭院有许多从经济观点看来无用的"寄生虫"，如今养活这一大批充满庭院和领主府邸的荷洛普已经失去意义，放他们自由较为有利。供给仆从衣鞋，给他们吃市场上很快买光的粮食，不符合封建主的利益，他们宁可要受奴役的农民和接近于受奴役者的各种"雇工"的劳动，于是寺院首先摆脱了成为累赘的奴仆及其非生产劳动。接着世俗封建主——王公、领主们也仿照寺院办理。出现了自由的荷洛普——"无固定依附关系"而服务的自由工作者。

因为出售谷物对封建主有利，私有的地主耕地便发展起来。在过去没有这种耕地而封建主满足于实物代役租的地方，如今这种耕地产生了（例如，16 世纪初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家族的私有地）。

某些领主封闭在自己的府邸中，使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产业与外界隔绝。他们照"老规矩"生活，不愿"破坏"老规矩。他们不能改造自己的产业，不能通过改造自己的世袭领地获得金钱，而钱又成为必不可少的需要，于是他们便还不清欠高利贷者（商人和寺院）的债务，"境况恶化"，破产，出卖"动产"和"衣服"，甚至老祖宗的"盔甲"和贵重用具。一些寺院（例如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神甫（例如圣母领报大教堂的大司祭瓦西里——借债给 10 位王公的债权人）以及商人均靠兼并这些领主贵族的世袭领地和财产而发财。

另一些为数不少的领主能按发展起来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要求改造自己的产业，他们扩大地主耕地，增加实物代役租，引进货币代役租。

急剧增长的"军职人员"——被安置在大公领地上的新兴贵族

顽强地尽力设法扩大自己的土地，加强自己对土地和农民的权利。尽管三分之二耕种过的土地掌握在寺院和领主手中，新兴贵族——地主，封建主统治阶级中的新兴进步集团，不断要求土地。新兴贵族的地主庄园经济如同世袭领地那样也是农奴制的，但是封建世袭领地是封邑时期的碎片，是具体体现封建割据性、对抗中央集权统治的独特的封闭小天地，而地主庄园则与中央政权相联系，依赖中央政权，具体体现着新制度、土地所有人封建主与"全罗斯国君"的密切关系。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推动封建主让农民转向缴纳货币代役租。产生了货币地租。货币地租并不排斥实物代役租和徭役地租(列宁曾强调指出："从《罗斯法典》的时代起……工役经济制度一直绝对地统治着我国的农业"①)，但是货币地租推广的事实本身证明了发展起来的商品货币关系对封建主经济的影响。

自然，封建经济中的所有这些变化不能不在农民的处境上反映出来。

封建经济进入商品货币关系中使农村居民的处境恶化，并加强了他们所受的剥削和他们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关系。

老佃农依旧构成农村依附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封建经济中农村"纳税者"的主体，是劳动力和代役租缴纳者。老佃农照例是受王公、领主和寺院"看管"和不放行的"世居老居民"、"鄙俗野夫"。在老佃农中间有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世居老住户"，也有成为这种老住户的以往的新约户和因受雇成为老佃农的人。他们全都在同样程度上依附于土地所有人，并依附于王公，他们照例还享有迁移权。

但是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15 世纪中叶时老佃农的处境

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 版，第 3 卷，第 283 页。

已发生变化。随着封邑公国的废除，农民没有可能从一个公国“转移”到另一个公国。国家政权本身来帮助封建主，帮助他们使农民农奴化。其他各种农村依附人口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

从15世纪中叶起，“银子”即借债取得的钱开始使银债农依附于债主个人。随着由国内市场发展所造成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种依附关系日益巩固。15世纪末出现了立卖身契的荷洛普(奴仆)——破产的自由人。各种受奴役者事实上日益接近于荷洛普，尽管名义上“官定的奴役制”规定只“自愿地”服从役使的主人。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农村依附者——对分制佃农的处境也发生了变化。15世纪后半叶的特点是对分制的发展，这仍然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相联系。变为对分制佃农的或是既无土地又无劳动工具的自由人，或是穷困了的农民。对分制佃农用自己的马耕种主人的土地，缴纳收成的一半，照例不缴国税，有权在期满后离开主人。但是从15世纪中叶起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对分制佃农在合同期满后重新在新的劳役合同上写下自己的义务，仍然留在主人处。

新约户户数增多，新约户是不能照旧负担赋役、无人帮助便不能自己恢复破产经济，但仍然指望将来能站住脚的穷困农民。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封建赋役的增加(这都是由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结果)都破坏了“旧规矩”，使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成为习惯的旧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有利于封建主的变化。封建剥削的加强引起农民的逃亡，但逃亡农民以土地“荒废”威胁封建主。就在这时，负有控制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农民的使命的罗斯封建主的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由弗拉基米尔·古谢夫准备草案，1497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批准的法典有如下规定：“……在每年秋季尤里节前后各一周，基督教徒们可以从一乡到另一乡，从一个村庄到另一村庄去。”离

去的农民如果住在主人处超过四年，这时在无森林区必须缴纳一卢布"易主赎金"，在森林地带则缴纳半卢布。住一年者缴纳"1/4"，住二年者缴纳"1/2"，住三年者缴纳"3/4"。

法典规定了荷洛普的地位和荷洛普的来源。荷洛普的来源缩小了。从俘虏中逃出的荷洛普就成为自由人，城市中的家庭粮食管理人不变为荷洛普，等等。1497年法典是罗斯农奴法固定化的重要阶段。国家政权执行其对待农民的基本职能，以此满足封建主利益。

农民的生活更艰难、更恶化。大多数农民村落为三至四户甚至更少的小村。自然灾祸、饥饿、流行病、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和战争，使许多村子变成"荒地"。农民住在没有烟囱的小木房里，小木房旁并非总有附属的经济建筑物。用袋子遮蔽的天窗透射进少许光线，某些木房甚至连这样的天窗也没有，只有一些狭窄的孔；只有最富裕的"发迹"农民在窗上安装了云母片。土地用犁耕作，农民的小马拉着犁耕地。农民饲养的小动物——牲畜和家禽也不多。农民生活艰难，勉强能糊口。最小的灾祸就使农民破产，使他们走向受奴役地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用加强阶级斗争来答复其境况的恶化。寺院农民普遍参加骚动，"农民檄书"掀起了"起义"。在罗斯圣者《传记》中我们找到了农民反对其剥削者——寺院的许多记载。寺院作为移民垦殖基地无疑在俄罗斯历史上，尤其是俄罗斯北方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但是寺院首先代表的是宗教界的封建主，对其活动首先必须从这个观点来分析。农民开垦浓密的森林区，"拔除"和"清除"森林以供耕作，但农民刚清理完森林，寺院便立即宣布自己对以这种劳动开辟出的"耕地"的权利。这就是农民如此多疑地对待迁居于他们的"伐林开垦地"附近的"长老"的原因。这就难怪"忘恩负义的人们"把安东尼·西斯基从斯科尔博特村赶走，

因为他们担心“这位大长老”占有他们的土地。农民也赶走了尤里耶戈尔荒郊寺院的创始人达米安。当德米特里·普里卢茨基在列扎河上建立教堂时，阿夫涅格村的农民赶走了他，他们正确地认为“过不久”“大长老”“就会占有我们和我们的村子”。“自认为似乎可占有其村子和田地”的斯特凡·马赫里茨基被尤尔措夫的居民所赶走。打鱼的农民追捕基里尔·诺沃泽尔斯基。寺院当局侵占农民土地经常付出昂贵的代价。卡申村的农民把马尔库沙河上修道院的创建者阿加皮特淹死了。阿尔谢尼·科梅利斯基和西蒙·沃洛姆斯基被农民杀死。农民“带着武器和棍棒”来到丹尼尔·佩列雅斯拉夫尔修道院院墙前，不让僧侣耕种土地，并向修道院当局声称:“为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建造了修道院?难道想占有我们的土地和村子?”1503 年，农民米哈尔卡·茹克·纳索诺尔和科波斯·费德科夫·切尔纳科夫为报复修道院的压迫，烧掉了修道院所辖伊利因村“及其庄稼和牲畜”。

不难理解，为什么保留下了如此多的有关寺院农民暴动的记载。这不是因为在领主领地上没有农民起义，而是因为寺院档案保存得较好。

各城市的“黎民百姓”也积极行动起来。“下层人民”的阶级斗争以各种不同形式实现。它经常采取宗教“异端派”的形式。1331年，在库济马、杰米扬两教堂附近联合为团伙的诺夫哥罗德手工业者的代理人瓦西里·卡利卡在诺夫哥罗德被选为大主教，瓦西里·卡利卡出身于接近“黎民百姓”的“流浪的盲歌者”。他担任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表明“下层人民”、“卑贱者”的趣味、期望、情绪和意图渗入了宗教界。在瓦西里同费奥多尔·特维尔斯基论及天堂的来往书信中，瓦西里是经验知识和直观的捍卫者，他以经验知识和直观对抗费奥多尔的神学论据。以人民生活为主题的，描绘渔夫、艺人、古斯理琴弹奏者、市民日常生活的绘画在瓦西里·卡利卡时代

出现在按当时的看法带有“异端邪说性质”的经书和赞美诗集上；瓦西里·卡利卡庇护1342年诺夫哥罗德起义时支持“黎民百姓”的翁齐福尔·卢基奇，并且庇护“黎民百姓”本身；瓦西里·卡利卡同自己的继任者、纵容“异端”的阿列克谢的联系——以上所有这些情况使瓦西里·卡利卡成为“黎民百姓”的意识形态在教会中的传导者。但是不久“黎民百姓”亲自出动了，极积而坚决地出动了。这里所说的是斯特里戈利尼克派的“异端”。因为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所以人民群众的反封建运动和反对当时封建制度的一切行动总的说来“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而且“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①

14世纪70年代，斯特里戈利尼克派的“异端”出现于诺夫哥罗德，接着它又传入普斯科夫。

“在家人”② 卡尔普(Карп) 奠定了“异端”的基础。并且异端派被称为“斯特里戈利尼克派”，这个名称本身起源于卡尔普及其周围最接近的人所从事的手艺。卡尔普“在俗世”是个“斯特里戈利尼克”，即理发师。③ 卡尔普、助祭尼基塔和另一个“在家人”被教会逐出，接着被流放沃尔霍夫。但是异端没能被制服。斯特里戈利尼克派否定“世界普世会议”，否定教会的整个教阶制度和僧侣生活，否定“收贿”出卖教会职位，斥责僧侣不体面的生活方式和贪婪行为(“夺取农民的地产”)，否定神甫，抛弃一系列教会仪式——圣餐礼、忏悔，等等。他们按严肃的生活方式生活，“黎民百姓”公正地把他们当作宗教界的榜样，声称“这些人(指斯特里戈利尼克派——马夫罗金注)不掠夺，也不夺取地产”。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401页。

② 指世俗人士，与出家人相对。——译者

③ 按照另一些资料，斯特里戈利尼克派得名于修剪呢绒和丝绒的手工业者。

恩格斯指出："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①恩格斯强调指出，市民阶级的要求归结为一个"廉价的教会"②。"从形式上看来，凡是异教都是反动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独霸的僧侣等级。"③

斯特里戈利尼克派出来既反对封建教会，又反对社会不平等、富人和高利贷者（他们"有财产是为了奴役和出卖自由人"），反对奴役平民，反对卖身契约和奴役性的依附关系。

"异端派"自任人民的"教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研究"书本上的语文"，成为有教养的人，尤其是对官方教会和政府有危险的人。斯特里戈利尼克派"迷惑人民"不只一个10年。同"可恶的异端"作斗争的一切措施全都徒劳无益，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尼尔和大主教斯特凡的努力则是微弱而没有说服力的——斯特里戈利尼克派的"该死的语词"为群众所接受和理解，强有力而鲜明。早在1429年就已有人同"异端派"斗争，后来这个斗争一直继续着。

斯特里戈利尼克派还没有被消灭，而新的"异端"皈犹教派却开始出现了。皈犹教派是斯特里戈利尼克派的直接继承者，某些"异端派"的告发者（如根纳季等人）干脆把他们称做斯特里戈利尼克派。但是按"异端派"的阶级成分，按"异端派"的社会思潮以及按照其思想基础，皈犹教派全都与斯特里戈利尼克派不同。皈犹教派大概不是一个统一的教派，而分为几个派别。应当说他们的成分也是如此。

---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0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在自己的先驱者斯特里戈利尼克派之后，皈犹教派也否定教会和教会的教阶制度，否定委派神甫时“受贿”，否定僧侣和“神殿”，抛弃圣礼、圣徒干尸、圣像。皈犹教派走得更远，他们宣布基督耶稣是人，而不是“上帝的儿子”，信仰唯一的父——上帝，认为应当执行《摩西法典》。官方教会预言“世界末日”为7 000年(即公元1492年)，这个预言的不灵，使皈犹教派的观点得到加强。

皈犹教派成员的特点是学识渊博。他们在天文学、数学、哲学、逻辑学、医学、药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关于这些，将在后文述及)很广博，处于当时先进科学水平。皈犹教派成员反封建教会的斗争和他们对科学的兴趣，使他们在人民中声名远播。“异端”的劲敌约瑟夫·沃洛茨基写道：“人们还没背教加入皈犹教派时，便已对从他们处学到的圣传多所指责，在市场上和家中，人们关于信仰进行热烈辩论并持有怀疑。”

当谈到家庭中的“辩论”(争辩)时，家庭是各种各样的——“异端”也传到了大公家中，这从官方教会观点看来还算不得大祸，但是“在市场上”关于信仰的“热烈辩论”却证明，“异端派”在以市场为政治生活中心的市民中间博得了同情，在对当时制度的公正、合理性“持有怀疑”，对教会、对国家“持有怀疑”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博得了同情。1490年在“异端派”遭到镇压之后，他们之中许多人从诺夫哥罗德四散逃走，分散到各城、各村，继续宣传他们的异端学说，那个时候皈犹教派同劳动人民群众的联系对统治上层变得特别危险。“异端”遍及罗斯许多城市，传播到乡村，吸收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参加，“那么多的人毁了，他们的人数无法计数”。在这一阶段中皈犹教派的运动也是城市人民社会意向的反映。在追随皈犹教派的“在家人”中有商人谢苗·克列诺夫、书吏伊斯托马和斯韦尔乔克，制造书(“写书”)的手工业者黑伊万。

正如我们已说过的，皈犹教派的“异端派”比斯特里戈利尼克

派的“异端派”复杂。在皈犹教派中我们可看到封建主、有势力的神职人员、国家领导人，甚至还有接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人物，但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就接近了封建主阵营内部斗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述及。

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时期的城乡劳动群众的境况便是如此，他们的反对封建制度、反对俗世封建主和宗教封建主的斗争形式便是如此。

罗斯封建社会统治上层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领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其成分也有许多变动。古老的莫斯科领主家族：科什金家族、萨布罗夫家族、切利亚德宁家族，莫罗佐夫家族、克瓦什宁家族、沃龙措夫家族、布图尔林家族等，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在40家古老的领主家族之外，如今增添了不少于150家新的领主家族。这些新的领主家族主要出自被归并和废除的各公国封邑王公，即：帕特里克耶夫家族、里亚波洛夫斯基家族、奥博连斯基家族、霍尔姆斯基家族、别利斯基家族、库尔布斯基家族、舒伊斯基家族、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家族、沃罗滕斯基家族，等等。这些出自留里克后裔或格季明后裔的有爵位的王公家族充满了整个莫斯科，占据了全部高级职位。他们占据领主议会的席位，在各处执政，以“全罗斯国君”的名义进行审判，统率军队，等等。过去莫斯科王公所依靠的莫斯科旧领主，受到同自己的领主和仆从一起来到莫斯科的富有而显贵的王公们的排挤，逐渐降低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在领主本身中间，如今形成了几个阶层；领主们“争权夺位”，他们注视着，以免“陷于”不够贵显的地位，即别让他们不晋爵升位；为了“爵位”他们展开无穷无尽的争吵、争执和争讼。这时他们所考虑的只是是否显贵。完全以“出身”，即以显贵程度、是否贵族为基础的“门第制”，是守旧的王公手中的既反对君主专横，又反对能“超越”他们的新兴贵族、领主后裔和各种侍从的斗争工具。

封邑王公随身带着封建割据时代的制度进入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是伊万的侍从和“奴仆(荷洛普)”,他们以小名(阿列克谢耶茨、费奥多列茨、瓦休克)自称，害怕伊万的大声呵叱,但是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中他们照旧认为自己是王公和全权的主宰者。他们甚至经常在自己的领地上留下全权代理人，而这只是巩固他们的地位而已。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利是世袭的，绝非大公“所颁赐”。封邑王公把自己看作世袭的统治者，他们把莫斯科看作特殊的集合点,从那里他们将重新统治整个国家,而不像祖祖辈辈那样各自统治一个地区,他们将以整个领主杜马共同治理国家。

所有这些意图都与伊万的政策相违背。伊万不能容忍在任命将军、总督、法官时人们限制他的权力,而把名门世袭的、但常头脑不清、在留里克后裔“名望”、“门第”问题上一丝不苟的人塞给他，以代替机灵的、尽管非名门世袭的服役贵族、“自由侍从”、领主后裔、书记后裔等人。按照“名门世袭”任命职位绝不符合伊万的利益,因为一切君主专制政权可以“使卑贱者成为王公”,不需要推崇“门第”。大公受到为数众多的新兴贵族、工商区居民、教会和莫斯科旧领主家族的支持，不能容忍变得愈来愈蛮横无礼的封邑王公的要求。于是伊万坚决制止了他们的狂妄企图。

1500 年，“由于狂妄地自作聪明”，王公谢苗·里亚波洛夫斯基被砍了头，王公伊万·尤里耶维奇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帕特里克耶夫被迫落发为僧。与里亚波洛夫斯基同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但宗教界为他们央求使他们保全了性命。伊万也不能容忍出征时各自率领军队擅自行动的专横恣肆的王公们。在出征斯摩棱斯克时,王公们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分散行动,抢劫多于作战。德米特里为此事向父亲诉苦，伊万便下令以“专横跋扈”罪将参加出征的许多王公处死。

王公们企图以全权代理人身份在自己世袭领地上站住脚，并

象过去他们统治公国那样统治世袭领地。为对付这些企图，伊万向各世袭领地推行义务兵役制，限制领主支配其世袭领地的权力，逐渐将王公军队划归自己的经常不按“门第制”规则任命的将军管辖。靠“名门望族”，而“受封的”世袭领地的数目日益增多。（王公）“出走（投奔别处）的”权利废除了，其实是已经无处可“去”。只剩下立陶宛一处（可投奔），但那里天主教又占支配地位，并且加强了对罗斯人、东正教徒的迫害。“王公后裔”领主失去了自己往昔的权力，他们在领主杜马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是时候了，于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儿子开始把他们象“庄稼汉”那样从自己身边赶走。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自己世袭领地的主宰者、大部分土地的领主，仍享有过去按照“封赐证书”赋予他们的特权，他们的势力仍很大，他们有无法计数的财产，他们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是巩固和稳定的。

王公们沉静了，但没有投降。只有伊万三世的孙子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雷帝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统治阶级的这个反动派别的抵抗力量，消灭封建分散的政治制度。

傲慢的王公后裔领主在政治上的企图是想在领主杜马推行自己的路线，这就迫使伊万竭力绕开领主杜马，并把经常成为王公的真正谋士的宫廷贵族和书记聚拢在自己周围。宫廷贵族于是成了伊万所依靠的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

我们已经看到宫廷贵族从“自由侍从”和“宫廷仆役”或“宫廷侍从”中产生出来。从15世纪起，宫廷贵族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首先，宫廷贵族失去了离去权。为王公效劳如今成了他们必须遵行的。对他们的酬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过去他们除土地外还得到王公收入的一部分——“俸禄”，如今由于效劳，他们只取得土地——“庄园”。取得庄园地产而不是取得世袭领地，成为地主而不是成为世袭领主。世袭领地为世袭的地产，而庄园则是王公因效劳所

取得的终身地产。与土地一起当然也“赐给”他们农民，这些农民由地主通过徭役和代役租进行剥削。“自由侍从”、宫廷贵族过去只担负宫廷服役，如今必须服强制的“军役”。总的说来，服军役如今成为为王公效劳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过去为王公经济服务的“宫廷仆役”，如今也开始担负军役。这两群人获得了“国君的军职人员”的总名称。大公和“全罗斯的国君”需要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它也由“国君军职人员”即服役贵族和领主后裔组成。服役贵族人数增多起来。封邑王公的“宫廷”被废除，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领主的土地被没收，归并于莫斯科的其他地区的领主被“迁移走”，大批小仆从、“仆役”、简直是奴仆的“宫廷所辖”人口被释放。他们全都加入了服役贵族的行列。“领主后裔”——“境况恶化的”、少土地的或完全丧失土地的领主兼世袭领主的后裔，也加入了服役贵族行列。由于自己的效劳，服役贵族“受赐”土地。罗斯的第一批“地主”、“庄园主”（这样的称呼最早见于1497年法典）就这样产生了。地主——服役贵族或“领主后裔”的处境有些特别，——其庄园地产的最高主人被认为是“全罗斯的国君”，而他，地主，只在为国君效劳时可使用这块土地。但是服役贵族地主逐渐开始在司法和税收方面享有世袭领主的同样权利。事实上，既然儿子与父亲同样地为“全罗斯的国君”效劳，庄园地产便固定于这样的“军职”人员家族。宫廷土地、“官地”、从领主处没收来的土地，都作为庄园地产分给服役贵族。但这些土地为数不多，而且大公不打算让自己没有土地和臣民。因此服役贵族的目光愈来愈频繁地转向教会和领主的地产，又因为领主是国君的政敌，所以大公在同领主作斗争时可以指望服役贵族的程度与服役贵族对大公的指望程度相同。封建主阶级内部新的进步力量为服役贵族，这个人数众多、迅速增长的小官宦集团，即服役贵族和“领主后裔”，不仅组成大公的武装力量，而且也成为他的政治依靠。阶级利益、集

团利益，有时又和服役贵族的私人利益以及巩固起来的大公的君主专制政权利益交错在一起，这种复杂情况成为服役贵族和君主专制制度紧密结合的基础，并构成整个俄罗斯历史的特点。服役贵族作为封建罗斯的较先进经济形态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代表者，作为统治阶级的进步阶层走向政权，发财致富，人数增多，政治上得到加强。

服役贵族也成为一股可怕的军事力量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柱。当然，与此相联系，农民的境况有所改变。从今以后农民必须供养军职人员，如果出征，农民必须作为其奴仆从征。稍后16世纪时，例如：占有100切特韦尔季[①]土地的新兴贵族本人必须“骑马”服军役，每增加100切特韦尔季地产，必须再提供一名骑兵。转为庄园制和庄园军队(制)使农民的境况恶化。

大批国家土地连同土地上的农民一起“赏赐”给军职人员。例如，伊万三世刚要归并古老的诺夫哥罗德地区——沃德行政区时，根据1500年登录册，仅是其所辖两个县，即拉多日斯克县和奥列霍夫斯克县就有106个莫斯科地主，支配着3 000户农民和住在那里的4 000个农民及地主的家仆。当时在莫斯科国家的所有各地区可看到大批地段分给军职人员。博罗夫斯克、克列梅涅茨、诺夫哥罗德、特维尔和莫斯科的地产均分给了“地方行政长官”和“军职人员”。在边远地区，地产“分赐”得尤其多——这些边远地区是：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地区，斯摩棱斯克、与塞维尔地区接壤的边区，“荒野”边区，奥卡河沿岸及其他边境地区。在这些地区与服役贵族的民兵最先发生冲突的是波兰—立陶宛军队、瑞典军队、德国军队和鞑靼军队。

这些土地上的农民被分给了服役贵族，因为当时唯一的经常、稳定的收入来源于土地和农民劳动；大公把土地及其全部农民劳

① 40俄丈长×30俄丈宽的土地面积(1俄丈等于0.71米)。——译者

动给服役贵族作为酬劳是最容易的。服役贵族组成的地方军队巩固了大公政权。往往不出自名门而出自侍役的服役贵族为了土地、农民，为了"国家的赏赐"，准备赴汤蹈火。而领主王公以自己的傲慢态度和"贫贱寒门"望尘莫及的"门第"固步自封，他们敌视新兴贵族。

服役贵族懂得，只有打倒聚集在大公宝座周围的领主世袭贵族，他们才能上升为统治阶层，成为在政治权力方面、在支配土地和农民方面的主宰。在这方面，服役贵族与君主专制制度有共同的敌人。君主专制制度依靠服役贵族，而服役贵族寻求君主对自己的支持。

封建主统治阶级本身内部的两个阶层——服役贵族和领主世袭贵族之间的斗争就这样逐渐成为不可避免，这个斗争在16世纪后半叶之初爆发，即实行所谓的"沙皇直辖制"(опричнина)。

随着罗斯合并成统一的国家，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也必须改变。

当罗斯四分五裂，每个公国还是一个独立的半国家，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特点"[①]时，甚至当莫斯科大公的权力已经扩展到那里时，旧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已不能满足统治阶级的要求了。

统一的罗斯需要中央集权的、巩固的行政管理。

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不是一下子产生的，而是逐渐形成的，不是像伊万雷帝和彼得大帝时那样短期内系统改革的结果，而往往从旧行政管理形式中以积累经验的方式，按需要逐渐形成；新的行政制度与旧的行政管理形态相结合和同时并存。

达尔罕证书[②]("颁赐的特权证书")是封邑老规矩的残余，根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4页。

② 达尔罕为古代蒙古社会里的一种称号。获得达尔罕证书的人可免除对主人的人身隶属关系、赋税和徭役，并享受各种特权。——译者

据这种证书宗教和世俗的大封建主不仅享有对其世袭领地居民的领主权，而且享有国君的权利。他们的世袭领地保持独立的领地地位，国君的臣属无权进入其中。甚至连军职人员(服役贵族)有时取得领地中的土地时，也拥有对农民的审判权，只是“不得杀人和抢劫”而已。

国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变了样，产生出新的官僚集团。在过去封邑时代，如果不算饲鹰、马厩等各“部门”，就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各种事务的不是机构，而是受“命”办理各种事务的领主。到如今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时，委托办事的指令变为发布指令的机构。中央行政机构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除古老的领主杜马外，产生了“官署”或“衙门”。产生了掌管外交事务的外交事务衙门和御库、御马监、内宫管理局、驿站管理局、粮食局、奴仆管理局，以及掌管服役贵族和军队的吏部衙门，后来又产生了地产管理局。16世纪初的罗斯共有10个中央官署。每个官署掌管全罗斯境内的一定事务或执行对外的一定职能。掌管大公私人财产、大公金库和档案的称御库，掌管宫廷土地和人口的称内宫管理局，掌管大公马群的称御马监以及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产生的其他官署，都是这样的官署。另一些官署则是由于罗斯武装力量的扩大和改造以及罗斯国际地位的巩固而建立的。掌管组建新兴贵族的军队以及任命、“分配”地产的吏部衙门就是这样的官署。发展起来的罗斯同东西方的联系导致外交事务办公厅的建立，后来扩展为掌管外交的外交事务衙门。奴役制依附关系的发展导致荷洛普(奴仆)管理局的产生，该局将所有的卖身契登记入册。还有管理一定区域的官署。根据若干资料，伊万三世曾将全国划分为“三大区”，即：弗拉基米尔区、诺夫哥罗德区和梁赞区。管辖“三大区”专设的各官署也以“三大区”命名。

各官署的首长为“法官”、领主或王公，但是实际上官署事务由

书记、书记助理、科长和只能理清复杂而千头万绪的文牍处理的衙吏掌管。书记是官署的真正的主宰者。

随着官署的发展和复杂化，随着文牍处理和各机构所起作用的提高，官署官僚开始有了重大意义，领主和君主本人不得不向他们征询意见。君主宁可避开领主，甚至避开官署首长，直接去找书记。书记、书记助理和其他"衙吏"的政治意义大大地发展起来。

地方上的行政管理也起了变化。过去各地由从王公或领主中委派的全权代理人和乡长管理。由于效劳，他们取得"俸禄"和"税收"。由此他们被称为"食邑贵族"。农民和市民"按索哈"缴纳"俸禄"。食邑贵族还取得税收，即：审判税、关税、婚姻税等收入。食邑贵族显然使人民付出了昂贵的费用。食邑贵族按照赋予他们的权力的充分性，很像封建割据时期的"附庸"王公，而通过食邑贵族管理地方的制度本身乃是封邑时期的残余和它的让位。食邑贵族在其所管辖的地区感觉到自己好像就是封邑小王公。

伊万三世时地方政权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方面开始起变化。食邑贵族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和监督。出现了限制食邑贵族的专横恣肆的颁发给各地区(如别洛奥泽罗)的专门的规章文书。

1497 年由书记弗拉基米尔·古谢夫编纂的伊万三世法典不仅为中央官署的工作定出了规则，而且也为地方行政管理定出了规则。法典规定了食邑贵族的权利，限制了他们的专横恣肆，扩大了他们对大公所负的责任，确定了他们的义务和权利的范围。颁发给食邑贵族的规章文书确定了"俸禄"和"税收"的数额，而且俸禄已经不由他们自己收取，而由城市的百人长和农村的村长收集。缩短了食邑贵族担任该职位的任期。地方上选任的当权者，即城市的百人长和农村的村长，被吸收参加行政管理。

根据 1497 年法典，"地方选任者"被吸收为全权代理人和乡长的法庭的成员。他们从"善良"、"优秀"者即富裕者中间选出。他

们审判偷窃和抢劫等"坏"事。这些案件不再由食邑贵族审判，因为食邑贵族靠这些案件大发横财，他们为所欲为。"地方选任者"在北方，即在"耕种国家土地的"地区的行政管理权特别巩固。这些措施具有十分积极的性质，因为它们削弱了全权代理人和乡长的权力，减轻了人民群众处境的困难，批准和加强了选任者的"地方"行政管理权。在官地、国家土地上建立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受选任的村长和百人长管理。他们分配村社的土地，进行"分派"——分摊和征收国家赋税，制定使用村社牧场、森林、捕鱼区等可用地的规则，同"国家官吏"进行谈判。村长和百人长从"优秀者"即富裕农民中选出。

官地的总额逐年减少，寺院、领主、服役贵族的地产靠占有官地而发展起来，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数也减少，不少农民转变为受奴役的农民、农奴。只有严寒的罗斯北方吓跑了封建主，罗斯北方仍然是官地和自由的、有进取心的、勇敢的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出色的罗斯沿海居民的边区。

在改造国家行政方面的所有这些措施都加强了"君主专制的"大公政权。伊万三世依靠地方军队、服役贵族、各种衙门，愈来愈可以没有领主自行解决问题，对领主杜马置之不理。领主杜马照旧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但是其性质和成分发生了变化。它的工作变成经常性的，职能复杂化了。如今远不是所有领主都可以参加它的工作，同君主一起"开会"。领主必须"受恩赐"，才能在领主杜马中"开会"。

"领主"一词本身如今开始既表示领主——世袭领主、大土地所有者，又表示领主杜马的成员。"侍臣"是第二种"领主杜马成员"。根本不是每一个领主都有可能成为"受恩赐"的领主。甚至连"侍臣"的称号也并非全体领主都能获得。可是服役贵族的代表——"进入杜马的领主世袭贵族"、后来称为"杜马服役贵族"者加

入了杜马。还出现了"杜马书记"。伊万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时代的领主杜马成员中的服役贵族和书记仿佛预示了从"王公"出身的有爵位的领主的未来。

实际上，领主杜马成了封建割据旧制度的残余——领主后裔、被国君一下子"封"为"领主"的留里克后裔、格季明后裔的集中地。他们把领主杜马看作他们这个阶层的机关，想通过杜马控制国家，影响国君，以保持其昔日权利和特权的残余。因此领主杜马也成为反动的领主反对派反对壮大起来的君主专制政权和中央集权机构的集中地。

当然，"全罗斯的国君"为了管理国家在领主杜马之外力图寻求支持，并在服役贵族和正在产生中的官僚身上找到了支持，服役贵族和官僚到时候将在"事实上"治理"俄罗斯国家"①。真正的国家行政主要不是集中于杜马，而是集中于中央各衙门。好妄自尊大的领主还可以以自己的"门第"自豪，每天从清晨起傲慢地高踞于杜马中，但是建立国家机器所需要的真正细心和耐心的复杂工作在中央各衙门中进行，那里的全权主宰者是书记。国家机器——君主专制政权的支柱和工具，就这样地形成了。

大公的金库财赋有相当大的增加。征收作为过去王公主要开支的"贡税"、礼物的凶恶贪婪的金帐汗国不复存在了。一系列地区和城市的并入也使大公的收入大为增加。规定了土地税、户税和手工业税。伊万三世从农民那里征收"按'索哈'征收的税"。为了安排好税收，他登记了必须按"索哈"纳税的全体农民人口。"索哈"数和课税数额各不相同，在乡村中取决于土地性质，在城市中则取决于各户的富裕程度。

此外，对各种各样出售的商品征收各种税。对采掘场也征收

---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255页。

税。国库从各项专营中获得巨额收入，熬制蜜酒、啤酒和利用啤酒花成为国库的专利权。实物税日益为货币税所取代。大公国库就这样充实起来。国库的富足巩固了大公政权。

伊万三世还使铸币事业起了变化。如果说过去每个公国有自己的货币体制，各自铸造货币，那末如今钱币的铸造被集中于莫斯科。

为了巩固各地区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伊万加强了所谓“驿站”的邮政往来。“驿站”徭役由农民负担。从农民中征集了“驿站车夫”，规定了一定的车马费，出现了管理驿站事务的专门人员。向居民征收新的税——“驿站钱”。“驿站”像一种邮递站，各站之间相距25—30俄里[①]，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在三天内从莫斯科到达诺夫哥罗德。

为了管理驿站服务，建立了驿站管理局。驿站徭役改进了各地的联系，减轻了各地区同中央来往和各地区相互间来往的困难，但它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管理罗斯各地的统一的行政制度就这样在中央和地方上形成了。与统一的行政相适应，有了统一的法律。1497年创立了对罗斯全国统一的法典。其目的是巩固封建主对农民和其他被剥削的依附者的统治，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制度，建立统一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度。这是欧洲第一部统一的法典，它证明了罗斯法学思想的成就（当然是在封建社会制度的范围内）。

罗斯武装力量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在过去封建割据时代，罗斯武装力量是由各封邑王公的亲兵队和各城、各地的民兵组成的。如今，“全罗斯国君”的军队的主要部分由服役贵族组成。诚然，仍然还有各王公、领主“尽力”招募并率领作战的亲兵队。列宁注意到这个特点，他指出，直到17世纪罗斯“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

① 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队去作战的”。①有时还征集“按索哈征集的军队”。

服役贵族骑兵用军刀、矛、弓和装满箭的箭袋、六叶锤、短锤、短剑武装起来，尖顶的头盔、环甲(铠甲)、钢护臂和膝甲是保护宫廷侍从军战士抵御敌人的武器。

“按索哈征集的军队”的武装包括斧、猎熊矛、钺、长木棒、弓箭、刀。出现了未来常备军（弓箭手和炮兵）的先驱者——“火枪手”队。“火器战”开始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1382年莫斯科保卫战时，罗斯人首次运用了火器。«尼康编年史»在1382年栏中述及保卫莫斯科抵御脱脱迷失的鞑靼人时，记载说:“市民们尽力向他们射箭，投掷石块，用弩弓和‘秋非亚基’发射，用石头撞击，拉紧弩弓，又是‘波罗基’，又是‘秋非亚基’；有些人就用那些炮向他们投射”。较早的编年史«沃斯克列先斯克编年史»、«叶尔莫林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也都有同样的记载。“波罗基”和弩弓不是火器，“炮”和“投射”二词只从十四世纪末起被固定用于“火器战”；至于说“秋非亚基”，这个词源于东方，源于突厥语，在俄语中固定用于“火器”，表示罗斯最早的炮。“火器战”出现于罗斯境内不应归功于西方。当1389年从西方“德国人处”运来第一批“阿尔马特”时，罗斯的第一批炮——“秋非亚基”已在莫斯科城墙上架设7年以上了。

14世纪至15世纪初罗斯最早的炮是什么样子的呢？在细长的铁炮筒上箍上了粗铁环。粗糙地锻成的附加铁弹膛带有把柄，在弹膛中央装进用填药塞填塞住的火药瓤弹药（16世纪时才开始把火药制成颗粒)；弹膛接在炮筒上，并用楔形物固定住。由于用来消除气体突破的零件装配得不准确，弹膛同炮筒的联接处涂有粘土，用湿麻絮填塞住，缠上破布。炮筒嵌入木块里。没有炮耳和

---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24页。

瞄准器。用烧红的铁条或导火索放到起爆引线孔上点燃弹膛里的弹药。这种炮的炮弹射程不超过300米，而速度取决于每小时发射一发或几小时发射一发。我们所知道的15世纪初的这种炮和类似的炮有好几尊。

甚至很难说，什么是"秋非亚基"——是特别笨重的手持火器，或是较轻便的炮；那时还没有区分枪和炮。恩格斯指出："火炮起源于东方这一点，还可以从欧洲最古的火炮的制造方法中得到证实。那时，火炮是用锻铁条焊成圆筒、外面用大铁箍箍紧而制成的。火炮由几部分组成，可拆卸的炮尾部是在射击时待火炮装填完毕后才装在炮筒上的。中国和印度最古的火炮也完全是这样制造的，它们同欧洲最古的火炮属于同样早的年代，甚至更早。"①

14世纪和15世纪初罗斯的炮（我们有权把"秋非亚基"看作14世纪和15世纪初罗斯的炮）无疑属于这样的"东方"型的炮，尽管这些炮当然不是在东方的某地制造的，而是在罗斯当地由第一批逐渐转为炮匠的铁匠制造的。

当时的火器只有三个优点：炮弹（核、弹头）的穿透力，精神上的效果（轰隆声、火焰、烟）以及未来的前途，但是前两个事实是可看到和感觉得到的，而第三点只有高瞻远瞩、有远见的眼睛才能见到。

再次提到"火器战"见于1408年关于也迪该围攻莫斯科的编年记载中。"秋非亚基"和炮重新又被谈到。

火药不再是罕见之物。早在1400年，由于"制造"火药，"莫斯科上空已整夜发出火光"。

火器成为罗斯的普通东西，并且造就了在伊万三世时、甚至大概在失明者瓦西里时就已出现的专门炮兵、掩蔽枪手、火枪兵部队，而在伊万雷帝在位时，俄罗斯炮兵"队伍"就炮的质量和完美

① 恩格斯：《火炮》，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195页。

性、炮筒的质量、炮手的技巧而言可认为是欧洲较好的。16 世纪时游历莫斯科的外国人(巴尔巴里尼、科边采尔等人)或伊万雷帝在位时同莫斯科军队交战过的外国人都谈到了这一点。

15 世纪末,除了用扁铁锻成、用铁环固定住的炮外,出现了用青铜铸成的炮,青铜炮的出现使 16 世纪时铁炮完全被排挤掉。

1475 年,威尼斯工程师阿里斯托泰尔·菲奥拉文蒂及其儿子安德烈和"青年人彼特鲁沙"来到俄罗斯。罗斯铸炮业的发展从此与这个人的名字紧相连。在斯帕斯基门附近,"制炮厂"工作起来。罗斯炮匠的机灵和聪明使他们有可能很快超过"海外的"智慧。罗斯制炮巨匠雅科夫及其学生罗斯"炮匠"伊万和瓦西里的名字是我们所知道的。留传至今的最古老的炮筒铸成于 1485 年,那上面留有题词:"雅科夫列夫的学生万尼亚和瓦修克"。我们的炮就这样产生了。

火器的出现在俄罗斯军事艺术史上起着重大作用。罗斯的保卫能力加强了,炮兵不断发展和完善,罗斯炮匠的制炮技艺兴盛。罗斯炮质量之高、数量之多,16 世纪莫斯科罗斯炮匠的技艺之精,使外国人感到惊讶;这不是偶然的。

火器的推广对罗斯各地统一为以君主专制政权为首的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事业也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①

火器在罗斯迅速推广,15 世纪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武器。

"火器"——最早的炮就这样在罗斯出现了,罗斯人就这样"懂得了用炮发射"。火器战进一步分化。出现了手持的火器——"火绳枪"。与"火绳枪"一起,出现了火枪兵队伍——射击手团队的先驱。最早的火枪兵出现于莫斯科。编年史于 1510 年首次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 3 卷,第 207 页。

到火枪兵。在各城市中，在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等城市的城市居民中间募集火枪兵。火枪兵只在出征时被募集，靠他们自己或派遣他们的城市供养。

火器的出现引起城堡建筑的改革。开始建筑能较好地抵御炮弹的角楼，考虑到城墙遭受射击的情况建立了其他塔楼。城墙厚度增加得相当大。建造了各种设备以便城墙"底部"和中部安置大炮。改造了普斯科夫、伊兹博尔斯克、波尔霍夫、拉多加和莫斯科的城墙，建立了伊万戈罗德的城墙。在罗斯边远地区，在与"荒野"接壤的边境地带，在罗斯坚强的警卫队孜孜不倦地守卫国界线的草原上，"建筑"了若干城堡。主要的守卫线沿着奥卡河延伸。这就是所谓"沿岸界线"，每年春天处于沿着谢尔普霍夫、卡卢加、卡希拉、塔鲁萨、科洛姆纳、阿列克辛等城狭长地带的军队各团前往"沿岸服役"。后来随着罗斯边界向南扩展，"警卫队"愈来愈远地向草原迁移，在草原上散布警卫岗，建立警卫的瞭望台，机警的战士用烟火把鞑靼人有可能来犯的危险通知罗斯。罗斯军队的改革以及火器的出现和推广加强了罗斯，帮助罗斯解决最重要的外交问题，帮助巩固了罗斯的国际地位。

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央集权行政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并以服役贵族军的形式产生了常备军。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常备军的产生是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的证明。

斯大林强调指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和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是两个不同的题目，虽然不能认为它们是互不相关的。"①

君主专制制度究竟是怎样在罗斯形成的呢？

伊万三世从"大公"取得"全罗斯的国君"这个尊号后强调指

① 斯大林：《给茨维特柯夫和阿雷坡夫两同志的信》，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61页。

出，从此以后存在的不是莫斯科、梁赞、特维尔、雅罗斯拉夫尔等等，而是罗斯，即俄罗斯国家。实际上在其在位时大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的基本特征已形成。莫斯科不再是公国的中心，而成了国家的首都。伊万三世时俄罗斯国家的巩固则是由奠定对农民的有秩序的封建剥削的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所造成的，由有能力组织对外敌斗争和消灭封建割据的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所造成。这个中央集权政权，“全罗斯的国君”和“专制君主”的政权，依靠组织得很好的军队和国家机构。

伊万三世竭力强调所有这些变化。大公政权受到尊崇的结果首先是大公从“并列者的首位”变为罗斯唯一国君后尊号的改变。他已经不是伊万，而是“受上帝恩赐的全罗斯国君兼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不里阿耳等地区大公”约安。在一系列公文中伊万被称为“全罗斯沙皇”和“专制君主”。他从挣脱鞑靼桎梏时(1480年)起成了“专制君主”和“沙皇”，因为直到那时之前罗斯王公们是从作为“皇帝”的(蒙古)汗“手中”取得领地的。在过去，处于金帐汗国统治下的罗斯人民的观念中的“皇帝”是蒙古大汗和拜占廷皇帝。如今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上帝终于使汗国变了样”，正如过去顿河王德米特里盼望已久的挣脱可憎的鞑靼桎梏那样，金帐汗没有了。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对大公的“沙皇”最高权力提出异议。

大公宫廷本身也有变化。伊万三世时设置了一系列新的宫廷官职：御前侍臣、御前鹰猎侍从、御马监助理、管理雪橇者，等等，建立了宫廷职官制度。豪华奢侈、“富丽堂皇”、复杂的宫廷典礼、向沙皇鞠躬，成为罗斯宫廷的特点。伊万三世的驻地——克里姆林宫在改变面貌。罗斯和外国工匠建造起教堂、宫殿、塔楼和厅堂。新的国徽——拜占庭帝国的遗物双头鹰被采用，尽管也保留了画有象征罗斯军队在库利科沃原野战胜金帐汗的胜利者格奥尔吉扭

转"蛇"用矛刺杀的旧的莫斯科徽章。

1472 年，伊万三世同末代拜占庭皇帝的侄女卓娅·帕列奥洛格(嫁到罗斯后改称索菲娅·福米尼奇娜)结婚，这就使某些"文人"有理由认为，拜占庭"帝国"归"全罗斯国君"所继承。伊万三世成为"帝都(即君士坦丁堡)公主"的丈夫后，开始被他们公认为东基督教"真正东正教"世界的领袖。

16 世纪末产生了"关于弗拉基米尔大公们的传说"，该"传说"断言：按编年史记载莫斯科王公为留里克的后裔，留里克是著名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兄弟普鲁斯的 14 代孙。因此，罗斯王公家族不折不扣地出自罗马(皇族)。(传说中)还提起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他是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莫诺马赫的孙子，据说，祖父曾"赐予"他王冠。① 普斯科夫城的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僧人菲洛费上书伊万之子瓦西里三世说：所有的基督教王国汇合成了他的一个王国，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东正教国王，莫斯科是第三个和最后一个罗马(帝国)。

两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由于叛教而灭亡，"往昔的笃信宗教"传统由于"上帝的恩赐"只保留于罗斯东正教沙皇所统治的莫斯科。而第四个罗马则没有("往昔的笃信宗教"传统)。君主专制思想体系就这样被东正教徒书籍专家所创建。

教会使伊万三世的政权神圣化，把他尊为沙皇和专制君主，尊为整个大罗斯国在其"往昔国境"中的国君。而重新统一罗斯、恢复罗斯独立这一点在君主专制思想体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于是在伊万三世身上"全罗斯的国君"战胜了"帝都公主"的丈夫。

无论是伊万三世、瓦西里三世或伊万雷帝都没有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同卓娅·帕列奥洛格的婚姻，把取得拜占庭皇位的"权

① 由此产生了著名的"莫诺马赫王冠"。

利”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工具，他们没有觊觎拜占庭继承权，没有把它同自己的沙皇尊号联结起来，尽管他们不放弃自己同拜占庭皇帝们的姻亲关系。他们所向往的并非如菲洛费所创造的“莫斯科——第三罗马(帝国)”理论所要求的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国君”，而是向往成为“全罗斯的国君”，认为自己“从来”就是“本国”的国君，所信奉的“并非希腊人，而是基督”。

而且尽管菲洛费顽固地把“世界王国”思想硬塞给“全罗斯的国君”，但当时的政府文献却不同于这种思想，它们坚持罗斯国君从来有权取得帝王尊号，进行君主专制统治并拥有其对基辅国境内的所有罗斯各地的权利。

罗斯的宫廷习惯也不同于拜占庭。罗斯的“富丽堂皇”和对国君的颂扬远非宣布皇帝为圣者的拜占庭习惯。拜占庭皇帝实际上是教会首脑并供奉神灵，而在罗斯，大公只领导世俗政权。

罗斯君主专制思想体系是在罗斯形成的，而不是卓娅·帕列奥洛格及其随从人员输入的，把大公看作全罗斯国合法和有无限权力的国君是罗斯君主专制思想体系的基础。

罗斯的君主专制制度就这样地逐渐形成着。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封建关系的发展、封建压迫的加强不能不引起广大劳动群众的抗议。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形成的同时，一方面沙皇与新兴贵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沙皇与领主世袭王公之间的矛盾暴露了出来。宗教界中间也产生了分裂。如果说第一种矛盾造成市民和农民对当时制度的不满和反对，那末第二种矛盾其实是统治阶级本身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是他们争夺权力、争夺优先地位、争夺土地和农民的斗争。

这些矛盾的思想表现形式首先是“异端”这种宗教流派的产生。封建社会时期的宗教斗争经常只是阶级斗争的表象。我们已经涉及皈犹教派“异端”，因为它反映罗斯各城市劳动人民的社会

斗争。但是皈犹教派"异端"是很复杂的社会运动，它传播于宗教界和封建上层中间。它的这个特点首先是由"异端"仿佛是罗斯的一种宗教改革运动所造成的，这种宗教改革运动与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时期对确立其方位的那种知识的渴求有关。根据传说，"异端"是 1471 年同米哈伊尔·奥列利科维奇的侍从一起来到诺夫哥罗德的基辅犹太人学者兹哈里亚带来的。在最早的皈犹教派中间有学识渊博的诺夫哥罗德教士杰尼斯和阿列克谢；除他们之外，有许多教士、助祭、书记和老百姓加入"异端派"。当伊万三世接触皈犹教派时，那时它还没有被官方定为异端，他注意到该派教徒，加以拉拢，让阿列克谢和杰尼斯担任内城宫廷大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和阿尔汉格尔斯基大教堂的神甫。他们在莫斯科使后来成为都主教的修士大司祭佐西马、领主杜马外交书记费奥多尔·库里岑和伊万三世的其他许多书记"加入了异端派"；伊万·马克西莫夫甚至让大公的儿媳、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妻子叶连娜也"加入了异端派"。

某些莫斯科商人，例如克列诺夫等，成了"异端派"。阿列克谢和库里岑对伊万三世有很大影响。"异端派"在"全罗斯国君"的宫廷中为自己筑了巢。

宗教界起初没有认识清楚皈犹教派的学说，到 1487 年时大主教根纳季才发现了"异教经书"。于是同"异教"长期进行斗争。皈犹教派的保护者——费奥多尔·库里岑，佐西马，甚至还有伊万三世，确实很强大。皈犹教派成员的特点是具有当时不寻常的渊博学识。犹太人的神学书——《圣经》被他们首次译成俄语。皈犹教派拥有许多天文学、星相术、医学方面的书籍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哲学家著作等等的一系列译本。他们否定教会拥有土地和"贪财"，揭露宗教界的贪婪和富有，否定教会仪式。宗教界由于缺乏"学识"，经常在同皈犹教派争辩时遭到失败。

皈犹教派反对教会拥有土地的斗争对伊万三世很有吸引力。寺院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伊万需要土地以分赐给“军职人员”——新兴贵族。因此他不让“异端派”受欺负，支持他们。

但是不能长久地继续如此。反对整个封建教会和当时制度的“异端”归根到底是人民运动。因此伊万三世跟“异端派”走的不是一条道路。

1504年召开了宣布皈犹教派有罪的宗教会议。伊万·库里岑（当时已去世的费奥多尔·库里岑的兄弟）、伊万·马克西莫夫、德米特里·科诺普列夫、卡西安、涅克拉斯·鲁卡沃夫和另一些“异端派”被处死。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异端”的死敌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根纳季的要求、“异端派”被放在火堆上烧死——这是西方天主教各国先进思想代表者所受的死刑。根纳季拥护对“异端派”使用酷刑，效法西班牙国王，这不是偶然的。

15世纪末，宗教界上层非常关心教会拥有土地的命运问题以及同大公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重要问题按不同方式加以解决。

在正统教会内部产生了也反对教会拥有土地和“贪财”的派别。这是以尼尔·索尔斯基为首的所谓“禁欲派”、“伏尔加河中下游东岸地区长老派”。尼尔·索尔斯基出身于古老的莫斯科领主迈科夫家族。他是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的僧人，后来在索拉河上别洛泽里亚建立了隐修区。1508年尼尔·索尔斯基死后，出身于被贬黜的领主格季明后裔帕特里克耶夫家族的斜眼瓦西安成为领导“禁欲派”的他的继任人。

“禁欲派”提倡退出散发着“恶臭”，充满着沉溺于淫佚、情欲的人们的世界。尼尔·索尔斯基在其《隐居条规》中要求远离尘世浮华，提高道德修养，要求同情欲，首先同“贪财”作斗争。他的严厉性格和爱真理以及隐修区修道士的热爱劳动使他博得了声望和人们的敬重。在对“禁欲派”的教育中有一个问题使打算在其索拉河

畔的隐居中“拯救”自己和他人的尼尔卷入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他的学生和继任人斜眼瓦西安使他卷入了政治斗争，然而放弃政治活动和斗争对这位过去的外交家和统帅来说又做不到。问题是教会拥有土地。“禁欲派”是教会拥有土地的反对者，尼尔·索尔斯基于1503年在宗教会议上首次发表了以反对教会拥有土地为目的的激昂慷慨的演说。“禁欲派”反对拥有土地——这一点符合伊万三世的利益，但他们拒绝给予伊万三世通常教会给予王公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宗教界应当只限于教会的事，——这就使“全罗斯的国君”不满意。

当尼尔·索尔斯基在1503年宗教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约瑟夫·沃洛茨基发言反驳说，这是“开始……行动，要让寺院没有村庄，让百姓住在荒野里，用针线活养活自己”。

伊万·萨宁即约瑟夫·沃洛茨基出身于军职人员家庭。他作为组织者和读过许多经卷的人，是个卓越的管理人材。他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建立的修道院是不断迅速发展的大经济世袭领地。约瑟夫·沃格茨基在其修道院中建立了“严格的共同生活”制度，按财富和出身的显贵程度把僧人分成等级，严格遵守“规矩”和表面仪式。约瑟夫·沃洛茨基作为封建主和教会制度、“规矩”的维护者参加了当时罗斯的社会政治生活。他压迫皈犹教派，也反对“禁欲派”。人们注意地倾听了约瑟夫·沃洛茨基在1503年宗教会议上的演说。这位修道院长兼世袭领主坚决保护教会拥有土地的权利。宗教会议的大多数人拥护他，不久，宗教界的绝大多数成为“约瑟夫派”。但是伊万三世支持“禁欲派”。国君需要土地以分赐给军职人员；没收诺夫哥罗德寺院和大主教的土地只激起了他的欲望。“约瑟夫派”齐心协力的压迫成功了——伊万三世放弃了对“禁欲派”的支持，但是“约瑟夫派”答应在一切事情上无条件地尽力支持国君。伊万三世还把“异端派”——皈犹教派成员交给约瑟

夫·沃洛茨基进行残酷迫害。站在斗争双方背后的到底是什么社会力量呢？领主世袭贵族甘愿支持“禁欲派”，他们认为，没收寺院土地能满足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服役贵族所缺乏的土地，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王公、领主的世袭领地上转移开。此外，领主估计，在分配教会土地时也许也有他们的份。而且，在“禁欲派”一旦获胜的情况下，国君失去了教会的支持，就会自愿或不自愿地重视王公。支持约瑟夫·沃洛茨基的是军职人员——服役贵族和“领主后裔”，以及领主和宗教界的大多数。最后，大公也站到了他一方。

伊万三世及其子瓦西里三世同约瑟夫·沃洛茨基的紧密联盟和友谊持续到1515年约瑟夫去世为止。“禁欲派”和“约瑟夫派”的斗争不顾两个运动的创始人的死去，后来在瓦西里三世时代仍继续进行。斜眼瓦西安靠政治上的敏锐性继续尼尔·索尔斯基的事业，并取得巨大成功，都主教丹尼尔则领导“约瑟夫派”，这两个人都是出色的善辩者和政论家。1518年从亚陀斯半岛来到俄罗斯的出身于阿尔巴尼亚的“具有非凡力量的英雄僧人”马克西姆·格列克站到了斜眼瓦西安一边。马克西姆·格列克是当时的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曾在巴黎、佛罗伦萨、威尼斯学习，听过萨沃纳罗拉的布道演说，研究过神学、哲学、历史、文学，懂得古代和现代语言。

马克西姆·格列克起来反对教会拥有土地，他成为斜眼瓦西安思想的捍卫者和他的朋友。尽管马克西姆·格列克赞同的并非“禁欲派”的全部见解，但是瓦西安的个人影响，他的“笔记本”、“收藏品”和所收藏的《拜占廷法律汇编》，他的自尊心，深信自己的正确和优势地位，使得马克西姆·格列克同领主和教会中的瓦西里三世的反对派——“禁欲派”亲近起来。

必需指出，力图建立以强大的君主专制政权为首的强大统一

国家的“约瑟夫派”，是包在教会学说外壳里的社会进步思想的表达者，而“禁欲派”及其宗法制的夙愿以及力图退出政治生活、建立独立于世俗政权的教会，则反映了罗斯教会中的保守因素。

1525和1531年的宗教会议宣布“禁欲派”有罪。1531年宗教会议后，斜眼瓦西安被监禁于约瑟夫一沃洛科拉姆斯基修道院，而马克西姆·格列克则成为特维尔的奥特罗奇修道院囚徒。

“约瑟夫派”获得胜利。罗斯教会的进步派别胜利了。

俄罗斯国家形成时期反映出它的复杂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斗争的社会派别便是如此。

第十一章

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

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大俄罗斯民族形成的过程。

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问题可以在研究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得到解决。斯大林同志的一些独创性的著作与其有关民族问题的著作同样地使人们有可能彻底研究东斯拉夫各民族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历史。

斯大林在谈到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所固有的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时，首先确定了氏族和部落的概念，指出部落是一种民族学的范畴。①

氏族和部落是原始公社制度所特有的人们共同体形态。

在封建社会产生和国家形成的时期，为原始公社关系最后阶段所特有的部落联盟让位于更复杂的共同体。斯大林把这个共同体确定为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②

东斯拉夫各族的民族发展道路和阶段是怎样的，俄罗斯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语言是确定民族归属的。东斯拉夫诸语言形成于很遥远的时代。

---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553 页；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291 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553—554 页。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和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民族）这二个词，斯大林在其一系列著作中交替地使用过。见《斯大林文集》，俄文版第 2 卷，第 303—304，349—351 页；第 5 卷，第 47 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俄文版，第 6 页。

斯大林指出:“可以推想，现代语言的要素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奠下基础了。”① 这就是说现代语言的要素在原始公社制度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

“那时语言是不复杂的，词汇是很贫乏的，但是有它的语法构造，虽然这种构造是很原始的，但总算是语法构造。”②

斯拉夫各族在语言上的亲属关系是一种要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现象。

斯大林写道:“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理论的表现。其实，不可否认，语言的亲属关系，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带来很大的益处。”③

如果我们企图回答我们可称为斯拉夫人的人类共同体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这个问题，那我们首先必须着手分析斯拉夫诸语言。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构拟逐渐形成斯拉夫语的最古老的诸语言的特点，确定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及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从而确定留传至今的斯拉夫诸语言最古老成分出现的大致时期。

氏族制度的斯拉夫名辞“氏族”、“部落”、“长老”、“谓彻”等以及表示亲属关系的名词“父亲”、“母亲”、“儿子”、“祖父”、“老婆”、“孙子”、“兄弟”、“姊妹”、“妯娌”、“叔伯”、“儿媳”、“婆母”、“公公”、“姑子”(丈夫的姊妹)、“舅舅”、“小叔大伯”(丈夫的兄弟)等在一切斯拉夫诸语言中都能遇到，为它们全体所共有，这就证明斯拉夫人氏族组织的形成过程处于斯拉夫人不可分离的、关系密切的时期。

---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4—565 页。

② 同上，第 565 页。

③ 同上，第 570—571 页。

按母系计算亲属关系这一方法的保存下来和语言中相应名词的存在，对有史时期的斯拉夫诸语言来说是非常突出的，——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产生的远古时代的残留现象、母系氏族的残余。

为一切斯拉夫语言所共同的表示鸟、兽、鱼、捕鱼和狩猎工具及手段的一系列名词的存在，证明早在农人占据的地区开始讲斯拉夫话之前，早在狩猎和捕鱼盛行的时期，在欧洲居民中就已有过斯拉夫语的成份。

狩猎和捕鱼的工具名称"弓"、"箭"、"弓弦"、"箭袋"、"大鱼网"、"袋形鱼网"、"捕鱼篓子"等等，以及鱼、禽兽的名称"鱼"、"鱼卵"、"鲈鱼"、"狗鱼"、"冬穴鱼"、"圆腹鲦"、"斜齿鳊"、"鲤鱼"、"棘鲈"等等，都是诸斯拉夫语共同的名称。

有没有一些氏族联盟，其成员在说话时使用的词是斯拉夫人按斯拉夫语发音的？没有。这是斯拉夫人的先辈，他们的语言不复杂，其特点是语法结构简单、词汇很贫乏。他们的语言还包含有如下远古时代的许多古老特征：当时欧洲有随着退去的冰河北进的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渔猎民的小氏族群所讲的语言。如果早在欧洲渔猎民的氏族组织阶段，就已发现斯拉夫诸语言的萌芽，当时牧人的畜牧业刚诞生，农业刚开始出现，那末当畜牧业、农业先后成为欧洲居民的主要职业时，斯拉夫诸语言无疑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

斯大林在说明从古代到现今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性质时指出："从粗笨的石器过渡到弓箭，与此相联系，从狩猎生活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原始畜牧；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铁斧、铁铧犁等等），与此相适应，过渡到种植植物和农业。"[①] 在同一时期，过渡到陶器

---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2页。

生产。①

这是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时期。在这个远古时代，全体斯拉夫人处出现了如下共同的名词：如"陶罐"——这是陶器生产产生和发展的证明；如"公牛"、"母牛"、"犍牛"（公牛、牛犊）、"绵羊"、"羊羔"、"马"、"马驹"、"牛奶"、"干酪"、"酸奶油"、"黄油"等——这些都是原始畜牧业产生的证明。

仔细分析所有斯拉夫诸语言中的农业名词，使我们可以说它们有惊人的相近之处，甚至可以说它们是相同的，尽管斯拉夫各族互相分离（过去就已分离），相距很远。下列共同的词汇是野蛮时代中期逐渐盛行于斯拉夫人处的农业的痕迹：如"谷类"、"丰富"、"食物"、"小麦"、"黍米"、"谷粒"、"耕耘"、"木犁"（古代的犁）、"犁"、"耙"、"石铲"、"镰刀"、"播种"、"农人"、"田地"、"种籽"、"耕地"、"低湿林地"、"生荒地"、"小丘"、"熟荒地"、"犁沟"、"大镰刀"、"春播作物"、"秋播作物"、"面粉"、"筛子"、"磨盘"、"谷仓"等。在蔬菜栽培方面，可以指出诸斯拉夫语共有的下列词汇：如"豌豆"、"春季豌豆"、"葱"、"蒜"、"芜青"、"啤酒花"、"罂粟"、"杂草"、"除草"等。

月份名称基本上与农业劳动的周期相符的古代多神教的农历也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农历迄今依然存在于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等斯拉夫各民族中。

因此，对各种斯拉夫语的具体分析再次证明了斯大林关于现代语言有远古时代成分和斯拉夫各（近现代）民族语言有亲属关系的论断的独创性。

远古时代是斯拉夫人语言和文化最具共同性的时期。后来，在民族大迁徙时期，斯拉夫各部落"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

---

①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2页。

合了"①，开始形成具有许多共同性、但同时开始独立为三个语支的西斯拉夫、南斯拉夫和东斯拉夫部落语言。东斯拉夫人语言的基本特点在6至7世纪时就已初具轮廓（"城市"，西斯拉夫语作грод，南斯拉夫语作град，而东斯拉夫语作 город；"乌鸦，西斯拉夫语作врона，南斯拉夫语作врана，而东斯拉夫语作ворона，即形成所谓"全元音音组"；产生了к、г为ц、з取代的现象，例如цвет（颜色）代替了квет，звезда（星）代替了гвезда；е为о取代，例如олень（鹿）、озеро（湖）、осень（秋）代替了елень、езеро、есень，а为я取代，例如яз、ягне代替了аз、агне，不发音的元音ъ、ь同流音辅音的结合，齿音д、т的软化，等等）。

在斯拉夫人于东欧广阔地域分散开来的过程中，东斯拉夫诸部落语言同非斯拉夫部落语言融合，在融合时东斯拉夫语言经常成为胜利者，这种情况造成东斯拉夫语言中的若干地方特点。

8到9世纪时，在罗斯的先进地区部落制度衰亡，让位于国家。东斯拉夫人以往语言的统一被政治生活的统一所补充。

以基辅国家的建立为结果的社会发展，引起东欧居民民族成分的巨大变化。

东欧地区国家组织的巩固对罗斯民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基辅国家把东斯拉夫各部落联合成统一的政治机体，用共同的政治生活、文化、宗教把它们联系起来，并促进了罗斯和罗斯民族的统一概念的出现和巩固。

罗斯各城市、各地区之间发展起来的贸易联系；由于王公的"贤能之士"主宰一切和管理的结果而形成的罗斯各地居民之间的往来；王公国家的和世袭领地的行政机构的扩大和推广；王公的亲兵队、领主及其"少年侍从"对新疆土的不断开拓；出巡，征收贡税，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5页。

审判，自愿或按照王公意志迁移，分别迁到各地和垦殖；一起旅行、出征和在贸易中相遇，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加在一起促使东斯拉夫各部落结合成为统一的民族。

邻族方言渗入部落语言、方言中，其他各地罗斯和非罗斯人的日常生活特点也渗入各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罗斯各地的语言、风俗、习惯、日常生活、制度、宗教观念虽仍保留了许多不同之处，但同时又具有了一切罗斯地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由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 所以在东欧斯拉夫居民统一方面的这些变化首先也是沿着加强语言共同性的路线行进的，因为民族形成的基础是语言。

不能把列宁关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思想，理解为别的，只能理解为它直接指出了语言是人们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我们在斯大林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发现了这个思想，该著作认为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第一个特征。[2] 斯大林在其《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指出：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对社会一切成员是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

①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载《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08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1—62页。

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①]

归根到底，一个人或人的集体的民族属性不是由人类学的、种族的特征，不是由服装和日常生活的类型，武器、建筑或家具的类型，而是由语言来确定的。

斯大林指出："文化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东西。"[②]

罗斯各部落的语言与罗斯部落日常生活相一致。东斯拉夫人的每一种部落语言与其他部落语言即"罗斯的斯洛温语"有许多共同点；同时又有许多不同特点，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变化造成了东斯拉夫人民族发展的新阶段。

斯大林指出："生产的继续发展，阶级的出现，文字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的发展，商业更需要有条理的书信来往，印刷机的出现，出版物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中许多部落和民族分解了和离散了，混合了和融合了……"[③]

生产的发展造成罗斯的原始公社制度为新的封建制度所取代，阶级的形成和古代罗斯的基辅国家的产生，商业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古代罗斯文学语言和古罗斯文学的发展，——这一切总起来造成了罗斯各地区东斯拉夫人语言特殊性的消除、古罗斯语言的发展和罗斯民族的形成。

斯大林指出："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④]

与基辅国家的产生相联系的东斯拉夫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应当不可避免地引起和已引起过他们语言的变化。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561—562 页。
② 同上，第 559 页。
③ 同上，第 565 页。
④ 同上，第 561 页。

如果说4至8世纪时斯拉夫各部落“分解了和离散了”[1]，迁入东欧的草原、半森林半草原地带和森林地带，形成了地方的语言特点，那末在8、9世纪之交以及后来，当东斯拉夫人为政治统一奠下始基时，发生了“从部落语言到民族语言”[2]的进一步发展过程。

早在古代，在罗斯国家观念萌芽时期，从基辅兴起时起，“罗斯境内所使用的”林中旷地土话就吸收了来到当地的斯拉夫族和非斯拉夫族人的语言成分，并发展成为全罗斯的语言。

由于远途贸易、迁移、一起出征、执行各种国家职务等等的结果，这种全罗斯的语言推广到了全罗斯各地。

全罗斯语，确切些说是作为公共口语的古代罗斯语言，就这样诞生了。

人民群众在创造全罗斯口语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保存有方言特点，但它仍成为全罗斯各地通用的语言。“客商”的旅行、手工业者自愿或按王公意志的迁移、战士的“分布”于罗斯各地、各部落的战士迁入罗斯国境、当王公及其周围的亲兵尚未故步自封于军事封建社会上层中时，当出身平民而成为王公亲兵的编年叙事诗中的扬·乌斯莫什韦茨和壮士歌中的伊利亚·穆罗梅茨[3]有可能出现时，各城市民兵在王公战事中起的重大作用，——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民群众在全罗斯口语的形成中起了决定作用的证明。全罗斯口语中的方言特点日益消失。罗斯城市语言在这方面尤其突出。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化，它日益复杂起来，吸收了战士、僧侣的专业化语言，即不供人民群众使用、而只供狭窄的社会上层或一定职业的人使用的特殊行话。市民的语言、首先是“基辅市民”的语言，开始逐渐影响到也在向全罗斯共同语言方面演进的乡村居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页。

② 同上，第553页。

③ 完全不应当由此认为他们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是，在人民的记忆中保存着一个普通战士可能发生这种演变的那些时代的回忆。

民语言。

在古代罗斯流传极广的民间叙事诗(歌曲、传说、壮士歌)的语言,以抽象概念、规范和其他叙事诗因素为特点的鲜明、丰富的语言,"博扬人"、"旧时代歌手"的语言,在全罗斯语言的创造中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早在《罗斯法典》之前、至少在《罗斯法典》时期就已形成的法律文书、法规的语言,公文语言,在全罗斯语言的形成中占有显著地位。早在基里尔和梅福季进行活动之前很久,这种语言就已从口语中发展出来。以古罗斯口语为基础,只用古斯拉夫文献语言修饰的古罗斯文学语言在11世纪时就已形成。东斯拉夫方言和部分古斯拉夫语是丰富的古罗斯文学语言的养料。这就是古罗斯文学语言非常丰富,发展水平很高,以及有丰富的修辞和词义的原因。

"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恩格斯语)① 的俄罗斯语言的最初阶段,便是如此。

那时的俄语是全体东斯拉夫人所用的语言。这是一种基辅时期、古罗斯国时期所用的东斯拉夫语、古罗斯语。

总之,语言是决定俄罗斯民族统一的首要因素。

现在让我们来叙述俄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

为了确信我们祖先的民族统一感、爱国主义感情、对祖国的热爱、祖国观念、罗斯国观念发展的程度,他们在"罗斯"、"罗斯国"这个词中贯注的多么大的无所不包的概念,只消一瞥我们的史料就够了,这些史料反映了古罗斯人们的思想,甚至只消肤浅地知道古罗斯的传说也就够了,这些传说反映了人民的思想体系。

《往年纪事》("记罗斯国是从何而来的,记最早开始统治基辅的王公,记罗斯国是从何产生的")、都主教伊拉里昂的《论法规与

①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98页。

神恩(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亚科夫·姆尼赫的«纪念和赞颂 (Память и похвала)»、«伊戈尔远征记»等古罗斯文献的瑰宝是反映古罗斯民族自觉感的古罗斯爱国主义的辉煌古文献。

这些古文献中充满了热爱罗斯国土的感情，它们自豪地讲到罗斯人民及其光荣的英雄业迹。基辅时代文人的著作中充满了从"切尔文各城"到特穆塔拉坎，从拉多加到奥列希耶的罗斯国土的统一意识、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

这个统一意识是基辅时代具有同一祖先的东欧三个兄弟斯拉夫民族在历史上的最大贡献，由于这个统一意识，形成了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和莫诺马赫时期的罗斯民族。

就在这个时期，从佩列梅什尔和别尔拉季，从普里亚舍夫和乌日戈罗德，从小加利奇和别利兹直到穆罗姆、梁赞，罗斯托夫和弗拉基米尔，从拉多加和普斯科夫，伊兹博尔斯克和别洛奥泽罗直到奥列希耶和特穆塔拉坎，形成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生活方式的统一；这种统一简直出现在一切方面——从建筑艺术到民歌民谣，从装饰品、木头雕刻品到婚姻仪式、迷信传说、歌曲、谚语，从家具、服装到语言的残遗物；直到现今，还有使喀尔巴阡山的古楚尔人、列姆基人同梅津河、奥涅加河地区的俄罗斯农民相似的统一性，使格罗德诺的白俄罗斯人同梁赞森林的居民相似的统一性。在这种统一性中，我们看到基辅时代给俄罗斯历史留下的巨大遗产，因为它，我国历史的基辅时代，使罗斯人成为罗斯国的罗斯人。统一的意识，即心中记得在利沃夫、加利奇、沃伦的弗拉基米尔、别列斯季耶、霍尔姆、雅罗斯拉夫、普里亚舍夫、胡斯特、乌日戈罗德、基辅、明斯克、波洛茨克以及克利亚济马河上的弗拉基米尔、特维尔、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雅罗斯拉夫尔、苏兹达尔、加利奇·梅尔斯基住着的都是以共同起源、相近的语言文化、共同的宗教、基辅时代的历史传统联系起来的同样的"罗斯人"的这种统一的意

识，永远不会从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中消失。无论是拔都的入侵、沉重的鞑靼桎梏，还是立陶宛、波兰领主、匈牙利大封建主、摩尔达维亚领主的长期统治，无论是落在大罗斯民族所有三个分支身上的荒乱年代或艰难经历，都不能磨灭这种意识。东斯拉夫人的所有三个分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保留着语言的一致性，任何压迫也不能使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放弃本族的语言。"历史表明，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对强迫同化的极大的抵抗力。"①

使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联合起来的共同点不仅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有共同的起源，而且也是因为早在基辅时代罗斯人及其国家的历史初期，罗斯各地的居民之间就曾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联系。基辅时代在东欧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就在于此。

现在大概不会有什么人怀疑9至10世纪时东斯拉夫人形成统一的罗斯民族。

在古老的联系和传统的基础上，在东斯拉夫人种族共同性的基础上，在自古以来语言共同性的基础上(因为"语言结构，即语言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许多时代的产物"②)，在逐渐形成的共同的风俗习惯、日常生活、法律、宗教、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一致的基础上，罗斯民族的统一意识开始在日益兴起的古罗斯国家中、在国际舞台的统一行动中、在为"罗斯国土和信仰"的共同斗争中、在共同的政治生活条件下，形成起来。罗斯人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同一信仰、同一语言、同一风俗习惯、("自己父辈的"风俗习惯)、同一习俗的人，是具有同一心理气质的人，

---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4 页。

② 同上。

是自己国家——罗斯的儿女。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民族的远祖——基辅时代的罗斯民族就这样地形成了。

对东斯拉夫人历史上基辅时代所特有的东斯拉夫人联合体，我们可以给它下个甚么定义呢？

对联合成统一的罗斯人的东斯拉夫人联合体，应当定为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斯大林指出：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取代了氏族和部落。民族在封建主义时代就已形成。罗斯的封建主义在9世纪时就已产生。列宁指出："农奴制可能使而且是成世纪地使千百万农民处于闭塞状态（例如：俄国从9世纪到19世纪……）。"①

因此可以认为我们已判明：在基辅国时代东斯拉夫人形成了统一的罗斯人，或具体地说，形成了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但是方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进一步统一的过程，东斯拉夫人进一步融合成统一的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过程，却被罗斯的封建割据所中断以及主要被拔都入侵、罗斯国土被侵占，罗斯西部、南部、东部各地被瑞典、立沃尼亚骑士团、立陶宛、波兰、匈牙利、摩尔达维亚、金帐汗国侵占所中断（后一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罗斯国土破裂，被分隔开，陷于各种历史环境中。当然，罗斯人民也就被分割为隔离开的几部分，互相疏远，被政治边界所分开，经济方面各自独立。

所有这些历史环境决定了东斯拉夫人的进一步民族发展道路。经过各自分离的封建割据阶段，罗斯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并未形成为罗斯历史上基辅时代已初具轮廓的一个民族，而却联合成东斯拉夫人的三个兄弟民族，即：俄罗斯（狭义的罗斯）民族本身或大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

① 列宁：《左派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77页。

封建割据开始于11世纪，到12世纪时终于形成。

东斯拉夫人融合成统一民族的过程逐渐停止、缓慢下来，接着便中断了。没有被基辅时代的共同性所消灭的、从各部落和罗斯各地继承下来的旧的语言特点，被封建割据时期产生的、由封邑时期罗斯各公国的经济、政治互相隔绝所造成的新特点搞得更加复杂化了。

与封建割据时期大规模的各"独立的半国家"(斯大林语)、封邑时期的大规模的各公国相一致的各个种族构成体开始出现。

正如"罗斯"(统一的罗斯国家)让位于各个"独立的半国家"(公国)一样，基辅时代形成的统一的罗斯民族也让位于东斯拉夫人的互相隔离的各地方的种族构成体，即封邑时期各"民族区域"(列宁语)的居民：普斯科夫人和诺夫哥罗德人，下哥罗德人和梁赞人。

难怪列宁指出：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存在民族区域。①

为语文学家们所熟悉的一个事实，即俄语方言区的疆界与封建割据时期各大公国(莫斯科、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梁赞)的疆界有时非常一致，这也不是偶然的。

东斯拉夫方言的疆域封闭性和分散性在13—14世纪是很突出的。统一的倾向衰退。

各部落方言和各地方的方言按照新的方式在各封建公国疆界内定形。

有自身语言特点(ч与ц，ш与с，ж与з相混淆，р读硬音，把无重音的о а音化，у与в的更替)的普斯科夫人，о音化的、有自身词汇特点的诺夫哥罗德人，а音化的梁赞人，о音化的、但不按诺夫哥罗德读音的沃洛季梅尔人，以及其他居民群，构成罗斯各"民

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载《列宁文稿》，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190页。

族区域"的居民。

在方言中残存着现在已不存在的各区域居民间的这样一些关系，是方言的值得注意的特点。

例如，古代的诺夫哥罗德公国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的疆界迄今仍保留在罗斯西北部的语言特点中，只不过稍有变动而已。

这种例子可以列举许多。封建割据时期是罗斯各公国边界将罗斯人民分割、隔离的时期。

这种分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封建主从上面实行的，与人民群众的看法、意图相抵触。我们抛开由罗斯各公国封建上层政治生活特点所决定的地方文化特点，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不仅在11世纪、而且在12世纪仍继续存在，只是到12—13世纪以及其后的时期才开始出现地方特点突出的情况。

罗斯各公国间政治、经济上的长期隔绝是封建主所固有的对闭关自守的向往的结果，这种状况开始影响到居民，并决定居民的语言、文化特点。

开始出现方言的发展(普斯科夫方言、诺夫哥罗德方言、莫斯科方言、下哥罗德方言、梁赞方言、特维尔方言)，出现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某些地方特征。

这是这样的时期，当时罗斯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这些公国不仅没有用民族的纽带彼此联系起来，而且根本否认这种纽带的必要性"。①

在谈到罗斯民族的历史时，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有些国家中，"同一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准备为地区利益牺牲民族的统一。而我们(除诺夫哥罗德外)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民族统一

①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89页。

的意识始终对地方意向占有绝对优势”。

在发展这个完全正确的思想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必需强调指出：“罗斯分裂为各封邑，纯粹是王公之间的瓜分所造成的……，而不是罗斯人民本身的意向所造成的”。因此，“封邑的涣散性没有在人民的观念中留下任何痕迹，因为它在人民的心中从来没有扎下根”。①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使我们能够有把握肯定地说：封邑王公和谓彻城市的领主是分立主义、孤立隔绝、“内讧”和“混乱”的体现者，是否认本民族必需有亲密联系的罗斯统一、罗斯人统一的反对者，但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渴望达到统一，反对封建割据，从未丧失罗斯人统一的感情。

而罗斯的封建割据快要结束了。

正如东斯拉夫各部落从前形成古罗斯民族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一样，后来 14—16 世纪在罗斯西北部和东北部，各“民族区域”即各公国的罗斯居民形成为大俄罗斯民族也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封建割据制度消灭的进程以及以君主专制政权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从普斯科夫到下诺夫哥罗德，从扎沃洛奇耶到荒野边区的罗斯国土被莫斯科合并成统一的国家。

从楚德湖到奥卡河下游，从北德维纳河和别洛奥泽罗到谢伊姆河之间的罗斯居民联合成统一的大俄罗斯民族，则是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保留着部落语言残余的封建割据时期的各地方言融合成为统一的语言。

大俄罗斯民族在克里维奇人（不包括其波洛茨克地区分支）、伊尔门湖的斯洛温人、维亚季奇人和塞维里亚人（其大部分）的古代部落疆域上逐渐形成。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18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541 页。

带有各地方言的大俄罗斯语言是在罗斯中部方言和罗斯北部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与罗斯南部方言和罗斯中部方言相近的塞维里亚人的方言以及独特的弗拉基米尔一苏兹达尔方言也成为大俄罗斯语言的组成部分。

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例如: 住在波罗特瓦河的戈利亚季人)和迅速罗斯化并完全(维西人除外)融合在罗斯人中间的芬兰一乌戈尔语系部落(梅里亚人、维西人、穆罗马人)参加了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过程; 当然,这些部落把某些语言成分和日常生活特点带给了罗斯人。

斯大林在谈到某种语言成为胜利者而造成几种语言融合为一时指出:

"例如,俄语就是这样,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同好几个民族的语言融合,并且总是成为胜利者。

"当然,俄语的词汇由于从其他语言中取得了许多词而充实起来了,但是这不仅没有使俄语削弱,相反地,使它丰富和加强起来。"①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是相伴而行的过程,是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方面。

"大俄罗斯"民族、"大俄罗斯人(великороссы)"这些名词可以代之以"俄罗斯"民族、"罗斯人(русские)"等名词,但是可选定великороссы(大俄罗斯人)一词,因为这可以避免把基辅时代的罗斯民族与伊万三世及其儿子、孙子时期的罗斯民族相混淆。

大俄罗斯人(великороссы)这个名词见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

列宁把他的一篇直接论述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民族自觉感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7 页。

情的著作正是题作«论大俄罗斯人（великороссы）的民族自尊心»的，在该文中他到处使用了 великороссы 这个名词。斯大林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及其他著作中也使用了 великороссы 这个名词。① 至于 Великая Русь(大罗斯)这个名词,则必须注意到它的起源是很古老的。"大罗斯"的概念见于表示全罗斯国土时，在这个含义上它不仅在最古的罗斯文学名著(如«鲍里斯和格列布的故事»)中获得反映，而且很早，即从 12 世纪起就见于外国文学作品中(如:长篇小说«坎迪亚的富尔卡»中的 Roussíe la large(大罗斯),长篇小说«布弗·德·安托纳»中的 Roussíe la grant(大罗斯))。13 世纪时"大罗斯"一词专门表示罗斯国土的北部，尽管14世纪"大罗斯"一词又用于表示整个罗斯国土。 15 世纪甚至 16 世纪时,我们见到"大罗斯"一词也有这两个含义。直到 16 世纪时,从普斯科夫到鄂毕河，从冰海到"荒野"的莫斯科罗斯才开始被称做"大俄罗斯(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莫斯科罗斯的居民获得了大俄罗斯人(великороссы)的名称。"大俄罗斯人"一词最早见于帕姆瓦·巴兰达的著作中(1627 年)。

俄罗斯(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道路呢?

经济状况是俄罗斯民族形成过程的基础。

斯大林指出了经济因素在罗斯合并为统一国家中的意义。②列宁写过文章论述建立民族国家的经济上的必不可少的条件。③

罗斯各地区、各公国的经济联系及其相互间的政治联系是大俄罗斯(狭义的罗斯)民族形成的基础。

我们知道：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不能形成（近现

①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 2 卷,第 304 页;第 5 卷,第 36 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161 页;斯大林:«贺词»,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5—537 页。

③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载«列宁文稿»,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1 版,第 190 页。

代)民族(нация)，因为(近现代)民族是出现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在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形成时期形成的是俄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

因此，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早在封建时代，在消灭封建割据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就年代而言，是在14—16世纪。这一时期已有了(近现代)民族的各个要素——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但当然还不可能说到(近现代)民族的产生。

斯大林指出:"当然，(近现代)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是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近现代)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①

这时在俄罗斯居民中间到底形成了可把他们定为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并在某种有利条件下将来可把他们定为(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的哪些要素呢?

让我们从任何一个种族构成体的基础——语言开始吧。

罗斯(大罗斯)语言的形成，发生在伏尔加、奥卡两河之间的古代罗斯托夫一苏兹达尔公国疆土上;罗斯中部诸方言的东半部和罗斯北部诸方言是促使它发展的环境。

罗斯民族的形成主要发生在大罗斯中部地带，该地带居民的过渡性方言在消除语言界限方面胜于所有其他地区的方言。

处于大罗斯南部诸方言和大罗斯北部诸方言交接处的莫斯科方言久而久之成了大罗斯语各种方言，确切些说即各种地方、"地域"方言(特维尔方言、梁赞方言、下哥罗德方言、普斯科夫方言、诺夫哥罗德方言)围绕的核心。莫斯科居民的方言同时既按大罗斯

①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第289页。

北部方言 o 音化，又按大罗斯南部方言 a 音化。

最近时期的考古发掘证明：莫斯科位于维亚季奇人的地域上，是维亚季奇人的城市；这些发掘使我们有可能接受、发展和补充如下设想，即：莫斯科的人民群众、其远古维亚季奇居民的语言是 a 音化的，而其当时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罗斯托夫、佩列雅斯拉夫尔来的封建上层分子的语言则主要是 o 音化的。

尽管从 14 世纪起，莫斯科领导了统一罗斯的事业，但当时的莫斯科方言只不过是形成中的大俄罗斯语的方言之一。只要我们估计到当时甚至象弗拉基米尔大公国这样强大的封建政治联合体境内的各公国、各地区都具有十足或几乎十足的独立性，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但正是在 16 世纪初形成的共同地域的基础上，共同的语言形成起来。大俄罗斯（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形成和发展起来。当然，方言语词、土语还很强大，它们在乡村中留存了几百年，诺夫哥罗德方言仍与莫斯科方言同样地很流行，只是到了 17 世纪，即列宁所定义的俄罗斯历史的“近代”，各地区的方言才统一化为俄罗斯民族语言。斯大林指出：“随着……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的形成，（古代）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就发展成为（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而（古代）民族的语言也就发展成为（近现代）民族的语言”。①

俄罗斯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就是 17 世纪，这是全俄罗斯民族市场、民族联系形成的时期。

但是 16 世纪时反映人民群众语言的莫斯科书面语言、莫斯科“读书人”和官吏的语言，就已经成为全国的语言，与它竞争的诺夫哥罗德方言、梁赞方言这两种最独特的方言在对大俄罗斯语言作出贡献的同时，便退居次要地位，逐渐成为主要在诺夫哥罗德和梁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54 页。

赞乡村使用的语言，甚至成为几乎只在这两地乡村使用的语言。斯大林在谈到部落和(古代)民族的共同的语言时指出: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者(古代)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却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从属于自己。”①

在罗斯也是这样。

莫斯科方言吸收各地的方言、土语和各“民族区域”的居民词汇，使自己大大地丰富起来。16世纪时，随着罗斯收复以往被立陶宛大公侵占而丧失的国土和各“边区”，莫斯科方言久而久之受到大罗斯南部方言的强烈影响。我们还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改革中找到对这个现象的解释。伊万雷帝实行的对领主的“逐一触动”和“打击”，下令把他们迁走，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国君的军职人员”等措施，彻底铲除了“世袭领主”的巢穴，把他们驱散，把他们连同“全家老少”和奴仆一起迁走，因为这些巢穴在o音化的北部和东北部连成一大片，而伊万雷帝的由军役贵族担任的直辖军(опричник)成了这些地区的新主人，这些直辖军往往出身于莫斯科国南方“边区”或西南“边区”的小军职人员，十分自然，他们的a音化词汇、他们的元音系统便开始渗入到北方。

生动的语言、民间语言愈来愈多地进入公文和书面语中。这是由于俄罗斯“文人”如此特具的民族自尊心所致，民族自尊心使他们不回避民间语言，而把民间语言吸收进自己的语言中。

除了生动的民间语言、劳动群众语言、所有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语言、市镇语言、“军阶标志不同的”各类军职人员语言以及尽管“为祖国给陛下服役”但“收入”与射手、炮手区别不大的小军职人员的语言之外，“各地区”、“各边区”的土语也进入莫斯科的书面语中。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3—554页。

这样的"边区"首先是乌克兰北部，即库尔斯克、普季夫利、雷利斯克、克罗梅、奥廖尔、谢夫斯克、斯塔罗杜布等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答同志们》中写道："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一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一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①

愈来愈与社会中等阶层，即军职人员、官吏、市镇居民的生动口语接近的新的书面语就这样形成起来。这种言语在某些场合成为文牍的一种语言形式。

俄罗斯书面语的各种风格，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各种社会方言和职业行话，就这样形成起来，俄罗斯民族语言就这样形成起来。

斯大林指出："语言作为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语言对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人们，即各社会集团、各阶级对于语言远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极力利用语言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把自己的特殊词汇即特殊用词和特殊用语强加到语言中去。在这一方面，那些脱离人民并且仇视人民的有产阶级上层，如贵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创造了'阶级的'方言，习惯语，沙龙'语言'。"②

斯大林进而指出，再没有比把这些方言、习惯语当作语言更错误的了。③

15—16世纪罗斯的社会方言和习惯语，也不是独特的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民族语言的形成，并指出其形成的不同途径时指出："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

---

①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78 页。

②③ 同上，第 554 页。

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①

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形成过程，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形成民族语言的这种途径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丰富而富有表达力的，铿锵有力而漂亮的，响亮动听而鲜明的俄罗斯民族语言就这样地形成起来。

由伊万三世和他儿子的成功的统一政策所固定下来的俄罗斯人的共同地域也形成起来。

民族觉醒的开端属于莫斯科统一罗斯各地区之初，确切些说为14世纪后半期。民族自觉的火花只不过被各公国的内讧、封邑制度和鞑靼压制制度所遮盖。它燃烧起来。库利科沃大会战使它燃起了火焰。全民族斗争的第一次尝试，手持武器抛掉可恶的鞑靼桎梏的尝试，在民族自觉②的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罗斯人精神振奋，爱国主义感情觉醒。莫斯科在抵御马买入侵时起了拯救罗斯的作用，它的威信和声望在人民群众中间更加巩固和提高。

人民群众的同情迫使敌视莫斯科的诺夫哥罗德领主显贵向由于莫斯科战士“抵御敌人”“保卫”“罗斯全国”而颂扬莫斯科及其王公的“小人物”、“卑贱者”、“谓彻中出身卑微的成员”让步，并把以赞许莫斯科的调子写成的有关库利科沃大会战的详细记述载入了«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人民群众的同情也使得索夫罗尼在马买入侵之后两年在梁赞（梁赞王公在库利科沃会战时扮演了如此不光彩的角色，他“退出了”罗斯）编写了著名的«顿河左岸故事»，颂扬挺胸保卫整个罗斯国土的莫斯科。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500页。

② 我是在属于某个正在形成为民族的人们的统一意识、他们利益和心理素质的统一意识的意义上使用“民族自觉”一词的。

库利科沃会战推动了罗斯民族自觉性的高涨，这次会战是形成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思想准备方面的最重大因素。

在库利科沃会战之后随之而来的民族觉醒促进了罗斯文化的发展。当时的罗斯文化正沿着建立全罗斯标准和形式，力求"有现实意义"和摒弃过时的一切陈规的路线前进。就造型艺术而言，在安德烈·鲁布廖夫的创作中，可找到这一现实主义倾向的最鲜明的反映。自然风景，裸体人像和肖像，透视的肇始，讲求明暗，抛弃空洞、晦涩的东西，叙事体裁和心理因素在绘画中的出现以及色调的鲜明和多样——反映在安德烈·鲁布廖夫的创作中和14世纪后半叶诺夫哥罗德水彩壁画(沃洛托沃、科瓦列沃、费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伊利因的斯帕斯)中的所有这些事实，证明罗斯人世界观中的巨大变化。

顿河王德米特里时期的民族觉醒与人们对过去、对罗斯历史兴趣的发展有关。这就是当时修复古代著名建筑物（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大教堂)的原因。

莫斯科王公和"文人"创立全罗斯编年史的意图是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突出情况。对各地区的编年史，王公、各公国、各城和各地的编年史，进行了修改、改编和被用于编写"全罗斯"编年史。莫斯科编年史家进行的这一意识形态工作有时超前预告了莫斯科政治地位的提高，它证明了罗斯"文人"中全罗斯利益意识的增长，证明了统一罗斯国土的意识在莫斯科统治者的政治计划中产生时，在人民中间早已得到发展。

14世纪末编写的所谓《大罗斯编年史》，是"全罗斯"的第一部编年史。但是在这部编年史中，全罗斯统一的思想还刚产生。真正的全罗斯统一的思想反映在1408年莫斯科编年史，即所谓《特罗伊茨克编年史》中。福季的史著在这方面更为鲜明，他在书中所贯穿的统一思想与明显地表露出来的民主倾向交织在一起，强调

人民的作用、莫斯科工商区居民在保卫本城中的作用在书中可找到反映(«脱脱迷失入侵纪事»)。

15世纪中叶，一整套带有罗斯独立统一思想的基辅的罗斯壮士歌终于形成。壮士歌是各地根据当地保存下来的基辅时代模糊的古代统一意识的历史追忆写成的，它随着全罗斯统一意识的增长，抛弃了地方性特点，上升为国家、政权、民族“统一”的思想，成为全罗斯人民的财产，而这又是由于人民的历史观的进化造成的。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写道:“民间创作从远古时代起就以独特的形式形影不离地与历史相伴而行”，这个正确的看法是很深刻的。

永远灭绝不了的罗斯统一和罗斯民族统一的思想，尽管由于封邑时期的“反常状态”和王公“内讧”的分立主义、动荡的鞑靼年代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而退居次位，但如今已在新的基础上振兴起来，在另一种经济、政治情况下，在另一种社会相互关系环境中，在另一个时代里带着新的力量振兴起来。莫斯科成了罗斯和罗斯民族统一思想的体现者。如果说过去某个时期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曾以分立主义理论对抗统一思想，那末后来它们本身也逐渐接受了统一思想，不再充当竭力追求统一的莫斯科的思想上的敌对者，而只作为它的(追求统一的)竞争者，用它使用的剑①武装起来，接受了它的思想武器。

但是，在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罗斯统一的最彻底的拥护者——莫斯科追随者的人数也增长起来。这主要是小封建主和工商区居民。乌帕德什的活动(他把准备向莫斯科军队开火的诺夫哥罗德大炮用东西堵住了)和«米哈伊尔·克洛普斯基传»中的思想表达了诺夫哥罗德大多数居民的这种情绪。

在修士福马致特维尔王公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谈话»中，我们也找到了罗斯统一、政权“统一”的思想以及首次称做“沙

① 指罗斯统一的思想。——译者

皇政权"的君主专制思想。《谈话》中的思想，无疑是先进的进步思想，但是由谁(由莫斯科还是特维尔)来领导罗斯国的问题当时已作出了有利于莫斯科的决定，因此在这种具体情况下，迟误的特维尔的进步思想只是莫斯科胜利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莫斯科和特维尔之间的长期争执，不久就通过武力解决了，结局有利于莫斯科。

罗斯统一的思想在莫斯科是如此地强大，它如此巩固地占领当时的文献，它在罗斯有教养人士和国事活动家中间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致无论是"第三个罗马"及其幻影"世界政权"、"世界王国"的理论，或是从伊万三世同索菲娅·帕列奥洛格结婚时起在罗斯宗教界中流行的莫斯科是拜占庭的继承者、"真正基督教"的堡垒的思想，都取代不了罗斯统一的思想。莫斯科的君主首先是"全罗斯"的君主，而不是幻想王国的东正教君主；他们"一开始就是本国的君主"，按照马克西姆·格列克的说法，他们"寻求自己的"王位，而非力求取得拜占庭皇帝的宝座，他们信仰的"不是希腊人，而是基督"，他们并非为东正教王国的皇帝宝座斗争，而是为"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即古老的罗斯国土而斗争，他们所要争取继承的不是帕列奥洛格和康斯坦丁·莫诺马赫的"遗产"，而是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贤明者雅罗斯拉夫和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的"遗产"。拜占庭的和罗斯的宫廷习俗、教会仪式以及君主与都主教相互关系的不同，都是从这里，从罗斯本身的优越感产生的。而"全罗斯国君"的尊号的改变，宫廷仪式的奢华，伊万三世时罗斯外交文书的自尊和独立自主的口吻，绝不是与伊万三世同索菲娅·帕列奥洛格的结婚有关，而首先是同摆脱鞑靼桎梏，同罗斯确立正式的独立自主相联系的。

罗斯统一和独立自主的思想，罗斯民族统一的思想，在精神文化的一切方面表现出来，并给精神文化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尽管在罗斯国土各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制度、风尚中

还留有许多地方的、独特的东西，但是同一化的过程在愈来愈快地进行着。远近邻区特有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不断渗入各地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中。同样的迷信、传说、风俗习惯，一致的民谣、歌谣，等等，在罗斯所有各地传播开来。

罗斯国土和罗斯人统一的思想也反映在物质文化纪念物中。15世纪时，罗斯建筑的各种流派，各地方的建筑传统（普斯科夫的、特维尔的、诺夫哥罗德的）联合成统一的罗斯建筑业，从此肩负起了在成为“罗斯人的民族生活中心”[1]的“全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建造宏伟建筑物的使命。

我们只叙述了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的若干最重要方面，叙述了统一思想的发展、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的增长，叙述了决定民族形成的“民族觉醒”的若干方面，但是上述情况已足以作出如下结论，即15世纪末和16世纪时，罗斯已形成了“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2]，和已形成了鲜艳多彩、独具一格的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于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的基础上，在表现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俄罗斯民族或其同义语俄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这个时期已形成了俄罗斯（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呢？有人似乎觉得，如果具备了确定（近现代）民族的一系列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就可以说已形成了俄罗斯（近现代）民族了。

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强调指出的，“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此外，

---

①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致莫斯科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市劳动人民的贺词。载《真理报》1947年9月7日。

② 《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64页。

“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是一个(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就不成其为(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①

我们所论述的时期的俄罗斯民族要变为(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到底还缺少什么呢？斯大林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着重指出：东欧各国特殊的形成方式可以在封建制度尚未消灭，各(古代)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在经济上尚未结合成(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从而把经济因素提升到首位的条件下发生。② 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首先要在经济上结合成完整的各(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实际上，斯大林在其另一著作《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中谈到前资本主义时期即封建社会中已逐渐形成(近现代)民族的一些要素时，认为必需指出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但没有谈到象共同经济生活、经济联系这样的要素，因为在大俄罗斯(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时期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共同经济生活、经济联系。列宁对俄国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作过如下论断：“在当时未必能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③

因此，15世纪至16世纪初，还不存在俄罗斯(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但已经有了大罗斯或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或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这时莫斯科所建立的统一的国家是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国家。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罗斯国家还不是许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因为住在罗斯国疆土上的说芬兰一乌戈尔语、突厥语

① 《斯大林文集》，中文版，第64页。

② 同上，第69页。

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及其他语言的较小的种族共同体通常还没有形成为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都是些人数较少、分散在一望无际的辽阔原始森林和冻土带上还过着原始公社制度的氏族群、部落或部落联盟。但是同时，在伊万三世时形成的中央集权的罗斯国家本身已带有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某些特征，尽管它终究还不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有逐渐地，当伊万三世的孙子伊万雷帝实现了祖父所奠基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事业，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以其充分的国力出现时，它才作为合并了许多非俄罗斯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的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出现在我们面前。“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①

这个贵族军事官僚只可能在建立以君主专制政权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条件下产生。这个以君主专制政权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从16世纪中叶起开始成为多民族的国家，这是因为她不仅合并了一些部落和部落联盟，也合并了鞑靼、巴什基尔等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此外，在包括15世纪就已加入俄罗斯版图的各部落在内的其他各部落中间，由于俄罗斯社会制度影响加强的结果，开始过渡到半宗法半封建形态的社会关系，接着又过渡到封建社会，从而发生了形成为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将于后文详述。因此，伊万雷帝及其以后时期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是奠定了罗斯中央集权基础的伊万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时代所创建的俄罗斯国家，这个国家的主要民族成分是同一的，尽管其中住有俄罗斯民族以及说芬兰—乌戈尔语、突厥语及其他语言，处在原始公社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分散的、互相缺乏联系的较小而人数不多的氏族—部落群、部落和部落联盟，但这些氏族—部落群、部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落和部落联盟决定不了莫斯科所建立的国家的民族面貌。

建立了统一的强大国家后，大俄罗斯人并没有对自己的同胞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漠不关心，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曾与大俄罗斯人的远祖一起在往昔基辅时代形成为统一的古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

多沼泽的波列西耶居民，西德维纳河沿岸居民，比亚沃维扎密林区新垦地居民，外喀尔巴阡原野居民，喀尔巴阡山和第聂伯河流域草原居民，波列西耶密林和黑罗斯阴森树林里的居民，全都清楚地知道：他们全都是罗斯人，他们的信仰是同一的，他们的语言和他们本身构成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民族(народ)。

但是，在一望无际的国土上的各地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不同的。南方和西方落到了立沃尼亚骑士、立陶宛大公、波兰和匈牙利国王以及摩尔达维亚王公的统治下。统一的罗斯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断了，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因素导致白俄罗斯民族形成于立陶宛大公国境内，也导致乌克兰民族形成于波兰、立陶宛、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境内，而后来基本上在俄国境内。这两个兄弟民族处在沉重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之下，大俄罗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强大国家后，开始在维捷布斯克和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契尔尼戈夫和戈梅利"寻找自己的同胞"，要求自己的"世袭领地"，为昔日的罗斯国土而战斗，他们希望恢复基辅国版图时的统一罗斯，他们支援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声援他们同兄弟的俄罗斯人联合的愿望。

第十二章

伊万三世在位时期罗斯的战争和对外政策

成为“全罗斯的君主”后，伊万三世主持外交，并进行追求全罗斯目的的战争。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俄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同鞑靼人作斗争，目的在于摆脱鞑靼桎梏，并扩大莫斯科对邻近的喀山汗国的影响；同骑士团作斗争，以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和夺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罗斯王公的“世袭领地”；最后，力求收复被波兰、立陶宛侵占的罗斯国土，即伊万三世的“祖先”的古老的“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并恢复基辅时代国界和民族边界内的罗斯的统一。

不管罗斯昔日屈服于金帐汗国的痕迹现在是多么微弱，不推翻汗的桎梏，俄国终究是无法发展和巩固的。

昔日强大的金帐汗国尽管在15世纪后半期已分裂和衰弱，但它仍不放弃侵犯莫斯科的野心，企图准备新的入侵。伊万时代罗斯的加强使波兰一立陶宛国感到惊慌，该国为此同鞑靼人结成联盟，力图阻止俄国的发展和壮大。

为了弄清罗斯最凶恶的“敌人们”结成联盟的基础，必须指出诺夫哥罗德的“陷落”曾使波兰、立陶宛、立沃尼亚骑士团和瑞典感到不安。它们所看到的不是孤立的罗斯公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而是“全罗斯”的力量。企图预防罗斯的加强，立沃尼亚骑士进攻普斯科夫，瑞典人进攻诺夫哥罗德，(立陶宛一波兰国王)卡西米

尔(四世)则谋求与金帐汗国结盟。

还在1471年，卡西米尔便想占有诺夫哥罗德，他曾派遣独眼龙吉列亦到金帐汗阿黑麻处去。尽管这个从伊万处投奔到卡西米尔处的叛徒竭力劝说金帐汗有必要出兵攻打莫斯科，但阿黑麻却不能帮助立陶宛。当时"勇敢的罗斯好汉"——维亚特卡水盗袭击萨莱，攻占并洗劫了该城。到1472年夏，阿黑麻才侵入罗斯国土，尽管遇到顽强的抵抗，他还是攻占和焚毁了阿列克辛，杀光了该城居民。鞑靼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同罗斯人决战，当伊万集合起15 000人的军队时，阿黑麻退回到自己的兀鲁思(国土)去了。敌对双方缔结了和约。伊万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从1462年起就已停止缴纳贡税，只限于不经常地向汗国送去礼物和给汗的使臣的贿赂，顺便说一下，罗斯对待汗的使臣的态度愈来愈坏了。

破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伊万预先作了关系破裂的准备，他同三个鞑靼国家中最强大的克里木汗国结成同盟。当时的克里木汗为明里一吉列亦。他同伊万有两个共同的敌人——卡西米尔和阿黑麻，即波兰一立陶宛国和金帐汗国。

还在1474年，莫斯科和克里木之间就已开始亲近起来。伊万珍视这一友谊，他抬高明里一吉列亦，他不像对待他所"亲自扶植的"喀山汗那样(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对明里一吉列亦发号施令，而是向明里一吉列亦"百拜顿首深表敬意"。克里木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伊万的使臣沙因和罗莫达诺夫斯基多年住在克里木。一方面莫斯科须向克里木人送礼物馈赠(克里木)诸汗，供养克里木诸汗驻莫斯科的为数众多的使团，但另一方面克里木统治营垒本身内部的不断斗争又迫使诸汗向莫斯科求援，有时甚至在莫斯科寻求栖身之地。克里木诸汗的这种境况也加强了伊万的地位，伊万援助不走运的克里木诸汗，为他们提供避难所，当然，也指望(日后)从他们方面得到支援。甚至强大的明里一吉

列亦在克里木汗国发生政变时也不得不同伊万签订条约，向他求援。于是为对抗卡西米尔同阿黑麻的联盟，形成了另一个联盟——伊万同明里—吉列亦的联盟。

15 世纪 70 年代末，在诺夫哥罗德合并于莫斯科之后，卡西米尔展开了有力的活动，唆使阿黑麻采取军事行动反对莫斯科。下列情况也鼓舞着卡西米尔：对世袭领地的划分不满的伊万的两个兄弟安德烈和鲍里斯于 1480 年初起来反对伊万；他们在反对其兄（伊万）的斗争中向卡西米尔求援，准备带着为数众多的军队"出奔"立陶宛。鲍里斯和安德烈的亲兵队向诺夫哥罗德进发。而诺夫哥罗德本身是不安定的。1480 年初，诺夫哥罗德出现阴谋。阴谋策划者旨在使诺夫哥罗德脱离莫斯科。立沃尼亚骑士团首领本人也利用了罗斯的"混乱"——他的军队围攻了普斯科夫。普斯科夫城英勇地进行抵御。

展开的内讧威胁着罗斯，这个情况有利于波兰和立陶宛。

当时，明里—吉列亦准备攻入卡西米尔统治下的乌克兰。卡西米尔开始催促阿黑麻，阿黑麻便于 1480 年向莫斯科进军。伊万出动军队迎战鞑靼人，但阿黑麻转向乌格拉河，这是莫斯科防御较弱的方面。莫斯科即将被围。以谨慎为其特点的伊万决定离开莫斯科，并且把自己的妻子索菲娅连同国库一起送往"（白）海"。伊万退到克列梅涅茨，希望赢得时间同（自己的）兄弟们讲和并巩固自己的阵地。

只有消除同（自己的）兄弟们的冲突（他们以造成内讧来进行威胁，而当阿黑麻的鞑靼军队日益逼近莫斯科时，这种内讧对罗斯是尤其危险的），取得罗斯的团结，伊万才能指望在即将发生的会战中获得成功。

但是在领主中间有些人竭力劝说伊万向阿黑麻求和。

9月30日，伊万驱车进入准备抵御的莫斯科。关于王公（伊万）在

莫斯科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城。莫斯科人围住王公，要求他坚决行动。罗斯托夫主教瓦西安号召伊万"保卫"罗斯，并用罗斯历史上的典范鼓舞他，让他想到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和顿河王德米特里的光荣业迹。当时，伊万的儿子伊万·伊万诺维奇已经一举从乌格拉河击退鞑靼人，他拒绝父亲要他回莫斯科的召唤。最后，在城民和宗教界的压力下，伊万出击鞑靼人，与儿子的军队会合。鞑靼人和罗斯人站在乌格拉河的两岸。伊万三世有意不转入进攻，阿黑麻也拿不定主意先渡河作战。编年史家谴责某些领主、"恶人、富有而肥胖的贪财者、基督教的叛徒、伊斯兰教徒的姑息者"企图散布对战争胜利的怀疑思想。但伊万是坚强的。他同阿黑麻进行了无休止的谈判，在其兄弟安德烈和鲍里斯的军队同他会合之前，他不希望开始军事行动。瓦西安劝说伊万不要听领主的话，要"保卫自己的祖国"。

秋天降临。伊万下令退到克列梅涅茨，在这里发生了伊万期望已久的罗斯各路军队的联合。从这时起，鞑靼人已经在战略上被打败。寒冷降临了，与鞑靼人相伴的是饥饿和缺乏饲料。鞑靼人的服装很差，衣服在出征中穿破了。卡西米尔没有前来援助。他不仅忙于同攻入波多利耶的明里·吉列亦的克里木鞑靼人作斗争，而且还忙于立陶宛的内部事务。立陶宛开始了内讧。

史料记载的立陶宛的"混乱"，是由倾向于莫斯科的罗斯王公和领主的反抗所造成的。立陶宛的全部罗斯地区力求归并于罗斯，这就引起卡西米尔对立陶宛命运的担忧。1481 年时，这场"混乱"演变为费奥多尔·别利斯基、奥列利科维奇、戈利尚斯基的阴谋，他们企图"投奔"罗斯，为莫斯科王公效劳。

（阿黑麻）汗由于得不到卡西米尔的支援，并获知罗斯各路军队已联合，于 1480 年 11 月 11 日退回去了，并在途中破坏了自己同盟者的边境地区。阿黑麻在北顿涅茨河河口过冬。1481 年 1月

6 日，昔班(秋明)汗国的亦瓦黑汗袭击了他，击溃了金帐汗国人，杀死了阿黑麻。1502 年，明里一吉列亦彻底击溃了金帐汗国，赶走了阿黑麻的儿子失黑—阿黑麻。金帐汗国遂不复存在。

马克思指出："伊万推翻了金帐汗国，但不是他自己打的，而是以佯攻的办法诱使它发动进攻，使它残存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并遭受它自己的那些已被伊万设法结为盟友的同族部落的致命打击。他利用一个鞑靼人制服了另一个鞑靼人。"① 马克思着重指出，伊万三世"把莫斯科公国从鞑靼人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并不是通过一次勇敢的攻击，而是通过二十年左右的耐心工作。"马克思接着又说："他不是把敌人驱逐出堡垒，而是用计把敌人调离开"。②

罗斯境内长达数百年的鞑靼压制制度就这样地垮台了。

压迫、凌辱罗斯人民的鞑靼压制制度经常带来恐怖、流血、大规模屠杀和毁灭，它的垮台，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罗斯抛掉了"压在他身上的鞑靼压制制度的桎梏"(马克思语)，鞑靼压制制度的桎梏曾长久阻碍罗斯国的经济、文化发展。

年轻的罗斯国家在同金帐汗国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

金帐汗国压制制度的垮台并未消除俄国同鞑靼人作斗争的问题。喀山汗国在东方成长壮大了起来。

喀山汗国包括许多部族的地区。在其境内有当时同卡马河不里阿耳人(伏尔加河不里阿耳人或银不里阿耳人)的残余混杂在一起的鞑靼人，而且鞑靼人接受了相当高的不里阿耳封建文化。统治阶级为鞑靼封建主，即宗王、贵族(мурза)、合刺柴(карачай)、伯克(бег)、鞑靼商人和僧侣(毛拉 мулла)。鞑靼封建上层剥削鞑靼农人和手工业者。但是占据伏尔加河中游、卡马河流域直到乌拉尔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2 页。

② 同上，第 71,72 页。

山、押亦河（乌拉尔河）的全部区域的喀山汗国（或喀山王国）的辽阔疆土除住有鞑靼人外，还住有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马里人（切列米斯人）和乌德穆尔特人（沃加克人）。鞑靼贵族在这些部族中也主宰一切，征收贡税、毛皮实物税，实行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这些部族处在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巴什基尔游牧民处形成了本族的封建贵族——剥削"帖普替雅尔"（受奴役者）的答剌罕和拔都儿。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其他部族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楚瓦什人和莫尔多瓦人中间也开始产生封建上层。

喀山王国被错综复杂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引起的内部矛盾搞得四分五裂，它在各封建集团的斗争过程中逐渐衰弱，在各封建集团中一些集团倾向于强大的克里木汗国，而另一些集团则倾向于莫斯科。伊万三世利用这个情况来抵御喀山鞑靼人，并准备远征攻打他们。

1467年，"亲莫斯科集团"在喀山得势，"担任军职的鞑靼宗王"卡西莫受该集团拥戴登上汗位。卡西莫立即将此事告知伊万三世，伊万的王公奥博连斯基—斯特里加的军队从莫斯科出动援助他。但是当卡西莫同奥博连斯基进向喀山时，喀山发生了政变，新汗易卜拉欣不许他们进入国土。饥寒交迫的罗斯士兵和卡西莫的鞑靼人返回去了。为报复他们的远征，易卜拉欣侵袭了加利奇，但喀山人没能占到便宜，因为居民早有防备，"被围攻时闭门不出"。罗斯人照样也在1468年破坏了马里人地区，击溃了卡马河沿岸的鞑靼人，而为此易卜拉欣也攻占了维亚特卡。为使喀山鞑靼人停止经常侵袭，并击溃这些强大而危险的敌人，伊万于1469年远征喀山。战士从各地乘船会集到下诺夫哥罗德。他们从北方来，从维亚特卡地区来，从莫斯科、科斯特罗马和穆罗姆来。伊万把大军集中于喀山附近，但这时重新出现了旧的封建分立主义。

没有统一的指挥，领主和王公各自统率自己的队伍，尽管推选

了鲁诺为统率，但各人还是自行冒险行动。鲁诺单枪匹马向喀山进发，尽管单独行动是不准许的。诚然，他焚毁了喀山的一些市镇，但此举也加速了王公雅罗斯拉夫队伍的毁灭。在喀山附近，“年轻人”不听从“年长者”，一个部队长官不等待另一个部队长官，每人都自行其是。许多部队长官坐在原处，但却劲头十足地要求“薪饷”。这种混乱和一意孤行的结果于是显露出来。喀山只不过是“遭到焚烧”，而维亚特卡却丢失了，它暂时臣服于喀山汗。

恩格斯写道:“同封建制度作斗争而使用本身就是封建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兵士同他们的直接的封建领主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王军队指挥官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意味着陷入绝境，走不了一步。”①

这段话是就消灭封建割据时代的西欧各国而言的，但是恩格斯的思想可以完全适用于伊万三世时期的罗斯。

伊万三世考虑到远征喀山的经验教训，对罗斯军队的指挥进行了适当的改革。这就在对喀山的新的远征中以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舍隆之战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严格组织起来的、服从统一指挥和按统一计划行动的莫斯科军队已经不再是一、二年前的莫斯科军队了。

为了消除喀山附近失败的后果，1469年秋，伊万同其兄弟尤里和安德烈一起组织了新的远征。大公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喀山，易卜拉欣被迫签订和约，向伊万屈服，他交还了全部战俘，并放弃了维亚特卡。易卜拉欣尽管被击溃了，但并未顺服，他于1478年利用莫斯科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化试图袭击罗斯。作为答复，莫斯科将军奥布拉泽茨、维亚特卡人和乌斯秋日纳人把喀山国劫掠一空。易卜拉欣再次求和。不久，易卜拉欣，他的儿子阿里和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455页。

马哈麻—额明发生斗争，喀山的达官贵人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阿里依靠诺盖帐汗国鞑靼人夺得汗位，马哈麻—额明向伊万求援。

伊万看到插手喀山封建上层内讧向他预示的远景，便立即给予马哈麻—额明以援助，不仅如此，他还在莫斯科与喀山人敌对的克里木汗国缔结了和约（此前不久马哈麻·额明的母亲嫁给了克里木汗明里·吉列亦）。伊万竭力抓紧有利时机。1487年4月，丹尼尔·霍尔姆斯基、谢苗·里亚波洛夫斯基、奥布连斯基等兼任将军的王公，同马哈麻—额明的鞑靼人一起出兵远征喀山。按照出征喀山的惯例，军队乘船而行。马匹沿河岸行进。喀山被包围，并被攻克。阿里被流放到沃洛格达；伊万像处置贬黜的罗斯王公那样处置了战败的喀山汗。他愈来愈感觉到自己是喀山的主宰者。由他扶植的马哈麻—额明成为他的藩臣，对他唯命是从，尽管在公文上马哈麻—额明被称为他的“弟弟”，但却是在一切方面求他批准的他的仆役。

伊万三世不仅“亲手扶植马哈麻—额明统治喀山”，而且正如阿尔汉格尔城编年史作者所指出的，马哈麻—额明“向大公叩头”，“称大公为父”，即承认自己是伊万的藩臣。实际上，正如16世纪初出使莫斯科的德国皇帝的使臣赫伯施坦所说的，莫斯科大公“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喀山扶立国王”。伊万甚至向喀山征收贡税。从此以后，莫斯科的势力在喀山加强起来。在喀山王位上，莫斯科的傀儡一个一个更替。在马哈麻—额明之后，也由伊万扶植的易卜拉欣的第三个儿子阿卜杜尔·列替甫成了汗，接着，马哈麻—额明又回到汗位上。只是到16世纪初，喀山的分立主义意向才获得了胜利，1505年，马哈麻—额明由于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便“脱离”了莫斯科。

喀山虽说恢复了独立，但事实上终究还依赖于莫斯科。莫斯科大公利用鞑靼封建主自身内部的矛盾以及臣服于喀山的各族人民

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在那里建立了“亲莫斯科派”（“亲莫斯科派”主要由敌视喀山封建贵族的“地位较低的喀山人”和克里木人组成），从而为喀山的臣服作好了准备。

伊万三世在位时使北方和东北方的许多民族和部落臣服于自己。

若干说芬兰—乌戈尔语的民族和部落，还在俄国形成和巩固的初期就加入了俄国。顿河王德米特里在位时，科米—彼尔姆人地区出现了莫斯科军队，著名的斯特凡·彼尔姆斯基在该地区活动，他使科米人参加了基督教，并创造了彼尔姆文字。

但是莫斯科国靠归并完全或主要住有芬兰—乌戈尔族源的民族和部落的地区来特别快地扩大疆域，发生在伊万三世在位时。在兼并诺夫哥罗德的同时，伊万三世兼并了卡累利阿人地区、住有“洛普”—萨阿米人（同一“洛普”人也住在稍南面的今卡累利阿境内）的特列或捷列克海岸以及住有罗斯人和“扎沃洛奇耶楚德人”——科米—兹梁人的扎沃洛奇耶、德维纳地区。在维切格达河和伯朝拉河，伊万兼并了向诺夫哥罗德缴纳贡税者，即另一些科米—兹梁人的地区；在北冰洋沿岸苔原，伊万归并了萨莫耶德人（самоядь，即涅涅茨人 ненецы）居住的地区。莫斯科在遥远的北方和东北方的这些地区建立起了与诺夫哥罗德的旧有制度大不相同的制度。莫斯科按照主宰者的方式实行巩固的统治，派出将军、军队和刚建立的各衙门的书记，设立城堡、寺院，征收定期的贡税。当然，在北德维纳河沿岸昔日布满德维纳地区的诺夫哥罗德领主的世袭领地被消除了，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制度促使扎沃洛奇耶变为“官地”和“耕种官地农民”的边区，变为爱自由的勇敢的罗斯沿海居民的边区，而在大诺夫哥罗德统治者统治下的其他地区，即便生活得不很轻松，但无论如何是自由的。诺夫哥罗德客商和“大胆的好汉”——水上强盗从遥远的过去就多次到过卡—累利阿、特列、

尤格拉和遥远的卡缅。只要有机会和没受到惩治，他们就抢劫、掠夺，遇上交好运还“抢劫贡税”；如果不行，就做买卖，但他们不打算长久住下来，也不确立自己的制度。他们的来自尤格拉的“农人”崇拜自己的“尤马拉”（神）与否，祈祷基督与否，用自己的语言讲话还是说俄语，遵循“自己父辈的风俗习惯”还是袭用罗斯风俗习惯，对他们来说是根本无所谓的。对于来自热闹的商业城市诺夫哥罗德的他们来说，需要的是皮货和“海象牙齿”，而这些商品他们要怎样才能获得，由谁提供给他们，以贡税方式向他们提供珍贵貂皮的人以何种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对这些他们都完全无所谓。

莫斯科“君主的人员”在这些地区牢固地定居下来，设立城镇，在漫长的冬夜在遥远的普斯托泽尔斯克编织永远使遥远的北方边区、严寒而富有的边区与白石头城莫斯科紧密相连的线。跟随在这些“君主的人员”之后，有时追过他们赶在前头，来了靠手艺谋生的人和僧侣，他们劝说人们信仰基督，传播片断知识，传播文字，与他们一起俱来的是寺院的土地和可经营的土地。地方的制度、当地政权的末日到了。

1472 年，伊万三世的将军费奥多尔·佩斯特雷前往彼尔姆。他因科米—彼尔姆人“习性难改”而曾惩治他们。

他占领了伊斯科尔、乌罗斯、切尔登、波奇卡等城镇，打败了彼尔姆人，俘获了他们的将军卡柴姆。

当时的彼尔姆王公是加入了基督教的科米—彼尔姆人米哈伊尔。费奥多尔·佩斯特雷在科尔瓦河畔建立了一座小城，开始以大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名义实行统治，征收毛皮实物税。彼尔姆居民全应缴纳毛皮实物税，但最初时期不仅由莫斯科的将军管理居民，而且也由科米—彼尔姆人中的彼尔姆王公管理居民。过了若干年。莫斯科大公开始“开拓”彼尔姆。被俘的彼尔姆王公米哈伊尔被送往莫斯科。不久（1505 年），彼尔姆人的最后一个王公马

特维·米哈伊洛维奇被"送往"莫斯科，而莫斯科派来的第一任地方长官瓦西里·科韦尔到了彼尔姆。

莫斯科将军还深入古老的尤格拉。那里有许多小"公国"，实质上是许多氏族，这就使莫斯科将军不难征服汉蒂人（ханты，即奥斯加克人 остякй）和曼西人（манси，即沃古尔人 вогулы）地区。

1465年，乌斯秋日纳人斯里亚巴"征服"尤格拉地区，向该地区征收贡税，并把俘获的"小王公们"押送到莫斯科，但伊万把他们释放回去了。两年后，此次是维亚特卡人"征服"沃古尔人，俘获了他们的"小王公"阿瑟卡。1481年，汉蒂人进行报复，袭击了彼尔姆。过了二年，王公费奥多尔·库尔布斯基的莫斯科大军在佩雷姆河河口打败汉蒂人，攻入西伯利亚，从那里沿额尔齐斯河进入尤格拉地区，科德公国的"大"公莫尔丹被俘。战败的汉蒂人答应一定不再侵袭彼尔姆。

1499—1500年，举行了新的远征。王公谢苗·库尔布斯基是5 000俄军的首领。库尔布斯基在伯朝拉河畔建造了城堡，并继续向东进，到达乌拉尔山彼方。他"征服了"40座城镇，俘获了58个小王公。尤格拉西部降服了，尽管在汉蒂人和曼西人那里仍长期留有独立的"小王公"，但从此古老尤格拉的全体居民都必须缴纳毛皮实物税，并且不侵袭莫斯科大公的臣民。

彼尔姆大主教——菲洛费主教对尤格拉的降服起了巨大作用。他同汉蒂人和曼西人的小王公进行联系，充当他们与伊万三世之间的调停者，为他们提出请求，劝说他们向莫斯科大公宣誓，并逐渐扩大教会和"全罗斯国君"对整个尤格拉的影响和势力。

随着北方受莫斯科大公的"庇护"，一方面，商业和手工业扩展到了遥远的北方各族、各部落中间（北方各族、各部落直到当时还很少参与商业活动），手工业者、商人、哥萨克、农民和僧侣开发了

人口稀少的辽阔疆土，在若干地区推广农业和畜牧业，而且寺院成为主要的垦殖基地，人数很少的居民被归并于较高文化的罗斯人，掌握了文字（在这方面寺院也起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全罗斯国君”的统治扩展到东欧北方，建立了对北方各族人民的经常的剥削制度。推行了毛皮实物税和收受各种“礼物”；在北方各地区，过去只有当地的本部落的“小王公”，如今来了莫斯科派来的将军和地方长官；推广了基督教，并且经常是强迫推广的；出现的寺院既作为垦殖基地和文字发源地起着积极作用，同时又充当莫斯科大公和新封建主的忠实奴仆。于是北方逐渐被大公和他派去的人员、商人和僧侣“所控制”。15到16世纪之交，加入俄国的北方芬兰一乌戈尔各族人民的状况便是如此。

在伏尔加河沿岸当时也已进入俄国版图的那些地区，居住着莫尔多瓦人、梅谢拉人和鞑靼人。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小王公”受到管辖，或由莫斯科大公的藩臣卡西莫夫鞑靼宗王进行管辖，但他们全都是莫斯科的纳贡者。

这样，非罗斯部落、非罗斯民族的地区就逐渐被征服，伊万三世时期形成的俄国就已具有以大俄罗斯民族的统治阶级为首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斯大林曾强调指出：“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①，迫使东欧各民族早在形成为（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之前的封建主义时代就已试图联合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样，东欧要摆脱东方各族、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侵犯（鞑靼人的枷锁曾在几个世纪中压在罗斯人和东欧、西西伯利亚的芬兰一乌戈尔各民族、各部落身上），只有通过建立能把东欧各族人民从“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马克思语）中解救出来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是，无论是萨阿米人、汉蒂人、曼西人、科米人，还

①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8页。

是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都作不到这一点。

大俄罗斯民族是能够承担主动创建不仅能承受外来鞑靼、土耳其人侵犯的压力，而且能抛弃长达几世纪的，使东欧各族人民精力衰竭，阻碍他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金帐汗的枷锁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唯一民族，只有她是最完善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形态和较高文化的代表者，只有她是东欧各民族中人数最多、最强大、发展水平最高的民族。斯大林指出："在俄国，是以历史上形成的强大而有组织的贵族军事官僚为首的大俄罗斯人担负了统一各民族的使命。"①

15 世纪末，罗斯再次受到卡西米尔（四世）在位时期巩固、强大起来的波兰—立陶宛国家的威胁。

过去，有一大批时而投靠立陶宛、时而投靠莫斯科的罗斯小公国把莫斯科和立陶宛隔开。如今局面发生了变化。莫斯科军队驻扎在立陶宛边界线上。但是这些边界线有较大的相对性，——没有任何天然界线，既没有山岭、大河或难以通过的森林、沼泽，也没有任何居民成分的显著区别。波兰—立陶宛国家的东部各地区住着处在波兰—立陶宛领主压迫下的大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波兰—立陶宛封建领主掌握对整个国家的统治。作为波兰制度和文化、波兰法律和天主教的传播者，这些封建领主仇视罗斯（当时对进入立陶宛版图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地区的称呼）居民。这些地区的农民只被看作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大公的国有土地被分给波兰、立陶宛天主教徒封建领主。他们建造城堡、庄园（фольварк）②，把天主教徒小贵族拉拢到自己周围。他们奴役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把他们变为"赫洛普"，迫使他们服劳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9 页。

② фольварк——波兰封建领主（老爷、贵族）的庄园。

役，缴纳贡税、代役租，负担一系列徭役，如：割草（帮忙）、拉大车、"谢列布希兹纳（серебщизна）"，等等。

波兰—立陶宛封建领主和小贵族的狭隘偏执，他们对全体罗斯人的仇视，对"荷洛普"及其信仰和文化的鄙视，造成了与阶级压迫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无形的民族压迫和宗教压迫。

居住在立陶宛的、罗斯大封建主早就开始波兰化和天主教化的那些地区的"罗斯人"的境况特别艰难。卡西米尔（四世）时，压迫也扩展到了与莫斯科（国）接壤的波兰—立陶宛国家的东部边区，在那里仍留有出自斯维亚托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后裔切尔尼戈夫王公的独立的、但对立陶宛大公称藩的罗斯王公们，还有罗斯化的东正教徒立陶宛格季明的后裔。波兰—立陶宛封建领主如今不再承认他们，这些罗斯王公被排挤到次要地位。如今被压迫的罗斯地区不仅人民群众开始骚动（这是对波兰—立陶宛封建领主作威作福的强烈不满的结果），而且罗斯王公和领主也表现出不满情绪。[1] 如果说过去立陶宛曾是强大的，必须在金帐汗和立陶宛大公之间进行选择时，通常宁取后者而弃前者的罗斯各地区曾趋向于立陶宛，那末如今这些罗斯地区已不愿依靠受波兰影响的立陶宛，而罗斯莫斯科国家就把被遗忘的和受波兰—立陶宛封建领主压迫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族人民拉到自己身边来。

战争日益迫近，莫斯科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中完全有理由期望获胜。罗斯人在莫斯科国家的居民中占绝大多数，而波兰—立陶宛国的大半居民也是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莫斯科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受统一的大公政权管辖，而在波兰—立陶宛国，国王和大公的权力较弱，中央集权化的程度不高，波兰—立陶宛封建领主不仅在地方上，而且也在中央主宰一切。

---

[1] 当时在波兰—立陶宛国内，不仅把大俄罗斯人称做"罗斯人"，而且也把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甚至连罗斯化的立陶宛人，都称做"罗斯人"。

军事行动应当在立陶宛的罗斯地区境内展开，该地区居民显然倾向于有同一宗教信仰、共同文化的莫斯科。卡西米尔终于理解了这一点，他要求与莫斯科(国)接壤的罗斯王公绝对服从，要求他们“自己的领地不脱离立陶宛大公国”。但为时已晚。

受波兰一立陶宛封建领主欺凌、歧视的罗斯王公、“留里克后裔”和罗斯化的格季明后裔，依靠人民群众，得到立陶宛罗斯地区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各阶层居民的支持，举行密谋，“投奔”莫斯科。通常是某个王公家族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出走”，但是应当分割的共同的“世袭”领地(因为一部分归属立陶宛，另一部分归属莫斯科)引起了纠纷、冲突和边界冲突。立陶宛大公不能保护自己的仍留在立陶宛的藩臣，而伊万则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帮助投奔自己的新的臣下。例如：1473 年，伊万就“占领了”留布特乡。于是，另一些亲属在稍稍犹豫之后，也“投奔”了伊万。例如：在伊万·别列夫斯基投奔之后，安德烈也投奔了，在德米特里·沃罗滕斯基投奔之后，又来了谢苗，等等。

边界上的小冲突一直进行着，但是不论是卡西米尔或伊万都没有下决心宣战，而只安于外交公文的往来。1492 年，卡西米尔去世，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成为立陶宛大公，他的另一个儿子扬-阿尔布雷希特成为波兰国王。利用波兰的不统一，伊万决定采取行动。1492 年 8 月，将军奥博连斯基从立陶宛夺取了姆岑斯克，沃罗滕斯基夺取了莫萨利斯克。战争开始了。

同时，伊万的同盟者明里·吉列亦也进攻立陶宛。亚历山大被迫开始谈判，并企图行使狡计。立陶宛使臣向伊万提出联姻，请他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亚历山大。但是莫斯科在和约没有缔结之前，不想听取求婚之事。

将军丹尼尔·谢尼亚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夺取了维亚济马，并让其居民对莫斯科大公宣誓。罗斯军队愈来愈深入立陶宛，

夺取了古时的罗斯土地。

在军事行动进入高潮时，罗斯王公不断"投奔"伊万，各城相继降顺。谢尔佩伊斯克、梅晓夫斯克和许多乡和村被占领。

1493 年 1 月，在莫斯科的立陶宛的爪牙的阴谋被揭破，这些人的首领是马特维·波利亚克和早就被卡西米尔秘密派遣到伊万处的王公伊万·卢科姆斯基。卢科姆斯基领受了卡西米尔让他杀死或毒死伊万的旨意。在阴谋者中间也有从立陶宛逃出来的费奥多尔·别利斯基。阴谋者的巢穴被消灭了。消灭了敌人在本国心脏的奸细后，伊万不顾仍在继续进行的有关求婚的谈判，坚决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伊万为恢复统一罗斯进行斗争，为建立统一的俄国而进行斗争，这个统一的俄国的版图内要包括从前被立陶宛和波兰侵占的全部古代罗斯土地，即：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戈夫—塞维尔、基辅、波洛茨克、平斯克、别列斯季耶、加利西亚、沃伦诸地区。他为从伏尔加河到加利奇和黑罗斯，从穆罗姆到佩列雅斯拉夫尔、卡涅夫、切尔卡瑟和奥列希耶的基辅时代的罗斯而战。因此，1493 年，当他的使臣、贵族扎格里亚日斯基在宣读伊万致亚历山大的文书，读到莫斯科大公的新的尊号时立陶宛人大吃一惊，因为在文书中伊万自称为"全罗斯国君"，而不是过去所称的"大公"。伊万宣称："基辅和沃伦领地，波洛茨克和维捷布斯克，以及罗斯的许多其他城市"为他的"世袭领地"，因为"……按照上帝的意志，自古以来，从我们的祖先时起，罗斯全部土地都是我们的世袭领地"。

伊万的这些谋求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因此不久，1494 年，立陶宛使臣便同伊万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维亚济马、谢尔佩伊斯克、科泽利斯克、柳布茨克和梅泽奇诸公国的一部分，划归莫斯科，此外，亚历山大承认诺沃西利公国、奥多耶夫公国、佩列梅什尔公国、沃罗滕公国和别列夫公国"归属"莫斯科。不久，亚历山大同伊万

的女儿叶连娜的订婚礼也举行了。伊万要求不强迫叶连娜信奉天主教，要为她建造一座东正教教堂，并吩咐她动身到立陶宛去要亲自帮助罗斯东正教徒，替他们在亚历山大面前求情等等。对亚历山大说来，这次婚姻提出的条件是一种耻辱。他甚至不敢向罗马教皇承认娶叶连娜为妻的条件。波兰一立陶宛封建领主当然敌视这次婚姻。叶连娜向父亲告密说：亚历山大不履行所订条约的条款。实际上，亚历山大对强迫灌输天主教于罗斯各领地起了促进作用。1499年，小官吏舍斯塔科夫从立陶宛写信给莫斯科说："在拉丁人和我们基督教徒之间开始了大的纷争……我们全体东正教基督教徒想举行洗礼"。为报复1494年和约，亚历山大唆使鞑靼人、瑞典人反对伊万。当然，他的企图并未获得成功。立陶宛的罗斯王公不能"忍受暴虐"，愈益频繁地投奔莫斯科。伊万加紧准备新的战争。召集了火枪兵队伍；普斯科夫人组成了后备军：无地的贫苦农民充当步兵，"10索哈"以上农民提供一匹马，"40卢布"以上的市民提供"一匹马和一名穿戴盔甲的战士"。"从农民和商人中征集的终身服军役者"也从罗斯其他领地召集起来，王公和领主的队伍汇集起来。伊万决定沿着三个方向进攻立陶宛，即：进向奥卡河、谢伊姆河、杰斯纳河、索日河，进向西德维纳和第聂伯河上游。1500年5月，伊万派遣使者向亚历山大送去一个"遂心的文书"，取消了1494年和约，没有给他送去"原先商定的文书"，因为伊万不想为取得立陶宛的土地同立陶宛作战，而收回罗斯的土地，按照他的看法，这是他的权利，不通过战争就能取得。

5月，罗斯军队出征。古老的罗斯城市——姆岑斯克、布良斯克、特鲁布切夫斯克、戈梅利、契尔尼戈夫、柳别奇、诺夫哥罗德一塞维尔斯基、斯塔罗杜布、普季夫利、雷利斯克、拉多戈希逐一光复。同时，普斯科夫军队收复了托罗佩茨。

莫斯科军队主要攻打多罗戈布日和斯摩棱斯克。莫斯科领主

尤里·扎哈里耶维奇将军统率进攻斯摩棱斯克的"大团队"。稍后，丹尼尔·谢尼亚取代了他的这一职位。尤里·扎哈里耶维奇感到受辱，但是在远征中能够"较量门第高低"的时间过去了，伊万的厉声喊叫迫使固执而任性的领主顺从地率领"警卫团"守护"君王的事业"，用"小人物"攻克多罗戈布日，在战斗中立功。

立陶宛统帅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率领军队迎战深入西方的尤里·扎哈里耶维奇。不久，"其他大将军"率军逼近尤里·扎哈里耶维奇。在韦德罗希河畔，在多罗戈布日附近的米季科沃原野，立陶宛军队等待着罗斯军队。罗斯先头部队渡过了河，假装逃跑，立陶宛人冲过韦德罗希河，这时罗斯人便对他们发起猛攻。可怕的搏斗开始了。罗斯队伍冲向前方，毁掉了奥斯特罗日斯基在河上建造的桥，丹尼尔·谢尼亚将"伏击团"投入战斗。1500年7月14日，战斗结束，亚历山大全军覆没。担任统帅的王公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被俘，并被押送到沃洛格达。7月17日，伊万获得韦德罗希河畔胜利消息的那一天，被莫斯科宣布为节日。

罗斯军队继续前进，到处击溃立陶宛人。罗斯人在姆斯季斯拉夫利附近作战，围攻斯摩棱斯克。当时亚历山大向匈牙利使臣求援，匈牙利使臣说服伊万签订了停战协定，从1503年3月25日至1509年3月25日为期6年。

按照协定，北乌克兰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和各乡划归莫斯科国。契尔尼戈夫、戈梅利、布良斯克、特鲁布切夫斯克、雷利斯克、普季夫利、斯塔罗杜布、北诺夫哥罗德、柳别奇、波切普、莫萨利斯克、多罗戈布日、托罗佩茨等19座城市归属莫斯科(国)。此外，70个乡划归罗斯。这是罗斯的重大收获：大片疆土从波兰—立陶宛封建领主的统治下光复了。

后来，亚历山大提醒伊万说：是归还按照停战协定交出的土地的时候了，他对这些土地就像对自己的"世袭领地"那样，十分不

舍。伊万回答说：他也舍不得处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自己的"世袭领地"，如：基辅、斯摩棱斯克、沃伦等地。和平很不稳固。战争一定会重新开始。

但是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焦急不安的不单是立陶宛大公领地内的（罗斯）"世袭领地"这个问题；俄国对待波罗的海的外交政策当时也已完全形成。这里，在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沿岸，也有"全罗斯国君"的"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

远古以来，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就与罗斯有密切联系。早在公元之初，当时称为文德人的斯拉夫人曾与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毗邻而居。楚德地区的居民爱沙尼亚人曾在9世纪罗斯国家组织的萌芽时期同罗斯诸部落斯洛温人、克里维奇人一起，对凶恶、贪婪的诺曼—瓦里亚吉人进行过斗争。在沃尔霍夫河沿岸古罗斯国家形成时，被阿拉伯人称做"斯拉维亚"的、以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国家中，不仅有罗斯人参加，而且也有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参加。在弗拉基米尔和贤明者雅罗斯拉夫时期，一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进入了基辅国家的版图。雅罗斯拉夫在楚德地区所建立的城市尤里耶夫（即塔尔图）就得名于他的基督教名（尤里）。爱沙尼亚语从俄语中借用的语词（例如：tapper——топор（斧），look——лук（弓），obruk——оброк（代役租），等等），爱沙尼亚发现的古罗斯钱币、饰物、十字架以及罗斯教堂的废墟——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楚德—罗斯之间关系的久远。

此外，早在古罗斯国家形成之前很久，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南部，在西德维纳河下游，库尔人、塞尔人、列托人、列蒂戈拉人、利夫人，自古以来就与深入西德维纳河下游的罗斯人毗邻而居。与爱沙尼亚语一样，在拉脱维亚语中也有不少俄语借用词（如：поп（教士）、погост（村庄）、крест（十字架）、капуста（圆白菜）、страда（农忙期），等等）。罗斯人把基督教传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随着

基督教的传入罗斯人还把文字和较高文化的萌芽传入该地区，罗斯人加强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同东西方的贸易联系，从而促进了该边远地区经济及其居民文化的发展。

在列蒂戈拉人（拉特加尔人）、列托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地区产生了各族居民杂居的罗斯城市和公国（格尔齐克，库科诺伊斯）。

波洛茨王公被认为是沿德维纳河直到海边的所有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罗斯人没有通过武力把自己的宗教、政治设施、制度和风俗习惯强加给当地居民，也不掠夺和压迫当地居民。因此，当12世纪末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出现德国骑士，至下一世纪初形成立沃尼亚骑士团匪帮时，罗斯人、利夫人、列托人、爱沙尼亚人起而并肩同侵略者进行斗争。

德国骑士团利用其数量上的优势以及罗斯遭到拔都入侵的破坏、毁灭和造成的严重损失，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从这时起直到骑士团被伊万雷帝的军队摧毁为止，在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拉特加尔人、利夫人、立陶宛人和罗斯人的心目中，穿戴铁甲的"上帝的侍从"——穿着缝有十字架的白外套的佩剑骑士的形象，开始成为掠夺者、压迫者和杀人犯的象征。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族人民憎恨他们的压迫者、奴役者，举行起义，并向罗斯人求援。在1215—1224年和1343年，爱沙尼亚人举行反对德国人的大起义，当俄国军队前来援助在尤里节之夜起来斗争的爱沙尼亚人时，就是如此。

罗斯—爱沙尼亚之间的这些悠久的联系，成为楚德地区一些大城市具有罗斯名称的原因（如：塔林，罗斯名称科雷万；塔尔图，罗斯名称尤里耶夫；奥坚佩，罗斯名称梅德韦日亚·戈洛瓦；塔林·林达尼斯古城废墟，罗斯名称列杰涅茨；等等）。

早在彼得大帝之前很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就是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从瓦兰人到希腊人处去"的大道通过这里，把罗斯同西欧联系起来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商人所走的陆路、河道和海路也通过这里。从 15 世纪末起，把罗斯同西欧联系起来的主要商道的方向发生了变化。诺夫哥罗德的衰落不能不引起它的商业的变化。以往罗斯同"海外各国"来往主要通过控制着"从瓦兰人到希腊人处去"的大水道北端的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商人与"德国人"、"哥特人"① 和其他来自"海外"的"客商们"同样航行于沃尔霍夫河、拉多加湖、涅瓦河，并出航到大海中去。

从 15 世纪末起，对西方贸易的领先地位转归普斯科夫。普斯科夫不通过罗斯海滨的"港口"进行贸易，而通过立沃尼亚骑士团辖境的城市和港口——纳尔瓦、列维尔、杰尔普特(即尤里耶夫)和里加进行贸易。

16 世纪初，同罗斯建立贸易联系的这些城市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个繁荣时期的同时代人留索夫记载说："在立沃尼亚各城市中，尤其是里加和列维尔，在罗斯商人和立沃尼亚商人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是如此活跃，以致难以在其他地区和城市找到更好的贸易……"。

立沃尼亚的情况变了样——它同罗斯建立的经济联系成为它的经济高涨的原因；它的港口开始成为罗斯商道的自然终点，这些港口的繁荣也全归功于这一点。

能直接出去到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对罗斯是有利的。这不仅是贸易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这还由于(罗斯)必需同西欧各国直接接触。而立沃尼亚骑士团千方百计对此进行阻挠，因为立沃尼亚各城市的繁荣补偿不了罗斯实力的非凡增长，这种迅速增长使贪婪的侵略者立沃尼亚骑士们极端害怕。

① 指从哥得兰岛来的商人。

罗斯谋求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谋求自己在立沃尼亚的领地、"世袭领地"，这是很自然的事。

"全罗斯国君"的军事力量代替较弱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军队出现于"德国人的"边境上，这就使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力量对比产生急剧变化。年轻而强大的俄国加入了夺取统治波罗的海地区的斗争。当然，伊万三世必须同立沃尼亚骑士团进行战争。德国人不断以其强盗般的袭击骚扰普斯科夫。例如，德国人按照普斯科夫叛徒托尔戈沙和波德库尔斯基的建议，于1469年袭击普斯科夫。一年后，叛徒托尔戈沙和波德库尔斯基被揭穿，愤怒的普斯科夫人把他们处以死刑。1473年，伊万派遣王公霍尔姆斯基统率大军援助普斯科夫人，惊慌的骑士团首领被迫同普斯科夫人签订了和约。德国人没有履行和约条款，他们使普斯科夫人遭受各种损失，拘留了各城中的普斯科夫商人，并于1480年突然进犯维什戈罗德和格多夫。伊万的将军与普斯科夫人将他们赶走，并焚烧了尤里耶夫郊区。当莫斯科军队从普斯科夫撤退时，德国人再次出动，进犯伊兹博尔斯克。这次伊万派出了12,000军队，这支军队占领了费林和塔尔瓦斯特，"押走"大批德国俘虏和运走"各种财物"。

1482年，德国人再次被迫签订了为期10年的停战协定。协定期满后，伊万不信任骑士掠夺者，于1492年，他在纳尔瓦对面建造了伊万戈罗德石堡。

看到伊万所作的准备，骑士团首领被迫把和约延长10年，但重又用阴险手段破坏了和约。在列维尔(塔林)，一个罗斯商人被烧死，而且伊万获悉：列维尔人夸口说，还要用同样手段来对付他。伊万要求骑士团首领把列维尔市政府全体成员交出来。骑士团首领拒绝了。就在同年，即1493年，伊万同对瑞典交战的丹麦国王缔结了同盟。丹麦也是汉萨同盟的敌人。丹麦请求罗斯在与瑞典

和汉萨同盟作斗争中给予援助。俄国使臣前往哥本哈根，同丹麦签订了条约，接着，1494年，伊万逮捕了诺夫哥罗德的汉萨同盟商人，封闭了汉萨同盟会馆。骑士团保持沉默，因为无力单独同莫斯科作斗争。当莫斯科开始同立陶宛国交战时，骑士团首领乘机同亚历山大缔结同盟，宣布对伊万作战。

在伊兹博尔斯克附近的战斗中，骑士团首领普拉腾贝格依仗炮兵的优势，顺利地击溃了普斯科夫人和瓦西里·舒伊斯基、丹尼尔·片科率领的莫斯科军队。骑士团军队围攻伊兹博尔斯克，破坏奥斯特罗夫，屠杀了4 000名以上和平居民。但是罗斯人很快从战败中恢复过来，莫斯科将军奥博连斯基的部队在格尔梅德附近彻底击溃德国人，追赶溃军10俄里。据编年史记载，罗斯人不用军刀攻打德国人，而是用六叶锤[1]像打猪那样，打击得如此沉重，以致连向骑士团首领报告战败消息的"捎消息人"（急使）也没能幸免。

第三次战斗发生在斯莫林湖畔，骑士团首领亲自出动，迎战舒伊斯基和谢尼亚，德国人再次战败。他们被迫撤退。几次战斗表明骑士们只能进行大破坏、袭击和抢劫。他们无力战胜伊万。

1503年，德国人被迫签订和约。骑士团首领向罗马教皇写了哭诉信，请求他宣布对俄国举行十字军远征，但是无结果。骑士团甚至不得不承认其对莫斯科的纳贡关系。尤里耶夫答应一定向莫斯科缴纳贡税。[2]

德国人暂时停止军事活动，只能千方百计竭力阻挠外国商人、医师、军械技师、建筑师、制火药匠深入俄国，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俄国的强大，而俄国则企图逐渐恢复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权

---

① 有六道棱线的金属短锤。

② 贡税是早在1462年就已确定的，并且它恢复起1233—1234年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击溃德国人后罗斯与骑士团之间曾建立的关系。

利并把他们这些侵略者赶走。

伊万三世还对北方进行战争，企图占领芬兰和芬兰湾沿岸地区，并把瑞典人从过去诺夫哥罗德军队和商人所到过的西北地区赶走。同丹麦王约翰缔结同盟后，伊万三世于1496年派遣军队到芬兰去。罗斯人围攻维堡，动用了长达3俄丈的攻城炮，但尽管如此瑞典的城墙还是经受住了罗斯的炮火。1497年，罗斯人再次进入芬兰，打败瑞典人，夺取了直至塔瓦斯特古斯的全部边远地区。罗斯北方沿海地区军队从北德维纳河河口出击，进入拉普兰，夺取了直达利门加的一片地区。拉普兰人(萨阿米人)加入了俄国籍。瑞典人进行了报复，斯万特·斯图尔袭击了伊万戈罗德。瑞典人攻占该城后焚烧了它，但没能坚守住阵地，撤退了。当丹麦王约翰成为瑞典国王时，战争停息。

俄国就是这样为自己的"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为自己的权利，为自己的独立自主而斗争的。但是俄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是仅由俄国军队的胜利造成的。

高明的俄国外交帮助了强大的俄国军队。

伊万三世在位时同一系列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建立起关系。随着莫斯科实力的增长，它的国际地位也巩固起来。伊万大规模地取得和合并各地区，使莫斯科公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1486年，远途旅行的骑士西里西亚人尼古拉·波佩尔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短期逗留后回到德国，于1487年在纽伦堡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的接见。皇帝和执政王公惊奇地听取了他有关遥远的"莫斯科国"的报告。得知"莫斯科王"与波兰交战的消息后，与波兰国王有冤仇的腓特烈，派遣波佩尔再次前往莫斯科。1489年，波佩尔到达莫斯科，他立即向伊万建议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缔结同盟，并建议伊万的一个女儿同皇帝的侄子巴登侯爵阿尔勃莱希特订婚，甚至建议封伊万国王尊号以使"莫斯

科国”加入“神圣罗马帝国”。波佩尔认为，这些建议会使伊万欣喜万分，便要求伊万立即让他看看新娘，但当他得到的答复是：“我国没有事先让看女儿的习俗”时，皇帝使臣不胜惊讶，因为用这样的口气谈“事情”，使波佩尔完全惊愕了。人们以伊万的名义答复他说：“蒙上帝的恩赐，我们从远古，从自己的始祖时起就是本国的国君……正如过去我们不想接受任何人的任命一样，如今我们也不想接受罗马帝国的封赐”。这个答复使波佩尔感到窘迫，他搁下有关“任命”伊万和封予国王尊号的一切话题，开始为伊万的女儿、公主们提出更有利的未婚夫——有选举皇帝权的侯爵萨克松斯基和侯爵布兰登堡斯基。但是波佩尔的一切试图都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维托夫特毕生力求取得国王尊号，但他直到作为“大公”死去时也还只是竭力追求而已，而自称“全罗斯国君”的伊万却不屑一顾地拒绝了罗斯的宿敌立陶宛大公当时所乐于接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赐。

佩波尔为伊万的女儿提亲的企图未获成功。就在1489年，伊万派遣自己的使臣尤里·特拉哈尼奥特到腓特烈及其皇储马克西米利安处去。特拉哈尼奥特来法兰克福时声称：大概只有马克西米利安本人才能成为“全罗斯君王”的女儿的未婚夫。从这时起，双方开始交换使团，而马克西米利安时而请伊万派遣军队去波兰、佛兰德和德国，时而又用“自己高贵的手”接待条顿骑士团和立沃尼亚骑士团。

哈尔廷格尔率领的最后一个使团，于1505年受到伊万接见，但除了交换空泛辞令与诺言外，这次使团并无任何重要意义。谈判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因为两国的利益离得太远了。

莫斯科同威尼斯的联系建立得更早，伊万三世的使臣伊万·弗里亚津曾经过那里。威尼斯人同土耳其进行的战争使它精疲力尽，当他得知莫斯科同克里木人的关系后，威尼斯共和国元首企图

利用俄国使团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该元首请求弗里亚津把他的使臣带走，向他指出通往克里木的道路。该元首让其使臣唆使鞑靼人反对土耳其人。弗里亚津答允了。于是威尼斯人特列维赞随他同行，弗里亚津未将此事报告伊万(三世)，伊万遂把他们俩拘留起来，并要求威尼斯元首进行解释。该元首不得不表示歉意。特列维赞被获准去克里木，而伊万的使臣托尔布津则去威尼斯召能工巧匠来俄国。1493 年和 1499 年，俄国使团又以同一目的访问过威尼斯。

(莫斯科)还同摩尔达维亚的斯特凡大公建立了关系，斯特凡的女儿叶连娜嫁给伊万的儿子小伊万。伊万三世写道：他同斯特凡是“姻亲和一家人”。这不只是说说而已。当土耳其人的入侵开始威胁摩尔达维亚时，伊万写信给立陶宛大公说：必须帮助摩尔达维亚，并请他做到这一点，因为由于距离遥远，伊万不能前去援助斯特凡。

1497 年，扬-阿尔布雷希特的波兰军队和亚历山大的立陶宛军队进攻摩尔达维亚，并围攻其国都苏恰瓦时，斯特凡请求伊万援救。伊万严词要求亚历山大停止对摩尔达维亚的军事行动。伊万的国书由洛班·扎博洛茨基和沃尔克·库里岑呈交后，起了作用。亚历山大“自己回去了”，扬-阿尔布雷希特的军队在库兹明森林被斯特凡击溃。

(莫斯科)还同匈牙利开始来往。匈牙利国王马特维·科尔温早在 1482 年时就曾派遣使者到伊万处，请求他在反对卡西米尔的斗争中给予援助。伊万接受了这一请求。但是不久，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的兄弟弗拉季斯拉夫成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他于 1501 年派遣使者到莫斯科，请求伊万同亚历山大和好。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写信给伊万，劝他在土耳其人进犯的艰难时刻别同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争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弗拉季斯拉

夫的使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同伊万签订了和约。

强大的土耳其也被迫承认了莫斯科，而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都听命于土耳其。

早在1482年时，前往马特维·科尔温处去的书记费奥多尔·库里岑被土耳其人在别尔哥罗德逮捕。不久，土耳其人释放了该书记，并让他明白：苏丹愿意同莫斯科交往。当时克里木已屈服于土耳其；做买卖的俄国商人每年去卡法、亚速夫和(克里木)汗国其他商业城市"作客"，即经常住在克里木。但是伊万并不急于利用土耳其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伊万三世只是在1486年致克里木汗明里一吉列亦的国书中，请他通报土耳其苏丹在向他谋求什么样的友谊。苏丹巴雅集特通过明里一吉列亦重复了自己的建议。伊万于1492年致巴雅集特国书，对土耳其的亚速夫长官欺压俄国商人的行为表示愤怒，并责怪巴雅集特说，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没有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是他的过错。伊万不让俄国商人到卡法和亚速夫去，声称："那里欺压我国客商，因此我们不放自己的商人到那里去"。作为答复，巴雅集特派自己的使团前往莫斯科，但是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使土耳其使臣在途中返回了。

接着，1497年，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普列谢耶夫率领的第一个俄国使团前往土耳其。伊万命令普列谢耶夫保持庄重尊严，把"土耳其境内君王客商受欺压的清单"交给苏丹。

巴雅集特对普列谢耶夫的举动感到窘迫。俄国使臣保持了高傲和自尊，断然拒绝同次要人物谈话，拒绝接受礼物——长袍和金钱。

接着，第二个使团从莫斯科前往土耳其。1499年，(俄国)使臣阿列克谢·戈洛赫瓦斯托夫随到卡法去的俄国商队前往巴雅集特处，他带回了苏丹的新国书，这份国书证实土耳其渴望同俄国建立持久的关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没有拒绝土耳其的一再要

求，因为通商利益要求建立外交关系，俄国商人经常前往卡法、亚速夫、苏罗日和君士坦丁堡。

马克思指出："伊万保护贸易，以此为目的，他尤其支持同亚速夫和卡法来往"。①

但是他没有被巴雅集特所表示的友好的保证所迷惑，——好战成性的土耳其高举其土耳其弯刀劈向了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

这些国家的人民向莫斯科"全罗斯国君"求援。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伊万曾在摩尔达维亚对土耳其人的力量悬殊的、极其消耗精力的斗争中请立陶宛大公援助摩尔达维亚。对于斯特凡的求援，莫斯科大公写道：如果他不是那样遥远，他就真心诚意地想援助摩尔达维亚，并"捍卫基督教"。

遥远的格鲁吉亚向同一宗教信仰的俄国求援，指望伊万保护她，以抵御波斯国王。1492年，（格鲁吉亚）卡赫齐亚王派遣使团到莫斯科，从"伊维尔地区"（向莫斯科）致敬，并在致伊万的国书中自称"卑微的奴仆"。亚历山大的这个使团为从伊万雷帝和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时起俄国经常援助格鲁吉亚奠定了基础。

但是向俄国求援以同伊斯兰教徒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作斗争的不只格鲁吉亚一个。曼古普的（克里木的）基督教徒小王公伊萨克（伊赛卡）和塔曼的（高加索的）统治者扎哈里·圭古尔西斯也向莫斯科求援，以免于土耳其人（的压迫）。

这个时期，俄国已开始起到从土耳其苏丹压迫下拯救克里木、高加索和巴尔干山脉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的拯救者的作用。

拔都入侵并没有把罗斯从黑海沿岸和多瑙河地区排挤出去，并没有使罗斯同南斯拉夫人的古老联系完全断裂。不仅在13—14世纪，而且在16世纪时，多瑙河地区仍留有与保加利亚人、摩尔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8卷，第160页。

达维亚人、瓦拉几亚人毗邻而居的罗斯居民，而罗斯流浪者——哥萨克的祖先也出现在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巴尔干山脉。

罗斯王公罗斯季斯拉夫居于贝尔格莱德附近的马奇瓦，在保加利亚则有同罗斯保持不断联系的雅科夫—斯维亚托斯拉夫："我强盛家族的整个罗斯土地，它的支脉是我的神圣祖先的根"。在君士坦丁堡的先知教堂附近，在阿索斯半岛的潘泰莱蒙修道院，住有许多罗斯人。罗斯人的"察里格勒"移民区很多。在阿索斯半岛，罗斯修道士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修道士发生冲突。罗斯的抄本抄录者和传记编纂者叶夫廖姆、叶夫谢维和阿夫拉米驰名于君士坦丁堡、阿索斯半岛和罗斯。

俄国的"文人"没有对自己的遭受土耳其人侵犯和奴役的同胞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注意到科索沃原野会战，这次会战的结果是塞尔维亚人被完全击溃并屈服于苏丹，他们也注意到特尔诺沃的陷落，由于该城的陷落开始了保加利亚数百年之久的受压迫(的历史)。

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向俄国求援。他们带着希望和自尊心期望俄国(的援助)。

俄国对南斯拉夫人的文化影响增长起来。罗斯编年史为塞尔维亚编年史奠定了基础，都主教伊拉里昂的《论教规与神恩》、《鲍里斯和格列布传》等古罗斯文献著作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文献产生着重大影响。

塞尔维亚人康斯坦丁·科斯坚奇斯基(15世纪初)在其《关于文字的传说》中认为，在古代，"一些妙不可言的好心人"以最优美的罗斯语言为斯拉夫文字奠定了基础。

保加利亚人基普里安(于14世纪末)，罗斯都主教、塞尔维亚人帕霍米·洛戈费特(于15世纪前半叶)，在莫斯科安装了"带有锤和钟的"时钟的杰出作家、塞尔维亚人拉扎尔(于15世纪初)，都

逃脱土耳其人的压迫，来到了莫斯科。

土耳其人在南斯拉夫人的各地区建立了统治之后，阿索斯“圣山”的作用更加增大了，因土耳其人没有把强有力的手压在它上面。

莫斯科起着保护一切受土耳其人压迫的东正教民族的保护者的作用。亚陀斯的罗斯人的潘泰莱蒙修道院从俄国得到更大的支持。1497 年，潘泰莱蒙修道院从伊万三世处获得大批赠品。希腊和南斯拉夫僧侣们前往莫斯科请求“施舍”、支持和保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贝尔格莱德都主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的数十座修道院的代表，都向莫斯科求援，因为受奴役的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当时的僧侣无论是在土耳其政府面前还是在国外都是代表这些受奴役民族的唯一的社会阶层，所以很自然，对俄国的这个援助的意义，大概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这种援助，南斯拉夫人、希腊人、东正教阿尔巴尼尔人的这些求援，逐渐汇合成对俄国的更大的向往，因为俄国成为他们的唯一保护者，成为使他们摆脱“土耳其苏丹”的唯一强大的斯拉夫强国，而俄国的加强也使她有可能通过外交手段和武装力量保护自己的有同一宗教信仰、同一血统的兄弟民族。

伊万三世在位时，同许多东方国家建立起联系。伊万派遣马尔克·鲁夫使团前往波斯乌宗一加桑汗处，1490 年，伊万在莫斯科接见了帖木儿后裔、呼罗珊统治者忽辛。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伊万三世推行着成功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罗马教皇西克斯特四世于 1472 年企图通过让伊万与合并派女教徒卓娅·帕列奥洛格结婚来谦慎地把他控制在手中，但这一企图以教皇使节的可耻失败而告终，教皇使节在神学方面的争论中被“有学识的文人”尼基塔·波波维奇击败，在外交辩论中被莫斯科书记们击败。

可以用马克思的话对伊万三世时期俄国的战争和对外政策作出如下总结:"伊万三世在位(1462—1505)初期，仍然臣属于鞑靼人;他的权威仍受到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竞争;俄罗斯诸共和国中为首的诺夫哥罗德统治着俄罗斯北部；波兰—立陶宛正力图征服莫斯科公国;最后,利沃尼亚骑士团尚未解除武装。但是到了他在位的末期,我们就看到伊万三世坐在独立的宝座上,身旁是拜占庭末代皇帝[①]的公主；脚下是喀山汗，金帐汗国的余部也群集来朝;诺夫哥罗德和俄罗斯其他共和国都已屈服,——立陶宛萎缩了,它的君主成了伊万手中的一个工具,——利沃尼亚骑士团也被击败了。惊惶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甚至使欧洲发抖的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本人也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莫斯科公国人的傲慢的语言。"[②]

---

① 马克思指的是托马斯·帕列奥洛格*,他是拜占庭帝国最后的皇族后裔。

②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0 页。

* 托马斯·帕列奥洛格为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的弟弟,他的女儿索菲娅(卓娅)·帕列奥洛格于 1472 年成为伊万三世的妻子。——译者

第十三章

瓦西里三世在位时期俄国更加强大

伊万三世死于1505年10月17日，与其祖先不同的是，他临死前拒绝接受苦行修士的最高级位。他在世和去世时都是国君，而不是修士和僧侣。

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继位。但是瓦西里三世并非立即取得王位。

这位"帝都的公主"之子有一个竞争者——伊万三世的孙子德米特里。德米特里是伊万三世与其元配摩尔达维亚国王斯特凡之女叶连娜·斯特凡诺芙娜生下的长子伊万·伊万诺维奇(小伊万)的儿子。

小伊万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并已被宣布为大公。1490年，他死去了。于是出现了谁成为王位继承人的问题——是伊万三世的孙子德米特里，还是伊万三世与其继妻卓娅·帕列奥洛格所生下的小儿子瓦西里？领主们认为"帝都的公主"是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名声大震的因素之一，他们害怕大公政权的进一步加强，便支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继位，而得势的各衙门书记和领主后裔则帮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支持索菲娅·福米尼奇娜[1]。

最初，领主们获胜，伊万三世封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为"大公"，把他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不久，瓦西里拥护者的阴谋在莫斯科被揭破。支持瓦西里及其母亲的一些领主和领主后裔遭受迫害。六名领主贵族被处死，许多人被关进监狱。瓦西里本人也被

① 即卓娅·帕列奥洛格。——译者

监禁。但是有势力的书记们并未停止活动，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伊万对儿子(瓦西里)的态度突然改变，他称他为“国君”和“大公”，把他指定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把德米特里及其母亲监禁起来。

伊万三世强调了自己对王位继承问题的态度，在其讲话和诏书中提出了大公有权擅自处理王位的思想。

谓彻城市普斯科夫的使臣们对伊万对待德米特里态度的前后矛盾和突然改变感到非常惊讶，伊万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说："难道朕、我大公对自己的子孙和公国不能作主吗？朕想给谁，就把公国交给谁统治。"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用这段话让人们懂得大公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过去随着大公政权的加强，封邑王公就逐渐丧失最高统治权(支配自己"世袭领地"、法庭、税收、铸币等的权力)，而大公则相反可无限制地支配自己的全部遗产，扩大自己的权力，那末如今立遗嘱的大公对其家族成员的权力则大大地加强了。

正如过去领地从封邑王公处转归大公意味着他们的一部分权利转归大公，而他们丧失这些权利和他们的权力被大公缩小又引起一部分领地转归大公一样，如今领地以及大公家族中的权力则集中到了立遗嘱的大公的手中。权力与领地是不可能分开的。封建主的土地所有权造成他在行政、军队、司法中的统治地位。这是各领地和整个国家的特征，也是大公家族的特征。

伊万三世"恩准"年长的儿子瓦西里占有庞大的领地。这些领地在大公世袭领地中所占份额要比伊万的父辈时按"长子继承权"所能分得的份额大得多。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从父亲处得到66座城市，而同时归他的四个兄弟的份额总共只有30座城市。收归国有的一切无主地产都归他所有；铸币成为他的权利，他的专利权；3/4的收入归他所有。

因此很自然，伊万三世在位时期被特别扩大的全部大公权利都转归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因为伊万三世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是旧国家制度的单纯扩大和发展，而是封建主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组织的一个崭新的形态，所以当一切权利的拥有者和最高政权全部职权的代表者只是“全罗斯国君”时，所有其余的人便只是他的臣民，不管他们的祖先是独立自主的执政王公“留里克后裔”或“格季明后裔”，还是以猎犬饲养者和训练者的身份为其效劳的人。

此外，伊万三世还把他对普斯科夫使臣所说的话以瓦西里与伊万的次子尤里签订的契约文书的形式固定下来，按照契约文书尤里答应一定在其兄长瓦西里死去时承认由瓦西里“恩准”为大公的那个瓦西里的儿子为国君和大公。

这个契约文书同时也是伊万三世力图确认大公有权擅自指定继承人的证明，是他担心再次发生失明者瓦西里时期令人恐惧的可悲事件的证明。

瓦西里就是如此登上大公宝座的。

他的父亲，罗斯领地的第一个“兼并者”伊万·卡利塔的事业的继承和完成者，已经建造了俄罗斯国家的宏伟大厦，留给瓦西里的事是对其修整、加工。还剩下没有被兼并的普斯科夫和梁赞，还有被强迫“合并”于莫斯科的封邑公国。

瓦西里的事业从普斯科夫开始。莫斯科派去的长官伊万·列普尼亚-奥博连斯基管辖着普斯科夫，感到自己是完全的主宰者。他的行动在爱自由的普斯科夫人中间激起反抗的风潮。1510年1月，一些普斯科夫使者被召到诺夫哥罗德去见瓦西里，他们在这里被逮捕，而莫斯科大公的一名书记则来到了普斯科夫。听到国君讲的话，人们召集起谓彻，这是普斯科夫最后的一次市民大会。瓦西里要求自己的书记乌斯塔米亚取消爱好自由的普斯科夫的谓彻

制度。普斯科夫无力自卫，因此第二天瓦西里的要求便被接受了。不久，瓦西里率领军队进入普斯科夫。许多领主和商人被逮捕。当天夜里，300家普斯科夫显贵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城市。他们被送往莫斯科。

不久，梁赞也被兼并。年幼的梁赞王公伊万·伊万诺维奇是力图恢复本公国独立的梁赞古老领主家族手中的工具。他们的狭隘私利，他们的可疑的政治手腕，使得莫斯科开始警惕地监视梁赞。不久，人们得知：伊万·伊万诺维奇同成了俄国的敌人的克里木汗有勾结。1520年，伊万·伊万诺维奇被召到莫斯科并被逮捕。他逃出来后，企图在梁赞起事，但他的这个企图没有成功，于是这位梁赞的最后一个王公不得不寻求栖身之地于立陶宛。(16世纪)20年代，瓦西里三世废除了按照1503年和约被兼并的位于北乌克兰的舍米亚奇奇家族的封邑。

罗斯各领地的合并就这样地完成了。

在此之前，瓦西里三世还吞并了斯摩棱斯克，终于从立陶宛大公手里夺回了这座古老的罗斯城市。

1506年，罗斯最凶恶的敌人卡西米尔的儿子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死去。立陶宛和波兰在死去的亚历山大的兄弟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老"西吉斯孟德一世的统治下重新合并。新的波兰国王兼立陶宛大公西吉斯孟德一世准备作战，拼凑起反对俄国的各国联盟。除波兰和立陶宛外，参加这个联盟的有立沃尼亚骑士团、克里木和喀山。莫斯科知道立陶宛的罗斯居民站在自己这边，并估计到立陶宛最大的大封建主米哈伊尔·格林斯基会出力相助，因为格林斯基已暗中与瓦西里联系，打算"投奔"俄国，因此莫斯科不怕(西吉斯孟德拼凑的)这个联盟。

我们已经知道，王公和领主们是怎样从立陶宛的罗斯领地上"投奔"俄国为莫斯科大公效劳的。

1500年，王公谢苗·伊万诺维奇·别利斯基带着"世袭领地""投靠"伊万三世，请求接受"他的效劳"，因为"他们在立陶宛为希腊法规忍受了巨大困苦"。仿照别利斯基接着"投奔"莫斯科的有居住在雷利斯克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舍米亚奇奇以及谢苗·伊万诺维奇·莫扎伊斯基。接着，投奔莫斯科的还有王公莫萨利斯基家族、霍捷托夫斯基家族。

如今，王公米哈伊尔·利沃维奇·格林斯基又准备"投奔"俄国。格林斯基家族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最富有的封建主，出身于一个鞑靼小王公列克萨的罗斯化和皈依东正教的后裔，列克萨在维托夫时代居住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米哈伊尔·格林斯基是个阅历很丰富、有文化教养的人。他长期住在(神圣罗马帝国）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宫廷里，并且到过意大利、西班牙。马克思指出：他"锻炼成一个统帅和政治家"。[①]

(立陶宛大公)亚历山大在位时，格林斯基家族靠米哈伊尔得势。他的两个兄弟当上了将军，一个是基辅的将军，另一个是别列斯季耶的将军。他们掌握着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全部"格林斯基领地"以及基辅地区、白俄罗斯的各乡、各世袭领地；白俄罗斯的图罗夫城是政治活动的支柱。西吉斯孟德在位时情况有了变化——格林斯基感到接近于失势。他希望靠莫斯科的领导地位统治立陶宛的所有罗斯领地，他请求瓦西里三世援助他，保护受天主教徒迫害的东正教徒同胞。

米哈伊尔·格林斯基的追求功名的意图（宗教问题对他关系不大，他原为东正教徒，在西方参加了天主教，后在莫斯科又重新恢复为东正教徒)与瓦西里三世竭力继承其父志为"世袭领地"而斗争的意图相一致。

立陶宛成为采取攻势的一方。1507年2月2日，在维尔诺召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8卷，第160页。

开的议会决定对莫斯科开战，并立即着手征集军队。

老西吉斯孟德已经同克里木汗明里—吉列亦和喀山汗马哈麻·额明结成了联盟。1507年3月，西吉斯孟德的使团厚颜无耻地竭力要求把1503年伊万三世所兼并的罗斯领地收归立陶宛大公。(俄国)必须迅速、坚决地行动起来。

1507年秋，俄国军队向立陶宛推进。1508年2月，米哈伊尔·利沃维奇·格林斯基从图罗夫出动，进向北方，即立陶宛领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一些封建主转到米哈伊尔·格林斯基方面，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支持封建主的这次密谋，因为在格林斯基惩治其敌对者时，敌对者的农民也跟着破了产。只有莫济里城投到他这一边，米哈伊尔的兄弟瓦西里把基辅地区的一些阶层的居民发动了起来。因此，很自然，米哈伊尔·利沃维奇没有取得大的成功，当1508年9月，在承认莫斯科领有根据1503年停战协定暂时转归莫斯科的全部领地的基础上，莫斯科和立陶宛之间签订了和约时，米哈伊尔·格林斯基不得不逃到俄国去。

在格林斯基兄弟之后，他们的追随者们——王公德鲁茨基家族、科兹洛夫斯基家族、日热姆斯基家族、奥金采维奇家族，也跟着到了莫斯科。

1507—1508年的战争使有兴趣同俄国结盟的欧洲国家活跃起来。俄国与丹麦恢复谈判，151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使臣同瓦西里（三世）签订了对西吉斯孟德作战的条约。但是瓦西里(三世)不需要帮助。

1512年时就已恢复了对立陶宛的军事行动。远征延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俄国军队给立陶宛封建主造成"许多灾难和损失"。还向斯摩棱斯克逼近，但未能成功。第二年1513年时，俄国军队再次出现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但该城仍留在西吉斯孟德手中。

1514年7月，俄国军队第三次从莫斯科出发，远征斯摩棱

斯克。

此次远征出动了“大量兵力，带去了许多大炮和火绳枪的弹药”。只有大炮能决定远征的结局。逼近了斯摩棱斯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下令“连续不断地发起大规模猛攻”，于是“大炮和火绳枪从四面八方攻打城市，火弹射入城里，由于大炮和火绳枪的轰鸣、人们的呼喊声、市民的哀号声、大炮、火绳枪的对射，大地似乎在战栗，人们互相看不见，在火焰和烟雾中踌躇，全城冒着烟”。

7月29日下午3时，从第聂伯河彼岸传来了威力巨大的前所未闻的射击轰鸣声，——这是炮手斯特凡奉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之命用重攻城炮开火了。炮弹落在装有弹药的要塞大炮上，“那座大炮炸开了 斯摩棱斯克城里死了许多人”。下午6点钟，大炮第二次开火，——斯特凡“收集了许多小炮弹，用铅束缚在一起，向另一方向开火，于是城里死了更多的人”。

接着，斯特凡大炮的第三次射击声轰隆响起。

被围攻的斯摩棱斯克人与发动围攻者一样，也是罗斯人、东正教徒，[①] 他们不想为立陶宛封建领主殉难，早已“倾向”于莫斯科。他们要求立陶宛大公委派的长官尤里·索洛古布停止抵抗。

马克思强调指出了斯摩棱斯克居民在使自己的城市转入“全罗斯国君”的高贵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该城长官被迫让步，7月30日，斯摩棱斯克被俄国收复。

被莫斯科军队所解放的罗斯居民友好地帮助舒伊斯基将军的战士加固被击坏的城墙。城民们还把贵族的阴谋报告了舒伊斯基。阴谋者被处以绞刑。从俄国人处夺回斯摩棱斯克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这时，由于看到俄国的强大，奥地利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和立沃尼亚骑士团首领都同莫斯科结成了联盟。瓦西里(三世)乘此机会，于1519年转入进攻。俄国人进到维尔诺，并进一步深入

---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8卷，第160页。

立陶宛腹地，1522年，(波兰）国王被迫签订和约。斯摩棱斯克归俄国所用。

斯摩棱斯克的归并对俄国具有重大意义。有众多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大城斯摩棱斯克，是俄国通往乌克兰(沿第聂伯河)，通往立陶宛、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最重要商道的集中点，是俄罗斯的“通往欧洲”的独特的陆路“口岸”。斯摩棱斯克还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意义。边境城市斯摩棱斯克在俄国历史上一直充当俄国同其敌国波兰斗争时的保垒或充当“莫斯科的大门”，俄国的敌人在通过这个大门回去时比他们进来时要急速得多。

拥有极佳设防的斯摩棱斯克使俄国西部边境大为加强。无怪乎斯摩棱斯克一直使力图夺取这座俄国古老城市的波兰国王感到不安。

莫斯科“兼并了”所有的大俄罗斯领地，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要兼并基辅罗斯国境内、东斯拉夫人民族疆界内的所有罗斯领地。因此对立陶宛的斗争不能因收复斯摩棱斯克而结束。

瓦西里三世在东方的行动也很成功，尽管东方的局势愈来愈复杂。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伊万三世在位时的俄国与同克里木汗明里-吉列亦联盟的卡西米尔四世的波兰—立陶宛国交战时期的情况。从1476年起成为土耳其附属国的克里木汗国如今已不需要帮助莫斯科同立陶宛和金帐汗国作斗争了——立陶宛已变为其同盟者，金帐汗国则已灭亡。受其盟国——强大的土耳其支持而振作起来的贪婪、凶恶的克里木鞑靼军队变为俄国的严重威胁。喀山汗国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在封建主各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莫斯科的敌人经常占优势。

1505年，马哈麻—额明同莫斯科决裂。同喀山通商的俄国商人遭捕杀，同年秋天，鞑靼人进向下诺夫哥罗德。

作为答复，俄国军队在大公的兄弟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日尔卡的统率下向喀山进军，但遭失败。这次失败使俄国的敌人振作起来。老西吉斯孟德同明里一吉列亦结成反对莫斯科的联盟，并同立沃尼亚骑士团首领普拉腾贝格相勾结，请他一起出动，反对"我们的敌人莫斯科大公"。这个联盟引起马哈麻一额明的注意，他派遣急使去见西吉斯孟德，提议他"一致"对抗莫斯科。

准备同立陶宛作战时，瓦西里(三世)必须保障自己免于东方、喀山汗国方面来的危险。诚然，"按照老规矩"同喀山签订了和约，但是实际上，在马哈麻一额明在位时，喀山是独立于俄国的，尽管1516年条约声称:"未经大公通知，喀山王与宗王们不得擅自行动"。

条约上的这一条文使瓦西里有可能在1518年马哈麻一额明死后，把自己的走卒沙阿里扶为喀山汗，并在扶立他之前从他和"喀山王公们"处取得了他们将"卫护"他的"事业"的"笔据"。

在克里木，也出现了有利的局面:马哈麻一吉列亦艰难地同反叛的、持亲莫斯科方针的阿黑麻进行着斗争。

与喀山相同，克里木也有相当大的、有势力的亲莫斯科的封建主集团。互有亲属关系并同臣属于瓦西里三世的卡西莫夫的"失邻氏大王公们"有亲属关系的一些失邻氏克里木、喀山王公起着特别积极的作用。

克里木汗的使臣王公阿巴黑以克里木汗的名义坚决抗议瓦西里扶立沙阿里为喀山汗，但是莫斯科的领主们一再向阿巴黑说明他们的走卒(沙阿里)在喀山即位，以及他们维护"失合来"(即沙阿里——译注)即位权的情况。阿巴黑改变了态度，签订了"牢固友谊和兄弟情谊"的条约。克里木小王公的让步是因为吉列亦家族中展开着残酷的争权斗争，这个斗争削弱了克里木。1519年被瓦西里派往克里木的使臣戈洛赫瓦斯托夫曾向瓦西里书面报告过有

关这个斗争的许多详细情况。

但即便沙阿里时期的喀山实际上也处于费奥多尔·卡尔波夫的支配之下(他曾奉派率军去那里支持"失合来"),克里木也并未放弃其对俄国的侵犯意图。

1520年,苏里曼一世登上土耳其王位,他对克里木汗马哈麻一吉列亦给予特殊庇护。

克里木转向坚决进攻俄国,并在土耳其的庇护下开始拼凑与莫斯科敌对的鞑靼穆斯林各国的联盟。马哈麻一吉列亦派遣使团到阿斯特拉罕汗扎尼别处去提议建立以远征莫斯科为宗旨的联盟,1521年春天,他派出骑兵部队进攻喀山。持亲克里木方针的那些喀山封建主乘机举行了政变。沙阿里逃到莫斯科,以便重新回到其卡西莫夫王国。克里木吉列亦家族的一个成员萨吉卜一吉列亦登上了喀山汗位。

喀山的政变使两个敌视莫斯科的鞑靼国家有可能同时出征俄国。

早在1521年5月26日,"喀山鞑靼人同切列米斯人"就已经进攻温扎河地区。但是"温扎人前来堵截,许多人同鞑靼人作战,鞑靼人和切列米斯人杀了许多人,并夺走了全部俘虏,尸骨遍野"。在1521年的几乎整个春季,鞑靼部队确实抢劫、焚烧、屠杀,并掳走了伏尔加河上游罗斯领地的居民。

同时,喀山军队的主力部队在萨吉卜一吉列亦的统率下,经穆罗姆和梅谢拉(另一说法为经过弗拉基米尔和下诺夫哥罗德)"进攻梁赞",在途中蹂躏了"许多乡和村庄",7月末进向科洛姆纳。强行渡过奥卡河的马哈麻一吉列亦的凶恶、贪婪的克里木人也来到了这里。克里木人同诺盖人,同大帐鞑靼人,"同伏尔加左岸地区鞑靼人、诺盖人等所有鞑靼军队"一起行进。"立陶宛国王派来的"叶夫斯塔菲·达什克维奇的部队也同他们一起行进。莫斯科

的外部“敌人”就这样地汇集了起来。但是，还有瓦西里的内部敌人——封建主反对派。梁赞大公伊万逃到立陶宛时正值1521年夏天，伊万是立陶宛和克里木希望在梁赞大公宝座上看到的它们的敌视莫斯科政策的传播者。

在科洛姆纳会合后，两个吉列亦统率的军队于7月29日向莫斯科推进。8月1日“克里木宗王和鞑靼人”已经到达莫斯科附近。

鞑靼人“攻占了许多乡破坏了许多村庄，……俘虏了许多王公、领主和百姓，砍杀了其他的人，烧毁了村庄。距离（莫斯科）城只差3俄里……”

瓦西里退到沃洛科拉姆斯克集结军队。不满将军们将凶恶的鞑靼军队放进莫斯科的平民，“在所有各城掀起大起义”。这样的事在俄国历史上已一再发生，当鞑靼人威胁到罗斯城市，而王公和将军们无力反击入侵时，平民便自己起而保卫自己的城市，抵御敌军。

但是早在8月24日“大公就已带着侍从来到莫斯科。战事平息了”。鞑靼人害怕俄国人备战，退回去了。鞑靼人对莫斯科的远征没有取得他们所期望的结果，甚至连瓦西里三世在吉列亦战胜时草拟的承认自己为克里木汗的纳贡者的“纳贡书”也不知怎么仍在伊万的梁赞地方官哈巴尔·西姆斯基手中。

为回答鞑靼人的远征，1523年瓦西里派出军队进向喀山，在苏拉河畔建筑了瓦西里城或瓦西里苏尔斯克堡，“以便他能从该城靠近喀山推行自己的事业，以便他的战士靠近喀山”。

瓦西里苏尔斯克成为俄国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的堡垒，成为通往喀山的要冲。该城驻有王公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斯特里金和瓦西里·萨尔特科夫和米哈伊尔·巴克耶夫三将军统率的驻防大军。

焦虑不安的萨吉卜—吉列亦向克里木求援，坚持要求送来大炮、火绳枪，派来精锐部队——亚内恰尔①。克里木新汗薛迭忒—吉列亦试图对莫斯科施加压力，要求瓦西里放弃对喀山的斗争，但是瓦西里对此置之不理，引证说自己有通过自己的权力扶立喀山汗的权利。

1524年，俄国军队再次进向喀山。这次远征被认为是以攻占喀山为目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给莫斯科军队配备的大量大炮（"大炮弹药"）证明了这一点。喀山没能被攻占，但萨吉卜—吉列亦逃到克里木去了，同一统治家族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萨法—吉列亦占据了他的位置。瓦西里同意保留萨法—吉列亦为（喀山）汗，但同意是迫不得已的，为了给喀山经济造成损失，他把俄国商人的集市从喀山撤出，迁移到下诺夫哥罗德。

（俄国）对土耳其的敌意也增长起来。过去（土耳其）苏丹阿谀奉承莫斯科，主动同莫斯科靠拢，阻止克里木人进攻莫斯科，（向莫斯科）派去使臣，现在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土耳其苏丹苏里曼一世把自己的权力向喀山扩展。土耳其在把自己的统治权扩大到克里木、喀山，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北高加索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之后，变成了与俄国敌对的东欧强国。如果说俄国提出的任务是消灭金帐汗国的残余，消灭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采取攻势的鞑靼各国，那末土耳其则是力图加强这些鞑靼国家，使它们在自己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以进一步恢复东欧全部疆域上的鞑靼枷锁，从而首先恢复对俄国的鞑靼枷锁，只不过这种枷锁以土耳其—鞑靼的形态出现。当然，这种形态的枷锁一点也不会比旧的金帐汗国的枷锁好些。

当时，东方已经开始形成斯大林所描述的那种局势，斯大林着

① 原文为янычар，此系音译。亚内恰尔为14世纪建立的土耳其正规步兵。——译者

重指出：在东欧，“为了抵御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东方人的侵犯，必须立即建立能够抵御外侮的中央集权国家”。[1]

1519年，借口“保护”经亚速夫到土耳其去的俄国使臣，土耳其人开始在顿河河口建筑可供进攻北方之用的根据地。由于传播关于莫斯科的进攻计划的挑拨性流言的土耳其使臣斯金德尔萨克的活动结果，土耳其和克里木于1525年准备大举远征莫斯科。土耳其派出了3万人，克里木汗派出了2万多人。土耳其—克里木军队由莫斯科的宿敌萨吉卜—吉列亦统率。远征虽由于克里木吉列亦家族内部新的封建战争而中断，但它证明了东方的危险仍在增长。不仅鞑靼军刀威胁着俄国，土耳其的弯刀也威胁着俄国。从1533年起，当苏里曼一世的走卒萨吉卜—吉列亦成为克里木汗后，克里木对莫斯科的敌对态度更其加强。

俄国在喀山的阵地则的确有所巩固。

1530年，俄国军队进向喀山，尽管喀山的同盟者诺盖人和阿斯特拉罕人援助喀山人，喀山人还是战败，并且承认了自己的“罪过”。接着，通过一系列巧妙的外交手段，俄国使臣组织了又一次政变。1532年，成为莫斯科的藩臣的瓦西里(三世)的走卒卡西莫夫宗王章阿里登上喀山汗位。

东方的局势便是如此。

鞑靼国家喀山和克里木的敌对态度促使俄国着手加强自己的东南边境，并建立东方和南方边境的国防。梁赞的波多尼耶和北乌克兰之归并于莫斯科，“波兰乌克兰地区”(当时对接近草原、“荒野”的一切地区的称谓)之并入俄国版图，促使莫斯科把接近草原的俄国边境的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

还在14世纪60年代顿河王德米特里在位时，霍皮奥尔河和

---

①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载《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8页。

顿河沿岸就设有莫斯科(公国)的哨所。1380年，哨所分布到季哈亚·索斯纳，越过了顿河。1444年鞑靼宗王木思塔法侵扰时，曾提到俄国自由逃民哥萨克以鲜血灌溉了罗斯"边区"的土地，他们从鞑靼人处夺回了这些"边区"，迫使进行突然袭击的凶恶骑兵愈来愈远地退向南方和东方。罗斯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到"野地"去，表现出"大胆勇敢"精神。他们逃避领主的代役租、奴役契约和官吏的笞杖，不愿"受雇作领主和寺院的雇农"，去寻求尽管危险但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这里，罗斯的自由逃民"大胆勇敢地"在顿河上，在塞夫鲁克人的"迁居地"(他们从第聂伯河走到伏尔加河，时而与顿河沿岸草原的哥萨克联合，时而与第聂伯河右岸地区的"切尔克斯人"联合)，汇集成以"首领"、哥萨克阿塔曼为首的"人群"，猎取野兽、捕鱼、放牧牲畜、采集蜂蜜，从鞑靼牧羊人处夺取羊群，抢劫克里木人和诺盖人的小队伍。草原已经不像拔都入侵后不久的那个时期那样地荒凉了。

在顿河上，在北顿涅茨河上，在谢伊姆河和沃尔斯克拉河上，在普肖尔河和苏拉河上，都"有了罗斯气味"。

1491年时，瓦西里·罗莫达诺夫斯基就已从克里木向伊万三世报告说："野地里(即荒野草原上——马夫罗金注)有许多您的臣民"。

但是除自由逃民外，经常使用草原边缘自由逃民的大公骑兵防哨也建立起来了。1492年，领主后裔费奥多尔·科尔托夫斯基和戈里亚因·西多罗夫的骑兵防哨在季哈亚·索斯纳附近打退了鞑靼掠夺者的军队；1528年，王公瓦西里·谢苗诺维奇·奥多耶夫斯基、伊万·伊万诺维奇·谢京、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洛帕塔和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奥夫奇纳的骑兵防哨在奥卡河上打退了人数众多的克里木鞑靼军队。

在奥卡河沿岸建立起了由设防的城、鹿砦、哨防瞭望台组成的一整条防御工事线。“沿岸线”——俄国的前沿防御线就这样形成了。

但是随着俄国边界的向南扩展和南俄一些城市从鞑靼枷锁下、立陶宛王公统治下的收复，防御线愈来愈向南移动，移到了半森林半草原地带。这一带有波杰谢尼耶的古老城市——布良斯克和切尔尼戈夫，有谢伊姆河地区的古老城市——雷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普季夫利是当时俄国最南面的城市。这是当时的一座带有石头城堡的大城。当时还没有沃罗涅日城和库尔斯克城，只有库尔斯克“古城遗址”表明这里在拔都入侵以前的某个时候有过一座大城，而当时（在古城遗址上）“完全长满了树林”。

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拔都入侵使这片南俄地区变成了“旷野”。当然，13世纪后半叶和14世纪时这里的俄国居民比基辅王公时代要少得多。然而13世纪后半叶在“库尔斯克密林深处”（鞑靼人这样称呼靠近库尔斯克的地区），在谢伊姆河地区有雷利斯克、普季夫利、沃尔戈尔、沃罗涅日、利佩茨克等城，有人口多得“像大城般”的一些村镇。

根据威廉·鲁布鲁克亲眼目睹所作的叙述，甚至在拔都入侵之后若干年，鞑靼人也并未在南俄草原上到处感觉自己是主宰者，他们担心行动大胆果断的俄国队伍的袭击，不敢在夜里迁移。在顿河上，在谢伊姆河地区，在苏拉河地区，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区情形也是如此。在这些地区，边区古罗斯居民的直系后裔塞维里亚人，即塞夫鲁克人，仍在播种谷物、捕鱼、采集蜂蜜、放牧牲畜，当然，他们始终警惕着，准备在任何时刻退入城内避难，或躲进草原的小山谷，躲进沿着乌达伊河、苏拉河、普肖尔河、谢伊姆河延伸的浓密森林里（今库尔斯克州的“沃尔斯克拉河区森林”是这些森林的残余）。

塞夫鲁克人很多。这就难怪明里—吉列亦派遣自己的侍从到伊万三世处去时，担心他的使团"进入俄国到您，我的兄长处去时，将会由于塞夫鲁克人而不能到达"。

俄国居民不断地向南推进，愈走愈远。新来的人补充了旧有的俄国自由逃民的队伍，同他们一起走得愈来愈往南。15世纪时在顿河和顿河左岸、霍皮奥尔河、季哈亚·索斯纳、沃罗涅日河、茨纳河一带已有不少从事各种行业的俄国居民。"北方迁居地"的谢夫鲁克人，住在1503年从立陶宛大公处夺回的北乌克兰地区，住在谢伊姆河地区，沃尔斯克拉河、普肖尔河和苏拉河沿岸。

在此以前，1503年俄国、立陶宛之间的边界处在半森林半草原地带过去佩列雅斯拉夫尔公国境内，以后普季夫利领地向南伸展到苏拉、沃尔斯克拉两河上游。塞夫鲁克的"迁居地"就在这里，因生活条件而变为俄国的自然边防警卫队的俄国自由逃民继续住在直到格林希纳为止的遥远的"可经营的土地"上，即住在"苏拉河沿岸荒漠"、北苏拉河地区、北格林希纳、北乌达伊河地区，在那里猎兽、捕鱼、采集蜂蜜和放牧牲畜。

普季夫利地区包括若尔万、比林和远在沃尔斯克拉河草原上的霍特梅什利、霍捷洛西奇或洛西奇乡以及尼灿地区。斯尼波罗德和延伸到谢伊姆河地区的苏拉河地区也在这里。这是"俄国边远地区"的最南端的一些地方，尽管远非"荒漠"，但人口稀少，它们与谢伊姆河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在南方的莫斯科据点的雷利斯克和普季夫利就在这里，它们是最重要的前哨服役中心。各城市的哥萨克和塞夫鲁克骑兵侦察班沿着大道、小路到"荒野"中去执勤。

位于苏拉河和沃尔斯克拉河沿岸地区的"北方迁居地"与谢伊姆河地区的联系是如此地牢固，而立陶宛大公在格林希纳和许多闲置领地上的统治又完全有名无实，以致塞夫鲁克人继续通行无

阻地前往自己的"可经营的土地"，在那里与从卡涅夫和切尔克斯来的，因此在俄国得名为切尔克斯人的乌克兰哥克萨相遇。

往昔的鞑靼密林地区——契尔尼戈夫、库尔斯克和雅戈尔达耶夫的密林地区，以及稍后的立陶宛"地方"，就这样成了俄国的一些乡。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陶宛和鞑靼人不再觊觎这些地区。还在脱脱迷失在立陶宛避难时，就曾用沃尔斯克拉河上会战前不久（1399年）颁发的敕令，将俄国的这些南方地区转让给维托夫特。在15世纪30年代割让给立陶宛的俄国城市名单中，再次发现有我们所熟悉的第聂伯河左岸地区的一些俄国城市。明里—吉列亦在1506年写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中提到：布良斯克、斯塔罗杜布、波切普、雷利斯克、普季夫利等城"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先的"。

我们知道，1507年老西吉斯孟德坚持要求瓦西里（三世）把这些城市和地区归还给立陶宛。

丰饶的边区拥有肥沃的黑土壤，拥有丰产鱼类的河流，有阔叶林和针叶林，那里有很多驼鹿、野猪、鹿、山羊、貂、海狸、熊和猞猁，这些兽类毛皮在国外极受珍视，边区还拥有一片片草原，那里成群的太盘马和高鼻羚羊在奔驰。资源丰富的边区，人口较稀少，与其说到处是城市，不如说到处是"城市遗址"——可怖的拔都入侵时代遭毁灭的俄国城市废墟。富饶的边区看来很容易会再次成为立陶宛大公或克里木汗的卤获物，但是俄国机警地守护着这个富饶的古老俄国边区。

凶恶和贪婪的克里木人继续把俄国看作自己的领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使臣西吉斯孟德·赫伯施坦所讲的一个故事在这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有一次俄国人俘获了一个肥胖的鞑靼人，惊讶地问他："你这个鞑靼狗，甚么东西也吃不到，怎么会这么肥胖？"那个俘虏回答说："我拥有从东方到最西边的辽阔土地，怎么会甚

么东西也吃不到?"这个故事讲了克里木鞑靼人所固有的坚定的看法:俄国是他们的领地,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禁止奴隶狩猎的田地。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公文中不断地讲到克里木人在奥斯科尔河、北顿涅茨河、普肖尔河、奥列利河、沃尔斯克拉河上袭击俄国商人、使臣和手工业者。但是这是一些小规模的、不大的劫掠。

16世纪初,克里木鞑靼人(经常还有诺盖鞑靼人参加)在冬季和夏季对俄国各地举行掠夺性袭击,只不过随着季节不同对其战术稍加改变。

与这些袭击俱来的,是可怖的抢劫和流血,俄国村庄和村落的居民被掳掠走。

俄国城市众多,鞑靼人利用这一点,经过小城堡,在冬天洪流般地源源不绝涌来,在夏天则分成小分队突入,他们开始抢劫、焚烧、奸淫,并掠走俘虏。成千上万的俄国少女、青年、儿童和成年男女被用绳索捆走,然后卖到卡法或科兹洛夫(即叶夫帕托里亚)的奴隶市场,在欧亚非三洲的伊斯兰教国家中担负沉重的奴隶徭役。

米哈隆·利特温曾引用过一个住在克里木彼列科普的一个税吏说的话,那个税吏说:每年有数千名从立陶宛和莫斯科国押来的俄国俘虏经过他的家门,从俘虏的人数来判断,这些国家已不应当剩下人了,但是使他感到惊异的是:这些国家还是住满了人。为了同宿敌克里木鞑靼人作斗争,俄国人在与荒原毗邻的边远地区建造起小城堡,建起城市,设立前哨役。

前哨役究竟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

鞑靼人不是"拥有城市者"。克里木人丧失了成吉思汗和拔都时代的鞑靼人所特具的围攻和夺取设防城市的本领。俄国城市经受住了任何一支人数众多的克里木鞑靼军队的围攻,因此克里木人知道自己的弱点,照例从城市旁边不停留地经过。俄国同克里

木鞑靼人的战争带有独特性。鞑靼人不把夺取城市、侵占疆土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的远征带有大规模抢劫的奔袭性质。强盗国家克里木汗国的凶恶鞑靼军队无数次袭击俄国土地的目的是掠夺各种战利品。

鞑靼人支持不住与他们人数相等的正规军队进行的战斗。他们特别害怕短兵相接、正面进攻，宁可采用狡计，主要是利用其骑兵队的灵活性和突然袭击。他们不使用火器，指靠的是弓、箭、军刀和套马索，以及健壮和有耐力的马。

因此特别重要的是，抢在鞑靼人前头，作好保卫城市的准备，把军队集中在一地，攻击克里木鞑靼军队，打退他们，夺回“被俘人员”和卤获物。为此必须机警地观察。在半森林半草原地带的边境地区，在城市废墟上，在土丘上和高高的柞树上，到处可见到俄国的防哨点。这些防哨点通常包括二至三名塞夫鲁克哨兵、各城市的哥萨克或领主后裔。当一人细心地察看草原和通往南面的道路时，另一人（或另几个人）则放牧马匹。如果地平线上尘土飞扬，哨兵之一立即骑上马，经常“两匹马并行”驰到下一个防哨点，从这个防哨点立即又有一名骑士驰出，通知下一个哨所。通过这种方式把消息远远地传递出去，直到传到莫斯科，开始召集军队，各城准备作战，奥卡河“沿岸线”准备在“鹿砦”后面进行反击为止。用焦油桶燃起的烟，枯枝、干草的篝火火焰，把鞑靼人临近的消息通知人们。草原上点起火和出现烟柱，或在夜里出现篝火火光，这就表明有了可怕的危险——“鞑靼军队来了！”

由塞夫鲁克人和各城哥萨克组成的有经验的哨兵可以在鞑靼人沿着其通常的草原小道行进时根据痕迹的深度、一股股尘土的高度和宽度获知鞑靼的人数、他们所走的路线以及行军速度。当鞑靼人沿着没有道路的地方行进时，则可以根据草原上踩出的路的宽度获知他们的人数、所走路线和行军速度。此外，哨所沿着草原

上的道路远远通向草原深处，通向沃尔斯克拉河、北顿涅茨河、托尔河、米乌斯河。塞夫鲁克人、各城的哥萨克、领主后裔从雷利斯克、普季夫利等边境城市出来巡行，细心地监视充满危险的草原。

哨所通常做着自己的事——俄国士兵堵住凶恶的鞑靼军队前进的道路；克里木人避免同俄国士兵冲突，他们宁可派遣小队伍抢劫没有防卫能力的村庄，掳掠村落的居民。

这个富饶边区的俄国人就这样地同凶恶、贪婪的掠夺者——克里木鞑靼人作斗争。在这里生活意味着作战，只有作战才能活下去。

瓦西里三世同其父亲一样，不仅起着战士的作用，而且还起着外交家的作用。俄国的国际联系扩大和加强起来。

1508 年，俄国同瑞典签订了为期 60 年的和平条约，并于 1513 年和 1524 年两次确认了这个和平条约。立沃尼亚骑士团被迫同俄国签订了停战条约(1509、1521 和 1531 年)。

1514 年，“以白海、波罗的海地区为一方，以海外各地为另一方”，瓦西里同汉萨同盟各城市签订了为期 10 年的停战条约，诺夫哥罗德的汉萨同盟贸易恢复起来。

1511 年和 1517 年，俄国同丹麦国王约翰和克里斯蒂安签订了联盟条约，根据条约准许丹麦商人在诺夫哥罗德和伊万戈罗德进行贸易。

俄国继续同德国皇帝进行谈判。同伊万三世时期一样，莫斯科外交家利用波兰雅盖洛王朝同德国皇帝争夺匈牙利的斗争，向德国皇帝提出以匈牙利交换应当归并莫斯科的立陶宛，因为立陶宛十分之九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住满“罗斯人”(广义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东正教徒的“世袭领地和继承的不动产”。但是德国皇帝在解决了匈牙利问题(1516 年，出身于雅盖洛王族的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死去）之后，担心俄国势力加

强，便竭力阻止俄国靠兼并莫斯科大公的立陶宛"世袭领地"增长实力；而莫斯科大公的尊号——"全罗斯国君"，不仅使立陶宛大公害怕起来，而且也使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害怕起来。

于是1517年和1526年西吉斯孟德·赫伯施坦的两个使团先后到来。

赫伯施坦没能说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放弃追求位于立陶宛的俄国领地。瓦西里声称，他力求取得"从基辅的祖先处继承的自己的世袭领地"，他在答复德国皇帝时最早自称为"沙皇"，而不只自称为"国君"。

罗马教皇也没有放弃扩大自己对俄国的影响的意图。

罗马教廷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达到目的的步骤。1519年，来了肖姆贝格使团；1524年又来了另一个使团。作为回访，俄国使臣扎梅茨基前往罗马；1525年，俄国使臣季米特里·格拉西莫夫又前往罗马。罗马教皇答允给予俄国厚利，答应授予全俄都主教以宗主教的教职，要求俄国同立陶宛和好，同土耳其作战。使臣们对教皇固执地一再重申："大公想要自己的世袭领地，罗斯领地"，并不醉心于罗马教皇的厚重许诺；对于同土耳其作战的要求，使臣们以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的名义答复说："我们遵循上帝的意志，将反对异教徒，保卫基督教"。这不只是一句空话，而是用事实加以充实的许诺。

南斯拉夫人和希腊人日益频繁地向与自己同信仰的罗斯人的强大国君求援。

1509年，三名塞尔维亚"长老"带着贝尔格莱德都主教费奥凡和专制君主的遗孀斯特凡娜·安格林娜的信来到莫斯科请求给予贝尔格莱德都主教以援助，因为"暴烈的上帝让塞尔维亚的统治权落入了异族手中，本修道院威信扫地，施舍物减少，没有人敬重"。塞尔维亚专制君主约翰等人也请求援助。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效

法“敬重”贝尔格莱德都主教的自己的父亲，赠给安格林娜160张貂皮、4 000张灰鼠皮，并赐给都主教120张貂皮、3 000张灰鼠皮和若干个银勺。

顺便说说，莫斯科王公家族后来同安格林娜的后裔结亲。她的儿子伊万娶叶连娜·亚克什奇为妻。叶连娜的姊妹安娜嫁给了王公瓦西里·利沃维奇·格林斯基，他们俩生下的叶连娜·格林斯卡娅，是瓦西里三世的第二个妻子、伊万雷帝的母亲。

因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同叶连娜·格林斯卡娅的婚姻带有政治性质。这就难怪，莫斯科大公离婚的消息使阿索斯半岛惊恐万状，因为希腊修道士们担心（莫斯科）大公全神贯注于塞尔维亚人，就将不给他们施舍物了。这也就是马克西姆·格列克为反对（莫斯科大公）离婚而斗争的原因，因为他牢记着自己同胞们的利益，当然，这决不排除保守的俄国领主的情绪和意图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在陷于土耳其苏丹统治下的斯拉夫各国中，如下坚定看法日益增长，即认为莫斯科是完全独立于“阿加尔人”（土耳其人、伊斯兰教徒）的唯一的东正教斯拉夫强国，只有它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可恶的土耳其枷锁。

半世纪后，一位意大利人不无缘故地写道：“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莫累亚、希腊的所有各族人民都崇敬莫斯科大公的名声，因为这些民族都正属于同一希腊宗教，不希望除他而外的任何人的手来把他们从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强大俄国的声望也传到了遥远的印度。

1532年9月，瓦西里三世接见“莫卧儿大帝国”的创建者印度苏丹巴布尔的使团。巴布尔通过其使臣哈只一忽辛告诉说，他愿意同莫斯科大公建立“友谊和兄弟情谊”。瓦西里三世答复说同意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但是巴布尔不久去世，这次出使没有取得

成效。

俄国就这样壮大起来，其大公和国君在其他各国中的威信增长起来。

大公、沙皇和国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在俄国的权力和威信也增长起来。如果说瓦西里的父亲还得听领主的“许多辱骂、责备”的话，尽管他容忍不了反对意见，那末瓦西里本人已经不仅不能容忍反对意见，而且不容许有反对意见了。

对试图与瓦西里顶嘴的杜马领主伊万·尼基季奇·别尔先—别克列米舍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曾愤怒地大声喊叫道:“庄稼佬，滚开！不要说了。”

难怪这个气恼的领主对马克西姆·格列克抱怨说:“如今……我们的国君把自己作为与大家不相干的人反锁在房间里，在卧床旁办理各种事”。这位领主维护领主杜马，把亲信拉拢在自己周围，并预言:“改变自己习俗的领地是不能长久存在的，而大公改变了我们这里的旧习惯，难道认为这对我们有好处？”

这已经是不可轻视的“反对意见”了，因此毫不足怪，1526年2月，别尔先—别克列米舍夫和书记费奥多尔·扎列内便由于对国君讲了不恭敬的话而被判罪。

这也是西吉斯孟德·格尔贝尔施坦谈到瓦西里三世时写下如下这段话的原因:“他以其对待臣属所使用的权力轻易地超过了世界的一切帝王。他完成了他父亲开创的事业，那就是从一切王公和其他统治者处夺走他们的一切城市和堡寨。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把城堡委托给自己的亲兄弟，因为他不信任他们。他用残酷的奴役手段同样地压迫一切人，以致如果他命令谁留在他的宫廷里或去作战或领导某个使团，那个人就不得不靠自己去履行任务……在他的顾问中间，没有人敢同他分庭抗礼或在任何事上反驳他。他们公开声称:国君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国君所做的事

无不根据上帝的意志。”

马克思曾指出瓦西里三世在位时俄国军队的人数众多及其力量和商业的繁荣。①

瓦西里三世消灭了没有成为其家族成员财产的最后一批封邑，他对自己的兄弟及其侍役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制度。但是在大公自己的家庭中并不是事事如意的。瓦西里第一次同出身于古老的莫斯科显赫领主家族的索洛莫尼娅·萨布罗娃结婚后，没有生下子女，于是发生了离婚问题。大多数领主和瓦西里周围的书记都坚决主张离婚，因为否则王位将转归瓦西里的两个活在世上的兄弟——封邑王公尤里·德米特罗夫斯基或安德烈·斯塔里茨基。这样，与失明者瓦西里时代相似的局面就又要重新出现，君主专制制度就要遭到可怕的打击。但反对大公政权加强的斜眼瓦西安、马克西姆·格列克、谢苗·库尔布斯基(伊万雷帝时期著名的叛逆王公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的祖父)坚决、大胆地行动起来。然而力量不在他们这方面。约瑟夫·沃洛茨基事业的继续者——都主教丹尼尔及宗教界的大多数人，领主、书记、“领主后裔”以及据格尔贝尔施坦作证只受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赏识的“收入低微……、受贫穷压迫的知名人物”，办成了自己的事。1525年11月，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同被送入修道院的索洛莫尼娅·萨布罗娃离婚，1526年1月，他同叶连娜·瓦西里耶芙娜·格林斯卡娅结婚。1530年，叶连娜生下了儿子伊万，一年多后又生下了尤里。

1533年9月，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患重病。所患的病(由于痈疽引起的血中毒)是不治之症。当10月查明病的性质时，瓦西里对自己事业的命运特别担心。让年仅三岁的大公登上宝座——这就足以使封建“王公后裔”的反动势力活跃起来。瓦西里细心地对其兄弟尤里和安德烈隐瞒了自己的病，但由于感到大限临近，他

① 马克思:《编年史摘记》，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8卷，第161页。

开始采取行动。宫内杂务侍臣曼苏罗夫和书记梅尼绍伊·普佳京取来他和他的父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旧诏书。瓦西里反锁上门，同二名亲信一起悄悄毁掉了旧诏书，然后召来宫廷管事希戈纳·波德若金,“三人在卧床旁”开始决定召请哪些领主来草拟遗诏的问题。召来了领主王公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舒伊斯基、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扎哈林、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司库彼得·伊万诺维奇·戈洛温，宫廷管事希戈纳·波德若金，书记梅尼绍伊·普佳京和费奥多尔·米舒林。

除这些领主外，后来参加商议的还有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舒伊斯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图奇科夫以及在三岁的儿子伊万根据父亲的遗诏登上宝座时被女执政者叶连娜·瓦西里耶芙娜留下的她的叔父米哈伊尔·利沃维奇·格林斯基。

但是瓦西里直到死去为止，仍然只相信自己，他的最亲近的助手是书记，而不是领主。

1533 年 12 月 4 日夜，瓦西里三世命令全体人员为伊万“效劳”，因他已将“自己国家”授予他。之后，瓦西里三世与世长辞。

三岁的伊万四世·瓦西里耶维奇，即伊万雷帝，登上了宝座。

第十四章

14 世纪到 16 世纪初的俄国文化

随着罗斯各地合并成统一的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国防的巩固，疆界的扩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巩固，以及俄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的形成，一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独特的俄罗斯文化发展了起来。

列宁强调指出了相伴而来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统一国家形成的“民族觉醒”。[①]

斯大林指出：“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他进而强调指出：“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②]

因此，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俄国是真正发展俄国文化的最重要条件，是俄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前提。

这是各领地、各地区和各公国合并为统一国家的时期，是形成大俄罗斯语言的时期〔而语言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形成)的基础〕，是民族觉醒和复兴的时代，是俄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形成的时代。

莫斯科罗斯(Московская Русь)经济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复杂化，国家组织的发展，为俄国独立自主所进行的斗争，它对国

---

①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载«列宁文稿»，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90 页。

② 斯大林：«贺词»，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5 页。

际事务的影响的加强，民族自觉的增长，——这一切总起来不可避免地引起俄国文化的发展壮大。

摆脱可恶的鞑靼枷锁是决定莫斯科罗斯文化迅猛发展的最重大因素。鞑靼枷锁的脱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4 世纪末、15 世纪和 16 世纪俄国科技、艺术的发展，反映了为俄国土地、为俄罗斯人的独立所进行的斗争。俄罗斯人民的独立创建了强大的罗斯——俄罗斯国家，使它跻身于最强大的国家之列，光荣地捍卫了自己独立自主存在的权利。从鞑靼枷锁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的人民的创造力表现在建筑和绘画中，工程技术和政论作品中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中。辽阔富饶和强大国家的建立造成了俄国人民的文化需要和科学兴趣的有机发展。

一切都在变动，一切都在斗争中，一切都在运动；所有一切都在迅猛地发展、成长，在自发地趋向生活，趋向现实，趋向“生气勃勃”。

我们在前文中已指出表明14—15世纪俄国手工业发展特征的那种高涨。这种高涨首先表现在有艺术表现力的手工业的发展上。

精致技艺达到了高度发展水平。俄国的饰以珐琅的制品特别驰名，如：碗、碟、十字架、武器、精制匣子、戒指，等等。装饰得富丽堂皇的俄国武器也很出名。枪托、火绳枪机、军刀、战斧，是高度技艺的产品。

俄国有不少有技艺的模压工和手艺工人，他们能在金银制品上“用乌银涂出”极为复杂的图画。俄国木雕刻匠的技艺也特别精巧，花纹的复杂和制作的精细有时令人感到惊讶。甚至连钳工们也创造了有高度艺术表现力的制品，简单的门环、钥匙、锁变成了艺术品。有真正艺术表现力的骨制品和刺绣品在俄国很出名。细

木工和木匠的特点是技艺高明，异常细致。莫斯科罗斯的无名建筑师建造了结构复杂、极其宏丽的建筑物。

修复诺夫哥罗德索菲亚大教堂的著名“科尔孙门”上失去的零件的诺夫哥罗德“工匠阿夫拉姆”的出色工作；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维尔斯基（15世纪中叶）在镶银的优质钢矛上根据《谢勒坎故事》情节所绘八个场面的精致版画；1435年诺夫哥罗德盛圣饼盘上的优美模压浮雕花纹；扎戈尔斯克博物馆所藏15世纪末的福音书封皮；1383年为苏兹达尔大主教季奥尼西所制的镀有乌银、珐琅、金层的匣子——这些都是手工技艺的杰作。

诺夫哥罗德大主教莫伊谢伊的一个1330年制成的镶银、饰有金银丝蟠花的碧玉祭杯；工匠阿姆夫罗西（15世纪前半叶）用胡桃木和红木雕刻的精致十字架和小圣像；领主费奥多尔·科什卡的福音书封皮上镶有圆框的搪瓷浮雕（1392年）；诺夫哥罗德瓦西里耶夫门上的镀金（1336年），——这些都是俄国工匠的优秀作品。

从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起俄国工匠敢于把自己的名字题在制品上的原因是很明显的，与无名工匠的作品一起，出现了题名的制品：工匠卢基扬的三折圣像（1414年）、工匠伊万的盛圣饼盘（1436年）、工匠伊万·福明的祭杯[①]（1449年）、工匠阿姆夫罗西的折叠神像（1456年）、“马卡罗夫制作的带有皮带的金腰带”、“希什金制作的金腰带”（14世纪），等等。

毫不奇怪，“在俄国人所称做的俚语俗语词汇中”，为甚么铁锁很受14世纪捷克的欢迎；到南方克里木去做买卖的俄国商人为甚么随身带着赛过意大利和大马士革制品的锁子甲、铠甲、刀、针和其他钢制品和武器；而明里一吉列亦为甚么持续不断地向莫斯科大公要“铠甲”。

俄国的能工巧匠的情况便是如此。他们的经验和技艺，职业

① 三折圣像、盛圣饼盘、祭杯，都是教堂用品。

技术素养和他们通过经验方法得出的自然科学结论，——所有这一切为真正科学知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4世纪至15世纪初，俄国的建筑艺术特别繁荣。从14世纪末起，在莫斯科、科洛姆纳和其他城市开始建造大型建筑物，这反映了库利科沃会战胜利的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涨。

应伊万三世之邀来到莫斯科的外国工匠（这里必须指出，所邀请的只是很高水平的“巧”匠）亚里士多德·非奥拉文提、马可·鲁福、庇特罗·安托尼奥·索拉里、阿列维兹、安东·弗里亚津，建造了高楼大厦和作坊，训练了俄国工匠，但同时他们本身也学习了俄国技术，吸收了俄国自然科学知识，并赋予自己的创作以俄国特征。俄国工匠掌握“外国的”、“海外的”东西，使它为俄国“本国的”东西服务，并把外国人的经验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

莫斯科统一罗斯各地时期民族自觉的发展表现为对本国古代、对罗斯往昔统一时代文物、对弗拉基米尔建筑遗物兴趣的增长。在顿河王德米特里和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在位时期，修理和修复了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和彼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的大教堂，等等。

伊万三世时期的俄国建筑师克里夫佐夫、梅什金、叶尔莫林，以及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的工匠们，建造了宏大的建筑物。解决保持平衡方面的最复杂问题的光荣属于叶尔莫林。

普斯科夫工匠是技术高明的建筑师。他们给自己本土的边境城市筑起坚固的石墙，这些石墙引起法国旅行家德—兰努阿的热情赞誉（1413年）：“普斯科夫围有坚固的石墙，其中有一座很大的城堡……”。这些普斯科夫工匠与叶尔莫林同样地能解决保持平衡的问题。因此，15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工匠不信任德国工匠，按自己保持平衡的方式修复诺夫哥罗德内城的叶夫非米大厅，结果

效果很好，不是偶然的。在发生地震时，由于拱顶过重，克里夫佐夫和梅什金在莫斯科所建的圣母安息大教堂的墙倒塌，被邀前来担任鉴定专家的普斯科夫工匠确定：造成灾祸的原因是石灰和带有填料的砌体的质量低劣。

当亚里士多德·非奥拉文提建造了与克里夫佐夫和梅什金所设计的相比小得多的圣母安息大教堂时，这个大教堂是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技术的结合，而意大利的因素极其微不足道，因为在俄国土壤上亚里士多德·非奥拉文提的创作已经俄国化了。

1486年，普斯科夫建筑师在内城建造了里佐波洛任纳亚教堂；1490年，在莫斯科建造了克里姆林宫的圣母领报大教堂；1505年，开始建造阿尔汉格尔大教堂。从1487年到1508年，建造了克里姆林宫内的大公宫殿，包括多棱金殿、红色门廊和无数厅堂、房间、楼阁、仓房、贮藏室、房屋底层、过道等。克里姆林宫是俄国建筑业的典型，保存和发展了古代俄国工匠的传统、木构建筑物的设计传统。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于1485年开始大规模建造。1485年3月29日，泰尼茨塔楼（“射塔”）奠基。二年后，别克列米舍夫塔楼奠基，又过一年，斯维布洛夫塔楼奠基。工程真是浩大。无论是由于拆除有碍建设克里姆林宫的修道院、教堂以及搬迁墓地而感到愤怒的宗教界的埋怨声，或是几乎毁掉莫斯科的1488年的可怖的火灾，或是大自然（河流、沼泽）的障碍，都没有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感到困惑。1490年，博罗维茨塔楼和康斯坦丁—叶列宁塔楼已经耸立起来，塔楼之间筑有高墙。另一些塔楼——索巴金塔楼、尼科利塔楼相继建造，并筑起城墙。在涅格林纳庞大的工程正在进行：建造水坝、磨坊和水闸。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死后，工程在他的儿子瓦西里时代继续

进行。挖沟，沟内砌上石头和砖并灌以涅格林纳的水，建起吊桥，莫斯科的第一座石桥于1516年建成。这一年，克里姆林宫的建设基本上完成，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城堡，其规模远远超过著名的米兰城堡和梅斯。

高高的圆形塔楼，曲折的城墙防御线，城墙很厚——这一切都证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建造者很熟悉“火器战”并考虑到随着迅速发展起来的炮兵在攻守术中所带来的新东西。地道、“秘密通道”，用于发现敌方地道的各个出口和“窃听地道”，通道和壕沟，——这一切都有利于进行防守。

但是克里姆林宫不单是一座城堡。它是与地区惊人和谐地结合起来的，完全符合于朝气勃勃的俄国建筑术原则的完整的建筑综合体。

当然，进行建设的不单是莫斯科。普斯科夫也进行建设，卓越的普斯科夫建筑师们在普斯科夫于1496年建造了扎普斯科维耶的主显教堂，于1494年建造了格奥尔吉教堂。钟楼是普斯科夫的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于1467年建成的耶稣升天教堂的出色钟楼尤为突出。普斯科夫仍在继续设防。1482年，扎普斯科维耶四周筑起了石墙。

在普斯科夫归并莫斯科之后，大公仍继续为这座俄国边境城市修筑防御工事。1517年，修复了内城城墙，二年后，书记米休里·穆涅欣建造佩切尔斯基修道院堡寨；1524年，建成著名的格列米亚恰雅塔楼。16世纪时，普斯科夫成为莫斯科之后的俄国设防最强的城市，在立沃尼亚战争期间，斯特凡·巴托里的军队看出该城防御工事的威力，不得不巧妙地从这座威严的俄国城市的城墙下退走。

1478年的一些事件中断了诺夫哥罗德此前若干年蓬勃发展的建设，但是，从1510年莫斯科客商伊万·瑟尔科夫建造任一米

罗诺西茨教堂开始，诺夫哥罗德的建设又复兴起来。1520年，莫斯科客商瓦西里·塔拉卡诺夫在伊沃罗夫大街建造了克利门特教堂，接着，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瑟尔科夫和另一些诺夫哥罗德和莫斯科客商又建造了一座教堂。

奉国君之命，改建了诺夫哥罗德的内城城墙，设计改建了城市的房屋，铺直和扩展了街道。

16世纪上半叶的特征是民间木结构建筑术在形式上和原则上转为石结构建筑术。有幕形顶盖的石建筑物的建成，是这一时期俄国建筑艺术的最卓越成就。在这种形式中，民间木结构建筑术渗入到石建筑术之中。石结构建筑术按木结构天幕式民间建筑艺术的主要图样不断复杂化和愈益完善。莫斯科附近科洛缅斯科耶村的著名的耶稣升天教堂，是源于民间技艺的这种石结构建筑术的最高成就。该教堂建造于1532年瓦西里三世在位时。

这座耶稣升天教堂是高达58米的天幕式宏伟建筑物，它建立在莫斯科河岸陡坡旁的高岗上，与周围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叹为观止。教堂的巨大红砖和白石柱子仿佛从山岗顶点冲出，直刺云霄。

后来，有名的法国作曲家柏辽兹把这座耶稣升天教堂称做“奇迹中的奇迹”。当时人们谈到这座“奇迹中的奇迹”时说：“它的巍峨、华丽和光芒四射，妙不可言，这在俄国前所未有”。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中世纪的一些著名大教堂在高度上都远低于这座耶稣升天教堂。例如，亚眠的大教堂高度为42米，博韦的大教堂高度为47.5米，只有巴黎圣母院高达69米，但它建造了数十年。科隆大教堂的塔楼高达156米，但它建造了700年，直到20世纪时才以现代建筑技术建成。

在建造科洛缅斯科耶耶稣升天教堂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它总共才用几年时间就全部建成了。这是西欧建筑师所没有的建造速度。

如果说16世纪初俄国建筑术的第一个特点是民间木结构建筑技术渗入石结构建筑术，摒弃笨重的拜占庭形式，以及源于民间深处直到晚近还保存在俄国北方的灿烂而生动的天幕式建筑术的繁荣，那末它的第二个特点则是逐渐取代地方建筑术特点的全俄建筑风格的推广。莫斯科的建筑风格推广到诺夫哥罗德（1515年瓦西里三世下令建造的胡滕修道院的普列奥布拉任斯科耶大教堂，综合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传统建筑术的1533年建造的安东尼修道院的奉献教堂）和下诺夫哥罗德（该城在建造内城时重复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基调）、谢尔普霍夫、扎赖斯克、图拉。

莫斯科有理由成为俄罗斯人民族生活和文化的中心。这首先明显地表现在建筑艺术上，它如此鲜明地显示出俄国艺术的民族性，并且大概最早，也最快地把各地风格融合为一个全俄的风格。

15—16世纪俄国建筑术的规模使我们可作如下设想：在建造为俄国工匠增光的大型建筑物时，不仅根据经验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照方配药技能”，而且还根据建筑力学、力学和数学方面的一定理论知识。生产“窍门”只传授给选定的人，这在封建主义时代一切国家普遍如此，于是生产知识成为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秘密，在教材中没有记载。

因此，我们不能只根根俄国工匠没有留下有关其专业的著作，就否认俄国工匠有其本行业的理论知识。

俄国写生画的发展是14世纪后半叶、15世纪和16世纪的特征。人物，他们复杂的心情，他们的行动，愈来愈多地成为俄国画家作画的主题。在基督、圣母、圣徒的画像中，可看到画家们努力表达人的感情和心境的意图。

人物形象在动态中被表现出来。出现了风景画成分，在圣像

上开始画上树木和草，花朵和簇叶。色彩鲜明而朝气勃勃。

对观察和再现现实生活，对“生气勃勃”和独特的现实主义的追求，也表现在艺术领域出现的所谓“壁画”中。其中虽还反映出画圣像的旧的教会精神，但是“壁画”已经脱离教会写生画，开始画寓言故事、讽喻画，并从教堂进入宫廷和大厅中。

莫斯科、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画家的作品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费奥凡·格列克在顿河王德米特里时代先在诺夫哥罗德，后又在莫斯科创作了一批出色的作品。他的外号为“哲学家”，因为他具有用有限的手法、有把握的涂画表达人的复杂心理，取得非凡绘画效果的天赋和才能。

费奥凡·格列克与西梅翁·切尔内一起曾为莫斯科的圣母分娩教堂画壁画(1395—1396年)，为克里姆林宫的阿尔汉格尔大教堂(1399年)画壁画；他与安德烈·鲁布廖夫和普罗霍尔一起曾为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个圣母领报大教堂（1405年）画写生画作为装饰。

但是在俄国艺术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当时最杰出的俄国画家还首推安德烈·鲁布廖夫。人性、深刻的人道主义和抒情以及色彩的明快柔和，是这位天才的俄国画家的特点，他可与古代美术大师，——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奇相提并论。

安德烈·鲁布廖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民族性。人的尊严感、热爱人、真实和朝气勃勃——这一切都取自俄国现实生活，反映出俄国人的心理特点。

安德烈·鲁布廖夫在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开始其创作活动，后来在莫斯科附近的安德龙尼科夫进行创作。与费奥凡·格列克一样，安德烈·鲁布廖夫受到顿河王德米特里和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保护。正如我们已看到的，1405年他曾与费奥凡·格列克一起为圣母领报大教堂画壁画。1408年，他同丹尼尔·切尔

内一起曾为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画壁画，后来1424—1426年又为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圣三一大教堂画壁画。这时他创作了自己的不朽作品——《三位一体》（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安德烈·鲁布廖夫的学生继承了他的事业，还在1460年时，圣母安息大教堂的赞颂侧祭坛的壁画就已盖有安德烈·鲁布廖夫的艺术印章。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另一位天才的俄国画家季奥尼西创作了自己的杰出作品。他的作品的特点是庄严和坚定。季奥尼西与季莫费·亚列茨和科恩一起1481年曾为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绘圣像，1488年曾为罗斯托夫的大教堂绘圣像，1484年，季奥尼西曾为约瑟夫—沃洛科拉姆修道院（Иосифо-Волокол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的大教堂绘饰，1500—1502年曾为别洛泽里耶的费拉蓬特修道院作画。

由于俄国东正教教会的特点，[①] 雕塑艺术发展较弱，但是即便在这个艺术部门中也有过象叶尔莫林这样的杰出大师，叶尔莫林曾于1464年完成装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城门的常胜者格奥尔吉像（现收藏于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的雕塑工作。

14世纪后半叶库利科沃会战时期是罗斯文学创作的高峰。当时的罗斯文学反映出罗斯人民生活的进展，并完全从属于创建统一的俄国和各领地、公国的罗斯居民融合为统一的大俄罗斯民族的任务。爱国主义、乐观精神、充满信心、富丽堂皇和庄严，是罗斯民族创建统一的强大国家时期罗斯文学的特征。

文学愈来愈取得全俄性质。

古代俄国读书人在其著作中最先反映了人民对统一的渴望，对保持罗斯国土独立的渴望，和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于是，

① 东正教教会禁止雕塑作品。

同鞑靼人绰勒罕·图丹诺维奇作斗争的民间传说，著名的《谢勒坎故事》，被记载下来。诺夫哥罗德人创作了两篇反映同德国人和瑞典人作斗争的奇妙古典作品：《关于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传说》和《瑞典国王马格努斯的亲笔手书》。后者是这样开始的："我，在神圣的洗礼中被命名为格里戈里的瑞典国王马格努斯，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一息尚存时写下亲笔手书，命令自己的子孙、兄弟和瑞典全国，宣誓不进攻俄国，因为我们不能成功"。接着列举了从涅瓦河会战到马格努斯出征的瑞典人征伐俄国的全部失败战绩。描写同德国人作斗争的另一个英雄——普斯科夫王公多夫蒙特的故事写得简单而缺乏艺术性。

同鞑靼人的斗争反映在编年史中、《罗斯国土沦亡记》的"纪事"中、有关"马买大战"的纪事中以及模仿古罗斯爱国主义古典名著《伊戈尔远征记》写成的《顿河左岸故事》中。但如果说《伊戈尔远征记》埋怨罗斯军队在卡雅拉的失败，那末《顿河左岸故事》则赞颂了罗斯战士在库利科沃原野的胜利。传遍罗斯国土的不是《伊戈尔远征记》中的那种"忧郁"情绪，而是"欢乐和奔放"心情，不是"哥特美女"把"罗斯"黄金碰得叮当响，而是"罗斯妇女"把"鞑靼"黄金碰得叮当响。根据《顿河左岸故事》，库利科沃会战是为卡雅拉(的失败)复仇，为半野蛮的鞑靼游牧军人使罗斯不得不忍受的一切复仇。

稍晚于《顿河左岸故事》于15世纪中叶创作的《马买大激战故事》，不同于《顿河左岸故事》。《大激战故事》中有教会影响的印记，但它有多处借用民间歌谣。15世纪时，保存在《拔都军队入梁赞纪事》中的叙述同鞑靼人作斗争的古代梁赞民间故事和歌谣得到加工修改。《纪事》叙述了同拔都的鞑靼人作战的勇敢大胆的梁赞青年的事迹，叙述了"经常大声疾呼地"指责罗斯王公"不互相援救"的梁赞普通市民的事迹，生动地描述了梁赞领地遭受破坏的情

况(只剩下了“烟、土地和灰烬”),记叙了奋不顾身地同鞑靼人拚搏的梁赞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斯摩棱斯基·梅尔库里耶纪事»叙及同鞑靼人的斗争。我们在«从脱脱迷失皇帝手中夺取莫斯科»的独特故事,在叙述帖木儿入侵的«弗拉基米尔圣母像纪事»以及罗斯人同鞑靼人的斗争作为次要情节写成的纪事和故事(«穆斯塔夫王子纪事»、«沃尔斯克拉河会战故事»等)中,读到过与鞑靼人斗争的描述。人民反对压迫者金帐汗的怒潮也反映在民间口头创作中。例如,在壮士歌«伊利亚·穆罗梅茨从卡林皇帝手中解放基辅之歌»中,对被鞑靼人捆缚起来的伊利亚·穆罗梅茨就有如下描写:

(他)跳上竖着的半截木头,
挣脱强壮双肩上的绳索。
伊利亚够不着马,
够不着重锤,
那无数铜铸成的重锤。
伊利亚抓住鞑靼人的腿,
那走到基辅城来的腿,
他抓起鞑靼人挥舞起来,
不论挥向何方,都有街道,
不论转向哪里,都有小巷。
他自己一边对鞑靼人说:
“结实的鞑靼人折不断,
执拗的狗撕不烂”。
伊利亚刚说出这句话,
鞑靼人的脑袋已折断,
那脑袋由于挥舞之力直甩而去。

殴打他们，折断他们，最后杀死他们，
剩余的鞑靼人抱头鼠窜，
全都沉没在沼泽中、河中，
留下大车和营帐一片。
伊利亚去找卡林皇帝，
他抓住卡林的白净手臂，
亲自对他说：
“对您皇帝哪，不打也不杀”。
他用瓦坛烧他，
豪放地高昂着头，
把他踢到烧热的石头上，
摔得粉身碎骨……

在有关同鞑靼人斗争的全部罗斯文学作品和所有民间传说中贯串着一条红线，不仅有“沉重”感，而且对自己的优势，对战胜“可恶的鞑靼人”充满信心。

还有其他题材的纪事和故事。例如，《彼得和费芙罗尼娅的故事》这篇有关莫斯科王公的赞助者两个穆罗姆人的故事，叙述了王公彼得对普通农家女费芙罗尼娅的令人感动但却遭当地领主反对的强烈爱情。

那时的作家感兴趣的是他们作品中英雄的心理和内心感受。他们乐于表达自己英雄的复杂内心世界，乐于重复“非常令人感动之处”。14世纪末至15世纪俄国文学的心理描写和某种伤感主义与当时俄国写生画中出现的同样性质的东西是相近的。

在《瓦拉几亚将军德拉库勒的故事》中，按当时对有权势而残酷，但却勇敢公正的君主的观念模式塑造了专制君主的形象。《故事》的作者是在匈牙利和摩尔达维亚住过的俄国人。

《拉丁语……选编》斥责佛罗伦萨教会合并，强调俄国教会的独立自主；瓦西安·雷洛致伊万三世的《书信》，请求大公坚定勇敢地“保卫自己的祖国，抵御穆斯林”；普斯科夫的叶利扎里耶夫修道院修士菲洛费在致普斯科夫人和瓦西里三世的书信中发展了“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帝国”的理论；《弗拉基米尔王公的故事》强调指出莫斯科王公家族历史悠久，出自罗马帝国的创建者奥古斯都的兄弟普鲁斯，并指出：莫斯科王公从最早的基辅王公时代起就是罗斯本土的“拥有者”，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时代起大公就戴上了沙皇冠冕。

约瑟夫·沃洛茨基和尼尔·索尔斯基，都主教丹尼尔和瓦西安·帕特里克耶夫，都有自己的著述。

在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文人”中间，叶皮凡尼·普列穆德雷和马克西姆·格列克尤为突出。

博学多识而有教养，通晓希腊语和其他语言，多次游历过东方各国的叶皮凡尼·普列穆德雷在其著作中显示出特别渊博的学识。他熟悉传记和历史文献，神学和地理学，并熟悉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学者、作家的著作。叶皮凡尼的语言华丽而庄重，充满抒情味和诗意。

马克西姆·格列克曾学习于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研究过神学和哲学，懂得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在俄国，马克西姆·格列克不仅完成了大量翻译工作，而且充当禁欲派主张的热烈捍卫者，他揭露“拉丁邪教”、“犹太邪恶信仰”、“希腊渎神行为”和“奥加良的诱惑”，抨击占星术，撰写讲道稿和政论著作，哲学和神学论文，以及语文学科学著作，进行翻译，把祈祷文改写成诗。这位热爱俄国及其人民，以俄国为其热爱的第二祖国的希腊人，“神保佑的强大俄国的好心肠而最勤奋的朝圣者”，在去世后留下了150多部著作。他的影响很大。他的学生中间，有德米特里·格拉西莫

夫和瓦西里·弗拉索夫(即弗拉西)，领主弗奥多尔·卡尔波夫和别尔先—别克列米舍夫王公安德烈·霍尔姆斯基、安德烈·库尔布斯基、伊万·托克马克，修士尼尔·库尔利亚捷夫和济诺维·奥坚斯基，以及书记费奥多尔·扎列内等人。由上述情况可知，在马克西姆·格列克的学生和崇拜者中间，有许多他所参加的阵营中的守旧派领主的代表人物，他们坚持禁欲派思想，但是也有象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和瓦西里·弗拉索夫这样的人，而且16世纪杰出的政论家叶尔莫莱—叶拉兹姆受到他的影响。伊万雷帝也很尊敬这位“斯维亚托格尔① 式的修士”。

俄国登上积极的外交活动舞台，这就唤起人们对其他国家历史和政治生活的兴趣。于是出现了前述有关“穆季扬”将军德拉库勒的故事；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写的、内容包括利夫·普列穆德雷预言君士坦丁堡将被“罗斯”人解放的、有关土耳其人于1453年攻占(拜占庭帝国京城)帝都的中篇小说；以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1184—1212年)为原型的《女王季纳拉的故事》；皈依基督教的《鞑靼汗国宗王彼得纪事》，等等。

14世纪末至15世纪以至16世纪初的俄国文学充满对俄国强大，对俄国人民力量和才能的信心。它没有狭隘的个人主题和趣味主义。它描写重大的社会问题，涉及社会生活和国家建设的主题，力求尽可能正确地(当然，这是在当时的认识范围内)描写现实和历史真实。

编年史对罗斯民族自觉性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在封建割据时期，在梁赞和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和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编年史家按照王公、主教、大主教和领主的命令进行年史编纂。

随着莫斯科周围罗斯各领地的统一，久而久之，继承1305年

① 斯维亚托格尔为俄国民间壮士歌中的一位有非凡力量的英雄。——译者

大公编年史家传统的各种全罗斯编年史汇编也相继出现。1408年，在都主教基普里安的倡议下，在莫斯科编写了一部全罗斯编年史，即1812年被焚毁的所谓圣三一修道院本编年史。这部编年史颂扬了莫斯科和莫斯科王公伊万·卡利塔，并从罗斯（莫斯科罗斯和立陶宛罗斯）统一的观点分析了一切事件。但是基普里安所特有的统一观点使不想把大公的"世袭领地和可继承的不动产"留在立陶宛手中的莫斯科政治活动家不满意。1418年的福季编年史（作为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和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的基础留传至今）考虑到了这一点，并同时减弱了对罗斯各领地和公国的攻击，不愿在莫斯科和普通诺夫哥罗德人、特维尔人等等之间制造纠纷。因而福季编年史成为此后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普斯科夫、罗斯托夫年史编纂的基础。福季编年史贯穿着民主主义倾向，在纪述同脱脱迷失斗争（1382年）时，把商人、手工业者、为莫斯科和俄国而斗争的真正斗士提高到了首要地位。

在福季编年史中，罗斯的历史没有脱离全世界的历史，而是与之紧密相联。1441年帕霍米·洛戈费特（即帕霍米·谢尔布）编纂的《年代记》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还创立了大公的编年史，即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失明者瓦西里的编年史，以及与出征诺夫哥罗德相联系的伊万三世编年史。

编年史唤起人们对往昔罗斯的兴趣，赞扬基辅王公时代罗斯的统一，号召重新统一，培养爱国主义感情，发展民族意识。

罗斯建筑师用口头传授生产"诀窍"的方法解决了艰难复杂的问题，建造了豪华的厅堂、钟楼、城墙和寺院；罗斯炮匠考虑到缓慢燃烧的火药的特点，增加炮身的长度，使炮弹在炮筒中较久地受到火药燃烧所产生气体的压力；罗斯机械师采用磨轮、绞盘、杠杆和齿轮组成复杂的钟和活塞唧筒，并在制造新的合金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书本”科学也发展着。15—16世纪时产生了由“土地测量”的实际需要、社会生活和国家机关的复杂化所造成的对几何学的兴趣。同样的原因推动着数学的发展。出现了生物学和医学的萌芽(解剖学、生理学、药用植物学)。

为保证“印刷”技术的需要，16世纪出现了“制纸磨机”(有关它的资料见于外国旅行家的记载中)，以及化学的萌芽：颜料和墨水的合成和广泛应用，新的化学组成的发明。

国防需求的增长迫切要求在制造技术和利用武器上采用科学资料。随着“火器战”的出现，产生了装药和炮弹的对比关系的概念，炮径和炮筒长度的概念，规格(按照“核对炮弹直径的制炮方面的器具”生产炮弹)的概念，抬高角度的概念。产生出弹道学。工匠们熟悉了金属的性质。出现了未来步枪的前身——“螺旋纹火绳枪”，出现了后膛炮。

于是，经验和罗斯人的机智帮助莫斯科罗斯的炮匠超过了西欧工匠，创制出了一百年后仍属新技术的武器。

最简单的机器和机件，如滑轮、绞盘、杠杆、齿轮、钟表、活塞唧筒等普及起来。出现了制作“火药”的“火药作坊”、铸工场和制炮场。

由于日益发展的国民经济、国家机关和国库需求的增长，成为生活必需知识部门的应用数学和理论数学发展起来。“土地测量法”、几何学，“木板演算”、“算盘”、加法表、乘方表、分数、方程，以及正如几何学从“土地测量”的需要中成长起来那样从商业的实际需要中成长起来的数学名词本身(“项”出自“项目单”，“差”出自“余额”，“被减数”出自“借债单”，“减数”出自“付款单”，等等)——成为15—16世纪俄国人民财富的所有这些东西，证明了(俄国)数学的高水平。这也就说明，为什么1467年叶尔莫林作出了使当时人感到惊讶的事，他修复了在莫斯科耶稣升天教堂失火中遭灾

的拱顶，使它成为“不能拆开的整体”，并对整个建筑物的各部分加以改造，“使所有的人对这件不平凡的事都感到惊讶”，而建筑师在建造科洛缅斯科耶的耶稣升天教堂时，精确计算了墙的厚度，如墙再薄一点点整个建筑物就会倒塌。

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引起自然科学其他部门即地质学、冶金学、化学（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的发展。这在当时的文献中已有反映。

在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罗斯先进社会思想的代表者“异端派”皈犹教派的文献。

皈犹教派成员将 14 世纪学者的天文学著作《六翼（Шестокрыл）》译成了俄语。《伊玛努伊拉-本-雅科巴（Иммануила-бен-Якоба）》一书有根据天文数学制作的各种表格和皈犹教派的天文学优于占星术的内容。皈犹教派成员研究了《秘密中的秘密》或《亚里士多德之门（Аристотелевы врата）》，以及一些包括各科知识的百科全书型著作，并把哲学家兼医生埃及人摩西的、内容包含有许多哲学、数学和物理学概念的有关逻辑学、形而上学的著作翻译过来。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著作的佚名译者最早使用俄语术语来表示各种概念：如“роженая”——推理，“душевенство”——精神，“гиюль”——物质，“держитель”——主体，“одержанный”——客体，“снур”——直线，“треснурно”——三角形，“плоть”——物体，“простор”——表面。皈犹教派成员通晓和研究欧几里德几何学，讲授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Гален）的生理学和医学，研究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罗斯人民开始按另一种方式了解天体现象，他们不同于其 11 至 13 世纪的祖先，不再把慧星、流星坠落、日蚀月蚀、北极光等“征兆”与人世间的生活事件相联系，而只限于往往精确而详细地描述现象本身。14、15、16 世纪的编年史家时而说：“在许多个黑夜

里可看到天上有象柱子般的人，天空呈现血色般的深红色”，时而又说：“旋风挟大风暴而来，非常可怕的乌云带来雨和大的冰雹”，在前一条记载中编年史家试图说明北极光的性质，把握北极光与周围事物所采取的形态之间的联系，在第二条记载中则力图阐明各种类型的闪电及其起源和对人类的作用。

在《尼康编年史》1472年项下，我们读到有关“扫帚”星的记载：“它所形成的光束非常长和宽厚，它发出的光比群星还亮”。慧星从东向西，“它所形成的光束向前方延伸，光束的末端像大鸟的尾巴般地伸展”。这已是不愧为不得不用肉眼观察天空的天文学家的观察结果。观察结果是准确、可靠和详细的。

普斯科夫编年史家指出太阳发出的光，“在太阳周围(有光环)……光环套着光环，有深红色，有绿色，有白色，有的五色缤纷”。

普斯科夫编年史家不同于基辅时代古编年史家，不把这一切解释为神秘现象，而是试图记述和理解这一切。

《尼康编年史》记载1371年的可怕旱灾时说：“当时干旱严重，极其炎热”。《编年史》试图把太阳上的现象，即太阳上有许多黑点(“太阳上象钉子般的若干黑点”)与地上的现象即炎热的雾气、干旱、沼泽河湖的干涸相联系，最后，《编年史》以前所未见的旱灾对人们的实际影响结束其记载；“当时谷物价格猛涨，所有各地大饥”。仔细观察天空和大气层现象以及气候变化的罗斯人，日益脱离对事件的神秘主义解释，日益减少对各种现象的惊奇和对各种“鬼怪”的害怕，日益试图解释一切，尽可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一切。于是，“文人”根据民间经验创立了最初的天文学和气象学。在例如由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的创建者基里尔于1424年写成的《圣徒、神父规则集(Сборник от правил святых апостол и святых отец)》等等著作中，可找到关于地球广袤、地球构造、空中星球的大小、大气层等等的冷静而切合实际的判断。

16世纪的罗斯人知道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周期，编制过天文表和以复活节为准的不固定节日日期计算表（这些表最早于1492年左右编制于诺夫哥罗德）以及太阴年表，并在记事中指出过天空的异常现象。

皈犹教派的以数学为基础的天文学不用说有更大成就。皈犹教派成员指出了天体运动的协调性（"它们协调一致地运行"），准确地确定若干行星和太阳围绕地球运转的周期（他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运转）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大小。

他们的天文学不为宗教目的服务，远离宗教目的。

14—16世纪的罗斯天文学便是如此。

生理学和医学发展起来。编年史家详细地描述了疾病的进展情况。例如，«尼康编年史»在描述1364年的"瘟疫"时记载说："病是这样的：先像长矛刺在肩胛骨上或刺在对着心脏的胸部附近……，于是人就病倒了，开始咯血，发烧，……接着大量出汗，接着身体颤抖，躺卧一、二天（能躺卧至三天者较少）就死了；至于诸腺患病则不一样：有的在颈部，有的在股部，有的在胸下，有的在肩胛骨后"。

这段记述正是对"黑死病"——鼠疫的相当精确的描述。

此外，在谈到病的传播时，编年史家正确地指出其传染性。

在«索菲亚第二编年史»中保存着有关瓦西里三世病死的详细得令人惊奇的"病史"型的直接的临床记述。大公患恶性痈，编年史编撰者逐日注视病情发展，直到濒死为止。编年史上的记载是根据大公的罗斯宫廷医师和他所聘用的外国医师，首先是罗斯化的尼古拉·布列夫的观察结果和记录编写成的。

顺便说说，在瓦西里三世时人们已经很好地懂得医师所能办到的事和医学在甚么情况下无能为力，而伊万三世时不高明和不胜任的医师"德国人奥通"和犹太人"米斯特尔·列昂"曾因医治小

伊万不成功而被处死。

15—16 世纪时，罗斯人已对传染病的传播有了一些认识。在流行病发生时设置关卡，不准病人参加圣餐礼，隔离病人，等等。在修道院里设立病院和养老院。

医学上的这种变化与通俗医书、《秘密中的秘密》及若干其他生理学、医学著作的传播有关，尽管在这些著作和其他类似著作中真正的知识当然是与迷信和神秘主义掺和在一起的。

对物理学问题的深入研究较薄弱。人们还认为雷是由于一片云与另一片云撞击而产生的，但人们已发现，视野取决于我们的"视力"，注意到虹的颜色，试图解释虹从一种色彩到另一种色彩的变化，知道光线的传播比声音快得多，但是在 14—16 世纪，实践和实践知识在物理学领域内仍占支配地位。

罗斯人在化学方面的知识具有更多的实践性，尽管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在罗斯，人们知道许多制作方法，知道按何种比例混合起来制成墨水、染料，知道在银子上涂乌银，把黄金涂在铁上，溶解朱砂，并知道在获取各种化学物质，生产染料、"饮料"等等时怎样有利，怎样有害。

这一切都刚开始萌芽。但是 14—16 世纪俄国科学在其萌芽状态时就已证明了俄国人的巨大创造力。

罗斯人对其周围世界的认识大为扩展，罗斯人深入欧亚两洲最遥远的地方，铺平了通往"北方"的道路。

早在基辅罗斯时代就已开始的到君士坦丁堡、阿索斯半岛，到"圣地"去朝圣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1389 年，都主教皮缅沿顿河乘船到过帝都(即君士坦丁堡)；1389—1405 年，主教斯摩棱斯基·米哈伊尔曾前往帝都、巴勒斯坦和阿索斯半岛，修士伊格纳季详细记述了他们的这次"游历"。修士辅祭佐西马于 1420 年，"客商"瓦西里于 1465—1466 年，都曾

去过耶路撒冷。

这样的"游历"为数不少，并且我们已谈到过帝都有许多罗斯人，阿索斯半岛有罗斯修道院，谈到过卡法、亚速、苏罗日的罗斯商人以及前往克里木和土耳其的罗斯使团。但是当时罗斯人的所有旅游中最出名的是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的"三海游历"。

1466年，舍马哈统治者希尔万沙·法鲁赫一叶萨尔的使臣阿桑别克来到莫斯科。以出产丝绸驰名的舍马哈使"全罗斯国君"感到兴趣，他派出瓦西里·帕平率领使团到舍马哈回访，帕平应把东方极为珍视的、在飞行速度和气力上胜过一切猎禽的90头矛隼交给法鲁赫一叶萨尔。阿法纳西·尼基京随同使臣前往，与他一起前去的还有若干名莫斯科商人和特维尔商人。阿斯特拉罕鞑靼人在伏尔加河河口袭击了商队，并把商队洗劫一空。只有两只船得以幸免。丧失了自己全部货物的阿法纳西·尼基京改坐其中一只罗斯船。尼基京所坐的阿桑别克的船停靠在打耳班，另一只船则被暴风吹到塔尔基附近的河岸上，罗斯商人在此被凯塔克人擒获，并被抢光。瓦西里·帕平和阿桑别克出面袒护他们，按照法鲁赫一叶萨尔的命令商人们被释放，并被送到舍马哈。其中一部分人返回罗斯。当时尼基京如一无所有地返回罗斯，就将面临入狱的危险。有鉴于此，加之渴望看到遥远而富有的东方各国(东方各国的货物曾运到罗斯)，他便继续远行。尼基京从打耳班前往"永不熄灭地燃着火焰"的巴库，接着坐船渡过里海，在马赞达兰登陆。他在波斯小城查帕库尔住了半年，因为他没有交通工具不能从那里继续前进。接着他迁移到萨里，后又到阿模里，最后，他经过列夷和也思忒前往霍尔木兹。他在这里购买了一些马，因为他得知马匹在印度很值钱，便"于福明娜周的星期天"登上海船"从霍尔木兹进入印度洋"。驶向印度的途中海船行驶了半月。船驶近马斯喀特、第乌，最后在印度坎巴勒城靠岸。俄国人第一次登上了遥远印度

的海岸。他在这里作短期逗留后，继续航行到查乌勒。阿法纳西·尼基京从这里牵着马向印度内地进发。朱涅尔、海得拉巴的比达尔、舍哈利亚乌丁等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印度城市逐一在这位俄国旅行家眼前闪过。尼基京从自己的印度朋友处得知有关锡兰、缅甸、印度支那和中国的情况。俄国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在印度度过了三年，他看到、听到、记住和记录下了许多情况。

他的求知欲无穷无尽，他的笔记很宝贵。我们可从他的《三海游记(Хождение за три моря)》得知各地的气候(在呼罗珊，"容易煮熟饭，有风"，在吉兰，"非常闷热，炎热难忍")、当地人的宗教和动植物、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帕拉瓦特的佛寺、使俄国商人感兴趣的商品、各城各国之间的道路和距离。他的观察是准确的，判断是可靠的，他的记载是公正和详细的，尤其突出的是准确和清晰。

比达尔城苏丹宫廷的豪华没有使他迷惘，他带领众多仆从神话般冠冕堂皇地行进在城里的大街上。他看到"……农村的人们很穷，领主富有而奢侈，他们被抬在银轿上"，种姓的差别使千万人民处于贫困、无权、耻辱和卑躬屈节的境地。

热带国家的异国情调没能迷住他，尽管这些地方的大自然是富饶而美丽的。阿法纳西·尼基京忧郁地想起自己的祖国罗斯，给罗斯以应有的评价："上帝保佑罗斯国土！上帝保佑它！世界上没有像它那样的国家！俄国的某些领主不公正、不善良，但让它走上轨道吧！"

于是1472年春天阿法纳西·尼基京打定主意返回祖国。他用两枚金币支付路费，坐上"海船"返程。暴风把船吹到非州沿岸。海盗企图把他们阻拦在这里，但尼基京和他的同伙们在航行中用金钱赎身，离开了他们。尼基京经阿拉伯海港莫斯卡特抵达霍尔

木兹，从霍尔木兹很快到达特拉布宗，整整一个夏天他从东南到西北穿过了整个伊朗。在特拉布宗，土耳其当局怀疑他怀着某种邪恶的意图来自乌宗—加桑的领地，他好不容易才证实了自已无罪。最后，他找到船，渡过"第三个海"——黑海。经过古尔祖夫来到卡法。他从那里同罗斯"客商"一起进向罗斯，但他没能看到故乡特维尔。在途中，没能走到斯摩棱斯克，阿法纳西·尼基京就去世了。"客商"把他的笔记送到莫斯科，交给书记瓦西里·马梅列夫。后来这些笔记的内容被载入编年史。

俄国旅行家阿法纳西·尼基京的"三海游历"就这样结束了，他比瓦斯科—达—伽马(Васко-де-Гама)的葡萄牙船队停泊于印度岸边早将近30年。

罗斯人曾远达东方。13世纪至14世纪初按照(蒙古)汗的敕令访问当时蒙古皇帝大帐所在地、遥远的哈剌和林的罗斯王公们曾去到东方；自己发起去东方的罗斯商人们曾去东方旅行，人们在15世纪时在伊朗、撒马尔罕、印度看到过这样的精明强干的罗斯商人；罗斯士兵和罗斯技艺熟练的手工业者按照(蒙古)汗的意志迁居到东方。

据中国编年史《元秘史》① 的记载，14世纪时，中国京城汗八里(今北京)附近有罗斯居民点。高明的罗斯猎人和捕鱼人向皇宫送去猎得的禽兽和鱼。早在14世纪30年代，这里就有罗斯士兵的一个庞大屯驻地。

因此，14至15世纪到过中国和印度的罗斯人先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发现这些东方国家，仅次于居领先地位的著名的马可波罗。

自古以来，早在基辅罗斯时代，罗斯人就经常为了商业和出使之事前往西欧各国。在鞑靼一蒙古人入侵后，这些联系虽有所削

---

① 应为《元史》。——译者

弱，但却根本没有中断过。15世纪时，这些联系不仅恢复起来，而且大为扩展。

1439年，罗斯代表团经过德国前往意大利参加佛罗伦萨基督教会代表会议。苏兹达尔修士西梅翁描述了这次旅行。他对杰尔普特、吕贝克、吕讷堡、奥格斯堡、纽伦堡、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都有所记述。1475年，(罗斯)使臣托尔布津前往威尼斯，他为我们留下了自己的出使札记，描述了使他感到惊奇的威尼斯城。

也就在这些年内，费奥多尔·库里岑访问了匈牙利。

1494年，奉伊万三世之命前往丹麦国王处的罗斯使臣德米特里·扎伊采夫和德米特里·格列克，不敢经过科雷万(即塔林)返回罗斯，他们"从瑞典王国附近的德维纳，取道摩尔曼岬附近的海洋，经过索洛韦茨基修道院"返回了罗斯。

这是从西欧国家驶入白海沿科拉半岛海岸回到罗斯的第一次航行。罗斯使臣德米特里·扎伊采夫和德米特里·格列克的航行先于钱塞勒①、威洛比、巴伦支②等人的"发现"。

1496年，使团口头翻译官格里戈里·伊斯托马(据赫伯施坦证实，他是个"通晓拉丁语的干练的人")，奉伊万三世之命出使丹麦，前往国王约翰处。由于国际形势的复杂化和瑞典的敌对态度，格里戈里·伊斯托马没有取道波罗的海，而取道北冰洋。他乘坐自己的船从北德维纳河河口驶出，沿摩尔曼岸边驶行，经过罗斯的拉普兰，绕过了隶属于瑞典国王的"卡扬地区"、位于雷巴奇半岛西北方由挪威人建立的瓦尔德古兹、"野蛮的拉普人地区"和特隆赫姆。那里有罗斯和挪威的"共有"领地，同时格里戈里·伊斯托马所指出的莫斯科国君有向直到特隆赫姆为止的地区征收贡税的

---

① 钱塞勒为英国航海家，曾参加威洛比的考察队寻找东北通道，1553年到达北德维纳河口。

② 巴伦支为荷兰航海家，1594—1597年间曾三次率领探险队沿北冰洋寻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东北通道。——译者

惯例是很值得注意的。

这是沿摩尔曼海岸从罗斯驶往西欧的第一次航行。以后，瓦西里·弗拉索夫曾按同样的路线沿欧洲北端出使西班牙去见皇帝。

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的出访代表着莫大的利益。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生于1465年。在立沃尼亚受过教育，在那里学习精通了德语和拉丁语之后，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参加了象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根纳季和马克西姆·格列克那样的有教养的人的翻译和文学活动。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以杰出的外交家知名于世。他曾担任罗斯使团的口头翻译官，到过意大利、德国、丹麦、挪威、瑞典。他曾三次绕过欧洲北端，沿着科拉半岛摩尔曼海岸驶向挪威和丹麦。

罗斯人在发现通往北方的道路和开拓北方方面所起的作用特别大。诺夫哥罗德及其"下方"的自由逃民在古代曾出逃到白海沿岸。11世纪时已有人出奔尤格拉和铁门海峡(即喀拉海峡)。诺夫哥罗德诸编年史记载了人们奔赴遥远北方的情况。

1320年，"卢卡到过摩尔曼"，1349年，"诺夫哥罗德人和德维纳人到过摩尔曼"。

15—16世纪，罗斯人开发了遥远的北方诸海沿岸地带。这里有冬海岸、夏海岸、特列海岸、白海奥涅加湾海岸、卡累利阿海岸以及其他海岸地带。沿白海、巴伦支海、喀拉海航行成为习以为常的事。罗斯人远远深入北方。远在到达巴伦支之前（它是"开发"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基地），白海、北冰洋沿海俄国居民就已航行到远在北冰洋中的格鲁兰岛或格鲁曼岛（这两个名称都是他们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称呼，正如西欧旅行家和学者曾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同格陵兰岛混淆起来一样，当时认为它大概一直延伸到新地岛）猎兽。

在关于"斯塔罗斯京氏（他们是在格鲁兰岛"上捕猎了数百年

的白海、北冰洋沿海罗斯居民的古老氏族）的传说中有如下说法：早在索洛韦茨修道院创建之前，即1435年之前，最早的斯塔罗斯京氏成员就已开始航行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勇敢的"格鲁曼兰人（груманлане）"（这是航行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白海、北冰洋沿海罗斯居民后来的自称）开发严寒的岛，建立过冬的住处，埋葬死亡者，在坟墓上竖立十字架。可怕的大海没有使他们害怕，尽管

"格鲁曼岛由于害怕，
整个为群山环绕，
周围用冰围住"，

但是

"格鲁曼兰人挺直脊背，
不怕北冰洋"。①

14世纪末当最后一艘海船离开格陵兰岛海岸时，由于气候剧变（北极地带持续百年变冷）丹麦人的殖民地注定要缓慢而令人痛苦地灭亡。

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二世想无论如何要与因冰障而与世界隔绝的格陵兰岛的丹麦殖民地取得联系，因为那里的命运已经几乎有二百年没有任何消息了。国王寻求能找到在北冰洋上通往悲惨死亡人们的道路的人。

从弗里德里克二世写给商人路德维希·蒙卡的信中我们得知：后者在马利穆斯城（这是当时挪威人对建立在科拉半岛上的俄国城市科拉的称呼，该城距今摩尔曼斯克不远）中找到了一个俄国船长帕夫洛·尼舍茨（尼基季奇？），这人"每年在巴托罗缪节（Варфоломеев день）前后"航行到格陵兰岛，他知道通往遥远的北

① 引自白海、北冰洋沿海罗斯居民"格鲁曼兰人"的古老歌曲。

冰洋诸岛的道路。弗里德里克二世请路德维希·蒙卡同此人联系，他应当负起组织这个艰难而危险的考察任务。

勇敢的俄国“格鲁曼兰人”就曾这样航行到格鲁曼岛，而“发现”遥远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荷兰和英国海员及捕鲸者在这个他们看来似乎在他们之前人的足迹未曾踏过的边区，惊奇地发现了被废弃的住宿处上的俄国木房遗迹和孤零零地竖立在阴森的山岩中间的木头十字架。

人类将把认识和开发北冰洋欧洲沿岸地带及拍击它的大海归功于沿海罗斯居民。勇敢的白海、北冰洋沿海罗斯居民住进了“鸟类未受惊扰的边区”。人们“扬帆驶向”新地岛，从海上“驶向”伯朝拉，发现了卡宁半岛、科尔古耶夫岛和瓦伊加奇岛。

跟随“各行各业人员”之后，莫斯科士兵和将军也前往东北，前往西伯利亚〔在提到西伯利亚的最早的欧洲加泰隆地图上称西伯利亚为“塞布尔(Себур)”〕。1483年，费奥多尔·库尔布斯基、乔尔内和萨尔特克·特拉温到过西伯利亚地区。他们到达秋明，到达额尔齐斯河。

15世纪末(1499年)和16世纪初(1501年)，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乌沙特同“伏尔加地区的领主后裔”经卡缅(即乌拉尔山脉)进入西西伯利亚，确定了乌拉尔山脉的最高点及其走向为从北向南，而不是如古代和中世纪作家所推测的为从西向东。在这些伟大的地理发现中，罗斯人受到科米—吉梁人、尤格拉—汉蒂人和曼西人的帮助。

但是俄国人开发欧洲北方特别迅速。到16世纪末时，在雷巴奇半岛的摩尔曼，人口稠密，沿海罗斯居民市镇就其规模大小而言已与城市相近。到这时，出海的罗斯船约有7 500只、船员3万人。同时，罗斯北方沿海居民根本不是遭受贫困的不幸的流放犯人。1556年在白海航行的英国人斯蒂芬·巴罗记载说：与他的船相遇

的罗斯人送给他白面包、挂锁形白面包、上等白面粉、鹅肉、干鱼、几大桶伏特加酒、蜂蜜、啤酒等物。所有的罗斯人都穿戴漂亮，看起来精神饱满、愉快。他们都精明强干和勇敢，航海知识丰富是他们的特点。

斯蒂芬·巴罗指出，"罗斯人①是勇敢和优秀的航海家，他们的船行驶得比英国的船快"。

勇敢而精明强干、熟悉自己的危险事业的罗斯航海家把欧洲北方、亚洲西北部、遥远的北方诸海和西伯利亚介绍给英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

罗斯外交家兼旅行家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是绝对肯定地回答了能否从欧洲通过北冰洋沿西伯利亚海岸到达中国和印度这一问题并画出伟大北方海道略图的第一个人。

据威尼斯人巴蒂斯特·拉穆齐奥证明，格拉西莫夫是向奥格斯堡学者谈到过通过北冰洋驶向东印度的航路的人（1525—1526年）。当1525年夏天罗马接见瓦西里三世的使臣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时，罗马教廷对这位"莫斯科人"表现出特别大的兴趣。

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在谈到东欧、北方和西伯利亚时讲了如此多的新鲜有趣的事，以致听他谈话的保罗·约维立即根据同他谈话的笔记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马上出版了。保罗·约维写的书很受欢迎，曾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各种文字。格拉西莫夫向保罗·约维谈到一望无际的北冰洋，沿着北冰洋右岸航行可到达中国。

同时，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给他看了一幅地图，保罗·约维委托巴蒂斯托·安耶泽把地图制成副本，收入他写的书中。

威洛比、钱塞勒、巴罗、皮特、巴伦支、赫伯施坦等16世纪旅行家利用过罗斯人的地理知识。罗斯的一位船长加夫里拉在斯蒂芬·巴罗航行于科拉半岛沿岸时曾充当引航员为他效劳，而另一位罗

① 指沿海罗斯居民。

斯船长洛沙克熟悉驶往新地岛和鄂毕河的航路，曾带领他的船沿着北冰洋破浪前行。斯蒂芬·巴罗十分热情地回忆起洛沙克、加夫里拉、费奥多尔和基里尔，指出他们在自己航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们的技术，他们的好意。格拉尔德·墨卡托在16世纪中叶绘制其地图集时，为绘出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图)利用了从罗斯沿海居民处汲取来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可能取自罗斯旅行家、航海家、外交家的谈话，或取自(他们绘制的)地图。

15世纪末当最早发现某位书记“在树皮上绘出”河流、湖泊的情况时，就已开始绘制罗斯地图了。在瓦西里三世时，我们不仅有立陶宛罗斯的各地方、河流、道路的“名册”，而且也有了立陶宛罗斯各地、河流、道路的“图”(地图)。

15世纪末至16世纪罗斯人对罗斯周围和遥远地区的这种如此突出的兴趣，使罗斯人较早知道了美洲的情况。

1530年，马克西姆·格列克描写了哥伦布的考察队、古巴及马鲁古群岛(顺便说说，马鲁古群岛是1512年才被葡萄牙人发现的)的情况，20—25年后罗斯人就知道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即“西班牙人韦斯普采”)① 航行的详情，并且马克西姆·格列克写得比马丁·别利斯基和翻译过来的16世纪末的《环宇概况(Космография)》更为科学、准确和认真。这样，14—16世纪的罗斯人以其勇敢的旅行不仅使罗斯重新“为世界各地所知晓”，而且对地理科学作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向西欧和亚洲人民介绍了他们所不知道的地区和海洋。

在我们分析和研究的这一时期里，教育在罗斯得到广泛普及。罗斯有不少“读书人”。其中苏兹达尔人季奥尼西(14世纪人)被

---

①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1454—1512)，航海家，意大利佛罗伦萨人。1499—1504年间曾数次参加西班牙和葡萄牙赴南美洲海岸的航行。他首先提出航行所到之地为世界上新大陆的推测。后来，新大陆遂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洲。——译者

编年史描绘为“绝顶聪明、明智，有事业能力和理性的人”。季奥尼西以其学识渊博使君士坦丁堡修士感到惊讶。根据他的倡议修士拉夫连季编撰了著名的《拉夫连季编年史》。他的朋友下哥罗德人帕维尔·维索茨基“很有学问，是个大哲学家”，在其下诺夫哥罗德的修道院里有时举行“十分”有益的“讲座”，有不少修士前来听讲。

著名的莫斯科都主教阿列克谢是个“学者”。伊万·卡利塔以高度的教养与众不同，当然，不用说他的所有后裔也是如此。

出版了医学、宇宙学、星相学等等的翻译著作，其中包括《卢齐达里乌斯（Луцидариус）》——一种百科全书。罗斯人学习波兰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瑞典语和其他语言。阿法纳西·尼基京用阿拉伯语、波斯语、鞑靼语（突厥语）写作。

15世纪至16世纪初的一些好学而有教养的人已经名留青史，他们是：图奇科夫、托克马克、萨布罗夫、舒伊斯基、卡尔波夫、格拉西莫夫、瓦西安·雷洛等人。在摘录的片段和名言中，可以看出他们知道荷马和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赫西奥多和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和普鲁塔克，修昔底德和伊索克拉底，希罗多德和毕达哥拉斯，德摩斯梯尼和色诺芬，以及古代的其他学者和作家。

这是一些有各种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例如，马克西姆·格列克的志同道合者领主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卡尔波夫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家，他曾接见过克里木、诺盖、喀山（诸汗国）和波兰的使者，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教皇的使节，是一个“绝顶聪明”、“才智横溢”的人。他那好钻研的头脑想弄清一切事物，矛盾和怀疑折磨着他，他担心自己会背离“笃信宗教”之道。他醉心于星相学，认为这是一切科学中的科学，他引用“荷马的话”对马克西姆·格列克写道：“我如今力穷智尽，深陷于怀疑之中”。他的作品充

满了悲伤和悲观主义，他附和福音派教徒约安(Иоанн)断言：“全世界处在灾难中”，他把注意力转向历史。

菲洛费和约瑟夫·沃洛茨基的书信则与他完全相反，充满活力和乐观主义，反映出正在形成的专制制度的思想体系。

瓦西里三世的书记、大公给普斯科夫委派的第一个书记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米休里—穆涅欣正是这种新式的“文人”、爱国主义者、政治活动家，这种人力图把新的国家制度研究明白并在理论上论证它。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尼古拉·涅姆钦(即尼古拉·布列夫)、菲洛费是他的朋友，他向菲洛费请教，请他解决疑问，并根据他的回答来作判断。这位书记的爱钻研的头脑根本不是用“神的天意”来解释一切的。

不能认为罗斯的“文人”寥寥无几。根据文献所载统计数字判断，16世纪初在罗斯北方识字的居民达80%，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兴贵族和领主后裔中有文化者超过65%，在工商区居民中有文化者的百分比达25—30%。许多欧洲国家不能夸耀有这样高的数字。当然，这些数字不是罗斯其他地区和其他阶层的特征。

识字率高是由于罗斯有众多的“教师”造成的。

由“教师”教儿童和青年“读书”的学校遍及罗斯。不论在各大城市、在罗斯的中心，或在边远地区和北方，都有学校。例如，佐西马·索洛韦茨基、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曾就学于奥博涅日耶的乡村“教师”处。安东尼·西斯基曾在白海之滨的乡村中学识字。在有插图的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传记的小型精细画上画有一个房间，11个学生坐在几条长凳上(学习)。人们教导学生“写和唱，教导尊敬”“世俗的书记”和神职人员。

教学生识字，读日课经、圣诗和使徒行传。甚至曾试图建立程度不同的学校——帕维尔·维索茨基曾搞过一种讲座(进行“对话”)。他已经识字，但为了深造，在“明智和有经验的”教会执事亚

历山大·奥舍文斯基(15世纪人)处就学。出现了一些修道院藏书室。15世纪末，修士多西费为索洛韦茨基修道院的藏书室奠定了基础。由于"有学识的"修士活动的结果，在诺夫哥罗德索菲亚大教堂、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沃洛科拉姆修道院、神迹修道院、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等处收藏了大批书籍。瓦西里三世的藏书室使马克西姆·格列克大为惊讶，因为不论在希腊或意大利他都没有见过与此类似的藏书室。这里收藏着蒂图斯·利维乌斯、西塞罗、尤利乌斯·恺撒、索留斯蒂乌斯、斯维托尼乌斯、阿里斯托芬、波里比阿的原著，以及罗马、拜占庭的法典，等等。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斯特凡·佩尔姆斯基、约瑟夫·沃洛茨基、基里尔·科梅利斯基等人用手抄写书籍，并促使自己的修士学生也抄书。

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抄书人"特别著名。因此百条宗教会议(Стоглавый Собор)于1553年指出："……从前俄国的莫斯科和大诺夫哥罗德设有学校，在其他城市有许多人教认字、教写和唱及礼节，因此当时能认字的人很多，而抄写者和歌手至今驰名于世"。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宗教会议之前不久俄国的学校减少了(可能由于这是在伊万雷帝的幼年"领主执政"时期)，但当诺夫哥罗德大主教根纳季于15世纪末请都主教向大公申请建立"严厉的"教育一切人的学校时，他这样做不是由于诺夫哥罗德人不识字，而是因为许多诺夫哥罗德"文人"和"教师"追随"异端派"——皈犹教派，因他所需要的不是单纯识字的人，而首先是"靠得住的"人。

在一切时代，俄国人民都是鲜明而有特色的俄国文化的建立者和创造者。受王公、领主、贵族残酷剥削、压迫的"城乡"普通老

百姓以其非凡的努力创造了祖国文化，并在外敌入侵的岁月里挺身而出保卫祖国。俄国在建筑学、手工艺、航海、捕猎、采掘、艺术、文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地理学、药用植物学、建筑力学和化学方面获得的知识，应归功于许多未留下名字的天才的俄国人，他们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劳动献给了创建民族文化的事业。

普通的俄国人热爱和珍惜书籍。这只要引用脱脱迷失逼近莫斯科城时莫斯科人所表现出的对书籍的关心就够了。他们首先努力抢救书籍。但是除了“书本”知识，还有其他知识——非书面的民间知识、世代相传的经验。罗斯人民知道在何处寻找矿石和地下水，怎样“扬帆航行”，并根据星辰确定方向，知道怎样医治自己和牲畜的疾病，知道从事农事所需的气候，知道建造木房和宏伟建筑物。

伐木工和石匠，建筑师和农人，猎人和战士，海员和商人在数十年、数百年内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能，导致新知识的获得，罗斯人眼界的扩大，对周围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新观点的产生，以及对书籍和知识的渴望，并试图理解所积累的知识、从理论上加以解释。正是对自己经验、思想、总结的这种态度使罗斯人充实起来，产生了一系列实践知识，并涌现出一批技术高明的铁匠、建筑工、首饰匠、炮匠，开发森林、草原的出色农人以及勇敢的航海家和有经验的医生。

煮盐工人和染色工人的化学，建筑工人和伐木工人的物理学和力学，沿海罗斯居民和“各行各业人员”的气象学和天文学，“客商”、使者和沿海居民的地理学和语言学，最早的“知矿员”的地质学和“炮手”的弹道学，——所有这一切都是普通罗斯人民对本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极其宝贵的贡献。

彼尔姆和尤格拉的罗斯农民带着“槭木犁”寻找“空间”——土地来到鄂毕河和白海，建立了巨大功绩。

罗斯人在艰难的劳动中，在同大自然、同“歹徒”和“敌人”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养成了热爱劳动、刻苦耐劳、坚定不移和远近驰名的机警。

社会愿望和人民群众的抗议在当时罗斯的精神文化中得到反映。罗斯人民在其童话中幻想过飞毯、神速奔驰的靴子、自行出现餐食的桌布、神马。在童话和歌曲中表现出人民对社会恶势力的抗议。人民热情地对待穷人，嘲笑富人和凶恶的领主及王公。说故事人、古斯里琴歌手和流浪艺人在各村游荡，讴歌遥远的古代、远古传说和“边远地区”，颂扬俄罗斯的土地。但罗斯有句俗话——“勇敢的流浪艺人的嘲笑使人害怕”。流浪艺人嘲笑领主和僧侣，鞭挞罗斯社会生活的不良现象、邪恶和不义行为，出卖灵魂和受贿行为。罗斯普通人民在寻找真理时倾向“异端派”——斯特里戈尔尼克派和皈犹教徒。

但是人民有时很少用语言同社会上的不公正、阶级压迫和奴役作斗争，因为这样无济于事。但当容忍超过了限度时，城市里的“平民百姓”、“卑贱者”、“小人物”便举行起义，农民也起来反抗。

在俄国建立、巩固和扩展的时代，俄国人民在开发自然财富、支配大自然方面作了巨大工作。表现出了人民的独创才能。这是俄国人民的创造力和科学才能在巨大的积蓄器里积蓄的时代，这种积蓄为一百年后创造出罗蒙诺索夫和塔季舍夫①，库利宾②和波尔祖诺夫③，坎捷米尔④和特列季亚科夫斯基⑤，列维茨

① В.Н.塔季舍夫(1686—1750)，俄国历史学家，著有《俄国通史》及其他历史、地理、种族志学的著作多种。——译者

② И.П.库利宾(1735—1818)，俄国力学家，曾发明多种机械。——译者

③ И.И.波尔祖诺夫(1728—1766)，俄国热工学家，热力发动机发明者之一。——译者

④ А.Д.坎捷米尔(1708—1744)，俄国诗人、外交家，唯理主义的启蒙作家。——译者

⑤ В.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8)，俄国诗人、语文学家。——译者

基[1]和博罗维科夫斯基[2]等人的俄国文化，创造出科学院和大学的俄国文化打下了基础。

---

① Д. Г. 列维茨基(1735—1822)，俄国画家。——译者

② В. Л. 博罗维科夫斯基(1757—1825)，俄国画家。——译者

结 束 语

让我们来作一些总结。

总之，在伊万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时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它以君主专制政权为首，并拥有正在形成的中央集权机构。

同时也形成了俄罗斯(大俄罗斯)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

斯大林指出:“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莫斯科的历史功绩在于，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罗斯建立集中国家的基础和倡导者。”①

经济上升、文化发展、俄罗斯人独立的确立——这就是罗斯各领地合并成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结果。

恩格斯强调说:“……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②

但是，俄罗斯国家形成的过程发生在残酷阶级斗争激烈进行的有阶级的封建社会里。

斯大林指出:“国家的活动表现为两种基本的职能:内部的(主要的)职能是控制多数被剥削者;外部的(非主要的)职能是靠侵略别国领土来扩大本国统治阶级的领土，或者是保护本国的领土不受别国的侵犯。从前的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情形是

① 斯大林:《贺词》,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35 页。

②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52 页。

这样。"①

俄罗斯国家是用人民群众的血汗创建的。但它不可能是人民的,伊万三世的国家控制着被剥削的大多数人,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定出规则,确立农民的农奴身分。在"全俄"范围内开始限制农民"出走",产生了农奴法。在当时条件下要建立强大国家只能以正在形成的君主专制政权为首。

因为伊万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的国家首先以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即被剥削的大多数人为己任,它实行尤里节的规定②,制订1497年法典,鼓励封建剥削和放高利贷,使人民群众注定必遭贫困和无权的命运,所以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便同封建主展开斗争,起来反对当局,反对国家,逃走和"躲避",参加"异端派"和举行起义。

但是强大国家的建立,有助于保卫俄国抵御其他国家和一切"敌人"的进攻,有助于保持俄国的独立自主,抛掉压迫它的鞑靼枷锁,从侵略者立陶宛人和鞑靼人处夺回罗斯国土,有助于大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俄罗斯人丰富多采的文化的发展和巩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与大俄罗斯人有血缘关系,在过去基辅罗斯时代他们曾同东北罗斯的大俄罗斯人的祖先联合为统一的国家,联合为"罗斯人"、"罗斯"、"罗斯部落",但他们不能从波兰、匈牙利、立陶宛和摩尔达维亚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只是在经过许多世纪后,莫斯科罗斯和俄罗斯帝国才把大部分乌克兰人和全部白俄罗斯人合并到自己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统治下。但是18世纪末的沙皇俄国已经成为"各民族的牢狱"。过去由于伊万三

---

①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载《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0页。

② 尤里节为俄历11月26日纪念圣徒格奥尔吉的教会节日。1497年法典规定此日前后各一周间,农奴有从一个封建地主家出走转到另一封建地主家去的权利。——译者

世和瓦西里三世的国家以“捍卫本国疆土，抵御其他国家的进攻”为宗旨，所以俄国的人民群众才支持它，起来保卫自己故土的边界。

因此，伊万三世所取得的成就是有利于俄罗斯人的。伊万三世事业的基本成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消灭封邑和成功地保卫了俄国。关于这点，恩格斯指出：“……甚至在俄国，在征服了诸侯同时，又挣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①

但是16世纪时还保留有封邑惯例、封建割据的残余。列宁谈到这个时期时说；“……国家分成各个‘领地’，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公国，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管理的特点，有时候还保存着自己单独的军队（地方贵族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去作战的）、单独的税界等等。”② 保留下来的封邑有乌格里奇封邑(Углицкий удел)、斯塔里察封邑(Старчцкий удел)。领主兼世袭贵族在其世袭领地内依旧感到自己还是封邑王公、专制的统治者。沃罗滕斯基家族、奥多耶夫斯基家族、舒伊斯基家族以及其他家族“住在自己的封邑内，并拥有巨大的世袭领地”。在领主兼世袭贵族的世袭领地内住着大批仆从、侍役，有堡寨，成批的军队集中在那里。封建割据传统的代表者领主兼世袭贵族阻碍着君主专制政权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加强。伊万雷帝在位时（1533—1584年），领主兼世袭贵族企图恢复封邑制度。但是，伊万雷帝这个“有坚强意志和性格”③ 的人依靠新兴贵族，依靠“进步的沙帝直辖军”，巩固了君主专制政权，确立了直辖制，对旧制度、封建割据制度进行了

①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8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载《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4页。

③ 关于电影《伟大的生活》。《联共（布）中央1946年9月4日的决议》，载《布尔什维克》杂志，1946年第16期，8月，第52页。

最后的斗争。于是造成了“俄国历史的新时期”,在新时期“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这种融合……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既然这个过程的领导者和主人是商人资本家，所以这种民族联系的建立也就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① 在商业关系、资产阶级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形成了全俄市场。民族联系的建立是正在形成的(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的基础。开始了罗斯民族 (народность) 转变为俄罗斯(近现代)民族(нация) 的过程。同时,俄国从伊万雷帝时代起变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基础是俄罗斯封建贵族对一切被征服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和部落(鞑靼人、莫尔多瓦人、马里人、乌德穆尔特人、巴什基尔人、科米—吉梁人、汉蒂人、曼西人,等等)的统治。列宁把俄国确定为“有基础和基地的民族国家”②，并指出了“ 在存在有基地的民族国家以及存在边疆地区的民族压迫的条件下俄国的民族压迫”。③

所有这一切都是伊万雷帝奠定的，而“大约从 17 世纪起”，开始了“俄国的近代史”④。

---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载《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4 页。

②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提纲·民族问题(根据回忆写的提纲)》，载《列宁文稿》,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第 1 版,第 193 页。

③ 同上,第 194 页。

④ 参阅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载《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124页。

附　　录

年　　表

1147年　在编年史上第一次提到莫斯科。

1156年　尤里·多尔戈鲁基在莫斯科周围建筑起木墙。

1209年　在编年史上第一次提到特维尔。

1223年　卡尔卡河会战。

1234年　王公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同诺夫哥罗德人远征爱沙尼亚，攻打立沃尼亚骑士团。

1236—1240年　拔都入侵罗斯。

1237年　立沃尼亚骑士团同条顿骑士团联合。

1238年　西季河会战。

1240年7月15日　诺夫哥罗德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在涅瓦河上战胜瑞典人。

1242年4月5日　“冰上激战”。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在楚德湖上击溃立沃尼亚骑士团。

1247年　特维尔公国成立。

1249年　佩列雅斯拉夫尔王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成为莫斯科王公。

1252—1263年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为大公。

1259年　诺夫哥罗德起义反抗鞑靼。

1262年　东北罗斯诸城(弗拉基米尔、罗斯托夫等城)起义反抗鞑靼。

1263—1272年　(特维尔的)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为大公。

1265—1270年　(特维尔的)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同诺夫哥罗德人订立条约。

1266—1299年　多夫蒙特在普斯科夫担任王公。

1270年　诺夫哥罗德取得在东北罗斯自由经商的敕令。

1293—1303年　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为莫斯科王公。

1293年　鞑靼宗王杜坚侵袭莫斯科。

1294—1304 年　安德烈·戈罗杰茨基为大公。

14 世纪　斯特凡·马赫里茨斯基修道院、尼科利斯基修道院、帕维尔·奥布诺尔斯基修道院、基里尔—切尔莫戈尔斯基修道院、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阿夫拉米·楚赫洛姆斯基修道院的世袭领地上农民发生骚动。

1301 年　科洛姆纳并归莫斯科公国。

1302 年　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并归莫斯科公国。

1303—1324 年　尤里·丹尼洛维奇为莫斯科王公。

1304 年　科斯特罗马人民起义反抗领主。

1304—1318 年　(特维尔的)米哈伊尔·雅罗维奇为大公。

1305 年　莫扎伊斯克并归莫斯科公国。

1305 年　下诺夫哥罗德人民起义反抗领主。

1307 年　莫斯科同特维尔为了诺夫哥罗德发生第一次冲突。

1313 年　诺夫哥罗德同莫斯科结盟反对特维尔。

1318—1322 年　尤里·丹尼洛维奇为大公。

1322 年　尤里·丹尼洛维奇反击瑞典人的进攻到科列拉。罗斯人围攻维堡。

1322—1324 年　(特维尔的)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为大公。

1323 年　尤里·丹尼洛维奇建立奥列舍克堡(彼得要塞)。

1324—1328 年　(特维尔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为大公。

1324—1341 年　伊万·卡利塔为莫斯科王公。

1324 年　莫斯科征服扎沃洛奇耶的楚迪人(科米—吉梁人)。

1326 年　都主教区首府从弗拉基米尔迁到莫斯科。

1326 年　莫斯科建造第一座石头教堂(圣母安息大教堂)。

1327 年　特维尔人民起义反抗鞑靼人(«谢勒坎故事»)。

1328—1341 年　伊万·卡利塔为大公。

1329 年　伊万·卡利塔在诺夫哥罗德兼任王公。

1332—1335 年　伊万·卡利塔同诺夫哥罗德人"失和"。

1335 年　伊万·卡利塔同诺夫哥罗德人签订"条约"。

1336 年　(特维尔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再次取得统治特维尔的敕令。

1337 年　莫斯科内城(即克里姆林宫)发生火灾。

1339 年　莫斯科内城(克里姆林宫)围筑新的柞木墙。

1339 年　(特维尔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在金帐汗国被杀死。

1340 年　布良斯克人民起义。布良斯克“造反者”杀死王公。

1341—1353 年　骄王谢苗·伊万诺维奇为莫斯科王公，并为大公。

1341 年　立陶宛王公奥尔格尔德进攻莫扎伊斯克。

1341，1342，1345，1349 年　普斯科夫同德国骑士团作战。

1342 年　诺夫哥罗德人民起义。

1343 年　爱沙尼亚人民起义反抗立沃尼亚骑士团。普斯科夫援助起义者。

1348 年　普斯科夫同诺夫哥罗德签订博洛托夫条约。普斯科夫彻底脱离诺夫哥罗德。

1348 年　诺夫哥罗德人反击瑞典国王马格努斯的进攻。诺夫哥罗德人远征维堡。

1350—1402 年　奥列格·伊万诺维奇为梁赞王公。梁赞崛起。

1353 年　穆罗姆斯基修道院农民发生骚动。

1353—1359 年　红伊万·伊万诺维奇为莫斯科王公。

1357 年　莫斯科人民起义反抗“大领主”。

1359 年　诺夫哥罗德人民起义。

1359—1362 年　（苏兹达尔—下哥罗德的）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为大公。

1365 年　（梁赞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在谢舍夫森林附近击溃鞑靼王公脱海。

1366—1399 年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为特维尔王公。

1367 年　莫斯科建造石结构的内城（克里姆林宫）。

1368 年　立陶宛王公奥尔格尔德进攻莫斯科。

1369，1399 年　莫斯科同特维尔签订贸易条约。

1370 年　立陶宛王公奥尔格尔德联合（特维尔的）米哈伊尔和（斯摩棱斯克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进攻莫斯科。

14 世纪 70 年代至 15 世纪 30 年代　斯特里戈尔尼克人的异端派。

1371 年　莫斯科同梁赞作战。

1371 年　德米特里·普鲁茨基修道院的农民发生骚动。

1372 年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在柳布茨克附近战胜立陶宛人。

1375 年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击溃特维尔军队。特维尔的米哈伊尔承认自己为莫斯科王公之“弟”。

1376 年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的军队攻占喀山。

1378 年　罗斯军队在沃扎河上击溃鞑靼贵族别吉赤的鞑靼军队。

1380 年 9 月 8 日　库利科沃会战。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击溃马买。

1380 年　莫斯科同诺夫哥罗德签订贸易条约。

1381 年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同梁赞王公奥列格·伊万诺维奇签订条约，根据条约后者承认德米特里的居长地位。

1382 年　脱脱迷失进攻莫斯科。莫斯科被焚毁。

1382 年　莫斯科人民起义。

1382 年　关于火器出现于罗斯的最早的消息。

1385 年　普斯科夫人民起义。

1386 年　立陶宛大公国同波兰王国合并(克列沃联合)。

1389—1425 年　瓦西里一世·德米特里耶维奇为莫斯科王公，并为大公。

1391 年　下哥罗德公国并归莫斯科公国。

1392—1430 年　维托夫特为立陶宛大公国大公。

1395 年　帖木儿在捷列克河上击溃脱脱迷失。

1395—1396 年　费奥凡·格列克同丹尼尔·乔尔内为莫斯科的圣母分娩教堂绘饰。

1397 年　德维纳地区暂时并归莫斯科公国。

1399 年　鞑靼人在沃尔斯克拉河上打败维托夫特。

1399 年　费奥凡·格列克同丹尼尔·乔尔内为莫斯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大教堂绘饰。

1399—1425 年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为特维尔王公。

15 世纪　斯帕斯基·努罗姆斯基修道院、索洛韦茨基修道院、乌斯季—维米斯基修道院、博戈斯洛夫斯基·瓦尔拉姆·斯沃耶泽梅茨修道院、圣三一卡利亚津斯基修道院、科尔尼利·科梅利斯基修道院世袭领地上的农民发生骚动。

1401 年　不里阿耳地区和摩尔多瓦地区并归莫斯科公国。

1401 年　苏兹达尔并归莫斯科。

1404 年　维托夫特侵占斯摩棱斯克。

1405 年　费奥凡·格列克同安德烈·鲁布列夫和普罗霍尔为莫斯科圣母领报大教堂绘饰。

1406,1407,1408 年　莫斯科同立陶宛发生冲突。

1408 年　安德烈·鲁布列夫同丹尼尔·乔尔内为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

教堂绘饰。

1408年 编写基普里安编年史(圣三一修道院本编年史)。

1408年 也迪该围攻莫斯科。

1410年7月15日 罗斯—波兰—立陶宛联军在格伦瓦尔德(坦嫩贝格)战胜条顿骑士团。

1418年 诺夫哥罗德人民起义。

1418年 编写福季编年史。

1424—1426年 安德烈·鲁布列夫同丹尼尔·乔尔内为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的圣三一大教堂绘饰。

1425—1462年 失明者瓦西里二世·瓦西里耶维奇为王公,并为大公。

1425—1453年 莫斯科公国发生内讧。

1425—1461年 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为特维尔王公。

1433年 尤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打败瓦西里二世。瓦西里二世被放逐到科洛姆纳。

1435年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同瓦西里·尤里耶维奇进行斗争。

1439年 佛罗伦萨教会合并。

1440—1492年 卡西米尔·亚盖洛维奇为立陶宛大公国大公。

1441年 帕霍米·洛戈费特《编年史》。

1445年 罗斯军队打败兀鲁—马哈麻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被俘。

1446年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被德米特里·尤里耶维奇·舍米亚卡捕获。他被刺瞎,放逐到沃洛格达。

1447年 舍米亚卡失败。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返回莫斯科。

1451年 鞑靼宗王马佐甫沙进攻莫斯科。

1453年 舍米亚卡去世。

1456年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与诺夫哥罗德人签订亚热尔比茨条约。诺夫哥罗德人承认莫斯科委派的长官。

1456年 莫斯科给梁赞委派地方官。

1461年 莫斯科给普斯科夫委派地方官。

1462—1505年 伊万三世·瓦西里耶维奇为大公。

1462年 停止向鞑靼人缴纳贡税。

1463年 废除雅罗斯拉夫公国。

1464年 叶尔莫林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城门塑造战无不胜者格奥尔吉像。

1467—1472 年　阿法纳西·尼基京游历“三海”到印度。

1467 年　建造普斯科夫耶稣升天教堂的钟楼。

1467 年　《普斯科夫审判法规》最后定稿。

1469—1473 年　普斯科夫同德国人作战。

1471 年　伊万三世远征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人在舍隆河上战败。

1471—1487 年　“皈犹教派”异端派开始活动。

1471 年　(罗斯)使团出使威尼斯和罗马。

1472 年　彼尔姆并归莫斯科国。

1472 年　伊万三世同希腊公主索菲娅(卓娅)·帕列奥洛格结婚。

1474 年　罗斯托夫公国废除。

1475 年　莫斯科使臣托尔布津出使威尼斯。

1478 年　诺夫哥罗德并归莫斯科国。

1478 年　德维纳地区并归莫斯科国。

1480 年　乌格拉河畔的“暂时停留”。鞑靼军队的退却。彻底打碎鞑靼枷锁。

1480 年　编写莫斯科大公编年史。

1480—1482 年　普斯科夫同立沃尼亚骑士团作战。

1481 年　季奥尼西同季莫费·亚列茨和科恩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圣母安息大教堂画圣像。

1482 年　匈牙利国王马特维·科尔温的使团驻莫斯科。

1483 年　(特维尔的)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同立陶宛王公卡西米尔联合反对莫斯科。

1483—1485 年　普斯科夫农民发生骚动。

1483 年　费奥多尔·库尔布斯基考察队前往西西伯利亚。

1484 年　季奥尼西为约瑟夫—沃洛科拉姆斯基修道院的大教堂绘饰。

1485 年　特维尔并归莫斯科国。

1485 年　伊万三世对喀山作战。

1485—1516 年　莫斯科建造克里姆林宫的新墙。

1486 年　普斯科夫建筑师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建造里佐波洛仁斯基教堂。

1487 年　伊万三世占领喀山。喀山汗国对莫斯科国的附庸关系确立。

1487—1508 年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建造大公宫殿。

1488 年　季奥尼西同季莫费·亚列茨和科恩为罗斯托夫的大教堂画圣像。

1489—1505 年　伊万三世同腓特烈三世商谈结盟。

1489 年　维亚特卡并归莫斯科国。

1490 年　建造莫斯科圣母领报大教堂。

1490,1504 年　莫斯科教会各大教堂斥责"皈犹教派"异端邪说。

1490 年　惩治诺夫哥罗德"皈犹教派"。

1492—1494 年　莫斯科国同立陶宛作战。

1492 年　建立伊万戈罗德堡。

1492 年　亚历山大·卡赫京斯基使团到莫斯科请求援助。

1493 年　粉碎莫斯科的亲波兰—立陶宛国分子的阴谋。

1493 年　伊万三世同丹麦结盟。

1494 年　关闭诺夫哥罗德的汉萨同盟会馆。

1494 年　罗斯使臣德米特里·扎伊采夫和德米特里·格列克首次从西欧沿科拉半岛海岸回到罗斯。

1496 年　罗斯使臣格里戈里·伊斯托马完成沿科拉半岛海岸从罗斯到西欧的第一次航行。

1496 年　普斯科夫的圣显教堂建成。

1496—1497 年　罗斯军队远征拉普兰，攻打瑞典人。

1497 年　编纂伊万三世《法典》。

1497 年　M.A.普列谢耶夫率领第一个罗斯使团赴土耳其。

1499—1500 年　谢苗·库尔布斯基远征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尤格拉地区)。

1499—1501 年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乌沙特去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考察。

1500—1502 年　季奥尼西为别洛泽里耶的费拉蓬特修道院的大教堂绘饰。

1500—1503 年　罗斯同立陶宛交战。

1500 年　罗斯人同立陶宛人在维德罗沙河上会战。罗斯军队获胜。

1501 年　罗斯军队在格尔梅德附近战胜立沃尼亚骑士团。

1502 年　金帐汗国被克里木鞑靼人消灭。

1503,1525,1531 年　在莫斯科教会的各大教堂判处"禁欲派"。

1505—1533 年　瓦西里三世·伊万诺维奇为大公。

1505 年　莫斯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大教堂奠基。

1506—1544 年　西吉斯孟德·卡西米罗维奇为立陶宛大公。

1507—1508 年　俄国同立陶宛交战。

1508 年　瓦西里三世同瑞典签订和约(1513,1524 年重申和约)。

1509 年　瓦西里三世同立沃尼亚骑士团签订暂时停战协定（1521 年和1531

年协定一再延期)。

1509年　贝尔格莱德都主教费奥凡和专制君主斯特凡的寡妇安格利娜派遣使团前往莫斯科。

1510年　普斯科夫并归莫斯科国。

1511年　瓦西里三世同丹麦国王约翰结盟。

1512—1522年　俄国同立陶宛交战。

1512,1524年　罗马教皇使团访问莫斯科。

1514年　瓦西里三世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缔结联盟反对西吉斯孟德的条约。

1514年　罗斯军队攻占斯摩棱斯克。

1515年　建造胡滕斯基修道院的主易圣容大教堂。

1516年　建筑莫斯科的第一座石桥。

1517,1526年　西吉斯孟德·赫伯施坦的使团来到莫斯科。

1517年　瓦西里三世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缔结同盟条约。

1517年　修理普斯科夫内城城墙。

1519年　罗斯军队逼进维尔诺近郊。

1519年　建造佩切尔斯基修道院的堡寨。

1520年　梁赞并归莫斯科国。

1520年　安东尼—西斯基修道院世袭领地上的农民发生骚动。

1521年　克里木汗马哈麻—吉列亦侵袭莫斯科。

1523年　奠定瓦西里城堡(瓦西里苏尔斯克)。

1524年　建造普斯科夫的格列米亚恰亚塔楼。

1524年　瓦西里三世远征喀山。

1527年　阿尔谢尼—科梅利斯基修道院世袭领地上的农民发生骚动。

1528年　博尔金三一修道院世袭领地上的农民发生骚动。

16世纪30年代　丹尼尔—佩列亚斯拉夫修道院世袭领地上的农民发生骚动。

1530年　伊万四世出生。

1530年　瓦西里三世远征喀山。

1532年　建造科洛缅斯科耶村的耶稣升天教堂。

人名译名对照表

А

Абдул 奥都剌
Абдул Летиф 阿卜杜尔·列替甫
Август 奥古斯都
Авраамий 阿夫拉米
Аврам 阿夫拉姆
Агапит 阿加皮特
Аграфена 阿格拉费娜
Адам 亚当
Акинф Шуба 阿金夫·舒巴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Стригин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斯特里金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Александр Ошевенский 亚历山大·奥舍文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Плещей 亚历山大·普列谢伊
Александр Свирский 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Суворов 亚历山大·苏沃洛夫
Александр Ярославич Невский 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涅夫斯基
Али-хан 阿里汗
Альбрехт 阿尔勃莱希特
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Хвост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赫沃斯特
Амвросий Контарини 阿姆夫罗西·康塔里尼
Америго Веспуччи 亚美利哥·韦斯普奇
Андрей Боголюбский 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
Андрей Голтяев 安德烈·戈尔佳耶夫
Андрей Кобыла 安德烈·科贝拉
Андр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安德烈·康斯坦丁诺维奇
Андрей Ольгердович 安德烈·奥尔格多维奇
Андре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 安德烈·拉多涅日斯基
Андрей Рублев 安德烈·鲁布廖夫
Андрей Старицкий 安德烈·斯塔里茨基
Антон Фрязин 安东·弗里亚津
Антоний Сийский 安东尼·西斯基
Аппак 阿巴黑
Арапша 阿剌卜沙
Аристотель Фиоравенти 亚里士多德·非奥拉文提
Аристофан 阿里斯托芬
Арсений Комельский 阿尔谢尼·科梅利斯基
Асан 阿散
Асан-бек 阿桑别克
Асыка 阿瑟卡
Афанасий Никитин 阿法纳西·尼基京
Ахмат 阿合马
Ахмат 阿黑麻

Б

Бабур 巴布尔
Баренц 巴伦支
Баттист Рамузио 巴蒂斯特·拉穆齐奥
Баттисто Аньезе 巴蒂斯托·安耶泽
Батый 拔都
Бахметьев 巴赫梅季耶夫
Баязет 巴雅集特
Беклемишев 别克列米舍夫

В

Г

Гаврила 加夫里拉
Гален 盖伦
Гартингер 哈尔廷格尔
Гедимин 格季明
Гезиодо 赫西奥多
Геннадий 根纳季
Герард Меркатор 格拉尔德·墨卡托
Герберштейн 赫伯施坦
Геродот 希罗多德
Гиппократ 希波克拉底
Глеб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нгвин 格列布·瓦西里耶维奇·隆格温
Голохвастов 戈洛赫瓦斯托夫
Гольшанский 戈利尚斯基
Гомер 荷马
Городишенский 戈罗季先斯基
Горяин Сидоров 戈里亚因·西多罗夫
Григорий Истома 格里戈里·伊斯托马
Григорий Морозов 格里戈里·莫罗佐夫
Григорий Судак 格里戈里·苏达克
Гридя Хрулец 格里佳·赫鲁列茨
Гуссейн 忽辛
Гуттенберг 古滕贝格

Д

Дани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Даниил Пенко 丹尼尔·片科
Даниил Холмский 丹尼尔·霍尔姆斯基
Даниил Щеня 丹尼尔·谢尼亚
Данила Иванович 丹尼拉·伊万诺维奇
Де-Ланнуа 德-兰努阿
Демосфен 德摩斯梯尼
Денис 杰尼斯
Джаландин-Султан 札兰丁-莎勒坛
Джан-Али 章阿里
Джанибе 扎尼别
Ди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аозерский 季米特里·瓦西里耶维奇·扎奥泽尔斯基
Димит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 季米特里·格拉西莫夫
Димитрий Пожарский 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
Дионисий 季奥尼西
Длугош 德卢戈什
Дмитрий Боброк-Волынец 德米特里·博布罗克-沃伦涅茨
Дмитрий Грек 德米特里·格列克
Дмитрий Зайцев 德米特里·扎伊采夫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Донской 顿河王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Жилка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日尔卡
Дмит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Дмитрий Минин 德米特里·米宁
Дмитрий Михаилович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
Дмитрий Прилуцкий 德米特里·普里卢茨基
Дмитрий Шемяка 德米特里·舍米亚卡
Довмонт 多夫蒙特
Досифей 多西费
Друцкий 德鲁茨基
Дюдко 久德科

Е

Евсевий 叶夫谢维
Евстафий Дашкевич 叶夫斯塔菲·达什克维奇
Едигей 也迪该
Ейтяк 爱替牙黑
Еле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Глинская 叶连娜·瓦西里耶芙娜·格林斯卡娅
Елена Стефановна 叶连娜·斯杰凡

Мамай 马买
Мансуров 曼苏罗夫
Мария Ярославна Серпуховская 玛丽亚·雅罗斯拉芙娜·谢尔普霍夫斯卡娅
Марк Руф 马尔克·鲁夫
Марко Поло 马可波罗
Марко Руффо 马可·鲁福
Маркс К. 马克思，К.
Марр Н. Я. 马尔,Н.Я.
Мартин Бельский 马丁·别利斯基
Марфа 马尔法
Масуди 马苏第
Матвей Корвин 马特维·科尔温
Матв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
Матвей Поляк 马特维·波利亚克
Мазовша 马佐甫沙
Межамир 梅扎米尔
Менгли-Гирей 明里·吉列亦
Меньшой Путятин 梅尼绍伊·普佳京
Мефодий 梅福季
Микула Васильевич 米库拉·瓦西里耶维奇
Миндовг 明多夫格
Мистр Леон 米斯特尔·列昂
Мисюрь Мунехин 米休里·穆涅欣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Плещеев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普列谢耶夫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Челядня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切利亚德尼亚
Михаил Бакеев 米哈伊尔·巴克耶夫
Михаил Глинский 米哈伊尔·格林斯基
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Мисюрь-Мунехин 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米休里·穆涅欣
Михаил Кутузов 米哈伊尔·库图佐夫
Михаил Львович Глинский 米哈伊尔·利沃维奇·格林斯基
Михаил Олелькович 米哈伊尔·奥列利科维奇
Михаил Семён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 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沃龙佐夫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
Михаил Челядя 米哈伊尔·切利亚季亚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Захарьин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扎哈林
Михаил Ярославич 米哈伊尔·雅罗斯拉维奇
Михалка 米哈尔卡
Михалка Жук Насонов 米哈尔卡·茹克·纳索诺夫
Михалон Литвин 米哈隆·利特温
Моисей 摩西
Моисей 莫伊谢伊
Молдан 莫尔丹
Моложский 莫洛日斯基
Мономахович 莫诺马霍维奇
Мосальский 莫萨利斯基
Мстислав Ростиславич 姆斯季斯拉夫·罗斯季斯拉维奇
Мустафа хан 木思塔法汗
Мухамед-Эмин 马哈麻-额明
Мышкин 梅什金
Мюрид 木里

Н

Нагой 纳戈伊
Назар 纳扎尔
Наримонт 纳里蒙特
Некомат Сурожанин 涅科马特·苏罗扎宁
Нестор-Искандер 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
Никита Попович 尼基塔·波波维奇
Николай Немчин (Булев) 尼古拉·涅姆钦(布列夫)
Николай Поппель 尼古拉·波佩尔

Х

Ц

Ч

Ш

Щ

Э

Ю

地名译名对照表

A

Або 阿博
Азов 亚速夫
Алексин 阿列克辛
Амоль 阿模里
Амьен 亚眠
Андронников 安德龙尼科夫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Астрахан 阿斯特拉罕
Аугсбург 奥格斯堡
Афон 阿索斯半岛

Б

Бартенев 巴尔捷涅夫
Бахчисарай 巴赫奇萨莱
Бежецк 别热茨克
Бежецкая пятина 别热茨克行政区
Бежецкий Верх 别热茨基·韦尔赫
Бежецкий уезд 别热茨克县
Беклемишева деревня 别克列米舍瓦村
Белгород 别尔哥罗德
Белград 贝尔格莱德
Белев 别列夫
Белое море 白海
Белозерье 别洛泽里耶
Белоозеро 别洛奥泽罗
Белоруссия 白俄罗斯
Бельз 别利兹
Березина, р. 别列济纳河
Берладь 别尔拉季
Бидар в Хайдерабал 海得拉巴尔的比达尔
Биринь 比林
Бирман 缅甸
Богемия 波希米亚
Боголюбов 博戈柳博夫
Болгария 保加利亚
Боровск 博罗夫斯克
Босния 波斯尼亚
Босфор 博斯普鲁斯海峡
Брест 布列斯特
Брянск 布良斯克
Буг, р. 布格河
Булгары 不里阿耳

В

Вайгац, о-в 瓦伊加奇岛
Валахия 瓦拉几亚
Вардегуз 瓦尔德古兹
Василь-город (Васильсурск) 瓦西里城(瓦西里苏尔斯克)
Ведрошь, р. 韦德罗希河
Вела, р. 韦拉河
Венгрия 匈牙利
Венеция 威尼斯
Верея 韦列亚
Вильно 维尔诺
Висби 维斯比
Витебск 维捷布斯克
Владимир 弗拉基米尔
Водская пятина 沃德行政区
Вожа, р. 沃扎河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Вологда 沃洛格达
Волоколамск 沃洛科拉姆斯克
Волоколамский уезд 沃洛科拉姆县
Волхов, р. 沃尔霍夫河
Волынь 沃伦
Воргол 沃尔戈尔
Ворона, р. 沃罗纳河
Воронеж 沃罗涅日
Воронеж, р. 沃罗涅日河

Ворскла, р.　沃尔斯克拉河
Ворь, р.　沃里河
Выборг　维堡
Вымь, р.　维米河
Вычегда, р.　维切格达河
Вязьма　维亚济马
Вятка　维亚特卡
Вятка, р.　维亚特卡河
Вяхирева деревня　维亚希列瓦村

Г

Галич　加利奇
Гдов　格多夫
Гелмед　格尔梅德
Генуя　热那亚
Герцике　格尔齐克
Гилян　吉兰
Глинщина　格林希纳
Гнезно　格涅兹诺
Гомель　戈梅利
Городец　戈罗杰茨
Готланд, о-в　哥得兰岛
Гренландия, о-в　格陵兰岛
Гродно　格罗德诺
Грумант　格鲁曼特
Грюнвальд　格伦瓦尔德
Гурзуф　古尔祖夫

Д

Дания　丹麦
Дарданеллы　达达尼尔海峡
Двина Западная, р.　西德维纳河
Двина Северная, р.　北德维纳河
Двинская земля　德维纳地区
Дербент　打耳班
Деревская пятина　杰列夫行政区
Дерпт　杰尔普特
Десна, р.　杰斯纳河
Джунейр　朱涅尔
Димитров　季米特罗夫
Диу　第乌
Дмитров　德米特罗夫
Днепр, р.　第聂伯河
Днестр, р.　德涅斯特河
Дон, р.　顿河
Донец, р.　顿涅茨河
Дорогобуж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多罗戈布日公国
Дрогичин　德罗吉钦
Дубровна　杜布罗夫纳
Дунай, р.　多瑙河

Е

Евпатория　叶夫帕托里亚
Европа　欧洲
Елец　叶列茨
Ельня　叶利尼亚

Ж

Железные Ворота (Карские Ворота)　铁门(喀拉门)
Жмудь　日穆季
Жолван　若尔万
Жукотин　茹科京

З

Заволочье　扎沃洛奇耶
Закамье　扎卡米耶
Закарпатье　外喀尔巴阡地区
Запсковье　扎普斯科维耶
Зарайск　扎赖斯克
Звенигород　兹韦尼哥罗德
Зеленая Дубрава　泽列纳亚·杜布拉瓦
Зеленщино село　泽伦希诺村庄
Золотая Орда　金帐汗国

И

Ивангород　伊万戈罗德
Иезд　也思忒
Изборск　伊兹博尔斯克
Ильмень, оз.　伊尔门湖
Индия　印度
Иртыш, р.　额尔齐斯河
Искор　伊斯科尔
Испания　西班牙

Люнебург 吕讷堡

М

Мазандеран 马赞德兰
Мальмус (Кола) 马利穆斯(科拉)
Мариенбург 马连堡
Маркуша, р. 马尔库沙河
Маскат 马斯喀特
Мачва 马奇瓦
Медведица, р. 梅德韦季察河
Медна село 梅德纳村
Мезень, р. 梅津河
Мец 梅茨
Мещера 梅谢拉
Микули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米库林公国
Минск 明斯克
Миус, р. 米乌斯河
Млево 姆列沃
Можайск 莫扎伊斯克
Мозырь 莫济里
Мокша, р. 莫克沙河
Молдавия 摩尔达维亚
Молитвенское село 莫利特文斯科耶村
Молога, р. 莫洛加河
Молукуские острова 马鲁古群岛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Моравия 摩拉维亚
Морея 莫累亚
Мосальск 莫萨利斯克
Москат 莫斯卡特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Москва, р. 莫斯科河
Москов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莫斯科公国
Мста, р. 姆斯塔河
Мстиславль 姆斯季斯拉夫利
Мурман 摩尔曼
Мурманский нос 摩尔曼岬
Муром 穆罗姆
Муром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穆罗姆公国
Мценск 姆岑斯克

Н

Назарьевская деревня 纳扎里耶夫斯卡亚村
Нарва 纳尔瓦
Нева, р. 涅瓦河
Неглинна 涅格林纳
Непрядва, р. 涅普里亚德瓦河
Нерль, р. 涅尔利河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下哥罗德公国
Нижний Дубяк, р. 下杜比亚克河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下诺夫哥罗德
Ницянская земля 尼灿地区
Новгород 诺夫哥罗德
Новгород-Северский 北诺夫哥罗德
Новосильск 诺沃西利斯克
Ногайская орда 诺盖帐汗国
Нюренберг 纽伦堡

О

Оболенск 奥博连斯克
Обонежская пятина 奥博涅加行政区
Обонежье 奥博涅日耶
Обь, р. 鄂毕河
Оденпе (Медвежья Голова) 奥坚佩(梅德韦日亚·戈洛瓦)
Одоев 奥多耶夫
Ока, р. 奥卡河
Олешье 奥列希耶
Олонец 奥洛涅茨
Онега, р. 奥涅加河
Онежское озеро 奥涅加湖
Орел 奥廖尔
Орель, р. 奥列利河
Ореховый остров 奥列霍夫岛
Орешек (Петрокрепость) 奥列舍克(彼得要塞)
Орешка 奥列什卡
Орлов 奥尔洛夫
Ормуз (Гурмыз) 霍尔木兹
Осетр, р. 奥谢特尔河

Оскол, р. 奥斯科尔河
Остров 奥斯特罗夫

П

Париж 巴黎
Пелым, р. 佩雷姆河
Перекоп 彼列科普
Перемышль 佩列梅什尔
Переяславль 佩列雅斯拉夫尔
Переяславль-Залесский 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
Переяславльский уезд 佩列雅斯拉夫尔县
Пермь 彼尔姆
Печенга 佩琴加
Печора, р. 伯朝拉河
Пинега, р. 皮涅加河
Подвинье 德维纳河流域
Подесенье 波杰谢尼耶
Подолия 波多利亚
Подолье 波多利耶
Подонье 波多尼耶
Познань 波兹南
Покой, р. 波科伊河
Полесье Пинское 平斯克的波列西耶
Полота, р. 波洛塔河
Полоцк 波洛茨克
Польща 波兰
Поротва, р. 波罗特瓦河
Посемье 波谢米耶
Посулье 苏拉河地区
Почеп 波切普
Почка 波奇卡
Прага 布拉格
Прибалтика 波罗的海沿岸
Прикарпатье 喀尔巴阡山地区
Припять, р. 普里皮亚季河
Приуралье 乌拉尔山脉地区
Пронск 普龙斯克
Пряшев 普里亚舍夫
Псел, р. 普肖尔河
Псков 普斯科夫
Пустозерск 普斯托泽尔斯克
Путивль 普季夫利
Пьяна, р. 皮亚纳河

Р

Радогощь 拉多戈希
Радонеж 拉多涅日
Ревель (Таллин) 列维尔(塔林)
Рей 列夷
Ржев 勒热夫
Ржева 勒热瓦
Рига 里加
Ровно 罗夫诺
Россия 俄罗斯,俄国
Ростов 罗斯托夫
Русь 罗斯
Рыбач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雷巴奇半岛
Рязан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梁赞公国
Рязань 梁赞

С

Самарканд 撒马尔罕(撒麻耳干)
Сарай 萨莱
Сари 萨里
Северный Донец, р. 北顿涅茨河
Север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塞维尔公国
Севск 谢夫斯克
Сейм, р. 谢伊姆河
Сербия 塞尔维亚
Серпейск 谢尔佩斯克
Серпухов 谢尔普霍夫
Скорнищев 斯科尔尼谢夫
Слободской 斯洛博德斯科伊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Смолка, р. 斯莫尔卡河
Смолин, оз. 斯莫林湖
Снипород 斯尼波罗德
Сож, р. 索日河
Солдайя (Судак) 索尔达亚(速答黑)
Сора, р. 索拉河
Сосьва, р. 索西瓦河
Старая Русса 旧鲁萨
Стариц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斯塔里察公国
Стародуб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斯塔罗杜

布公国
Степурино село 斯捷普里诺村
Стокголм 斯德哥尔摩
Студеное море 冰海(即北冰洋)
Суздаль 苏兹达尔
Сура, р. 苏拉河
Сурож (Судак) 苏罗日(速答黑)
Сухона, р. 苏霍纳河
Сучава 苏恰瓦

Т

Тавастгус 塔瓦斯特古斯
Таллин (Колывань) 塔林(科雷万)
Таллин Линданисс (Леденец) 塔林·林达尼斯(列杰涅茨)
Тана (Азов) 塔纳(亚速夫)
Танненберг 坦嫩贝格
Тарваст 塔尔瓦斯特
Тарки 塔尔基
Тарту (Юрьев) 塔尔图(尤里耶夫)
Таруса 塔鲁萨
Твер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特维尔公国
Тверца, р. 特维尔察河
Тверь 特维尔
Телятев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捷利亚捷夫公国
Терек, р. 捷列克河
Тетерев 捷捷列夫
Тихая Сосна 季哈亚·索斯纳
Тмутаракань 特穆塔拉坎
Тор, р. 托尔河
Торжок 托尔若克
Торопец 托罗佩茨
Торусса 托鲁萨
Трансивания 特兰西瓦尼亚
Трапезунд 特拉布宗
Тре (Терский берег) 特列(捷尔河岸)
Троицк 特罗伊茨克
Троки 特罗基
Тронгейм 特隆赫姆
Тросна, р. 特罗斯纳河
Трубчевск 特鲁布切夫斯克
Тула 图拉
Туров 图罗夫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ырново 特尔诺沃
Тюмень 秋明

У

Углич 乌格利奇
Угорская Русь 乌戈尔罗斯
Угра, р. 乌格拉河
Удай, р. 乌达伊河
Ужгород 乌日戈罗德
Узун-Гасан 乌宗-加桑
Украина 乌克兰
Унжа, р. 温扎河
Урал 乌拉尔山
Ургенч 玉龙杰赤
Урос 乌罗斯
Уса, р. 乌萨河
Усть-Вымь 乌斯季-维米
Устюжна Железопольская 热列佐波利的乌斯秋日纳

Ф

Феденино, село 费杰尼诺村
Феллин 费林
Финляндия 芬兰
Финмаркен 芬马尔肯
Финский залив 芬兰湾
Фландрия 弗兰德
Флоренция 佛罗伦萨
Франкфурт 法兰克福
Франция 法国

Х

Хлынов 赫雷诺夫
Холмогоры 霍尔莫戈雷
Холм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霍尔姆公国
Холопий городок 霍洛皮镇
Хопёр, р. 霍皮奥尔河
Хотеллосичи (Лосицкая волость) 霍捷洛西奇(洛西奇乡)
Хотмышль 霍特梅什利

Хуст　胡斯特

Ц

Царыград　帝都(察里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Цейлон　锡兰
Цильма, р.　齐利马河
Цна, р.　茨纳河

Ч

Чапакур　查帕库尔
Чаул　查乌勒
Червинск　契尔温斯克
Червленный Яр　契尔夫列内・雅尔
Червоная Русь　契尔沃纳亚・罗斯
Чердынь　切尔登
Черкасы　切尔卡瑟
Черная Русь　契尔纳亚・罗斯
Чернигов　契尔尼戈夫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ехия　捷克
Чудское озеро　楚德湖
Чухлома　楚赫洛马

Ш

Швеция　瑞典
Шейх-аляуд-дин　舍哈-利亚乌-丁
Шексна, р.　舍克斯纳河
Шелонская пятина　舍隆行政区
Шелонь, р.　舍隆河
Шемаха　舍马哈
Шибанская (Тюменская) Орда　昔班汗国(秋明汗国)
Шоша, р.　绍沙河
Шпицберген, о-ва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

Э

Эстония　爱沙尼亚

Ю

Юг, р.　尤格河
Юг Устюг Великий, р.　大尤格・乌斯秋格河
Югра　尤格拉
Юрьев (Дерпт)　尤里耶夫(杰尔普特)
Юрьевец　尤里耶韦茨

Я

Яик (Урал), р.　押亦河(乌拉尔河)
Якоть, р.　雅科季河
Ям　亚姆
Ярославль　雅罗斯拉夫尔
Яуза, р.　雅乌扎河
Яхрома, р,　雅赫罗马河